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thelp.net>

THE BUY SIDE

A Wall Street Trader's Tale of Spectacular Excess

他是华尔街的另类，是个有良心的疯子



“绝命毒师”在华尔街的闯荡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

我在对冲基金的5 840天

(美) 特尼·达夫 (Turney Duff) ©著
艾博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BUY SIDE

A Wall Street Trader's Tale of Spectacular Excess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

我在对冲基金的5 840天

〔美〕特尼·达夫（Turney Duff）◎著
艾博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我在对冲基金的 5 840 天 / (美) 达夫 (Duff, T.) 著；
艾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9
ISBN 978-7-300-21930-1

I. ①痛… II. ①达… ②艾…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9624 号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我在对冲基金的 5 840 天

[美] 特尼·达夫 著
艾博 译

Tong yu Ai de Jiaoyi Shengya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6.75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3 000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华尔街交易员穷奢极侈的写照



我想写一本真实的书，所以书中的地名和人名我都尽量用真的。但是，考虑到隐私，并且我不想让某些高尚和不太高尚的人难堪，于是我改动了一些细节，用了化名。本书最后一页列举了我使用的假名。书里的故事和对话都是靠回忆写出来的，有些时候我浓缩了一下，只写了主要内容。我也尽量把时间顺序搞对，但我还是有可能颠倒一些事情的先后顺序。除此之外，本书就是我能记住的我在华尔街生活的点点滴滴。

序



2003 年 10 月，晚 7：30，纽约

我们准备好了。穿过翠贝卡的时候，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我们的鞋踩在鹅卵石上，发出了响声。在这个点儿，到布卡步婴儿用品店买东西的人已经被周六狂欢的人潮所取代。我和室友们还有我的小圈子——六男三女，全都衣着靓丽，好像要去走红地毯。他们模仿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像黑夜里跟随着我的一群小鱼。我们往西百老汇大道和运河街走着，脚步渐渐加快了。我穿着一件法兰绒衬衫，袖子已经扯掉；下身是我最爱穿的牛仔裤，已有年头了。我戴的眼镜是淡蓝色的墨镜，镜片外沿镶满了假珠宝。

运河酒吧的老板马科斯站在门口等着我们的到来。一见到我，他笑开了，嘴咧得老大。“这些是我的人。”我说着，用大拇指朝身后那堆人一指。门外的红绒围绳一拉开，我们就跟马科斯走了进去。里面几乎空无一人，但不会空太久了。马科斯笑得那么欢是有原因的。他叫我“翰姆林魔笛手”——黑夜之王。很快，那帮忠于我的华尔街新人，会把这个酒吧挤满。

八点钟。运河酒吧门口已经排上了长龙，队伍有一百多人。八点半。人数增加了一倍。门终于开了，犹如盛满香槟酒的大理石水池阀门被拧

开。身着阿玛尼和普拉达的红男绿女们蜂拥而入。我站在门口，充当迎宾员。我的脸颊上多了一个又一个口红印。偶尔，会有人给我一个小礼物——买方就有这么个好处。一位叫布莱恩的朋友，塞给我 10 粒摇头丸。我才不吃呐——呃，要不就来一两粒吧。我把它们塞进口袋，把它们当作派对人情挺好用的。如果我看到哪位朋友的瘾上来了，我就可以走过去，挤眉弄眼地说：“薄荷糖吃吗？”他一开口，我就扔一粒进去。今晚，无底线。

今晚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酒吧、乐队还有贵客名单。发邀请函的是另一个我：克里夫兰·D。这俱乐部刚新装修过，全纽约最好的音响正播着爱丽略的《Work It》，充分展示出这首歌巨大的震撼力。如果有人还傻傻地以为今晚不过是华尔街的普通聚餐，请个高价 DJ 或者请个诸如“欧曼兄弟”或“外国人”这样的怀旧乐队就完事了，那么这种想法会随着摇滚歌手丽莎·杰克逊的出场而烟消云散。当她唱完《紫色细雨》，又开始唱《按我的门铃》，每个男人的下体似乎都被她牢牢捏住。而她，只不过是今晚的前戏。

九点半。夜已疯狂。酒如水流。大家随着音乐摇摆，觥筹交错。我走向吧台，就几步路的距离，走了五分钟还没走到。我跟谁说话都不会超过几秒钟，随时有人拉我的腰背，或者搭上我的肩膀。远处有人挥舞着一根荧光棒，有人举杯向我致意。好像全华尔街的人都来了，至少举足轻重的人都来了。每家交易公司都来人了：买方交易员、卖方交易员、投资银行家、收取固定手续费的交易员，等等。

舞台上，一个叫“天然顽皮”的组合用嘻哈风格重新演绎着杰克逊五兄弟的《ABC》。才唱出几个音节，全场立即都疯狂了。多条旋转频闪器疯狂地照在那些以拳击空的人的脸上。“天然顽皮”的主唱是嘻哈歌手崔奇，他抓着手麦，在台上前后变换着脚步。气氛热度很高，非常高。舞台的前方是一片涌动的人潮。摇摆的身体越靠越近，前面的人想要抽

身绝不可能。音乐演奏没有停歇，气氛越来越热烈，此时崔奇把麦移近了嘴边。“都是跟克里夫兰·D来的？”他说完就把麦伸向台下。“是的，你知道的！”台下吼道。

我站在舞台边上，任贝司的低音狂震我的耳膜。我也跟着吼：“和谐的军队。大卫扔了一颗炸弹。”我跟着崔奇一起唱着，似乎那歌是出自我的口。我们已经不分彼此。我面前这四百名宾客跳着、唱着，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他们超性感、超迷人、醉醺醺、高智商、强有力、不缺钱。他们如同胜利归来、正在狂舞庆祝的部落武士。我知道这家酒吧今年的收入一定会上亿——都是华尔街说的“该死的”钱。而今夜，这些金融界的天才们都掌握在我的手心里。

之后，狂喜渐渐消退，我的心里冒出一股莫名其妙的不安。就在那个膨胀欲炸的瞬间，一道鸿沟出现，我突然惊醒：我刚刚三十四，这个派对就是我的生日庆典。然而，我还应该庆祝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不知咋的，我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搞对冲基金交易的了？这可是华尔街炙手可热的工作。我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既没有常春藤 MBA 的背景，也没有过人的头脑（我面前的这些男男女女才是这方面的天才），但我是华尔街的成功骄子，我证明了这里的名言：收盘以后发生的事情，跟开盘期间发生的事情，同样重要。在办公室灯光熄灭之后，我的光芒才在黑夜里绽放。

但是，我想着我的成就，我老觉得哪里美中不足——我的快乐蒙上了阴影。我无法描述……我就站在那里，在舞台边沿，看着这片可由我掌控的人潮，我却感觉一片空虚。并且，这是长久以来的第一次。这一次，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够填补我的空虚。

目 录

1 第一部分 开端·人戏

缅因州的大雪·摩根士丹利的私人客户服务处·《特尼通讯》·
买方——“法老的采购员”·“悄悄话先生”·龙舌兰与可卡因

87 第二部分 巅峰·深渊

“白宫”·保健板块·翠贝卡的公寓·一根“棒子”的奖金·
“拉链”评级·1 864 999 美元·简

177 第三部分 迷失·重生

多汁烤肉汉堡·罗拉·“打劫”自己·戒毒中心·插、挖、
吸·再次戒毒·写作

249 尾 声

251 谢幕之后

第一部分 开端·人戏

缅因州的大雪

摩根士丹利的私人客户服务处

《特尼通讯》

买方——“法老的采购员”

“悄悄话先生”

龙舌兰与可卡因

1984 年 1 月，缅因州，肯尼邦克

下雪了。我的老家位于野生动物保护区的边缘。蓝灰色角屋的屋顶上，有着 2 英尺厚的积雪。从厨房雾蒙蒙的窗户看出去，四十四岁的老爸在昏暗的光线下，在车道上铲着雪。他比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都健壮。他就像是年轻的威廉·沙特纳，穿好了行头，准备给 L.L. 比恩牌的衣服拍广告。雪花落在他身上和地上。他机械地拿着铲子挖着，铲着，送着。他的节奏感超好，没有一次失误，没有一次停顿。挖、铲、送，挖、铲、送。他口里呼出的气遇冷成了白烟。他身旁是那辆 1977 年的绿色福特 LTD 旅行车，排气管也跟他一样呼着白烟。他一边清理车周围的积雪，一边让车子预热。老爸正在一寸一寸地从积雪里清出车道。挖，铲，送。

我坐在厨房里长长的木桌边，吃着麦片。挖、铲、吃，挖、铲、吃。木地板和白灰墙不断吸收着火炉里燃烧的木柴释放出的热量。厨房是我家最暖和的地方。

我穿着带有波士顿大学标志的毛衣，那是姐姐克里斯丁给我的礼物，她在那儿读大一。她此时在厅里跟大姐德碧看电视，大姐读的是缅因州立大学。她们都是回来过寒假的。我最小的姐姐叫凯莉，达夫家的小女儿，坐在我对面写着家庭作业。我双手捧起碗，放在嘴边。我从碗的上

沿看着凯莉。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面前的课本。我这几个姐姐都遗传了老爸的固执，还有家传的小巧完美的鼻子，就像是整形手术广告上的一样。凯莉刚开始读高中，她是胜利归来的女王。她还是 800 米赛跑州冠军。达夫家的孩子都继承了老爸的体育天分。我呼呼地喝着甜牛奶，把圈形的麦片吸入嘴里。凯莉抬起头看着我，投来一个略带轻视的目光，转瞬即逝。她觉得我很惨。她知道我不想跟老爸去。我朝她笑了笑。

老妈坐在餐桌的另一头，做着十字绣，偶尔呷一口葡萄酒。她的十字绣还得过杂志的奖呐。她齐肩的头发已是灰白，高尔夫球衣外面套着围裙。“你最好别让你老爸看到你晚饭吃麦片。”她说。我一仰头，把剩下的牛奶和圈形麦片倒进嘴里。

“我真不想去。”我说，用手背擦了擦嘴。老妈也知道我不想去，也帮我说过几次话，但是老爸的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到了这个份儿上，他的意志就像是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就连半米厚的积雪也无法阻挡他。挖，铲，送。

老爸认定了，我是当高中摔跤选手的材料。今晚，尽管风雪这么大，尽管我不停地抗议，尽管老妈和所有的姐姐都跟我站在同一战线，尽管我才上初二，老爸已经决定了，他要带我去高中部体育馆练练，让教练看看我的能耐。

老爸本人曾经是个摔跤明星。时隔多年以后，如今在他老家宾夕法尼亚州黎巴嫩山那儿的人，还对他当年的壮举津津乐道。至少有三所大学愿意给他奖学金。但是这三所大学都没有机械工程专业，那是他的第一志愿。因此，他的摔跤梦不得不屈从于事业的选择。

但今天，他也不像是想通过我来重温他高中时期的辉煌往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部分原因是，他想通过摔跤让我变成条汉子。我有三个老姐还有老妈惯着我。老爸说，摔跤垫上的火热、更衣室里的气味能够让我强硬一点。最重要的是，他不想让我和他重复他和他老爸之间

的关系。虽然老爸是高中摔跤明星，也是撑竿跳高纪录保持者，但是我爷爷从来就没去看过我老爸比赛。老爸觉得摔跤是我们——达夫家的男人——的共同语言。老爸深谋远虑，但是只欠东风：我不想玩摔跤。

我想当厨师。朋友的妈妈有一次把我带进“白谷仓客栈”，那是肯尼邦克最豪华的餐馆。大厨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时候，所有顾客都向他行注目礼。我特喜欢这种被人注意和与众不同的感觉。如果当不了厨子，那我当个骗子好了。我太喜欢电影里那些骗子的角色了。六年级的时候，我想勒索一个叫凯莉的女同学。我威胁她，如果她不在图书馆里BBM杂志的第13页放一块钱，我就在下课的时候告诉所有人她的男朋友是谁。她报告了老师，然后我就惹上麻烦了。但是现在，我想上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或康奈尔大学，去学酒店管理。我想什么都由我来管。我想帮别人度个完美假期。再说了，这好像也不太难。也许，我只是不想步老爸的后尘罢了。

对他来说，凡事没有捷径，没有快钱可赚。他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妥善分析，计划周详、滴水不漏。他不会存有侥幸心理。他知道镇上哪家加油站最便宜；他看电视上预告最准确的天气预报。每年夏令时开始的时候，他凌晨两点钟起来把屋里每个钟表都调到正确的时间。虽然我跟他名字一样，也有罕见的蓝绿色（有时转灰）的瞳仁，还有达夫家标志性的鼻子，但我跟他一点都不像。他想给我灌输勤劳工作、守纪律的思想，想让我过井然有序的生活，但我每次都顽强抵抗。他想让我更像条汉子。他想让我更像他。就是因为这个，我此时才坐在厨房里，心里没着没落的。

车库的门开了，又关上了。我知道那是他。“车准备好了。”他向全家宣布：“走吧，特尼。”我点了点头，朝老妈瞥了一眼。我要让她看到她儿子眼里的痛苦。她挤出一丝同情的微笑，而我也知道我别无选择了。

路上只有我们的车。我们静静地一言不发，任飘雪像棉花团一样砸

在挡风玻璃上。真是要命。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去体育馆练摔跤。来个人，杀了我吧。说不定我们会滑到路旁的沟里，动弹不得。我的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忽然，我看到前面有车灯照过来，是黑色的雪佛兰克尔维特。还能有谁。当看到纽约的车牌，我百分百确定了。我们以 10 英里的时速擦肩而过，我看到司机浓密的大胡须。“那是塔克舅舅。”我说。

“他是八小时前出发的。”我们擦肩而过时老爸这么说。我知道现在是不可能掉头回家了。我特喜欢塔克舅舅来家里。他每次都会教我一招扑克牌的把戏。他三十二岁，有的是钱，到处走，生活棒极了。他明天就会带我大姐二姐去滑雪。我一直看着他的车，直到刹车灯消失在风雪之中。车子还没走到第一个“停”的标志，还差 100 英尺老爸就开始减速，因为路口必须完全停车。此刻老爸不看路了，转过来看着我。“知道吗？你很小的时候，还不会爬，你就已经会拱腰了。”他说。

“知道。”我说。他说过 800 遍了。他接着解释，在摔跤的时候，拱腰有多重要。他说，如果被仰面压住了，拱腰是唯一不被压死而输掉比赛的方法。他仰着脖子给我做示范。我知道该怎么拱腰，在摇篮里我就会了。

“肩膀得绷紧，用脖子撑着身体。”他继续唠叨着。我转过头，看着窗外。“是教练请咱们去的，咱就过去看看。”老爸说着，已经感受到我的不高兴。

体育场的地上放着一大块蓝色的摔跤垫子。我一边跟着老爸走到移动看台边上，一边掸掉头上的雪。我朝场地上看过去，到处都是人，慢跑的，做拉伸动作的，有几个已经在摔了。如果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还没开始发育，这时候我就真的知道了。这些家伙块头真大，有几个都长出胡子了。我的感觉比来之前更糟了，心慌得更厉害了，肚子里的黑洞在不断扩大。我不想玩摔跤。教练注意到我们了，老爸微笑示意。

教练跟我们挥手，让我们过去。他四十岁出头，不高，但很健壮。他穿褐色的裤子、蓝色的衣服，胸前有着“肯尼邦克摔跤队”字样，脖

子上还挂着个哨子。他伸出肥大的手跟我握了一下，说他是教练。我强颜微笑，说见到他很高兴。

“怎么，你喜欢摔跤？”

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高喊着不喜欢，但我知道，如果我敢这么说，老爸一定宰了我。我点点头，说：“还行。”还好，教练转过去跟老爸说话了。他们开始用摔跤术语交流，有如高手过招。听他们讲着什么“反手扳头”还有什么“上位身后锁臂”，我真想吐。但是，老爸脸上出现的喜悦之色却是平常少见的。他就像个气球，每一个摔跤术语都把他充得更大一点。

接着，不知怎的我就戴上了摔跤头盔，穿上了专用鞋子，但我坚决不穿那件背心，我穿那件波大的毛衣就可以了。不知是谁递给我个保护牙齿的东西。此时，我还没站上那个摔跤垫子。站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叫布莱恩的高一学生。他比我大一岁，但我初中时候就认识他了。他竟然也在摔跤队，我有点惊讶。从没见过他玩过什么体育项目。他应该是理科类型的——他是班上唯一会用电脑的，而且老玩“阿塔利”或者什么其他电子游戏。我看得出，他挺紧张的，当然不是因为我这娇小的 5.4 英尺的身高，还有 110 磅轻量级的体重。他是怕输给我这个初中生。他的队友们开始给他喝倒彩了，他们也开始给我加油。他输了就全完了。如果他被我打倒了，他的队友们肯定得生吞了他。教练的哨子已经响起。

虽然我有老爸的摔跤基因，但是我没有他的技术。我只懂得拱腰，就这么多。我想着，只要我不被按死，大家就都有面子，我也就算交差了。布莱恩朝我走过来，我们的双手搭上了，开始使劲想把对方撂倒在地上。我立刻可以感觉到，他的速度没我快。他还在讲究正确的姿势和位置。趁他还在讲究那些，我滑到他身后，抱住他的腰，把他扔到了地上。布莱恩还没来得及反应，我已经把他的背按到地上了。教练开始拍打垫子数数。在一旁观看的一小撮摔跤手同时发出了“哇”的声音。比

赛结束。感谢上帝——可以回家了。但是教练心里还打着其他的算盘。他要我跟一个高二的人比划比划。现在来围观的人多了十多个。我用更短的时间把他也干掉了。

我应该输掉才对的。我的第三个对手是马克，他已经高三了，他想成为他哥哥那样的选手——全州摔跤冠军。观众们不再看好我了。让我这个初生牛犊干掉两个普通队员也就算了，他们可不希望他们的队长也被我灭了。他的手臂搭上我的肩膀，我把它挡掉了。他要拉我的腿，我也及时缩回来了。我们顶上了，头顶着头，耳朵贴着耳朵，接着我们同时跌倒在地上。我以为我能找到杠杆点，可以压住他，但是我们来来回回僵持了一分钟。突然，我知道我找到杠杆点了。我感觉到他的手臂没有劲了，我决定乘胜追击。我抓住他牢牢固定在地上的那只手臂，我想把它给弄倒。此时我听到他的狞笑。忽然间，我感觉自己像是卡通漫画里从山上滚下来的人物一样。我的身体以我从未经历过的方式被纠缠在一起。我的肢体还处于“麻花”的状态，就已经听到教练拍着垫子，说我输了。我花了一秒钟才把自己“解开”。

从那之后我再没碰过摔跤。我老爸也没有食言，他只是在我高一的时候又提过一次，以后就再不提了。我摇摇头，他就懂了。我没去摔跤，却打起了老爸说我身材不适合打的橄榄球。他越说不行，我打得越拼命。我想上大联盟当明星，我要镇上的报纸把我的名字登上头条——后来还真的上了头条。我上高三的时候被评为最有价值球员和全能球员。我的比赛老爸一场也没有落过，他甚至说我超出了他的期望。对于这个评价，我只有一种解释：他对我的期望太低了。

当我们回到家里，车子驶入积雪的车道，在塔克舅舅的克尔维特车旁边停下，我立刻跳下车，冲进去找他。老爸拿起铲子，把车道上剩下的积雪继续清理完。我还没进门，就能听到那熟悉的声音：挖、铲、送，挖、铲、送。

2

1994 年 1 月，缅因州，肯尼邦克

十年过去了，同样的车道，同样那么多的积雪，只不过那辆绿色的车换成了 1987 年的福特探险者。老爸的车每隔 10 年或者开满 20 万英里就会更换。房子也重新油漆过，还是同样的颜色。最后一包行李打包好了，我看着出租车车身上的大龙虾图案，上面写着“美国搬运大冒险——缅因州”。我瞄了一眼我朋友杰米，他正跟我父母聊着。我们都身高 5.9 英尺，深色头发，胡子拉碴的。经过一个冬季，我们的皮肤都跟面粉一样白，我们也都穿着牛仔裤，戴着棒球帽，穿着杰克鲁牌的夹克衣。我们两个人一起住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东西几乎都搬好了，这次他来是来帮我的，陪我一起走。

俄亥俄州立大学新闻系的导师在我毕业六个月之后，打了通电话给我。他问我想不想去纽约工作，我得去纽约。12 月份的时候，我盲投了 30 多份求职简历给各家报纸杂志还有公关公司，但杳无音讯，所以我决定要直接找上门。租来的小货车已经可以上路了。老妈给我来了个紧紧的拥抱，搞得好像我要上战场似的。老爸伸出冰冷的手，跟我握了一把。他的握手无可挑剔，坚实有力，同时还直视我的双眼。他也是这么教我的。

“祝你好运。”他说。如果这辈子我可以第一次跟老爸拥抱一下，此时就是机会。我小时候他一定抱过我，但我没印象了。应该是他来拥抱我，我想着。我放开他的手，打破了那个尴尬的局面。我们出发了。

雪还在下。十个钟头之后，我们把行李搬进了纽约第 85 街和哥伦布大道交界处的公寓。有三个人同住这个公寓。杰米的朋友约翰占了那间大卧室。他是搞投资分析的，每礼拜干 80 小时的活儿。小一点的那间归杰米。我呢，就睡在杰米的小房间和客厅之间的那个最小的房间的沙发上。我每个月交 400 块的房租。木地板、白墙壁，都不错——就是小点儿。没问题，我心想。明天我就找份工作。

可我连工作的门都找不着。很明显，《体育画报》杂志社不喜欢不速之客。我说我要上去做个自我介绍，大楼保安眯起眼睛，朝我靠近了一点儿。“没，我没有预约。”我承认道，“我就想来亲自投一下简历，顺便看看能不能跟谁聊聊。”

“寄过来。”那人说。

回到家里，我决定打电话试试。我琢磨着，如果打给公关公司，我应该直接找公司总裁。没人给我回电话，一个都没有。这么折腾了几个礼拜，我最终来到一家猎头公司的办公室。我坐在桌子旁边，听桌子的主人说了好几次“临时工”这几个字。真晦气。这办公室够旧的，墙也够脏的，地毯斑斑驳驳的。那儿有四个女的，每个人都哭丧着脸，躲在堆得高高的文件后面。那个头发梳得老高、穿紫色套装的达琳叫我跟她走。我是从报纸上找到她的，然后就约来面试了。她把我带到一张小桌子前面，桌上空空的，只有一台打字机。

“坐。”她一边说着，拿起一张纸。“你有一分钟时间打字。”

我看了看那张纸：某某人叫波比，想买一辆新车，写了好几段话。我跟达琳打电话的时候，她没说还得考打字啊。我往打字机里卷了一张空白的纸。我把那张关于波比的纸端端正正地放在一个像乐谱架那样的

东西上面。达琳盯着她的手表看着时间。

“开始！”她喊道。

高中一年级的時候，我选修过打字，还有在大学里读新闻系的时候我也打过字，但是，我打得不快。而且，我也疏于练习。刚开始我打得很慢。我想慢慢打，别打错了。我打完第一句，然后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打错。该死。在“dealer”和“ship”之间我留了一个空格。

“时间到！”达琳在我身后说道。

“真的假的？”我说。那是我这辈子当中过得最快的一分钟。她看了一眼我打的那一句，然后跟我说我没通过。我抬起头，用我小狗般既可爱又萌萌哒的眼睛看着她。这招通常对我老妈管用。

“不好意思。”她没有一丝丝的同情。“帮不了你。”

她竟然没送我到电梯口。她一转身坐回到她的座位，我抓起外衣就走。

在公寓里，我一个人坐着。杰米和另一位室友约翰都在上班。回来的路上，我顺道去盖普公司拿了张工作申请表。至少那里的人还挺友好的。但我决定把这东西放在衣橱里面，我不想让两位室友看到，也不想盖普公司工作。但我需要有份工作。我打电话给老妈寻求安慰，她叫我打电话找舅舅帮忙。这10年间我只见过塔克舅舅两回，在两个姐姐的婚礼上见的。我只知道他跟他第二个老婆搬到旧金山去住了。他还在金融界干。他把大胡子剃了，卖了克尔维特，换了一辆海军蓝的奔驰560SL，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博斯基”。给车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最大客户是伊凡·博斯基。电影《华尔街》的人物哥顿·盖柯至少是受了他的启发而创作出来的。由于塔克舅舅的原因，华尔街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充满魔力的地方。但是我从没有动过去那里工作的念头。他肯定认识一些成功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新闻界的应该也有。我写下了他的号码，跟老妈说了再见。

塔克舅舅听到电话第一声就接了电话。“交易部。”他说。我说我是他外甥特尼。他觉得有点惊讶，但还是很高兴听到我的声音。他等我开口说事儿，但我没有计划好要说什么。我的喉咙直冒火，大脑也一片空白。我很努力地想说明我的情况，于是在“嗯、啊、这个、那个”还有沉默之间，我告诉他我在找工作想让他帮忙。

“了解了。”他说。

我还想解释得更详细，但说来说去就那几句。

“过十分钟再打过来。”他说。我还没说我想干哪类工作呐。我放下电话，坐在那个沙发——我的床——上面。二十分钟之后，电话响了。“这星期你得去面试十次。”他说。

“什么工作？”我问道。

“就跟他们说你想搞销售。”他说。

杰米做完法律助理的工作回家，我跟他说起我舅舅给我安排的这事儿。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着比萨，杰米告诉我一些关于大卫的事情。大卫是杰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来过这里，所以我认识。“那小子，他去高盛公司面试了。”杰米说。他就这么把话悬在半空中，等着我的反应。但我怎么知道高盛是啥玩意儿啊，听起来好像什么高级百货公司。

“他会去那里工作吗？”我问。

“不会。”杰米说，摇摇头。“搞砸了。他要跑到布拉格去打职业篮球。”也挺不错啊，我想。至少比卖女士香水好。

几星期之后，我身穿“费莱尼地下室”季后店的西装站在了世界金融中心三号的前面。我身后是高耸入云的世贸中心双塔楼。现在是早上8点45分，西装革履的人群鱼贯经过我的身边。我鼓起勇气，进入大楼的前门。前台保安给我要见的人打了电话，然后告诉我坐电梯上八楼。到了八楼，前台的小姐微笑着把我领到一个有窗的等候室，里面摆着不少时尚的现代桌椅，桌上放的是《华尔街日报》和其他财经杂志。她问我

要喝些什么，我谢了她说不用了，然后挨着一个金属皮椅的边缘坐下。五分钟之后，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进来了，他身材不高，但很健硕，发际线已经在消退，但头发仍是黑的。他穿深色的裤子，白衬衫的袖子挽了起来。领带挂在脖子上，看上去像是已经工作好几个小时了。

“麦克·布伦尼。”他自我介绍，用力跟我握手。

很明显他已经喝足了咖啡，讲话速度每分钟一英里。他操纽约或是新泽西口音，讲得飞快，我感觉有点听听不懂他的话。我觉得他是在跟我讲雷曼兄弟公司的历史，然后他问我有兴趣干啥。

“销售。”我说，“我想搞销售。”

我舅舅肯定有很多东西没跟我讲，但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够了。他点着头，带我走到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大厅，里面有很多长条桌子，桌子上放着电脑和电话。这是交易部的大厅，里面大概有一百个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要么在交谈，要么在讲电话。他们释放着巨大的能量。我那已经加速跳动着的心，开始猛烈地冲击我的胸腔。麦克带着我穿过一条通道，让我坐在两位年轻的交易员中间。

“体会一下，看看我们干些什么。”他拍着我的后背跟我说。虽然我认识麦克才几分钟时间，我真不想他就这么走了。但是，其中一位交易员的微笑让我的恐惧消失了。

“你在哪儿读的书？”这位穿着醒目的年轻交易员问我。他看着我，电话还夹在脖子和肩之间。“俄亥俄州。”我答道。他却按了电话座机上亮着的灯，向电话那边一阵“狂轰滥炸”，说他要看看布里斯托·玛雅斯。“啥时毕业的啊？”我觉得我好像是打扰他工作了，但他似乎可以一心两用，那边讲着话，这边还能对我表示兴趣。突然，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布里斯托开 14 块半，2—5—0。”他朝 20 英尺外的一个交易员喊着。我一头雾水，但我很喜欢这感觉。

开盘钟声响了，一片有序的混乱。大家都喊叫着，在键盘上猛敲股

票代码。一位交易员坐在椅子上在过道里滑行，还得避开别人拉的 20 多英尺长的电话线。有人把揉成团的纸投入纸篓。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每个人都要求获得注意。有些人同时接着两部电话，同时还对交易厅里的其他同事喊着什么。这里的一切动作似乎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很像《西区故事》里的打斗场面。

几分钟之后，我面前的那位年轻交易员给我拉了一部电话，让我听听他们在讲什么。“我按这个灯的时候，你也按你的灯。”他说。我就这么听他跟一个又一个的客户联系，都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还有他跟同事们的讲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他们好像是在讲暗号，而且是以光速在进行。不过，就在这说天书般的对话之中，有一个对话的口气跟别的有稍许不同。电话那头的那家伙说的是关于飞机票和预定拉斯维加斯酒店的事情。很明显那是在安排某某人结婚前狂欢派对的事情。他们电话讲到一半，面前的交易员才想起我也在听他们的对话。他用手遮住听筒。“呃，这个你就不用听了。”他说。于是他接着跟朋友聊，我则四下张望。我真想跟眼前这些人打成一片。这里能量这么足，这么强，气势这么浩大，完全把我震住了，我也要加入。

麦克打断了我的思绪。他带我去见大老板唐纳德·克鲁克斯，他跟我击掌，然后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上哪个学校？打橄榄球吗？但他没有问我是不是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仔细回顾，我在华尔街的所有面试中都没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有资格在金融界工作。

我之后又有八次面试机会，在美林公司、KBW 公司、杰弗里斯公司、史密斯·巴尼公司、UBS，还有其他好多大牌公司。这些公司的等待室都非常新潮，经理们的衬衫袖子都是卷起来的。这些公司都有雷曼公司那样的气场。但是，每个面试都好像是走过场而已。塔克舅舅介绍的那些讲话像机关枪的人拿了我的简历说要保持联系。

接着，我又去了 33 楼，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厅。经理拿了我的简历，

差不多要跟我说要保持联系的时候，他桌上的电话响了。“37 楼有人想见你。”他说。

37 楼的那位自我介绍她叫史戴芬妮·韦迪尔。她应该有四十岁，即使真有的话，那也算是风韵犹存。她头发乌黑，身着黑色职业套装，看上去有点像电影《几个好人》中的黛米·摩尔。她带我上了电梯，又上了四层楼。

“我太喜欢塔克了，”她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一边朝她办公室走，一边聊着。她的桌子很整洁，文件夹一摞一摞的，但井然有序。她桌上有几样东西：一个柚子大小的橡胶球，一个印着笑脸的黄色减压球，还有一些筷子。我还看到她和 O.J. 辛普森的合影——看上去像是在交易厅照的。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句话，说她错过了昨晚那集《梅洛斯小宅》。惭愧啊，我本人也是该剧的粉丝。昨晚我看了，所以我跟她剧透说，希德尼搞鬼，要找一个妓女来勾引罗伯特，还要用录影机把整个过程录下来，再让麦克把录影带寄给简——超级好看。史戴芬妮用手猛敲着桌子。

“真的假的？”她说。

搞定。

大约 20 分钟之后，她告诉我说，她手头还有两大堆简历，都是申请她要处理的职位的。“第一堆有这么高。”她说，手的位置高出桌面几英尺。“另一堆有这么高。”她说，手放低了几英寸。她接着说：“你的在第二堆。”二十四小时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说那工作是我的了。

几天之后正式上班。此时，我决定要走向公寓。我口袋里有 22 块钱，富可敌国啊！我往西走，朝阿姆斯特丹大道走去。我记得第 86 街和百老汇大道交界的地方好像有个电影院。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总想躲起来。能有两小时的时间盯着银幕、躲进别人的世界里，夫复何求！我想看惊悚片，不过其他片子也没有问题。我走到阿姆斯特丹大道的时候，

看到一个酒吧。那儿有个叫“拉昆酒店”地方，外面的广告牌上写着：“全天供应扎啤，一杯2块。”我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快速地算了一下：不加小费可以买11杯，加小费可以买八九杯。于是，拉昆酒店以它的魔力轻轻把我拉了进去。几杯啤酒也能让我躲起来，而且效果比电影好。前两杯感觉就像肮脏的洗澡水，但第三、四杯酒感觉就正常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一个中年男子在酒吧的另一头看着我。他穿着一件棕色的西服，看上去洗过无数次了，几乎都闪闪发亮了。他还戴着丑陋无比的杂色领带，穿着丑陋无比的鞋子。看上去他也喝了不少了。他看到我在看他，我连忙避开他的眼睛，但是太迟了。他拿起他的扎啤，滑到我身边的椅子上。红万宝路烟就扔在我的面前。

“来一根。”他说。

“我不抽烟。”我说。

“你不抽烟？”他问道。我摇摇头。“在这城市住久了，你就会抽的。”他说。

如果我喝第一杯的时候他过来跟我套近乎，我一定会转过身去的。但我已经四杯下肚了，感觉飘飘然了。他看上去像个“拉里”，我心想。此人歪下巴，头发从中间往两侧分。他问我从哪儿来。

“克利夫兰生的，不过在缅因州长大。”我说。

“缅因州！”他说着，眼珠子直转。我静静地坐着，想等他告诉我为什么我的老家缅因州让他这么激动，但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却问我几岁了。我说了。他一听就摇头，说才二十四岁，这太不公平。最后，他问我做什么工作。

“我下礼拜开始就要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了。”我说，“这是我第一份工作。”

“哇！”他吹了一声口哨，“厉害！你肯定是天才，要么有什么关系。”“拉里”又点了一根烟。“听我说，孩子，”他说，“我在尚司兄弟公司做

过——听说过吗？”

“没听过，”我说着，喝了一口啤酒，“我对华尔街还不太了解。”

“华尔街的人是一群浑蛋，不折不扣的浑蛋，”他说，“我被他们搞死了。”“拉里”把烟灰弹在地上，又猛抽了一口。“我得给你提个醒儿，孩子。”他的话伴随着一团烟吹到我的脸上，“如果你要在这行混，你得记住三件事。”看着“拉里”就像是在看一部很难看的电视剧。我真想转台，但是他又有一些东西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我微微点了点头。“第一，记住，一定，我说的是一定，感恩节之后那一天一定得上班。只要做半天，你就会感觉自己像是个英雄。”我向吧台示意再来一杯啤酒。“拉里”注视我的眼光开始让我不耐烦。他探过身子，“第二，”声音较低，还是伴随着一团烟雾，“所有的10—5—W你都得拿到。”

“所有的啥？”我都不太敢问。

“爱斯基摩人。”他说。我真被搞糊涂了。“跟他们保持密切关系——生意是他们在掌控的。当然了，美林、摩根、蒙哥马利等等，有一大堆像你我这样的人。”我看着他，怀疑自己听错了，我和他一点儿都不像好不好。“你觉得高管层是谁，谁在那里掌控着？是10—5—W。”

“10—5—啥？”我问道。

“字母表第十个字母是啥？第五个呢？”我掰着手指头算着，J、E，JEWS？犹太人？我生长的地方没有犹太人，也没有黑人。种族歧视只有电影上才看得到。我把面前的啤酒一饮而尽，把剩下的两块钱放进口袋。我转身正要走，感觉他的手搭上了我的肩膀。

“等等，”他说，“我还没告诉你第三件事呐。”我回头看着他。他的眼睛是冰冷的，他的牙齿是乱糟糟的，而且跟校车一样的黄。他猛抽了一口烟，吸得真用力，脸颊都陷进去了。“收入第一，”他用香烟指着我，“能做到这个，就没人能动得了你。”他喷出烟雾，把自己藏在烟雾的后面。“就这么简单。”他说。我逃到街上，心想电影院到底是在哪个方向。

1994 年 2 月

有一张椅子是空的。会议室 A 在大楼的内侧，所以没有窗子。会议室里的这七女二男，几乎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在那张光滑的椭圆桌子周围，在黑椅子上舒舒服服地坐着。那些女的个个魅力四射，看上去精明能干的样子。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已经被打开，有几个笔帽已经被拔下来。另外两个男的看上去比较放松一些。他们的穿着跟我一样，廉价西装和领带。我在那张空椅子上坐下，抬起头看着史戴芬妮。给我面试时候的笑容已经不复存在。她的表情严肃，几乎是在生气。她让这沉默慢慢渗透整个空间。那两个男的感觉到了什么，坐直了一点儿，盯着我们的老板。“欢迎来到私人客户服务处。”她说。我舅舅跟我说，“私人客服”是我能进的最靠近交易桌的职位了。这些服务人员负责“高净值”私人客户资金，不是大机构的资金。他们是负责零售的，但他们的客户不是大街上的阿公阿婆。他们只负责资金量为 1 000 万、2 000 万、3 000 万美元以上的客户。“我知道你们几个当中有人已经在摩根士丹利干了几个星期了，还有的人呢，”她的眼光直视着我，“今天是第一天。”她开始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我的工作就是把你们训练成世界上最好的销售助理。”她稍停了一会儿，接着她开始笑了起来。“同时，我还得负责你们

不会哭。”我四下看了看有没有谁在笑，没有人在笑。她又开始严肃起来——好像她有个笑穴，可以随时开关。她还是围着我们，慢慢地在绕圈。

“你们知道我在这家公司干多久了吗？”她问道。这次她是直直地看着另一个男的。“二十年。想知道我为什么能干二十年吗？我这就告诉你们。因为摩根士丹利可以做，别的公司也可以做。”好像她是在为亨利·摩根和哈利·士丹利发言，“你只有一次机会离开摩根士丹利。”

她又停了一下，让大家仔细体会体会她的话。我看到有两个女的在本子上把这句话记了下来。我觉得这不是我混的地方。我想去的是交易厅，那里的人好像快活无比，这里太严肃了。她又开始绕圈了。我觉得我们好像在玩幼儿园的丢手绢游戏。“你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要先在场上漂一漂。”她说。她走到我的身后。“去年的MBA培训课程是我们举办过的最大的一届，他们很快就会需要销售助理了。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找到职位，有些人却只能找到回去的路。”我觉得她随时会把手绢扔在我身后。“所以，你们在漂的时候，得干出些成绩来，让那些交易员觉得你行。要不要让你们当助理，他们说了算。”

之后的五分钟，史戴芬妮说道，你们需要通过两次考试——第7级和第63级，学会使用电话和电脑，阅读研究报告，还要认识邮件分发室和后勤办公室的人。我尽量理解吸收她讲的话，但我觉得我不是海绵。我朝那两个男的去，他们好像很有信心，甚至都有点骄傲了。看上去他们的状况跟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开始萌发一个念头：或许我真的不是这块料。

这会儿轮到自我介绍了。我的同事们一一发言，个个都像是名人榜上有天赋的人才，他们毕业的学校都是普林斯顿大学这类排名前十的大学，杜克、斯坦福、哈佛都有。我之前从没有因为我上的大学而感觉羞愧。我热爱俄亥俄州立大学，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棒的大学。但是，

当我自我介绍说：“我是特尼·达夫，缅因州肯尼邦克来的。我上的是俄亥俄州立大学。”最后面的那个男的，读弗吉尼亚大学的那个，叫道：“巴克爱（七叶树鸡）！”

“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不是俄亥俄州。”我说。

“是俄亥俄州的迈阿密。”有人插嘴道。不过他们都搞错了。

“在雅典。”我说。“短尾猫？绿加白的那种？”

大家都看着我，一脸的迷惑。大家的目光本来就像是聚光灯，现在更像是警察的手电筒，直照进我的眼睛。我希望在第二部分的互动单元可以挽回一下自己的颜面，因为第二部分要介绍自己有趣的事情。“我喜欢写作。”我说。我觉得这帮人肯定会对这个感兴趣的，他们说的兴趣也很类似，不过是：高中年度畅销书，最爱的宠物，而那个弗吉尼亚来的马屁精对史戴芬妮说他喜欢用自己的账户炒股票。于是，我的话如石沉大海，有如冰淇淋圣代上面放着的一粒肉丸。我都能感觉到额头上冒汗了。史戴芬妮笑了，但我不知道那是出于同情还是她喜欢看我受罪。

“好了，各位，”她说，开始带我们往外走。“我带你们去看看餐厅在哪里。”我落在队伍后面，跟杜克大学毕业的那个女的一起走。

“啥叫‘漂’啊？”我小声问她。

办公室几乎跟整个街区一样宽，长度像个橄榄球场。所有交易员和助理都用开放式的办公桌。桌子六人一组，整个办公室都是桌子。每张桌子看上去都一样，有电脑、电话、收发信函文件夹、一个键盘，还有家庭照片、名言警句还有其他纪念品等。交易场上随时都有二三百号人。大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男的，还有二十几岁的女的。交易场的最外圈是办公室，里面的男人们都五十多岁了，一脸的严肃相。

我后来明白了，所谓的“漂”，就是每天都得来上班，哪个组缺助理，你就得漂到哪里去帮忙。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史戴芬妮报道，然后由她来分配当天哪里需要我们。这职位比临时工好那么一点点。这

样做的好处是，当我们漂了一段时间之后，某个交易员或者某组交易员喜欢你，那么他们就会要求你在他们组留下。

上班的第二天，我就被叫去把 18 页纸的债券价格用传真发给客户，我也照办了。但是客户打电话给交易员说他没收到。我又发了一遍。这回，客户又打来电话，说他收到 36 张白纸——我把纸张放反了。那个交易员一整天没跟我说话。几天之后，我被叫去帮某个组接电话。电话是这样操作的：电话铃一响，我就拿起听筒。接着，我得记下交易场发送过来的信息，然后我站起来对身后的两个交易员和三个助理喊话。这比在两个空罐头中间拉一条线那样的土电话稍微进步一点点，但那时候已经是 1994 年了，我们还在这么干。第一次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拿起听筒，里面传来的声音开始哇啦哇啦讲个不停。我奋笔疾书，想记下对方讲了些什么。我还没搞清楚状况，对方电话已经挂了。我盯着那张纸看着。上面写着：弗雷德行长言辞老套乏味。这咋整啊？我愁死了。交易员们和助理们都看着我；我假装还在继续写着，这样我就不用对他们说里面的内容。但我知道迟早都得面对他们，所以我站起来，拿着那张纸，做诗歌朗诵状。“弗雷德行长，”我铆足了所有的勇气。“言辞老套乏味。”大家集体鼓掌。接着这组人发出一阵狂笑。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笑，但是我的脸烫烫的，我知道一定红得跟什么似的。最后，第一助理走到我桌前。

“我想，他们可能说的是‘联储主席言辞鸽派’。”她说。看得出她在尽量控制自己的表情。“不过我也可能说错了。”

我在交易场漂的那些日子里，就像是重复着浪漫喜剧里面的蒙太奇画面——男主角一次又一次约会不成功的窘态。发狂的交易员毫无目标地大喊大叫；一组交易员想要某个辣妹当他们的助理，不想要一个傻蛋；南美交易员的那些不会说英语的客户；女交易员恨我以及所有男性工作人员；正在经历离婚的交易员整天哭个不停（他让我下班后跟他共进晚

餐，听他诉说前妻的故事)；有交易员不跟我直接讲话而只会跟我通电话，而且总是压低声音，因为他认定我是俄国间谍，想来偷取机密；我非常想跟一位交易员一起工作，但是他已经有两个助理了。我只想找到一个小组，但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好像我永远都找不到。

如果我的私人生活能够控制得好的话，我的工作应该可以更顺畅一些，但我控制得不好。纽约这个城市让我摸不到头脑。比如说，西百老汇并不是百老汇大街西端的延伸部分。我还经常搭错地铁跑到布朗克斯。非常奇怪，我掏出 20 块钱的钞票来付钱，无论是开出租车的，还是送外卖的，都没有零钱可以找给我。我家那个地铁站外面的那个无腿人士，可能就是用我给他的钱买了一双假腿，因为我看见他已经在打篮球了。出太阳的时候雨伞一把两块钱，下雨的时候一把十块钱。你孩子上哪家幼儿园是身份的象征。你不能说“圣诞快乐”而只能说“节日快乐”。在年终的时候，你送棒棒糖给门房当作礼物，他们可不会很高兴。35 频道的一些深夜电视节目真的非常有意思。“肉类包装区”的“女孩子”问我要不要个约会的伴儿，但“她们”却不一定是女的。你上错了巴士，司机一点都不当回事儿。酒吧一直开到凌晨 4 点。第 23 街还不算市中心。

我适应了挺长一段时间，终于在 1994 年 12 月的时候，一切好像峰回路转了。首先，史戴芬妮叫我到会议室见她。我没做错什么事情，但我还是有点焦虑。在发年终奖之前，大家都会有些焦虑。不管你是在那种财力雄厚的大公司，还是在“有今天没明天”的联合基金，在华尔街，这样的情景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你的名字被叫到了，全交易场的人都看着你，准备看你的命运如何。走在前往办公室的过道上，那感觉就像走上了红地毯的新娘，又像经历多次挑战又再度走向角斗场的角斗士，我的血液里澎湃着期待与恐惧。通常空无一人的会议室，此时坐着你的老板或者老板们，铁青着脸。他们穿的是“奖金日”那天穿的最好的衣服，最正规最保守的那种。虽说已临近圣诞节——我是说就要放假了，

他们都还没显露一丝丝要庆祝的样子。

史戴芬妮说公司决定给我一笔两千块钱的奖金，还问我对此满不满意。我努力想挤出一点笑容，但是，我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当时的情绪把我冲击得不知所措。两千块可不是小数目。我的头前后伸缩着，我的嘴巴想说出“谢谢”这个词。我的样子看上去好像是不太喜欢她的提议，因为她接下来说：“三千怎样？”她说得那么快，我胸中的空气都被挤出来了。后来我一直想，如果我当时再紧张一点，我可能会得一万块钱奖金。当天稍晚的时候，我跟其他阿漂们一起在邮件分发室里，比较着奖金数目——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大忌，我发觉我是唯一一个多得了一千块钱奖金的人。从今以后，只要有人跟我提奖金，我就得耸耸肩装作毫不在意。

几个月之后，我又得了一个大好处。史戴芬妮要我去她的办公室。我朝她办公室走去，我追随几个星期的那两个交易员——安迪和卓西——已经坐在里面了。安迪的脸色很好，戴着厚厚的眼镜。他从来就只会吹嘘他有钱，而且会直言不讳。

“嘿，安迪，昨晚尼克斯队的比赛怎样？”

“噢，太棒了。我去‘花园’的路上，给出租车司机小费之前，我让他先拐到帕克大街我的公寓那里，我先去拿了坐垫。”他会这么说。

卓西肤色犹如古铜，也带类似的眼镜。他人太好了，几乎都不适合来华尔街工作。因为卓西性格温文尔雅，安迪老欺负他。不过，总的来说，他俩是公司里最有人气的员工。他们有最好的密报，他们得到的条件最好，不管他们想要什么资源，统统会得到满足。“我们想让特尼来我们这个组。”安迪告诉史戴芬妮。

90年代中期的时候，高净值部，如摩根士丹利的私人客户服务处，进行了一些大的变动。以前，交易员主要的工作是帮客户进行交易。交易员要听命令进行佣金交易来产生利润。改动之后的新模式是获取“托

管资产”，即帮客户管理 1 000 万、2 000 万，甚至 1 亿美元这样数量的投资并收取管理费。虽说帮私人客户进行交易的收入仍然在我们公司的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托管资产却是可以赚大钱的业务。安迪和卓西想大张旗鼓地多筹集资金来赚取管理费，但是他们需要有人在办公室里负责私人客户的交易。其实，这应该是安迪的想法。他是小组里的头头，是人上人。他觉得我可能是成为好徒弟的材料。当他说他们想给我这个职位的时候，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回想起我的第一次面试——在雷曼兄弟公司交易厅的面试。虽然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我真的就要当交易员了。

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有了固定职位，我就会涨工资了。五万美元，这是我漂着的时候的两倍，那可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钱啊！我再也不用每周四跟杰米借钱买地铁硬币上班了，也许我可以开始搭出租车上班了。那得有多么奢侈啊！每天可以多睡 20 分钟，不用担心地铁班次取消，不用一直站到下车，也不会有人踩到我的脚。也许这个周末我得去布鲁克斯兄弟公司买一套新西装。还有，星期一的时候，我要拿一瓶胡椒博士饮料，还要在报刊亭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会把公司的地址告诉出租车司机，然后好好地坐车上班。我感觉我已经算是事业有成了。

我的桌子——现在可以这么叫了——就在安迪的隔壁。所有的桌子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包括盖尔和米歇尔那两个助理的桌子。盖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棕色的爆炸头，脸蛋红红的。对于工作的各方面，她是门儿清，她还知道所有的八卦新闻。她已经在公司干了有些年头了。米歇尔跟我年龄差不多，非常性感（但是她故意穿得邋里邋遢，还戴个厚厚的眼镜想遮掩一番）。她聪明得吓人，还是我所见过的最注重细节的人。我肯定会跟这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卓西和安迪对我要加入他们的小组也非常兴奋，对我也好得不得了。接着股市开盘了。

安迪开始对我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数字：“ITG，1/2 买进 50 000，

5/8 买进 25 000，3/4 买进 25 000。给我平均数。”他说。我手里连一支笔都没有。啥？他看得出我是傻眼了，所以他又重新说了一遍，但是更快了。米歇尔通过眼角的余光看见如此混乱的局面在上演，就在纸上写下了什么东西。我还在努力记忆安迪说的东西，米歇尔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1/2 买进 50 000，5/8 买进 25 000，3/4 买进 25 000。字体美极了。但我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我开始用 50 000 乘以 1/2，25 000 乘以 3/4，但我不知道 5/8 是个啥。我用 5 除以 8，接着我考虑要保留几位小数点。安迪吼了过来：“我现在就需要知道平均数。”我还在进行多步骤的演算，米歇尔又递给我一个纸条。

那天晚上我回家，我想着，如果我回到肯尼邦克，申请当个高中橄榄球队教练，日子会怎样。这个想法没什么雄心大志，但却很安全，但我才不会辞职呐。我这辈子都不会放弃任何东西，至少我不会放弃想要的东西。也许是我想起可以回到肯尼邦克高中，这让我灵机一动。我准备了一张速查表，上面全是分数和小数点，上午一上班我就把这个表贴在抽屉里面。真搞笑。读书那会儿我认为分数是最无聊的了，而现在，它却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知道我现在会搞这个，当初我就会好好学数学了。

凡事得慢慢来。我每天都有进步，六个月之后，我可以眼睛都不眨就对安迪和卓西喊出平均数。我跟其他助理一样快了——呃，可能还没有米歇尔那样快吧。

1995 年，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第二年，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改变出现了。每个人的桌上都有电脑可以连接互联网了。互联网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恐惧。我们周遭的世界开始飞速发展，过去五天才能结算好的交易，现在只要三天就可以了。互联网的好处是，技术和电子邮件让我与别人一样处于同一起跑线，甚至还让我稍稍占了点优势。

如今我写电子邮件来解决麻烦问题。也许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奔，

激发了我沉睡已久的写作想象力。驾驭文字的能力有时候还是非常有用的。比如说，有一个表格叫作“取消与更正单”。如果交易出了差错，我们需要用这个单子来进行更正。如果你每个月出现三次操作更正，那么，办公室后面的那些行政人员就会对第四次更正收取 50 美金的费用。如果每个月我出错太多，就会被扣钱了，安迪和卓西就会对我很不满意。有一天，我要发这个月的第四张更正单了，我在电邮的主题栏上打入“个人广告”几个字。接着，我写道：“单身白人男销售助理，运动员体格，寻操作员配合取消与更正。须爱美食烹饪，喜欢看电影和海滩漫步。”立刻有操作员回复。这次的更改单没有收我钱。当下我立刻领悟：社交技能在华尔街的重要性不低于从常春藤学校取得的 MBA 证书。

我在私人客服处渐渐如鱼得水，三年时间也很快飞逝。但是，丝毫没有让我下交易场的迹象。我每个月都会到交易场上逛荡一两回，跟大家打声招呼，仅此而已。我就想让他们记得我是谁。如果有机会出现了，至少他们会想起我。我想在塔克舅舅时代的华尔街里畅游；我不想当另一个安迪。交易场不像私人客服处那么死板。那里时尚高雅，到处都是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我确实也做一点儿交易，但我主要做的是行政方面的事儿。我决定要找史戴芬妮帮帮忙。

当我已经走进她的办公室，轻轻拍了拍她办公室敞开的门，她问我：“啥事？”她身上一如既往地穿着黑色的套装。如果她需要临时去参加葬礼，这身打扮绝对可以。她想对我微笑，但我已经走进了她的办公室，这让她觉得不舒服。

“呃，我就想，跟您聊聊。我已经来公司三年了，我一直以为我是要下场交易的。”她站了起来，走过我身边，把门关上。

“帮你找个新岗位可不是我的工作。”她说。我觉得我的脸刷地一下变得火辣辣的。“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干了，我这里有几百份求职信可以让我找个替补的。”

“您给我这份工作我心存感激。”我说，“但，就是……”

“就是啥？”她问我，“你想让我挥挥我的魔法棒，让你管理数百万美元的账户？自己找机会吧。”我得开始危机处理了。我说我完全明白。“你得与众不同吧。”她说，口气也缓了一点儿。“机会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这话好像是绣在枕头上的某人的名言，但从她口里说出来，充满了骄傲的语气。我觉着这是个可以让我稍微体面地下台的机会。我得让她知道，我很注重团队精神——她也喜欢强势。

“您说的对，”我说，“谢谢您对我的鼓励。”我站了起来，走过去打开了办公室的门。“这门您是想让我开着还是关上？”我问。

“开着。”她说。

我走出去几步，听到她说：“跟马特·德萨沃或者大卫·司莱恩混混。请他们喝喝酒。”说完她自己哈哈笑了起来。“看你的了。”

我还真没想过要和德萨沃和司莱恩一起混。这两人是交易场的经理，他们的位置比我熟悉的社交圈要高一层。

1996年7月

我身边美女如云。西堤酒吧就在公司的街对面，是大家最爱扎堆的地方。最近我才开始下班后跟同事们泡酒吧的。我也还真不习惯华尔街这种穿西装打领带来泡酒吧的方式。要我说，最好是穿牛仔裤，地上撒满锯末也没问题。西堤酒吧其实是个餐馆，但我必须承认，弧形曲线的吧台设计，隐私的空间，确实非常有特色。这里的酒杯超级大，服务生倒酒也毫不吝啬。平常的晚上，我们服务处有10~15个女的来这里泡

吧，交易场有 5~10 个男的来这里泡吧。这地方不是什么秘密地点。六小时恋情通常是从这里开始的。

此时我就在酒吧里，身边是德瑞雅和可琳。她们是我们服务处负责组合投资的。德瑞雅是安德瑞雅的简称。她的蓝眼睛似乎可以看穿人心，两个门牙之间有条缝，让她显得额外性感。她也几乎和我一样天真无邪，她只看到别人的好，我太喜欢跟她一起玩了。我们常常欢声笑语。她的助理是可琳，眼睛比德瑞雅更蓝。橄榄油色的皮肤，乌黑发亮的头发。男人们都像飞蛾扑火一样朝她扑去。今晚，她的“电压数”已经高涨。

满是人头的吧台边上，隔着我几个座位的地方坐着大卫·司莱恩，华尔街没人不认识他。他身高 6 英尺，浑身是肌肉，那是职业橄榄球员的身材。但他的棕色短发却给他一个娃娃脸的感觉。不能以貌取人。头发丝那么小的事情也可以让他火冒三丈，这在交易场无人不知。他是场外交易的负责人；整个交易处都是他管的。他发起火来（好像他随时都在发火），便会嘟囔着跟别人讲话。如果哪次交易不称他的心意，你几乎都可以看到他两耳冒烟。关于司莱恩的一件趣事，有好几个版本。不知道是他在吃着薯条，别人一直打扰他不让他好好吃，还是有人不给他吃自己在吃的薯条，或者是他在对电脑屏幕发火，这都不重要。所有版本的结局是一样的：他把电脑键盘扯了下来，扔得远远的。我怕大卫，所有人都怕大卫。但是，当可琳叫他过来的时候，我想起了史戴芬妮说的那句话。

司莱恩屁颠屁颠地来到可琳面前。可琳帮我做了介绍，他就侧头对我点了一下，眼睛还是只看着她。我以前见过他，不过他肯定不记得了。我坐在吧台的椅子上，等着机会想插上一句半句的。我知道我得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我滋滋地吸着饮料。

吧台另一头，坐着我的同事荷泽和诺拉，她们俩都和德瑞雅和可琳一样迷人。荷泽是那种反叛的金发拉拉队队长型——一切都得听她的。

诺拉则带点南美混血的魅力。我朝她们招了招手。我打小跟三个姐姐长大，我完全知道怎么跟女性打成一片，这是与生俱来的功夫。私人客服处每个女的我都认识，知道她们在哪里长大的，甚至对于那些有男朋友的，我都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也知道怎么让她们微笑。她们清一色都是美女，我看得出这是华尔街招工的要素。

“这是大卫。”我对荷泽和诺拉说。就这么简单，我和大卫就被这酒吧里最美的女人们给围住了。

“你们想来点啥喝的吗？”我问道。我可以感觉大家都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就连大卫也开始感觉到我站在他的身边了。“荷泽想要隆胸，”我说，“大卫，你觉得呐？”荷泽笑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笑着把她那对诱人的B罩杯挺了挺。大卫的下巴都要掉了，他的表情就是在说，这小子真敢说。但他的眼睛却不断睁大，不断闪烁。我可以感觉我的股票涨了。我又呷了一口喝的。

“我看这大小正好。”他说。

荷泽立刻说：“我想升级到D罩杯。”她双手还比划着D罩杯的大小。大家都狂笑起来。我让德瑞雅和诺拉把她们的胸也挺一下，但她们不干。我帮大家买了一圈喝的，还叫过来其他几个女的，安吉利亚、丽姿，还有得克萨斯州来的几乎身高6英尺的美女罗伦。我跟她们共事几乎三年了。应该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如鱼得水了。我觉得自己掌控着一切，能够随心所欲。如今回头想想，我当时真是无知。我怎么可能在工作上出人头地嘛。跟她们比，我经验不足、交际不广、学位不高。但是，一杯好酒在手，我跟别人一样能够呼风唤雨，可能还比别人干得更出色。不知谁说再去另一家酒吧，我立刻兴致大发。

“那就拿上你们的外套吧。”我说。

我们一行七个人，大卫和我，再加上五个女的，跳上了两辆出租车。我告诉出租车司机地址：第10大道和第17街交界处。我肯定，大卫和可

琳会觉得那地方没问题，但其他女的可能会觉得很恐怖。那是我最喜欢的酒吧之一，几乎每周末我都去。我们的车先到了。德瑞雅、洛伦还有可琳和我下了车。我站在一个大木门前等着，门上贴满了摩托车店、酒和黑帮的广告贴。街角的地方没有路灯；唯一的照明是这家酒吧的霓虹灯。我们已经到了“肉类包装区”的边缘。第17街黑乎乎的，就像条小胡同，在外面就能听得到酒吧里面人潮澎湃。绣着红岩石的黑色旗帜挂在窗口上方的西边，好像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那些女的问我要带她们去哪儿。

“到了就知道了。”我说。

几分钟之后，荷泽、诺拉还有大卫从另一辆出租车上跳了下来。我推开那酒吧的门，德夫勒帕的歌声扑头盖脸地涌了出来。“要加糖吗？”歌词唱道，“一块还是两块？”摩托车党、派对女郎、牛仔们一起对唱着。

人山人海。这个算是中型酒吧，里面灯光昏暗，只有啤酒广告的霓虹灯散发出红红蓝蓝的亮光。吧台后面贴了更多的广告、汽车车牌号、哈雷戴维森的标志、呼啦圈、明信片、灯笼，还有从一个大镜子上面垂下的胸罩，很多胸罩。空气浑浊，充斥着发酸的啤酒的味道。吧台后面有两个女吧员，穿着暴露的皮上衣、牛仔裤、黑色的大靴子。喇叭里炸出“往我身上撒点糖”这句歌词的时候，一个女的躺上吧台，把衬衣拉到脖子那里，露出漂亮的“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粉红色上托型胸罩，吧员则把威士忌酒倒在她的肚脐眼上。吧员的领班看到我，招手让我过去。她在我嘴上猛亲了一口，然后跳上吧台，跨坐在那个客人的身上，把客人肚脐眼那里的威士忌酒吮吸干净。人群更疯狂了。他们高举百威、蓝带和滚石啤酒，泡沫四处飞扬。喇叭放出的歌声震耳欲聋。大家唱着。在人群的怂恿下，两个女吧员开始亲昵起来。我叫了八瓶长颈百威啤酒，转过身给我的那些同伴们递过去。我看到那些女的个个嘴巴张得老大，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大卫轻轻地跟我碰了碰酒瓶。

1997年6月

我被叫到史戴芬妮的办公室。我是不是捅什么娄子了？她板着脸，好像出什么问题了。她让我坐下，接着关上了门。我知道我捅什么娄子了。我可能要被炒鱿鱼了。

摩根士丹利公司里最近闹耗子了。公司发了几份电邮，提醒大家下班后不要把食物留在桌子上。我的同桌米歇尔对老鼠是害怕之极。上星期有一天她去买午饭的时候，我钻到她的桌底下。那地方太小了，所以我只好掀开桌下面那个黑黑的铁盒子，爬到那个隐藏电脑线、电话线的地方。我勉强能把自己塞进去。米歇尔买午饭回来，把鞋子脱了。果然如我所料。她的脚趾甲涂成了粉红色，闪闪发亮。我打赌，周末的时候她一定穿得性感十足，脚上穿着露脚趾头的高跟鞋。我用拇指和食指在她脚上捏了捏。接下来就出现了我听过的最高分贝的尖叫，她跳上桌子不停地尖叫，她的午餐飞向空中。史戴芬妮可能就是要跟我谈这个事情吧。每个人肯定都听到了那尖叫声。

史戴芬妮的眼里似乎能射出道道利箭。她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嗨，约翰，我就跟你确认一下咱们谈过的事情。”她说。

我真不太喜欢听那调调。不过，她放下电话，严肃的脸竟然来了个180度转弯，成了个笑脸，露出一口白牙。“我要你搞一个派对。”她说。我愣了一秒钟才知道我没有闯什么祸。接着，史戴芬妮开始跟我说，目前交易场里大家士气低落。于是交易部拨了3 000块钱想搞个活动，给大家打打气。

“交给我。”我说。搞派对可是我的专长，在大学里就修这一门的。我回到办公桌前，我想起史戴芬妮那个电话可能是打给大老板约翰·斯特劳斯的。他是我们部门的头儿，我的老板的老板，是“食物链”的最上层。我都怀疑他知不知道有我这号人存在。我对他心存敬畏。他就像是个将军，不过却总愿意冲在第一线。他是个顾家的男人，是个有原则、有价值观的人。略微发白的头发让他看上去更稳重、更有分量。

我定下了一家酒吧，在第73街和第3大道交界的地方。那地方有个窄窄长长的房间，里面有个长长的木吧台，墙上露着砖，还有一台点歌器。这看上去什么都不是，但后面却有一个巨大的露天空间。我亲自去了一趟，打了两个电话，写了三封电邮，整晚的安排就定下来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让派对大获成功。我知道史戴芬妮和约翰·斯特劳斯也会参加。我可不想在全办公室最重要的两个人面前一败涂地、颜面全无。我想出一个好计划。星期天的时候，我跟中学的老朋友克里斯·阿立那碰了面。他比我早来纽约，在NBA公司中城区主办公室上班。他的电脑上有我想用的文字处理软件。我跟他在第5大道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边门碰面，他的办公室就在对面。我们穿过大厅，朝他的办公室走去，我跟他说起我来的目的：我要出一份刊物。我坐在克里斯办公室的电脑面前，一个空白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我最喜欢空白画面了——我就想把它填满。

我搞这份刊物的目的就是想要让大家因为这个派对而心潮涌动，我也想把里面的文字写得好玩一些。时间、地点、人物、缘起、干什么等等细节就把第一页给填满了。我又多画了一个香槟酒瓶，一些节庆的彩带，还有一个目录——调调大家的胃口。我知道，相比于那帮同事们，我没有什么内幕交易或有深度的事情可以说，这些事情他们比我清楚多了。我的刊物绝对得像超市收银机边上那些杂志那样诱人，得像茶水间的八卦。想到这里，我思如泉涌。第一则故事的名字是：“什么？你想

当个色情明星？”八小时之后——一晃即过的时间——我写完了最后一条。把想写的都写完了，最后的工作就是要给这份刊物起个响亮的名字。在最上方，我用超大超粗的字体打上“特尼通讯”几个字。

我决定等到星期二再发出去。我想在比较接近派对的时候发出去，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件事了。星期二的早上，我比平时早 30 分钟起床，我想早点到办公室打 250 份《特尼通讯》。我想用稍微大一点的纸张来打印，这样它看起来就更像一份刊物或者一份小型报纸。我让邮件收发室的人教我怎么打印。我决定在午餐时间发。那是最佳时间——我不想让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沉浸在早上的工作中，那个时间不用再理会客户的要求了。

正午时分，我看着那一大堆的《特尼通讯》，心里开始发毛：我这样做对吗？我做出这档子事儿，有 50% 的可能会把自己搞得像个小丑。如果大家笑话我怎么办？我站起身来，心里的恐惧更深了。这比传发我的商业研究更难，那样的专业内容也总会有人挑刺儿找毛病。办公室八卦新闻会有什么效果呢？我是怎么想出这破东西的？

我眼前是跟整个街区一样长的办公室。虽然大多数的交易员和助理们还在干活儿——打着电话，认真看着电脑什么的，有些交易员已经把午餐端上来了：纸袋装的外卖、沙拉，还有三明治。我深吸一口气，昂首阔步走了出去。我把《特尼通讯》一份一份送了出去。我在每张桌子前停留片刻。比较容易的做法是交给那些助理们，因为他们我全认识。那些交易员的脸上浮现出有点怀疑的表情。我想，他们都以为那是跟摩根士丹利有关的公司事务，推出的新产品介绍什么的。但是，我每发出一份，就越觉得扬眉吐气。我告诉自己，我啥也不在乎。我就要这么干。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了第一个笑声。

我回头看见一个助理指着《特尼通讯》给组里的另一个同事看。我看着，确定他们都是在会意地微笑。接下来，我看到另一组的人在开怀

大笑。几步之外，又有笑声传来。接着，一个交易员朝我走来，跟我要了一份。

在我把《特尼通讯》发给每一位交易员、助理、行政人员还有那些搞投资组合的人之后，我开始给外圈的办公室发，那是玻璃房的经理层办公室。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每个办公室，先露出我非常礼貌的微笑，然后把通讯放在他们桌上。我走到整个楼层最大的转角办公室的时候，朝里面瞄了一眼。谢天谢地，里面没人。我不知道如果约翰·斯特劳斯在里面，我有没有胆子进去放一份。我进去放下一份，飞奔着跑了出来。

回到我桌子的时候，我回身看着整个交易场，好像大家都在看通讯，都在笑着。那天下午，助理们和交易员们对我好评如潮。更重要的是，似乎大家都期待着派对快点到来。《特尼通讯》一炮打响。

没过多久，我听到不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特尼在哪儿？”那人问道，“特尼的座位在哪儿？”约翰·斯特劳斯拉朝我大步走来，袖子卷着，鲜红的领带朝两边晃荡着。虽然他还距离我 20 英尺远，但我看到他手中也拿着一份《特尼通讯》。我迅速转头看着电脑屏幕。我知道他会走到我桌前。我抓起一支笔，在我手指之间玩弄起来。我眯着眼睛看着电脑屏幕，似乎正在做一个很复杂的数学运算。接着，我听到身后传来他的声音。“特尼？”他问道。我转过身，说了声“嗨”。我感觉有数百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你有没有想过做点交易股票证券以外的事情？”他问道。我一时搞不清楚那是对我的赞叹还是侮辱。我耸了耸肩，盯着他看，等待着命运的判决。接着，他的嘴咧得好大，笑得好像一朵花儿。“这东西太棒了！”他说。他脸上的表情对我的鼓励，胜过我拿的任何年终大奖。

派对当天，盛况空前。派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会上，约翰·斯特劳斯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他抱了我一下。“哎哟，特尼，你是在哪儿长大的？”他问道。我看到史戴芬妮在人群的那一边，微笑地看着我们。就在那个时刻，我知道我成功了。我知道，我打了第一场漂亮仗。

4

两年之后，我依然还在摩根公司当交易助理，简历还是拿在我手里。人生的进展还真“大”啊。头一次在会议室跟史戴芬妮谈，那都是五年前的事情了，可如今我还是交易助理。“我跟那组人没办法一起做事了。”我对史戴芬妮说：“我得干点儿别的什么事情。”我已经完全放弃在摩根当交易员的念头了。她把我拖进她的办公室，关上了门。她的办公室里没有任何一件东西能说明她有私人生活——没有度假的照片，也没有亲人、丈夫的照片。她和 O.J. 辛普森的照片在警察狂追辛普森汽车的事件之后也不见了。她在摩根已经干了 25 年了，这期间，大多数时间里她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忙招聘和培训助理的事儿。我看着她的眼睛，她心里一定矛盾重重。一方面，她肯定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想去别的地方干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她在心里也暗暗地想着要逃出这个地方吧。她在纸上飞快地写了点东西，把纸递给我。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们两个人的手都揪着那张纸。

“别跟任何人说是我在帮你。”她说，放开了手里的纸。虽然我也不确定，但是我敢打赌她以前从没对别人做过这样的事情。那张纸上写的是雷曼兄弟公司和美林公司交易场上的联系人的姓名。

两个面试都进行得很好。但是很明显他们现在不招人，是看史戴芬妮的面子才让我去面试的。第二个面试之后，我又回到了私人客服处，我把装满履历表的文件夹放在空空的桌上。史戴芬妮允许我再到交易场

上漂着，给我提供去面试见工的时间，但今天没有地方让我漂。此时，电话响了。只有史戴芬妮和前台知道我今天坐在交易桌前，肯定是打错了。我拿起电话，说了声“哈喽”，好像我是在家里一样。“你小子这就给我过来。”电话那头是个女性的声音。肯定是打错了。我刚想给她点颜色瞧瞧，或者干脆把电话给挂了，但是我听到：“特尼，我是说真的，现在马上就过来。”她说。原来那是可琳。

可琳一年前离开摩根，去了一家刚创立的叫高利安集团的对冲基金公司。打那以后我就跟她没什么联系了。据小道消息，她混得不错。是大卫·司莱恩帮她进那家公司的，几个月后，司莱恩也过去了。之前跟我们一起在摩根共事的丽姿，拿了个好差，到雷曼公司去了。今天就是她给我面试的。她告诉可琳说我在找工作。对于高利安公司，我一无所知，关于对冲基金，我也是两眼一抹黑，我都不知道她想让我干什么。我问她明天去可不可以。

“好吧，”她说，“明天吃午饭的时候过来。”她告诉我地址，还说她今晚会上给我住的地方打电话，跟我交代一下面试的时候要怎么说。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高利安公司出现职位空缺了，可琳会想到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她在摩根的最后一天。她跟大家一一道别，我也过去，微笑着向她祝贺。在这样的离别时刻，为了表示友好，我应该跟她说多联系，她则会说没问题。然而就在那个时刻，在华尔街40多位职业人士面前，我觉得自己不行了，我说不出口。也许她因为这样而喜欢我吧，所以才优先给我打电话，给了我这份工作的面试机会。华尔街遍地都是高傲自大的人。她看出来我还保留了一些真诚，就像个腼腆腼腆邀请女伴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男生。

我去高利安面试几天后，我公寓的电话响了。那是位于西67街一栋高楼里的四居室公寓，我几年前搬过来的。电话响着。那是星期一下午，家里没有人。电话放在一张巨大的手型椅子上。手掌是椅座，手指

是椅背。电话一直响着。椅子周围的家具摩登入时：沙发、椅子、桌子，还有几盏灯。还有一个桌上足球案和一个家庭酒吧。客厅里是周末残留下的东西，数个空啤酒瓶和一个装比萨饼的盒子，一片狼藉。我和几个室友住的是阿尔法·波特里·巴恩兄弟会的房子。铃声停了，转到留言机上去了。“现在没人能来接电话，但是我们想知道是谁打来的。……找特尼，按1；找杰森，按2；如果找杰米，按3；找伊森，按4；如果你要找强尼，呃……不好意思，留言位满了。”

我回家的时候，查了查语音留言。“嗨，特尼，我是高利安公司的杰宁。”她的语音挺轻快的。“交易员的职位我们想给你。请回我电话，我们约个时间，你过来把合同给签了。”事后杰宁跟我说，她当时在考虑是不是要给我那份工作。她想着我怎么跟那么多人一起住，倒也是，她一定认为我不正经吧。“欢迎加入买方队伍。”留言机里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欢快。

5

那啥叫买方呢？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买方和卖方有什么差别，不过不久之后就弄明白了。我就用古时候的例子来说明吧。在古代，如果你是买方的话，假设你就是那个推着法老给你的整车黄金，到市场去买东西的人。你的任务就是为法老采购最好的东西。你买到好东西了，法老还会给你好处费。不过，虽说你可以支配法老的钱，但那不是你的钱；你唯一可能损失的东西就是你的好处费。但是，如果你表现好，你就会有大大的好处。比如说，下次你再推车去市场买东西，你的车轱辘可能是定制的，可能还有内置导航仪什么的。但是，你不是唯一一个推着一车黄金在市场里办货的人。所以，一到市场，你就得准备好喽。市场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有店家在卖东西。如果你是卖方的话，你就会希望法老的采购员是你的客户。每个店家都想把手头的东西卖出最高的价钱，另外，他们也想把仓库里的那些滞销货也一一卖掉。他们想获得最高的收入。店家之间会进行剧烈的竞争，想博取你的青睐。他们需要你。有人会请你免费坐船游览尼罗河，还可以带上几个“他们店里的女招待”；或者他们会带你去看看金字塔里面的陵墓；或者带你到美索不达米亚去度周末，吃上一些美味的莲果。花样不胜枚举。还有，很多店家都是骗子。如果你把那些滞销货也买回去了，或者你付的钱太高了，可能下次法老就不让你推着他的车去采购了。当然，还有更糟的情况，你得去当那些卖货的店家。如果有一个店家星期四晚上带我游玩尼罗河，我就从他那

里买些牲口；如果我能把这些牲口卖给在星期五带我去美索不达米亚的人，那我一定要这么干。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和卖方是互利的关系，都需要对方的存在。在华尔街呢，买方可以买，也可以卖——他们就是客户。卖方卖的是信息、研究的结果还有给客户提供协调服务。

一言以蔽之，买方是客户。卖方最爱的就是客户。

拉吉·拉贾拉南、盖瑞·罗森巴克、克里森·萨德和第四个（负责西海岸的）叫作阿里·阿贾瓦林甘的人，他们一起在1997年创办了高利安公司。他们都是从一个叫尼南的小投资公司出来的。在那家公司，拉吉的业绩，特别是他买的科技股的业绩，给公司赚了好多钱。他也给自己赚了好多钱，是他给公司赚的钱的十倍。当拉吉的合伙人知道了这事儿之后，告诉拉吉、盖瑞和其他的人，不可以用他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交易。于是他们四个人就离开了尼南，另创了高利安公司。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正值科技股飙升，对冲基金也刚开始兴起。那还是在草创阶段的事儿了，他们几个人不能放过任何可以抓住的机会。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已经是1999年，高利安借金融发展的好势头，顺风顺水地发展了起来。

我去签合同的那天，高利安的几个高层我都见到了，包括克里森、盖瑞还有拉吉。拉吉打着电话。我跟拉吉在面试时候见过面。他挺精神的，皮肤黑黑的，眼镜厚厚的，留着胡须。他微笑着跟我握手，坚实有力，脖子那里还夹着电话。他的两颗大门牙之间有个缝，让他看起来比较友好。我看了不觉也想微笑。但是，我也知道，我要接替的那个位子，虽说人已经走了，但是位子还是热的。据说，那个女的很吸引人、很聪明、很强势，但她有问题。她的交易损失太多，还隐瞒不报。根据高利安的规定，这跟偷窃同罪。当她无法再隐瞒的时候，老板们发现了这个

问题。她当场被炒鱿鱼。胆敢对拉吉撒谎！胆敢偷拉吉的东西，下场一定会很惨！

克里森负责的是医疗保健类股票。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知道，在很多方面，克里森是拉吉的分身。拉吉是斯里兰卡人，而克里森是在印度孟买长大的。克里森瘦瘦的，脸型很好看，肉桂色的皮肤，温文尔雅。好像所有人都喜欢克里森，特别是投资者。有人曾经说过，克里森筹钱的功夫了得。如果让他到小学三年级的教室里走一趟，他会拿着所有人的午饭钱出来。他跟我握了握手。他脸上的微笑尊贵无比，他对我说欢迎成为他们的一员。一切顺利，至少暂时如此。好像大家都很友好，都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

接着，我被带到交易桌前，介绍给盖瑞。他大约四十岁，棕色头发，发际线已经开始消退。他穿着高尔夫衫，褪色的牛仔褲紧紧绷着他的腿。他最显著的地方是浓重的鼻音。他微笑着站起来跟我握手。“欢迎加入。”他说。接着，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有点奸诈地笑了一下。

“15万？”

“没错。”我答道。

罗森巴克在面试的时候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在摩根士丹利挣多少钱。我说15万。其实我当时只挣35 000，因为我离开私人客服处，又去交易场上漂了。

他大笑起来，说我骗人；但是他说很欣赏我的胆识。要么他真知道底细，要么他就是在装。但是不管怎样，盖瑞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接着，他向我介绍了我工作的职责范围——今后六个月内，每个人反反复复要求我做到的事情——不能让电话铃的响声超过一次。做好记录。把交易记录在电脑上……接电话。做好记录。把交易记录在电脑上。反反复复，周而复始。每个交易日结束的时候，把所有交易核对一遍。要确定所有买、卖、股票数额、价位、佣金还有总额都正确，不能出错。他

终于讲完了，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每天都做好随时被炒鱿鱼的准备。”他说，“如果没被炒，那么就算是一天圆满了。”

每天早上我在家洗澡的时候就开始心情紧张恐惧。令我担心害怕的想法一个接一个，犹如打在我胸口的拳头。昨天我是不是每个订单都做对了？昨晚盖瑞让我做的事，我今天都记得吗？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大疙瘩。天天如此。

我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唯一的照明是昨晚没关的电脑屏幕上的亮光，此时闪烁着屏保图案。我打开电灯开关。这办公室真是巨大，就像车行的展示厅。整层楼都是一个接一个分析师用的小办公室。一半的空间是空着的，我想那是留给日后扩张时候用的。（我入职一个夏季之后，我们搬到下面一层，那儿更大。随着我们负责管理的资产的增多，其他东西也增多了。）每个办公室门口都有交易桌，拉吉的办公室除外。他的办公室前的交易桌摆成了一个“丁”字。

有一个长条桌，靠着后墙，那是盖瑞和可琳坐的地方。还有一个宽桌子，放在那个长条桌的正中间，两边分别可以坐三个交易员。我就坐在这正中间。

此时，我坐下来，开始核对前一天所有交易的情况。我得确保没有出差错。我心里感觉不对劲儿，每天都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我每天都背着一个12磅重的保龄球。我老妈总说犯个错不算啥，但她没在对冲基金干过。虽然我压力巨大，每天早上却是我当天最冷静的时候，没有混乱的场面，没有老板们盯着。

但我还是紧张。我核对着交易的情况，也顺便帮老板们和同事们叫好了早餐，他们到的时候，吃的也来了。我猜，他们的想法是：如果这小子连早餐都订不好，他哪有能力处理数百万美元的买卖订单呢？如果我把他们的早餐给订错了，他们的反应有时候比他们买卖赔了更凶。他们还没搞清楚，我订餐的时候要的的确是“脆皮熏肉”，我敢保证，但那

又不是我煎的。我跟订餐的那家餐厅的西班牙裔女孩打得火热。我时不时就过去跟她打个招呼。我会用西班牙语说：“你好，我叫特尼，我喜欢滑雪。”她笑我一字一句发音太死板，但她不知道我处境危险：每次熏肉火候都不对。

20分钟之后，大家陆续来上班了。他们走进办公室，每天订的餐都一样。最先进来的是那些交易员。可琳是第一个来的，天天如此：手里拿着杯咖啡，一份还没看的报纸，带着昨晚没有处理完的私人问题——要么是昨晚她家水龙头坏了，要么就是有外星人绑架她。她跟我说的那些故事，有一大半我连编都编不出来。除了外星人那事儿有点离谱，她说的其他故事我都挺当真的。她的日子过得真是够刺激的。托德第二个进来。他的大名叫哈里森。为啥叫他托德？天知道。此人英俊潇洒，黑头发黑眼睛，活脱脱就是期权交易员的样子。高利安把他从摩根士丹利挖了过来。他坐在我的左边。他的口头禅是“我的个天！”接下来他嘴里会冒出什么，我也清楚。他的故事总是这样的开场白。故事里面总有一辆加长汽车，哪个小姐被他给拿下了，然后回到他的公寓，接着是翻云覆雨。真希望他的性生活有他说的一半好。但我搞不懂他干吗要跟我说这么多奇闻逸事。

下一个来的是大卫·司莱恩，我的保护神。他直接从健身房过来。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的高尔夫衫还有垫肩。还没坐下，他就已经知道了股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有大卫坐在我右边，我感觉很安全。我知道自己随时都做好了被炒鱿鱼的心理准备，但是我觉得至少还有大卫可以帮帮我。如果盖瑞问我个问题，我答不出来，大卫总会悄悄跟我说答案。

接下来还有卢比，那是影星布鲁斯·威利斯的翻版，光头的那版。他的真名是克莱格。他穿设计师版紧身牛仔褲，开领衬衫。如果“A&F”品牌有四十岁的顾客群，那么卢比一定是最受欢迎的顾客。关于卢比，

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具体干些啥事。他和我们一起坐在交易桌前，但是据我所知，他不是公司员工。他既像在巴士站捡来的流浪少年，也像“新鲜空气基金”的小孩。之前他在酒吧俱乐部当过看门的，那家酒吧要么叫“奥登”，要么叫“心碎”，或者是其他什么《大城与亮光》电视剧里面出现过的 80 年代的夜总会。有时候他看别人进出办公室的眼神，让别人以为他还当自己是酒吧看门的或者是保镖。他仍有酒吧看门的那种身材。他也跟大卫和盖瑞一样，是个健身控。反正，自打我进高利安以来，我就没摸清卢比是干什么的。

倒数第二个进场的是盖瑞。老板拉吉当然是最后一个。虽然他的块头大，皮肤黝黑，但在盖瑞面前就相形见绌了。拉吉的进场犹如女王驾临，光彩夺目，脚下似乎铺满了玫瑰花瓣。当盖瑞进来的时候，他的光彩会照遍整个办公室。他身穿格林尼治乡村高尔夫球场的衬衫和牛仔裤。他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空调温度调低。他喜欢把气温调到低于舒适度以下几度。你永远都搞不清楚他会给你来点什么。今天，他对可琳说早上好，还问她为啥没打电话跟他讲 AMD 现在的价位。每天早上，还没睁开眼睛，他的大脑就开始绕着股市运转。我没看到交易记录上 AMD 有什么交易，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消息。我低下头，希望他不会看到我。同时我也暗暗祈祷，今天的早餐不要出错。

但是，今日与往日不同。盖瑞的水果和优格没有搞错。然而，在我电脑的屏幕上，高盛公司的记录是：我们昨天买进了 10 万股 IBM 的股票。我订的是卖出！出问题了，大问题！我立刻按高盛的灯，找负责我们交易的约翰。他确认是要买进。

“你确定？”

他说确定，他帮盖瑞操作的。这说明了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盖瑞心里想着要买进，但是他对我说的的时候却说成了要卖出；要么是他对我说要买进，我不小心打成卖出。不管是哪种可能性，最终都会算到我头上。

雪上加霜的是，盖瑞、大卫和拉吉都是根据错误的仓位进行交易决策的。今天还没开始交易，我们就短缺了10万股IBM股票。如果我预定买进了盖瑞认为已经买进的10万股，那我们就多出了20万股。但是，我们的仓位显示是平仓。目前IBM的成交价是130美元。如果是我出错的话，那就是我给公司造成了2600万美元的损失风险。IBM的股价当然不太可能猛跌至0，但是任何的波动都会给高利安带来巨大的损失。

我的座位离盖瑞的座位就几英尺的距离，但我还是决定要亲自走过去跟他谈。我不想让周边的交易员知道我要跟他谈什么。他在讲电话，还同时处理着三件事情，但我还是打断了他。他看到我脸上死人般的表情，立刻知道出大问题了。他让电话滑下肩膀，带着一脸的鄙视，看着我。

“这次你又他妈咋了？”盖瑞一有机会就会挤对我。他就像个九岁的小孩，而我呢，是一只被他逮到的蜘蛛，他非把我的脚一只一只揪下来才开心。

我无路可逃。我必须告诉他这个差错。

我就想确定一下，昨天IBM的股票，他是想跟高盛买，还是卖。这是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高盛那边弄错了。

“我要买。”他说，“你很清楚的啊，我跟你喊着说的。”我开始胃疼。糟了。

“很抱歉，我可能听错了，要么是我打错了。”我嘟囔着。

“你他妈什么意思？我们多了10万股IBM？”

“应该是20万。”我说。他看着期货仓位，看股市开盘的情况。我之前查的时候，股价是微跌。他问可琳IBM有没有动静。她迅速敲了敲键盘，接着向我扫过同情的目光。她跟盖瑞共事两年了，不知怎的，她比其他人能应付盖瑞。

“记录只有几千股。”她说，“我相信应该可以找人帮我用最晚收盘价

买入一些。”也就是说，她可以拿起电话找个交易员告诉他买进 20 万股 IBM，公司承受损失。她是想帮我，但是盖瑞脸色铁青。他开始咆哮了，说我如何如何无能。他朝拉吉嚷着，说 IBM 的仓位不要了，接着他对大卫嚷着，同样的内容。他根本不用重复的，不过他就喜欢贬低我。我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你他妈去哪儿啊？”他问道，“给我滚过来。”他把剩下的早餐扔进垃圾桶。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看着他，不过没敢跟他对视。

“很抱歉。”我最后说，又朝我自己的座位走去。

“抱歉你个头。”他尖叫着，“墙角罚站！五分钟！”

我看了看盖瑞，又看了看整个办公室，看来他是来真格的。大卫开始笑出声来，可琳和托德忍着不想笑出声来，连盖瑞和拉吉脸上都露出了微笑。盖瑞又绷起了脸，指着交易桌另一端的墙角。我不知所措，朝那个墙角走去，一言不发。我背对着交易桌，脸朝墙角，距离只有两英寸。我都快三十了，此时却像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在墙角罚站。我闭上了眼睛，听到后面传来咯咯的笑声，好像他们是在叫交易场上的其他分析师和助理们过来看。可能盖瑞确实说“买”，我怎么会打成“卖”？我想笑了。一个成年股票交易专业人士在墙角罚站真是件好笑的事情，即使那个专业人士是我自己。现在我得强忍着不笑出来，我得假装被盖瑞欺负得很惨，要不然盖瑞会想出其他的法子来整我。两分钟之后，大卫叫我，说要我帮他干点什么。我知道他是在帮我找台阶，我感激得不行。我跑回我的座位。他说别再出错了。15 分钟之后，我听到盖瑞在电话上数落赫佐格公司的一个交易员。

我能预报股市涨跌，但我无法预知盖瑞的情绪。他好像是单纯为了整人而整人，跟我的表现好坏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就在墙角罚站事件过后的几周，盖瑞对我说，要我开始独立交易了。“就交易 5 000~10 000 的量。”他一边嚼着涂满黄油的面包圈一边跟我说，“要赚钱。”他说得轻

描淡写。与高利安公司的普通交易量相比，5 000~10 000 的交易量简直就是小儿科。但对我来说，却是决定性的时刻。

那天上午，我等到 10 点钟，等到一切都稍微安静下来。我才不想让老板们知道我忙着 5 000~10 000 的交易，就把平常的工作给忘了。我决定要买入 5 000 股微软公司的股票。这是流通量很大的股票，我随时可以买进卖出。不过这样的交易没有任何的分析做后盾，我只是知道交易桌周围的同事们当天都在买进科技股。股市微扬，如果科技股涨了，微软也会涨的。我把交易记在电脑上。股价很快涨了 1 点。我调整了一下椅子，让我的双脚可以有力地踩在地上。我的肚皮顶着桌子边沿。我紧盯着电脑上的微软股票。每升一点，我的心里就震动一下，就像酒吧里音响的低音喇叭震动了一下。我买的第一只股票，得赚钱啊。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股票一直往上升：0.11、0.12、0.13、0.14……我按了电话上拉扎德的灯，告诉我们的交易员朗格尔，说卖 5 000 股微软。“卖出 5 000 股微软，45 元 14 分。”他说道。首战告捷。我把这个销售记在电脑上。5 000 股，每股我赚了 14 分钱！但是一进一出我分别付了 6 分的手续费，所以，我的利润是 2 分。之所以我要付 6 分的手续费，是因为用了他们的分析研究，用了他们的资源，还有他们的服务。为了获得服务，高利安公司每年得付数百万这样的手续费。如果是我自己交易，我可付不起这样的手续费。我看着交易结果的屏幕。我看到微软的代码 MSFT，股票数：0；损益：+ \$ 100.00。啊哈！100 美金！总比赔钱好吧。现在我可以开始第二笔交易了。

我想买进高通公司的股票。上一次的交易把钱都浪费在手续费上了，所以这回，我要用 Instinet 程序进行交易，这样每次只要付 0.1 分的手续费。我点击了买入的按钮，打入代码 QCOM，然后输入 10 000，接着按下发送。我盯着屏幕看。买进了 1 万、2 万、3 万股。怎么回事？我一直买进。数字一直往上升，停不下来。我查看了一下键盘上“0”的按键，

原来它卡住了。他们给我的键盘是最老最烂的那个。天啊，我买进了 10 万股 QCOM 股票。我又不知所措了，然后我就听到大卫叫了起来：“美林公司给 QCOM 降级了！”他当然不知道我刚买进了这只股票，而且是 10 万股。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股票已经降了 4 点。就几分钟的时间，我损失了 40 万美金。我真的不知所措了。大卫站起来，低头来看我的电脑屏幕。“天呐！”他说。他立马抓起 JP 摩根的专线电话，说要卖出 10 万股 QCOM，立等。就是说他电话不挂，立等回信。然后他转过来对我说：“不用谢。”那只股票简直就是做自由落体运动。QCOM 连降 6 点，现在是交易员得负责那 60 万块钱了，不是我们。

事后，大卫打电话给那个交易员跟他说谢谢，说欠他一个人情。“你欠我十个。”那交易员说。那一整天，再没人跟我说过一句话。不过我不需要到墙角去罚站了。

我在高利安的日子真是苦不堪言啊。我信心全无。我随时得小心翼翼，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人说我交易记录不对，或者接电话不够快，然后从后面给我来上一脚。我走出办公室，看到一些精神抖擞、信心饱满的交易员在呵斥着电话那端的人。出了公司，他们跟纽约中城区的其他人没有两样，但是在公司，他们可牛啦。这好像是所有买方交易员都要有的一个基本素质。我觉得不那么强势地欺负人也能做好交易，不过能强势一些会有帮助的。既然交易桌上都是些坏警察，那么我就很自然地充当起好警察的角色了。对那些给我们帮助的销售员，我对他们会竭尽全力地报答。他们听到我接他们的电话都会欣喜若狂。就是说，他们交易中捅了再大的娄子也不会有人数落他们，即使他们万恶不赦也不会被我骂。他们总喜欢请我吃饭，跟我喝个酒什么的。有时候甚至会带我去看球赛或者听音乐会。一天至少有三四个人约我，可我总不想去。我怕他们问我股市的事情，我怕没有语出惊人的答案，那他们就会知道我是菜鸟，跟他们不是一类人。

有一天，盖瑞叫可琳、托德还有我收盘后到会议室见他。托德看上去一脸无聊的样子，可琳在发着短信，而我觉得我可能要吐了。我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见我们。我们等着。盖瑞姗姗来迟，走到桌子最前面，拉开椅子坐了下来。此时托德已经精神了一点儿，可琳也把手机放在了一边儿。可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会的目的，我焦虑万分。我盯着盖瑞的嘴唇看。我想预见他说的内容。“这个月你们跟谁出去过？”盖瑞问道，他主要是看着托德和可琳。他们说出去吃过几次工作餐。可琳似乎是夸大其词了，不过我知道托德确实出去吃过几回。接着盖瑞把目光转向我。我只跟伊森、杰森还有杰米一起出去过，星期六我们去“西红石”酒吧闹了一回。酒吧员玩喷火，几乎把我的眉毛给烧了。但我知道盖瑞肯定不是想知道这些。

“没人。”我答道。

他学着我说的“没人”，好像五岁小孩。“搞点把戏，”他吼着，“搞点情报。”他还用手敲了几下桌子，貌似我们有谁在打瞌睡。“如果你们几个还想在这里干，”他一边擦自己的鞋一边说，“那么你们就得有电话进来。”可琳和托德都点了点头。“我可不是要那些我们已经有的消息——我要新的。”他站了起来，把衬衫塞进裤子里，转身朝门走去。“咱这儿有新规定：每周至少得有两三次工作餐。我要你们写下来，跟谁出去，谈了些什么，你们怎么搞好关系。”他说。然后他就出去了。托德也跟了出去。可琳抓起电话，继续发短信。我可不想跟卖方一起混。

我想我之所以答应跟约翰出去吃工作餐，是因为他几乎不谈工作。他人瘦瘦的，但有个啤酒肚，看上去傻乎乎的。高盛公司肯定不会用这样的人。他比较像卡通人物。他每次接电话都会咯咯地笑，说他如何捉弄周边交易员，要么他会讲个低俗笑话。他更喜欢逗我们笑，而不是专心做股票交易。约翰只比我大几岁，但是好像他在股票界已经混了很久了。我选了地点，上城区西边的一个酒吧。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那儿

了。他说全纽约所有餐馆任我选。我就想选个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如果出了什么事儿，我就可以逃出来立刻跑回家。第一杯鸡尾酒才喝了一半，我就感觉到他想多了解了解我。他喜欢我；想跟我交朋友。他人挺逗的。我们在台上叫了吃的。他问了一大堆我老板的事情。他想要点儿“爆料”的，但我很怕告诉他真实情况。三四杯鸡尾酒下肚，我觉得乐滋滋的，我可以对高利安发表点意见了。“如果我出了个错，”我说着又呷了一口酒，“不管我有没有对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他们都会狠狠地教训我。”

“那叫标准操作程序。”他边说着，边点燃一根香烟。“他们打你吗？”

我觉得他是在调侃我。“不会。”我指着他的烟，我的表情就是想让他也给我来一根。那不是我的第一根。“不过也差不了多少。”

“呃，”他说，“他们工资付得还行吗？”

“行。”我说，“我不知道奖金会给多少，但是，我们公司几亿几亿地这么赚着，我看少不了。”

“那你就甭担心了。”他说。

“也许吧。”我说。我还想多说点儿。我想多证明证明我说的那句话，但他说的也很有道理。如果他们付我的钱很多，那他们对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去看脱衣舞吗？”他问我，把最后一块牛排塞进嘴里。

“不了，谢谢。”我站了起来，穿上外衣。脱衣舞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更想跟普通的女孩子多聊聊天。

他付完钱，跟我说门口有车等着我。我家就几个街区，所以我跟他说我走回去。“你怎么像个老墨（墨西哥佬）？”他说。我不清楚怎么才算老墨，这跟我走路回家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但是我还是微笑着说我可以走回去。“不行，”他坚持着，“上车。”有必要吗？但我还是打开车门，说今天晚上谢谢了。“只要你愿意，每周我们都可以聚一次。”他说。那车是全黑的；后座比我家沙发还舒服。十条街的距离，我都沉默着。那

司机肯定认为我不知趣。我想我是不是得给他小费什么的，但我不确定。我看着纽约的街区在我身边一一掠过。我觉得此时好像是电影里面的场景。对此我习以为常。到我家了，司机微笑着对我说晚安。

我慢慢上手了。每周两次，我会跟搞销售的出去吃饭。每次都是我来选餐厅或者酒吧，每次都有车送我回家。我开始喜欢这样的饭局了。我现在是客户了。我不太可能出错。刚开始我搞不太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如此谄媚地来巴结我？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卖方的人买卖期权跟买方的人买卖股票是一样的。

今天我虽不是交易桌的头，也不是控制高利安公司大多数订单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想在我刚出道的时候跟我搞好关系。他们现在好好招待我，以后我会想着他们的。

1999年12月，我第一次参加了高利安公司的节日派对。那是在纽约中城区一家灯火通明的餐厅。里面的装潢还有餐桌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那地方20年前应该是个很酷的地方。服务生就像是80年代电视剧《大亨》里的原班人马。“我要被炒鱿鱼了。”杰宁说。派对是她安排的，表演的人也是她找的：通灵人士。不知道他通不通灵，能不能看出这些全无兴致的人的思想。我跟杰宁还有她的助理莎莉坐在比较后面的桌子旁。莎莉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我真的挺喜欢杰宁和莎莉的。我们可以坐在那儿整晚闲扯个不停。盖瑞朝我们的桌子走来，我的胃开始疼。华尔街上有人管他叫“罗西”（意思是“脸色红润”），因为他姓“罗森巴克”，但是我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哪里红润。他开始对我发问了：今天股市收盘如何？盘后微软交易怎样？机构买家给几点？他也不让我回答，就一直吊着他那个高音嗓子对我狂吼一通。答案他都知道。我挪了挪屁股。趁他没看见，杰宁和莎莉翻了翻白眼。

“咱们来喝龙舌兰。”他说，朝女服务生指了指。“八杯。”他喊道。我们桌总共才四人。他盯着我的眼睛。“如果你能喝下这八杯，我给你八

百块。”他说。我一时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来真格的。我坐直了，假装信心满满。“我是来真的，”他说，“八杯八百。如果你吐了，你就输了。”女服务生把整个托盘的八杯培恩牌的龙舌兰放在桌上，上面有八片柠檬。“咱不要柠檬。”他说。我觉得我已经四面楚歌，无路可退。不就是几杯酒嘛，八百块也不错。“大家都过来瞧啊。”盖瑞喊了起来。

开始了。第一杯、第二杯……第六杯下去，我眼泪出来了，喝第七杯时，我噎着了，我觉得体温在上升。我拿起第八杯的时候，龙舌兰已经从我嘴里溢出来了。周围的人开始呼喊了——好像是个角斗场。我站了起来，感觉天旋地转。我勉强站稳了，把第八杯举到嘴边。我一口闷下，一屁股坐下，全场欢呼。罗森巴克掏出一个厚厚的钱包，拿出八张百元的票子，扔在我脚下。我跪在地上，拾起那些票子。我醉了。

第二天早上，我眼睛充血，一塌糊涂，羞辱万分。我挣扎着来到交易桌前。除了我，没一人有宿醉的样子。我需要咖啡。罗森巴克在茶水间里坐着。他面前的台面上放着一盒果冻甜甜圈，某个交易员送的。他抓起一个甜甜圈从中间掰开，把半圈塞进了嘴巴，说：“三分钟你能吃下八个我再给八百。”

几个月之后的一天，刚下班不久，办公室里别无他人，就盖瑞和我。我在网上看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春季训练的情况。跟 CIBC 公司进工作餐之前，我还有时间可以消遣一下。工作餐安排在周氏餐厅，这里是时尚名人、社交名流、国际美食老饕聚会的地方，服务生都穿白色燕尾服，服侍客人吃北京烤鸭。周氏餐厅就在公司附近，所以我没理由还先回家一趟。我不知道盖瑞为什么也留在公司；通常股市一收盘，他的加长汽车就会来接他。他叫我过去，让我在可琳的椅子上坐下。他的脸不再那么严肃，看上去甚至有些温柔。“你最近干得不错。”他说。能听到盖瑞的夸奖，就等于狮子对你说你的肉很好吃。“知道吗？特别是在高通那单交易之后。”他说。在“单”之前说的“那”字，要么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要么是，依我看，非常非常坏的事情。公司最近确实非常忙，我觉得他应该没注意到我的表现如何。

“明天我要你跟第一波士顿和高盛交易，”他说，“我要你买进卖出那些公司的股票。”他是一边看着电脑上的电邮一边跟我说这些事儿的。我什么都没说。“专找那些交易量大的，知道吧，微软软、英特尔、阳光电脑啊什么的。”我最近才知道微软软就是微软公司。“我要你能交易多少就交易多少。”他说。他开始给什么人写邮件。“尽量少赔钱。”

“你不想我赚钱？”我问道。

“不是这意思。”他说着，按下发送键。“我要你整天买进卖出这些公

司的股票。跟波士顿买十万，等五分钟，卖给高盛。”他手机响了。“一整天你就买进卖出。”他说。他接了电话，告诉司机说他就下去。“跟我好好干，特尼。我会让你成为明星。”我看着他站起来，离开。整个谈话都很诡异——无论是他让我干的事情，还是他对我说话时候极好的态度。

毫无疑问，盖瑞的幽默感来源于高利安公司做的生意。在2000年那会儿，我们公司在华尔街以狼性著称。能有三位数字回报的公司都这样。几百万不是我们谈的数，我们谈的是几十个亿。要投资的钱汹涌而来。如果有哪个销售员或交易员不听我们的话，会有99个排着队要来效力。每天都有新的分析师坐入上一个分析师留下的空位。我们又从摩根士丹利挖来一个高级交易员，老板们也答应我要找几个年轻人来帮我做那些杂事。

不过，盖瑞的指示还是让我有一些疑虑。公司正在疯狂地成长，又赶上办公室里猜忌和竞争的气氛越来越浓重，搞得公司上下鸡飞狗跳。拉吉有个臭名昭著的伎俩，他能挑拨两个地位相当的分析师，让他们明争暗斗。我称之为“拉吉挑拨斗鸡模式”。他跟一个分析师咬耳朵，又跟另一个耳鬓厮磨，接着他就坐山观虎斗，看他们把对方的眼睛给抠出来。适者生存。打赢的那个就可以保住工作；血淋一地的那个，连同鸡毛都会被扫地出门。他想拿这一套来整我和可琳，但是他失算了，或者他不知道我俩特熟，我们下班后也经常一起混。

除此之外，高利安集团旗下两个基金之间也酝酿着一场斗争。拉吉、盖瑞还有可琳负责科技基金，我和克里森、司莱恩负责保健基金。我刚开始在高利安干的时候，公司旗下保健基金那一块只占总资产的10%。但我进公司之后，短短一段时间之内，保健基金像气球那样涨到数十亿元的规模。虽说只有科技基金三分之一的规模，但不管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个巨大的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牛市的带动，另一个原因则是首席交易员司莱恩。虽然盖瑞和司莱恩处得不错，每天早上一起去健身房

健身，有时候甚至还称兄道弟的，但是他们私底下暗自较劲儿。所以，虽然盖瑞是我的准老板，但他已经越过了那条无形的界线给了我一个机会，他还说要让我成为明星。但是，我只认一点，我要认真交易了——这比天天订早餐好多了。

第二天上午，我回到我的交易桌前。我把该做的一些杂事做好了，晨会也开得挺顺利的。股市开盘的时候，那就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第一笔 10 万股英特尔我决定要跟第一波士顿买进。两分钟之后，我卖给高盛。我赚了 2 分，手续费却花了 12 分。小损。我继续如法炮制。我决定买进 20 万股阳光电脑，几分钟之后再卖出。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午饭点还没到，我已经进进出出几百万股了。我的损失总共是 75 000 美元，但我们公司要分别付给高盛和第一波士顿 60 000 美元的手续费。这就是重点，盖瑞吃午饭的时候跟我说的。“干得好。”他说。我感觉不是那么好。不过，只要他开心，我就开心。虽说这么做不符合常理，但这么干很有意思。再说了，高盛和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交易员都热血沸腾了。

第二天我就看出些门道儿来了。第一波士顿给一个首发股定了个价，公司名叫“西乐提卡”，股票代码 SLTC，今天上午就推上股市，要卖 400 万股。那公司干啥的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但是首发股很抢手，预购数量已经超过配股的 100 倍。第一波士顿的每个客户都想预购一些股票。这就是大家说的抢手货。我们跟华尔街上其他人一样，也预购了 100 万股。第一波士顿来电话了，我抓起电话。那边的交易员说给我们买了 10 万股，每股 30 美元。他说我们是全华尔街拿到配股数量最大的公司。他说的应该没错。他说，他的很多客户要么没拿到配股，要么只拿到 5 000、10 000 或 25 000 股。我先报告盖瑞，然后告诉了拉吉。接着，我就跟往常一样，把这个交易记入电脑，以显示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盖瑞在他的电脑上看到了这个记录，对我喊了起来：“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他的鼻音依然那么浑厚，“记在司令的账上。”

司令的账号里面主要是盖瑞和拉吉的私人基金。具体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数量很多。我们员工也可以通过司令的账号投资。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他们都极力怂恿我往里面投资。“相信我，”他们都说，“把钱投这儿。”我照做了。

我有一个退休金账号，里面大概有 5 万块钱（从摩根公司转过来的），可能不止，也许能再多个几千块吧。

我在电脑上选中 SLTC，双击鼠标，把它从公司的主要交易基金转到了司令的账上。买进 SLTC10 万股，30 块钱。开盘之后，第一波士顿那边有个人打电话过来，说 SLTC 大概早上 10 点正式交易。我大声传话，大家都听到了。差 10 分钟 10 点，那人又打来电话。“貌似开盘价是 40 块。”他说。五分钟以后，电话机上第一波士顿的灯又亮了。“貌似 62 块！”三分钟过后，那家伙又打过来。“80 块。可能更高！”他喊着，声音好像充了电一般。

股市开盘的时候，全公司一片欢呼。“天上掉下来的钱，宝贝儿。”盖瑞叫道。我看着我的电脑屏幕，SLTC 开盘价是 94 美元。每秒钟交易几十万股。最新的交易情况在我的屏幕上不断更新，简直就是在跳舞。超过 100 块了。

现在我好像看懂了这游戏的规则，为什么盖瑞让我买进卖出，还丝毫不关心我有没有帮公司挣钱。事实如下：我们付给卖方的手续费越多，作为回报，他们提供的信息就越多。前一天我给公司损失的 75 000 块，那不过是为巨大利润付出的一点成本。SLTC 股价此时到了 110 块，我们赚了 800 万块。好像不费吹灰之力。而且，从法律角度来讲，这完全没有错，我想是如此。哇噻。这买卖做得真棒。

但是盖瑞对我喊：“特尼，叫‘婴儿膀子’。”“婴儿膀子”自己独立一个人在交易场操作。他穿着那种夜里穿的丝绸衬衫，领口开着，露出卷曲的胸毛还有他挚爱的土豪珠宝，简直就是上演《黑道家族》的真人

版。不知道他有没有上过大学，从没听他说过。他是个大块头——可能他身体每一个部件都很大，因此才有那样的绰号。如果我们想搞张门票或者任何事情，请他帮个忙，他都可以做到。好像他就是专门负责帮忙的，像个酒店大堂的总管，他也顺带做做股票交易。“叫他套 10 万股 SLTC。”盖瑞说。简言之，“套”就是完成一个买方卖方的交易。一般情况下，你只能跟一个客户或者交易员套。但是盖瑞让我做的，是让“婴儿膀子”当操作员，我们自己套。我们自己买自己卖——这合法吗？我真不知道。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这么干，但是我还是这么干了。高利安的水挺深的，我渐渐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要学的还很多。我给“婴儿膀子”打电话，他照我说的做了——一买一卖他就分别拿了 6 分的手续费。10 万股 SLTC，价格一样，同一笔交易，买一次卖一次，他立马赚了 12 000 块，可以买很多丝绸衬衫的了。

后来，也许是当天的晚上，或者再晚一些，我才意识到自己被卷了进去。这只新股票是 30 块一股，我买了 10 万股，用的是司令的账号。我们自己的钱。股票涨到 110 块的时候，我给“婴儿膀子”打电话，让他用同样价格帮我买进卖出 10 万股。我在司令的账号上做好记录，并在公司的主要交易基金上记下了买入，基金是投资者给我们的钱。这次交易在司令账号里留下的唯一记录是那 800 万块的利润。

同样的情况——当然是不同的股票——不断在高利安上演着。我们会在上午买进股票，看它涨跌的情况，在下午决定把它放进哪个账号。投资者从来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的主要交易基金一直表现很好。如果有投资者看到这个司令账号，说真的，他们肯定有问不完的问题。但是没人问。

我知道我们这么做不对。至少得有个类似委托责任什么的。但是，这里的钱滚滚而来，让人飘飘欲仙。有时候我拿出计算器敲一敲，看我赚了多少钱。运气好的日子，我一天可以赚 5 000 块。只要我有钱，我可以投在司令的账号里，赚的钱比高利安给我的工资还多。

8

几星期之后的一天，我在办公室里，没什么大的动静。盖瑞出去打慈善高尔夫了，拉吉在外面开会，司莱恩在会议室打电话。我在整理一张表格——高利安计划中派对的宾客安排表。我先打给所有的交易员，看他们要不要参加，要不要带什么人来。老板说我自己可以带五个人——但必须是提供有用信息的人，看来我的那些室友是没份了。这时候，我发现有个外线电话打进来。“高利安，”铃响一声我就抓起了电话。那边的声音有点闷闷的，好像是在对我说悄悄话。我又说了一遍“高利安”，这次，我勉强听清他说了什么：“盖瑞在不在？”

“不在，”我说，“他出去了。”几秒钟的沉默。

我正要挂上电话，我听到那个声音又小声地说：“拉吉在吗？”

“抱歉，”我说，“他没在座位上。我能帮什么忙吗？”我能听到那个人呼吸的声音。他的声音让我想入非非：一袭风衣，电话亭，神秘电话。

最后，“悄悄话先生”讲了一点人话。“杰弗里斯要给亚马逊升级，六分钟之后。”接着，我听到“哒啦”一声，他就这么挂了。没有姓名，没留下联系电话，无法证明这消息是否准确。我瞄了一眼电脑上的时间：下午 12：59。我该跟谁说？该不该说？“悄悄话先生”可能是在搞恶作剧，也可能是盖瑞开的玩笑。我说了你可能不相信，罗森巴克可能会空穴来风地给公司整出个赔钱的事儿，就为了让我出个丑。我又看了一眼时间：一点整。我的大脑开始高速运转。我要不要买进一些亚马逊公司

的股票，看看它会不会涨？不过，我立刻打消了那个念头。没有理由啊。谁会在这大白天打电话来还搞得像 007 的电影？电脑上一分钟好像一秒那般就过去了。1：02 了。如果我不买进亚马逊公司的股票，而“悄悄话先生”讲的话又是真的，他会告诉拉吉或盖瑞，说他打过电话，之后就是拉吉或盖瑞过来找我算账。该死。1：03 了。我只有两分钟可以做决定。我看到可琳的眼睛，飞速跟她交流了一下。“他是谁？”她问道。我说完全不清楚。她耸了耸肩膀，继续干她的事情去了。1：04 了。不管了，我对自己说。我买进 10 万股亚马逊的股票，然后往后靠，躺在椅子上。我希望“悄悄话先生”知道他在干什么。

1：05，亚马逊公司股票开始涨。起初一下子涨了 5 毛，两秒钟之后，涨了 2 块。杰弗里斯的灯亮了，我抓起电话。他说亚马逊公司升级了。我想说知道了，但我还是向他道了谢，接着挂上电话。看着股票不断上涨，我突然有个感觉，我可能干了件非法的事情，不过这念头在我的大脑里瞬间即逝。木已成舟，我只能安慰自己。每天盖瑞和拉吉都给我灌输这样的想法：我得有点突破。这就是他们经常说的。每次有外线进来，我都接。我盼望那又是“悄悄话先生”。

拉吉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股票已经涨了差不多 5 块钱。我等他走进他的办公室，然后我告诉他神秘的“悄悄话先生”的事，还有我买了 10 万股亚马逊的股票。我们的损益表显示：50 万利润。他低头看着他的电脑屏幕，开始哈哈地笑了起来。拉吉平时就笑得很大声，如果有好事他更是如此。我问他是要抛售，还是留着。“我来。”他说，还笑着。这是我进高利安以来第一次觉得我不再像个普通职员，而像个交易员。亚马逊事件之后，我开始了解，在对冲基金这行，没有什么碰巧的事情。大家都在以最快的速度抢信息，不择手段。如果我要赚钱，赚大钱，赚买方的钱，那么我就需要有自己的门路。

在筹备派对的那几周里，经过大肆宣传，整个办公室的人以及所有

想被邀请到的人都被搞得热血沸腾。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这可不是你常去的那种华尔街交际派对。买方公司要来讨好卖方，这本身就是绝非寻常的事件。通常都是倒过来的。但是，拉吉不只是想要来招待卖方；他还要让所有人都记住这个派对。我们公司租了一个超级大的舞厅，那是一个纽约中城区的“超级俱乐部”——可以容纳1 000人。虽说这派对是华尔街最劲爆的派对，但是我们对来宾却没有什麼资格限制。如果您罩过我们、挺过我们、帮过我们，再小的忙也没关系，您就来吧。

一天早上，拉吉聘请的设计派对并安排表演的那个负责人来到了公司。他请来的表演者包括重磅人物唐纳·萨摩。此人有点范儿，说唱歌手的风格，高高的，蓬松的金色头发，我一看就喜欢。可能是由于他那种专业的风度，或者是他的公司非常有创意——拉吉不只让他安排这个派对，还让他给高利安公司写个嘻哈风格的主题歌——也许是他唤起了我那份尚未忘却的非华尔街情怀吧。他自我介绍说他叫杰西·依兹勒，我立刻认出，他的嘻哈艺名是杰西·杰米斯。

“嗨，杰西，”我的一位桌友叫了出来，“特尼也是个嘻哈歌手。”我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粉红色。“是吗？”他说着，点点头好像挺满意，“你的嘻哈艺名叫啥？”

我仍然红着脸，打算死也不告诉他。我想起1991年的时候，那是在看《呦！MTV嘻哈》节目，里面有他的歌《跟白女孩那样摇摆》，还有《大学女生很容易》。我还知道他的那首《我喜欢这游戏》得过艾美奖，那是他为NBA篮球赛写的嘻哈歌曲。他还帮纽约尼克斯球队写过《纽约队冲啊》。

“克利夫兰·D。”我最后才挤出这几个字。

“很好。”他说。

我哪算什么嘻哈歌手啊。这么说我是抬举我。不过说真的，我挺喜欢嘻哈曲风的。而且，说真的，我在1988年和我最好的朋友内森尼尔

（他自称“LIVE T”）组了个嘻哈团体叫作“最高密度”。我们的朋友大都都恨透了嘻哈风的音乐。不过，那是在肯尼邦克高中的往事，肯尼邦克恐怕是地球上最不嘻哈的地方了，我们通常都在内森尼尔家的谷仓里自己唱，面对的观众数为零。

几天之后，我桌上电话响了，是杰西打来的。他问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写高利安主题歌的歌词。“真的假的?!”我说，声音高亢到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我立刻就很酷地接着说：“那当然。必须的。”跟内森尼尔家的谷仓比，这确实是个飞跃。这样好的机会何时还会再有呢？

派对前的一周，我跟杰西在录音室里碰面了。那是在上城西区的一个大楼的地下室。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找对地方。终于我找到一个门铃，上面有个小标签写着“米尔·罗斯音乐”。我走下晃晃悠悠的楼梯。地毯很黑，墙很脏，整个地方都是发霉的味道，但那个录音室却很专业。有几个录音间，音响师坐中间，后面有个沙发，还有几张椅子。音响师看到我，说道：“啥事？”

我们只剩一星期的时间，要写歌、要录音、要做后期，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才能按时完成。我一整个星期都在准备我们的这次会面——呃，或者说，我一整个星期都在担心。我想要准备，但不知道从何做起。每当我想到一个主意，立刻就觉得傻得透顶。我坐在沙发上，杰西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开始问我关于高利安的问题。在那儿做事啥感觉？华尔街对高利安有什么看法？我说华尔街给高利安的称号之一是：“好船。”忽然间，我有了个主意，我脱口而出。干吗不用那首《坐上好船糖果号》的曲子，我们把歌名改成《坐上好船高利安号》？

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克利夫兰·D!”他喊着，头上下摇着。我松了一口气。

我开始放松了，歌词也源源不断地涌了出来：“这是艘好船，叫作高利安……华尔街往上涨啊，交易量往上冲……大家都可以赚大钱。”秀

兰·邓波儿都得满意这样的歌词。杰西找了个女音来唱和声。接着，带着我写的东西和我所有的想法，他进了录音室，开始嘻哈嘻哈地唱上了。我叹为观止。20 分钟不到，他就录好了。“该你了。”他说。杰西让我也来嘻哈几段，他的原话是“八个小节”。刚开始我好兴奋，但马上又变得好紧张。我想起内森尼尔，还有我们一起排练模仿的最新劲歌，还有我们自己创作的新歌。我必须得唱几句。

音响师放了杰西唱的最后一部分，让我知道啥时可以接进去。我得接着他的那句歌词的韵，我必须和上 CNBC 的韵。我是这么唱的：“还有我，克利夫兰·D。来吧，买吧，我需要交易量。只给我 5 块？太愚蠢了。我是高利安，四通八达，保健和科技全有。”我唱完，制作人给我个“有没有搞错？”的表情。他放了一遍，我一听也觉得恶心，像个不着调的机器人。我的艺名可能得改成“无调特尼”了。我又唱了一遍，进步了一些。NG 九次，我依然屡败屡战。每次 NG，制作人的头都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最后，我第 11 次开唱。他耸了耸肩，于是我的第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嘻哈曲子诞生了。现在我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了——我现在在灌 CD 了，我要给内森尼尔寄一张，他想放多大声就放多大声，让缅因州的那些反嘻哈人士们好好听听吧。

高利安派对举行的当晚，我去了超级俱乐部对面的一家酒吧。“婴儿膀子”让我先去那里跟他碰头，他说有个礼物要给我。第一杯啤酒上来的时候，他到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他竟然穿着运动外套——黑色很贵的那种，可能是阿玛尼牌的吧。他转过身的时候，我看到后背上绣的是一条中国龙。“特尼·达夫！”他说。他抓过我的肩膀，强迫我跟他拥抱了一下。要么是他不知道我的啤酒洒在他的衣服上了，要么是他不在乎。他叫了一杯喜力啤酒，还叫了几杯烈酒，接着，他让我伸出手来。他跟我拍掌，把什么东西贴在了我的手掌上。我低头一看，是一个两英寸大小的塑料封口袋，里面有白白的东西。“爽去吧！”他说。我又不知

所措了。我把那袋子放进口袋，问他今天过得如何。那些有的没有的讲完之后，他说：“那玩意儿你要不要去洗手间爽一下？”我笑了一下，仰头把啤酒灌了下去。我走进一个隔间，锁上门，把手伸向我的口袋。以前我没见过可卡因。我只记得高中的时候，校篮球队明星兰·比阿斯用过，他心脏停了。我还知道，如果你有一大包这玩意儿，电视上的唐·约翰森警长一定会撞开你家的门，在你胸前打出几个子弹窟窿。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这玩意儿。要倒出来吗？他还会要回去吗？他会不会知道我用了多少？我得有一手准备才行。我得全部都嗑了吗？我用手指摸了一点点，在舌尖上点了一下，整个嘴巴都麻了。我把小袋子封上，塞回我的口袋里。我又回到酒吧。“婴儿膀子”等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东西他要拿回去。“咱们去派对吧。”他说。我们喝了一半的啤酒就留在了吧台上。我希望他没有察觉到，我一点可卡因都没有用。

派对气氛很疯狂。七小时之后，我站在俱乐部门口。我看到“婴儿膀子”正要上车。他看到我，停了下来，朝我走过来。“还要再来点儿？”他说着，指着自己的口袋。

“不用。谢了。”我说。

“这派对酷毙了，”他说，“真炫。”他举起他的那份CD，使劲摇着，好像那东西很烫。《坐上好船高利安号》简直爆了棚。人手一张。我听很多人唱着那句朗朗上口的歌词：“……有钱就投给高利安。”

“婴儿膀子”在后座上坐安稳了，但是后门他还没有关上。

“连对冲基金都有主题歌了，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曲终了，人该散了。”

不管今晚多么的辉煌，不管华尔街有多大的潜力，“婴儿膀子”的话似乎像是来自上天的启示。不过，我能想到的是，还没到曲终人散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卖方的人陆续走出俱乐部，我听到有人叫我。“那歌酷毙了，特尼。”他们说。忽然间，我知道自己已经突破了，能独当一面了。

在华尔街有一个说法，迟了就等于错了。科技股就像是嘴里含着管子吹泡泡的九岁小男孩。他吹出来的泡泡非常不规则，特别大，肯定会爆。爆的时候，他肯定是一脸肥皂水，湿答答黏呼呼的。炒科技股是拉吉的强项，也是他盘踞对冲基金巅峰的原因。他绝不容忍任何一丝对股市的负面想法。迟到也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坐在交易桌前，股市正在下挫。我的屏幕上只有一只股票是绿的——其他地方都红旗飘飘。^① “大家都死光光了，”桌对面有人喊着，“有没有人卖空？股市快不行了。”此时，拉吉办公室里电话响了。

“拉吉，电话！”一位助手喊道。拉吉跟我们的一个分析师走过交易桌，走向一个小会议室。他把那扇木门给关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玻璃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他以前几乎从没关过门。我们就像是听到远处枪声的麋鹿，大家都竖起耳朵听着。交易员互相看了看，不知道有谁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拉吉跟分析师在对着电话说着什么。情况很严重。

20分钟之后，拉吉叫盖瑞和大卫进去。我们剩下的人都焦急地坐着等。不一会儿，大卫冲了出来，把一堆卖出的单子朝我扔了过来。所有单子都是科技股的。随时都会有人会给我一些单子要交易，通常都是保健股的。不过通常每次都是一两个单子。但今天这叠单子够厚的。“把这些

①——此处股票涨跌标记颜色为美国习惯。——译者注

卖了，我说真的！”他说，“卖了。现在！”交易桌上每个交易员手里都有40张卖出的单子。这真是疯狂大甩卖——必须全部清仓。要么是我们有什么消息，要么是我们公司要倒了。拉吉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的左手捂着嘴的左边，好像他是想要跟谁说悄悄话，但他却朝一个交易员喊道：“给我发个电邮，解释一下卖出‘北方公司’基金的原因，”他说着，“记得给我写点关于罗伯森·史蒂文斯会议取消的事情。”罗伯森·史蒂文斯是旧金山市的一个老牌投资公司。每年它都会举办一个科技会议，业界大腕儿和投资者云集，讨论科技行业的现状与未来。那个北方公司就是业界大腕儿之一，临时取消会议并不一定就是说有坏消息，但别人可能会这样解读。

刻不容缓，我们立刻开始打起电话。我同时给出了四五张单子。

“给我拿出去卖了！”我们对那些交易员说，“卖掉！”

我们电话显示板上面的灯闪烁得就像QVC电视珠宝大甩卖时候的灯。我把交易反反复复地进行校对，我不希望出任何差错。单子还是很多，还没有全部处理掉。办公室里大家叫过来喊过去，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司莱恩，摩根找你！”“盖瑞，你卖25万股CSCO。”“卢比，别碰我的电话。”“盖瑞，打给美林期权的前台。”“高盛找你，可琳。接电话。”“接电话。特尼，派博只卖出10万股CTRX，你想怎么办？”“司莱恩，JP摩根电话！”“特尼，JP摩根出财报了。”“接啊！该死！接电话！”

一片混乱。我努力想把所有卖出的单子都处理完，收集好我们这桌所有交易员的报告，输入系统里。高利安平常每天平均处理100个单子，我说的是一整天。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两倍的量，时间只有一小时。我祈祷不要出任何差错。经过一小时的疯狂混战，接下来整个办公室一片寂静。我们竟然处理完了。我们清仓了200多个仓位。现在我们完全平仓了，不拥有任何股票。难以置信！

全华尔街都在买进，而高利安全数卖出。那天早些时候，股市好像

会大涨，经过我们这么一抛售，股市难以保持不跌的状态。我把自己从桌边推开，松了一大口气。谢天谢地，总算过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拉吉又喊盖瑞和大卫进去了。又出什么事了？

让我们演《土拨鼠日》？大卫回来的时候又扔了 40 张新的单子给我，但这次我们是要卖空以前我们熟悉的股票。卖空跟卖出是一样的，不同点在于我们此时手头没有股票。先卖出去，希望今后用低价买回来。今天我们刚把所有的股票都卖出去，现在还要赌一把，希望它们都会降价。又是一片混乱。而这次，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要在收盘之前做完——还剩 30 分钟。交易员们又开始喊叫了，电话响个不停，拉吉时不时过来问我们单子处理完了没有。我开始手忙脚乱了。我没有时间思考。电话一直贴在我耳边，我还用另一只耳朵听其他交易员在讲什么，我还得记录所有的交易。当收盘钟声响起，单子全部做完了。两小时之前，我们几乎拥有每一只科技股股票，现在，我们把它们全部卖空了。这是全新的领域，对冲基金从没有这样玩过。

整个办公室又静了下来。拉吉站在盖瑞身后，他们看着打出来的新闻消息。收盘后两分钟，北方公司的财务报表出炉，收益数字很差，未来收益的预估更差。在科技股膨胀到最高峰的时候，北方公司发展得比同行的专业公司都快很多。但现在它的股价停滞了。这不仅对北方公司来说不好，对整个股市也是如此。盘后交易中，期货交易跌得一塌糊涂。泡沫就要破了，而我们明天就要捞回大笔大笔的钱。“我靠！”我小声地说。

接着盖瑞命令我预定买进 1 万股北方公司股票，看涨，给交易员的手续费是每股 25 分——这比一般手续费高 10 倍。我觉得我正走进一个抢劫现场，而盖瑞正递给我一个面具。如果我们不是事先知道了消息，那为什么我们付这么高的手续费？这肯定是封口费。但我还是这么干了，因为是盖瑞命令我这么干的。但我内心明白，这种辩解在法律上是多么

的脆弱。我把交易单给大卫看。大卫告诉拉吉说我们都得去坐牢。“这交易不是我授权的。”拉吉说，“盖瑞干的，他单独行事。”我的天啊……

之后的几周，办公室里气氛凝重诡异。几个交易员说要找律师做好准备。大卫跟我说证监会已经打电话给拉吉了，要他解释为什么抛售所有科技股。他回答说因为北方公司退出罗伯森·史蒂文斯大会，所以他才抛售。那一瞬间，我想起拉吉对那个分析师喊着，要他在电邮中提及北方公司退出大会的事情。我意识到那是拉吉在制造文字记录来洗清他的犯罪嫌疑。他竟然还混过去了。拉吉给出的理由被证监会接受了。挂电话之前，可能他们还进行了友好话别。

在我们公司里，我们跟生意伙伴举行了内部会议。大家都要把自己的话说圆。我想，拉吉已经叫分析师写邮件给他，说明了抛售的理由，他给自己找好了无犯罪嫌疑的证明。我则收到警告，嘴得把严。但这个“北方交易”，行里的明眼人都能看懂，他们的态度是羡慕嫉妒恨。高利安顺利躲过了一场数十亿美元的灾难。

2000 年秋，公司又招了两个年轻人——罗布和查德，都二十来岁，要学的比我当时还多，什么交易差错啊，核查所有交易正确无误之类的。每天早上他们来上班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的恐惧。一整个夏天，股市都在努力尝试从刚破裂的泡沫中复苏。高利安保住了“性命”。我们不可能会有以前那样的三位数收益，差得很远。但是我们现在负责的资金是数十亿的，所以我不需要有三位数的收益。

虽说我在高利安工作以来，在短短的时间里经过了不少历练，我还是没有整出一个大交易量的突破，也没有获得一系列的可靠信息。但是，有一天，利灵克公司的电话灯亮了。那是波士顿的一家小经纪公司，主要做保健方面的股票。全公司只有我会接他们的电话，因为其他人都认为这家公司毫无用处。我也开始要有这样的想法了。我们在交易桌上常用一些简写代码。交易员会说“MG”或“YG”，代表“我的人”或“你的人”。我所有的 MG 都是大家不想要的——无人垂青的“孤岛”交易员。虽说现在有了罗布和查德，他们也不怎么与别人交谈，但我还是交易桌上的初级人士。这些孤岛有点意思。每隔一段时间，你都会从这些孤岛上挖出一枚闪亮的宝石。

另外，跟我联系的那个利灵克公司的女孩也很有意思。她可以拿八卦跟你换最好的消息。只要她来纽约，我都跟她出去见一下面。铃声响了两下，我抓起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恐慌。她说了些关于礼来制药

的事情，但我没有明白她说的是啥。挂了电话之后，我一直想着她的电话。我不是在想她说的事情，而是她说的方式。直觉告诉我，必须给她打回去。我打了，她还是跟之前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再说一次，这次慢点说。”我说。“礼来制药已经有确凿消息了，”她说，她的话终于能表达她激动的心情了。“他们的通用型普罗萨克抗忧郁药要停产了。”

“然后呢？”我说。我还在等待更多信息。礼来制药停产了又怎样？又不是没有停产过。他们又不是只有通用型普罗萨克这一种药。

“你没听明白，”她说，“斯普拉克公司去年销售 2 700 万，预计到 2003 年，他们可以因为通用型普罗萨克拿到 5 000 万~1 亿的特许费。”现在我完全听不明白了。“打住，”我说。“交易礼来制药，还是交易斯普拉克？”“斯普拉克。”她说，“他们是跟礼来制药开发通用型普罗萨克的合作伙伴。斯普拉克玩完了。”

现在我恍然大悟。斯普拉克是礼来制药的合作伙伴，现在要完了。斯普拉克基本上什么都不是。它的股票会一落千丈。我打电话给花旗银行的交易员买进 500 份斯普拉克看跌期权，等于卖空了 5 万股。当天该股开盘价为 120 元，现在已经跌到 105 元了，跌了 10%。卖方负责保健股的交易员开始给我打电话问为什么斯普拉克完了。“我也不清楚。”我说。我继续买进 500 份看跌期权，股价又跌了 5 元。我又买进 500 份，股价现在跌到了 99 元。我不清楚股价会到什么程度，但如果他们的预估是 5 000 万~1 亿的特许费，而现在的数字是零，股票应该会继续猛跌。我又买进 500 份看跌期权。现在，我手头的量已经等于卖空了 20 万股，平均价为 99 元。股票现在的价位是 98 元、97 元、96 元……股市的卖方开始恐慌。几家经纪公司开始对斯普拉克进行看跌处理。我给利灵克公司的那个女孩打电话，问她斯普拉克的股价会是多少。她朝她的分析师喊了一下。分析师表示 90 元是好价位。

我立刻打电话给花旗的交易员，让他把我的 2 000 份看跌期权卖出。

卖看跌期权就像是在买进股票。“现在就卖，马上卖。”我说。他几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报告交易结果。股价现在为 94 元。10 分钟，20 万股，我每股赚了 5 个点。100 万美金。“干得不错啊，小子。”花旗的交易员说道。瞎蒙的。如果大家都搞清楚了这种瞎蒙是怎么回事，会造成这只股票的暴跌，谁还需要做研究啊？我看了看周围，因为我想找个人跟我击个掌。我控制住自己，因为我想大声喊：“现在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了！”但是我忍住了。该听到的人现在都听不到。拉吉和盖瑞今早都出去了，大卫和克里森在会议室里待着。他们回到交易桌的时候，我会漫不经心地说我赚了点钱。他们看看电脑上的损益表就知道了。

他们看了电脑之后，就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想了想利灵克的女孩，又想到“悄悄话”先生。“我看了礼来制药公司的新闻，于是就猜到了。”我说。大卫和克里森看上去为我感到自豪，也为我高兴。但我可以看得出，盖瑞和拉吉心里盘算着我还知道些什么东西。我不会说的。利灵克公司那条线归我管理了。

2001 年的前六个星期很难过。我们猛追 1 月份的那个小高潮，但是没有成功。现在整个股市都在抛售，我们在赔钱。我再说一遍——我们在赔钱。现在的局面是，所有对冲基金都得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只有马多夫除外吧。在基金交易中，厄运连连或者数个错误决策都会导致负收益，同时还会带来双重的后果。第一重后果是事后回顾：上星期五你没上班——你太懒了；上个月可能卖出获利的股票，现在还在手上，这说明你对股市的看法愚蠢透顶、一文不值；每个员工都需要接受工作评比，你最近的每个交易、每个想法、每个错误都会受到着重批评。第二重后果比较难以表达。姑且想象一下“雨前浮云”吧。就像狗的行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一两个小时，狗在桌下狂吠乱抓一气。可能是因为气压的变化，或者是电能的增多。也可能是狗的听力和感官非常灵敏。还可能是因为它们意识到了雨的来临。不管原因如何，如果高利安是一条狗，2001 年初的时候，它一定处于在交易桌下狂吠乱抓的阶段。

情人节那天，就在这种“雨前浮云”的情况下，我走进公司的办公室。我的桌上放着一把甜心巧克力。我不讨厌情人节，因为我不讨厌，所以就显得我很有爱心。我三十一了，单身，还是个买方交易员。虽然办公室里时不时有人骂我，说这么大了还没个正经的女朋友，但我的生活节奏太快，没时间坠入爱河。再说了，我的日子过得好着呐。我花钱

连眼都不眨。跟我的室友一起，我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我安定不下来，没法交女朋友。

我打开电脑，把一颗心形巧克力扔进嘴里。查查邮件。一抬头，我看到盖瑞已经坐在他座位上。我没看到他进来。他眼睛上面有一道伤痕。伤口是新的，在日光灯的照射下，涂着软膏的地方闪闪发亮。他低着头，一副被击溃的样子。他抓起电话。

“盖瑞。”我叫他。他慢慢转动眼睛，朝我看过来。他的皮肤简直少了一层光彩，看上去就像生了病。他应该整晚都没睡。我心里有个问题随时都可能脱口而出，但是我听到脑海里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别问。千万别问！”我立刻转头继续看我的电邮，还说着：“没事，我会搞定的。”

同事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办公室。每个人都看到盖瑞眼睛上方的那个伤痕和颓丧的表情，大家都把头转开。有些人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事发之后，就有人用手机“广播”了。盖瑞约可琳出去；司莱恩可能早已和卢比说过了，因为他跟他们是一起的。真是搞笑：我是最早到办公室，但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虽然手机不停地转播着八卦新闻，办公室里却是一片诡异的寂静。司莱恩最后一个晃进办公室，比平常晚了半个小时，然后在我身边坐下。他没看着我。我朝他看去，想引起他的注意。他用一块清洁布擦着他的手机，每天早上都是如此。我一直想跟他产生眼神的接触，但无果。他知道我在看着他。最后，终于他转过头，朝我靠近了一些。“我打了那小子。”他小声对我说。我往嘴里扔了四颗糖果。

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完全不明白那句话对我的工作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影响。我只知道，除去好奇，我当时心里还混杂着某种情绪。不管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反正盖瑞早就欠扁了。我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不过，导火索是什么呢？怎么司莱恩也掺和进来了？我的头脑里有这些问题在闪过。突然间我好像懂了。几天前，拉吉开始挑拨司莱恩和盖瑞。

“你干吗让盖瑞对你指手画脚的？”拉吉说。拉吉老这么挑拨他的员工——他的斗鸡模式，但他还没在管理层这么干过，至少我没见过。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公司没赚钱，拉吉很不习惯这样的状态。也许他觉得内部来个小小的斗争会让大家斗志昂扬。他想看看司莱恩和盖瑞争相求宠。于是他开始出招，就像一位火辣辣的拉拉队队长。不过，我怀疑拉吉有没有设想过他的挑拨会导致这样严重的后果。

罗森巴克和司莱恩通常一起到雷宝健身房去健身。那天他们是一大早六点去的。健身之后，他们又一起去做桑拿。桑拿室里已经有另外两个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大家说了无数遍，版本也有很多。盖瑞光着身子，手里拿着毛巾，头上脸上热汗直滴，他挖苦大卫说今年真是牛劲冲天啊。“我们赔钱了，还不都因为你。”他说。司莱恩身上的肌肉在蒸气中闪闪发亮。他警告盖瑞不要再说了，但盖瑞没停下来。盖瑞挖苦人的时候，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停。司莱恩甚至对盖瑞放话，他会像贝比·鲁斯的全垒打那样，指哪儿打哪儿，他威胁要盖瑞停下来。但是盖瑞的“大喇叭”就像牙科医生手里的钻，那刺耳的高频声音还是停不下来。于是，接下来就发生了抽耳光事件。很显然，大卫大拇指指甲划到了盖瑞眼睛上方。一时间，全身赤裸、被烟雾笼罩的盖瑞站在那里，盯着司莱恩，吓呆了。“二十五年的交情，”他说，“打了水漂。”接着，他转身冲出桑拿室。

一整天，我坐在他们两人之间。他们两人没有讲过一句话。我开始觉得自己就像是那堵柏林墙。有一回，拉吉把大卫拉到一旁（在我的听力范围内），告诉他必须想办法继续跟盖瑞一起工作。“这不是在公司里面发生的事情，”拉吉说，“不归我管。”第二天情况照旧。接着，整个星期他们都在进行绝对的冷战。不过，整个办公室都在他们背后议论纷纷。有人说，盖瑞的老婆打电话给拉吉，要他炒大卫鱿鱼。她说，盖瑞都害怕到办公室上班了，他觉得自己不安全。我们都觉得极端搞笑，但我们

也都知道，这是个小小的把戏，让拉吉从二人当中选择一个。他们之间的冲突，被无知的旁观者给恶化了，如果还能恶化的话。我想，如果我们公司还在赚着钱，这样的抽耳光事件是不是还会发生。华尔街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不过，每当有人问起这个事情（我常常被问），我就耸耸肩膀，说言语有时候跟行为一样能伤人——我这是委婉地抱怨盖瑞在办公室里的粗暴语言。几个月之后，盖瑞和司莱恩的关系脆弱到了一个程度，似乎必须有个了断了。之后，真的有了。

一天早上，司莱恩让我跟他到会议室去。他坐在会议桌的一边，我在另一边。他穿的艾佐德衬衫似乎已经绷到了极限。“今早我就会向拉吉和克里森说我要辞职了，”他说，“我要找两个人一起组建自己的对冲基金。”他的语气是那种很自然的语气，但很友好。“这事我让你第一个知道。”我没有被这话吓到。我知道肯定有事情会发生的，我也知道让盖瑞走人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盖瑞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他在尼南公司时就开始跟拉吉一起干了。我想着自己一个人怎么应付盖瑞。“我觉得你该留下，看他怎么对你。”司莱恩继续说，似乎他已经看穿了我的心思。“如果他们对你不好，你就过来跟我干。”司莱恩帮了我这么多，如今他这是给了我对付盖瑞最强的方法。如果罗森巴克再给我穿小鞋，我立马走人去跟大卫干。这个想法让我心里舒坦了许多。心里舒坦了，情况就更明朗了。我很高兴，因为这样的局面应该会很理想。司莱恩走了，高利安需要我。

大卫一走，我就可以当上负责公司十亿元保健基金的唯一交易员了。我知道公司可能会从外部找一个负责保健基金的小组，但在他们找到这样的小组之前，我说了算。我开始每天早上6点就来上班。我要学习关于保健基金的每一个细节。下班后，我还追着克里森问有关各种板块的事情。我每周安排三次工作晚餐。我寻找业内最能干的搞保健基金的人。卖方开始把我当成未来之星。支配佣金也由我负责。第一个月我的调整

做得不是很理想。但到了第二个月，我觉得一切都变得手到擒来。到了第三个月，我觉得公司都没必要再请其他人了。我没有出任何问题；我掌控着所有订单的流向。对于我的板块，我了如指掌，克里森也时不时来找我拿内幕消息，就连盖瑞也把我当交易员看待了，并且拉吉也开始问我关于市场的问题。一切都上手了。

经过了几个月，之前关于北电的谣言和恐惧淡了许多，但还是没有完全消除。偶尔在工作晚餐上有人会提起这事，但说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充满了憧憬和羡慕。毕竟这是华尔街，你怎么赚钱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赚了多少钱。另外，虽然市场不景气，高利安公司能赚钱的名声却越来越响，公司目前掌管资金已经高达近 50 亿美元。据我所知，我们已经是华尔街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之一了，并且是最活跃的公司之一，我们每天都不停地交易。

大卫走了，伤痛渐渐消失，但伤疤一直还留着。伤疤之一就是这件事成了拉吉和盖瑞之间的疙瘩。司莱恩曾经是盖瑞最好的朋友——盖瑞结婚时候的伴郎。桑拿室事件过后，至少据我所知，盖瑞就没跟大卫说过话。但拉吉是个实在的生意人，他还是跟司莱恩保持联系——至少，盖瑞是这么理解的。

在我掌管高利安保健基金的前三个月，我和克里森的关系发展得不错。在华尔街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克里森算是好人，诚实、公平、勤恳，很难被扣上黑心操作经理那样的帽子。每天晚上他都回格林尼治跟家人在一起。他有两个儿子，都还小。他的办公桌上放满了两个儿子画的画。克里森对政治还有华尔街以外的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环保。我真羡慕他的生活。

可我并不是说我眼下就会像他那样去生活。除了我的新职位，还有工作晚餐安排得比较多，我的生活几乎还是老样子。虽说我常跟交易员们出去玩，但是我不太去那些高级餐厅，里面满是买方的人，还有华尔

街的一些大腕们。我喜欢穿牛仔裤、T恤衫，到上西区那里去墨西哥餐厅吃饭，如兰奇奥，还有圣塔菲。

一天晚上，我在圣塔菲和一个交易员吃过晚饭，他说：“这可让我不好办了，这顿饭花的钱太少了。”

对于那时的我，晚餐有了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意义。高盛公司的约翰约我喝点东西，我立马答应了。虽然我知道我得跟他壁垒分明，但是我把他当成朋友，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并且，我觉得他可以为我在片不明水域指引方向。我们约在第一次见面时候去的那个酒吧见面，也在上西区。这次我比他早到。他走了进来，一脸灿烂的微笑，头上是渐渐稀少、棕黄色的头发，乱糟糟的。他张开双臂，给我一个拥抱。我就那么站着，感觉他紧紧地拥抱着我。“特尼，宝贝儿。”他说道。他放开手臂，退后了一步。“瞧瞧，你都长大成人了。”他擦去眼角那不存在的泪滴。“我太高兴了！”他咯咯笑着，“他们找人面试来顶替司莱恩的位子了吗？”

“据我所知还没有。”我说。

“很好。太好了！”他说，呷了一口杰克·丹尼尔威士忌。“每天一大早你都要给我打个电话。我的药品股和高科技股交易要在电话上跟你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约翰这么认真地说工作方面的事情。接着，他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看，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会让他们跟你全面介绍保健行业的一切事情。”我知道他这是想帮我，可我也知道，他也是想帮自己。我们又点了一杯酒，祝贺我的升职。我再次告诉他，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安排。其实我并不觉得会是暂时的，约翰也有同感。我不觉得自己在走回头路，他也有同感。我把酒一饮而尽，把杯子往吧台里面一推，站起身来。“哪儿去？”他问我。

“吃晚饭，我说过的。”

“还有第二局啊，你小子。”他说着，假装很生气的样子。“现在你是对冲基金大腕了，没时间陪我们这些小人物了？”我给他来了个“哪有”

的表情，耸了耸肩膀。他最终也笑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些钱来。“给我点面子好吧。”他说。我笑了，把钱塞进牛仔裤，转身朝门的方向走去。“我叫手下明早给你打电话。”他对我说。我没回头，举手挥了挥。我走进夜色，拦下一辆出租车去了下城区。

照理说，买方的人都很有个性。在高利安公司，很容易就能看得出谁是老大。曾经，就连克里森也不敢挑战拉吉的领导地位。克里森对他的合作伙伴很友好、很温和，他们两人也带家属一起出席社交活动，克里森似乎一直愿意对老大服服帖帖。至少以前如此。现在看来，两人的位置来了个大对调。大家一直以为“好船高利安号”永远不会沉没，但如今这艘好船快要沉了。

某个星期五，我听到从克里森的办公室里传来喊叫声。他从没跟谁大声嚷嚷过，更别说对拉吉了。几分钟之后，克里森冲出办公室。他手里捧着一大堆文件，好像一位橄榄球队员要做最后一码的冲锋。还有三名保健分析员跟他一起，形成一个楔形进攻队形。他们就这个样子，一起出了办公室，又出了公司大门。大家一片死寂。接着大家开始窃窃私语，一切都难以置信。除了拉吉，还有刚出去的那四位，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大家都知道，出大事了。

周末过得就像是高中的毕业班最后的那一段时期。最后，星期天下午，电话响了，我听到克里森温柔的声音，唱歌般的声音。他说要自己做保健对冲基金，他要我跟他走。他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租了个临时的办公室，还让我隔天，就是星期一过去跟他谈谈。

那天晚上，我反反复复地想着最近发生的事情。就在几天前，说克里森会辞职还是件很荒谬的事情。克里森对拉吉忠心耿耿，他在高利安也赚了许多钱。2000年的时候，拉吉和克里森都进入了对冲基金经理最高收入前十名排行榜。根据其中一个排行榜的介绍，2000年克里森的收入是4800万，几乎是拉吉的两倍，但我确定，拉吉在“司令账号”里的

收入没有算进去。克里森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收入，我感觉很奇怪，除非他很确定他要做的事情能够让他获利更多。我想了一整夜，我努力想看清能够改变我命运的机会，这也许是一生中唯一一次跳槽的机会。他会给我什么样的机会呢？首席交易员？合作伙伴？创业合作伙伴？这个级别的交易员能够从利润中抽成。我会要求 10 点，但即便 5 点也可以成交。我不睡不行了。

星期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高利安公司，说我要去看牙医。我造出的印象是克里森已经知道这事了，所以盖瑞不会起疑心的。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效果，但别无选择了。我穿了一条卡其色裤子、一件蓝色衬衫，出了门。这是六月初。天气棒极了。克里森租的临时办公室在第 5 街和第 6 大道交会的地方。我走进办公室。

会议室里坐着克里森和那天跟他一起从拉吉办公室离开的三位分析师。奈特、安吉利还有赞迪。奈特可能四十岁了吧。他的头发精心梳理，像个共和党人，安吉利也四十开外，一头黑色短发，还多留了一缕叛逆的白发。赞迪比我还小。她曾经在英国某个实验室工作过。我猜她父母可能是嬉皮士，可能还以为他们的女儿仍在实验室里研究某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呢。克里森一上来就说抱歉，说星期五搞得动作那么大。他讲了讲当天发生的事情。他去找拉吉谈事儿——说他想单飞，搞个保健对冲基金。克里森希望能够跟拉吉好聚好散。虽然他没有说得太详细，似乎拉吉是想在克里森的新公司也占一份股，要当个投资人。刚开始，拉吉能接受，他们还握了手。等克里森吃过午饭回来，拉吉已经把克里森的工作给了安吉利。他想把克里森踢出去，还不让他带自己的分析师一起走。拉吉就是这样解雇人的。

虽然星期五事情闹得有点大，但现在克里森看上去很好。还不仅这样，他所释放出来的正面状态有很强的感染力。我觉得这可能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华尔街每个人都谈他们自己的“数字”。这数字通常是一位或

两位的，在我的这个阶层，是“5”或“10”这样的数字。要离开华尔街，你银行账户里需要有这样的数字，不过单位是百万。你在这个行业待得越久，孩子越多，孩子上的学校越好，前妻数量越多，错误投资越多，你的数字也应该越大。我还从没见过谁赚到了他们心中的数字。

我在摩根工作的第一年，就有人告诉我，如果我在华尔街干了五年以上，我就永远走不出去了。他们说这叫“黄金手铐”。“可能是‘你’的手铐吧，”我说，“我可不同。”我当时就决定不能让钱主宰我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态度一直适合我。如今，我在华尔街干了七年了。我还不知道我的数字是什么，可能500万就够了。我此时坐在克里森的办公室里，我眼前看到的是这些跳动的数字。克里森给我年薪15万，再加上公司3%的股份。我告诉他我要10%。最终我接受了5%。

现在，我要做的就剩下辞职了。在高利安，似乎有人把暖气调得太高了。我的衣领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会如此担心。突然间，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小孩，颤颤巍巍地走到学校后面，去见那个欺负我的学霸。我请盖瑞和拉吉给我一分钟的时间。从他们的表情来看，他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走进一间小小的办公室。

想说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来的路上我已经在脑海里重复30遍了。不知咋的，话说出来并不像在大脑中排练时那样刺耳。“我要感谢你们给我的机会以及你们为我做过的一切。”我想跟他们保持眼神的交流，但太难了。我还没说到一半，就感觉拉吉眼珠后面的轮子已经开始转动了。他轻轻点着他那颗巨大的棕色的头。他通常欢快的表情，现在非常僵硬、非常不友好。我说完了。他说需要跟盖瑞单独谈谈。我站在我的桌子旁边，等着。所有交易员都看着我，都迫切想问我怎么回事。他们大概都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但他们都想听更多的细节。

几分钟之后，拉吉出来了，就像一头想要往前冲锋的公牛。但他的的话是经过字斟句酌的。“我们给你30万，你留下。”他说。直截了当。30

万。“今天就打到你账上。”不知道是他认为我太有价值了，不能让我走，还是他觉得不能让我帮克里森干，可能是后者吧。我还真考虑了这个提议。不过，我还是打电话给塔克舅舅跟他说了我的处境。关于我工作的事，他给过我很多好建议，但是最好的建议要数这次谈话。“一旦下定决心，就坚持你的决定。”他说，“如果你决定要辞职，那就别让人家说服你留下来。他们会记仇的。”

我知道他说的对。如果我拿了那 30 万，拉吉和盖瑞肯定不会忘记的。某日，某时，以某种方法，他们会把这些钱再拿回去的。我看着面前这个人高马大的人。他的眼中闪烁着的是气愤。“谢了，”我说，“不过我已经做好决定了。”我转身，最后一次走出高利安的大门。

2001 年夏天，阿格斯伙伴公司成立了。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开始给我的交易员打电话，打给那些曾经在高利安罩过我的人。刚开始，我对那些冷冷的回应还很惊讶。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嗜钱如血的高利安怎么可能任由阿格斯这样的竞争对手渐渐壮大而无动于衷呢。盖瑞对所有生意伙伴说，只要他们跟我交易，高利安就不跟他们交易。那可是数以百万的佣金啊。

我约见华尔街的每一个经纪公司。盖瑞可以欺负每一个曾经罩过我的交易员，但他没法阻挡我再结交新人。我真心觉得阿格斯公司是辆飞速的列车，如果不想被留在站台，要上车的人就必须抓紧时间。为了增加自己的信心，我决定给自己的形象投资一笔钱，我买了一两套正式服装。

我走进巴尼斯，穿着宽宽的短裤，T 恤衫还有人字拖。我虽然穿着休闲，但我觉得我还是挺有时尚眼光的。因为我的脚踝处有个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吉祥物刺青，所以我看上去不完全像艾萨克·米兹拉伊。有个销售助理看我漫无目标地瞎逛，于是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我说我在对冲基金工作，需要几套衣服。我立马被带到一间私人更

衣室，有彼得和凯文两位时尚人士帮我做了全面检查，问我的风格是什么。

“怀旧好莱坞风格，”我说，“卡拉克·盖博或者博加那一型的。”我不着边际地瞎说着，但我觉得还算靠谱。

“颜色呢？”

“蓝和黑。”我说。

“鞋？”

“合脚就行。”我说。彼得看着我的人字拖，几乎得强忍着才没发表什么评论。他还问我喜欢什么样的社交生活，我笑了。

“鸡尾酒会？慈善活动？俱乐部？”

“对对对。”我说。

“有女朋友吗？”他问。

“好几个。”我说，但心里却想着才怪。

彼得叫我脱到只剩内裤。这个更衣室没有门，怪怪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可能是正常的吧。就这样我半裸着站在更衣室里等着。又来了一个人，拿来一双旧皮鞋、一双袜子。我笑着，微微举手，说了声“你好”。

接下来的两个钟头，一堆服装被拿了进来。一个架子挂“可以的”，另一个挂“不可以的”，两个架子很快都满了。我觉得自己像在电影《风月俏佳人》中，只是我不知道我演的是茱莉亚·罗伯茨还是李察·基尔。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身披杜嘉班纳、古驰、普拉达。每试一件，我就感觉自己强大一分。“嘿，老兄。”我朝镜子里的那个穿着海军蓝普拉达的自己打招呼，说着台词：“咋啦，你想把我给灭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很牛？老子来给你点教训吧，小子，你脚下的冰快化了。”彼得不知道哥顿·盖柯是谁，他一脸的不解。凯文看过那部片子，他笑呵呵地看着我表演。

最后我买了五套正装、两双鞋子、一堆衬衫。信用卡单子上的数字我连看都没看一眼。我直接签了字，把单据塞进短裤的口袋里。“需要一两天才能改好。”彼得说。没问题，我心想，只要下星期之前改好就可以了。那是我第一次见经纪人的日子。

当我最后鼓起勇气看那张收据的时候，发现上面的数字是 21 000，比我第一年在华尔街挣的仅少几千元而已。不过，这次在巴尼斯的疯狂购物完全物超所值。我去拜访所有经纪人时，都获得了红地毯级别的欢迎。在跟所有经纪人见面时，我都认识了新的交易员。这些公司的经理都做足了功课，因为他们给我安排的伙伴都是喜欢娱乐的单身年轻人，这很适合我。我喜欢会员俱乐部、体育运动、音乐会，还有充满乐趣的晚餐。我只捞回了高利安公司的几个交易员。现在我在华尔街的人马已经翻了一倍。谢了，盖瑞。

12

也许是因为我穿了那套新衣服才变得信心百倍，跟高盛的面谈顺利无比，他们甚至问我是不是可以给他们的夏季新学员班讲课。课程被安排在一个叫博蒂诺的托斯卡纳风格的意大利餐厅里。那天，我站在吧台的附近，搔首弄姿。餐厅就在离“西部红岩石”不远的地方。我偷看那些坐在私人用餐包间里的听众们。一些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是读 MBA 的学生——围坐在桌子旁。为了获得高盛的这个实习机会，大家抢破了头，全美国最大的商业学校，从哈佛到斯坦福，从杜克到沃顿，统统有派人来参加。我跑回酒吧，叫了双份的龙舌兰酒，我得压压惊。我没有想过要说些什么。“简单就好。”高盛那个要我来讲课的人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常春藤，你肯定懂的。”

我望着那片蓝衬衫和红领带，其中还有几位职业女性。我手里握着麦克风，三十双饥渴的眼睛朝我看来。我清了清喉咙。就在这个时候，龙舌兰的酒精冲到了大脑，爆炸似的释放出暖暖的感觉并迅速往我全身散发。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紧张。从我早期在摩根士丹利做的时候就紧张，到高利安公司之后，也一如既往地紧张。我聊着，中间夹杂一些对冲基金的术语，再抛几个内幕数据，并且我还保持着平易近人的感觉。“跟别的事儿没什么两样，”我对那些全神贯注的观众们说，“做个真正的自己。”大家频频点头。我看着高盛公司那个叫我来演讲的人，他本身也是常春藤的人，他很自豪地朝我笑着。

接着，我看到后排有一个白白瘦瘦的手举了起来。那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他有问题要问。“如果你是我的经纪人，而我想增加投在你公司的对冲基金的金额，我首先应该做些什么？”

“这个嘛，”我说，“你先带我到拉斯维加斯去走走吧。”

我此时在汤普森酒店的楼顶。小小的桌子，烛光摇曳，花盆里种着小树，远处看得到帝国大厦，这景色很美。要上到这里来可不容易。美酒如水流，身边美女穿梭不停，放眼望去，穷奢极侈。我在这里要见两个人，兰迪和詹姆士。他们两人在不同公司上班，但住一起。我怎么这么幸运，他们两人都是我的贵人，罩着我做交易。兰迪是个高个子，乌溜溜的卷头发，穿的西装酷极了。在大学的时候，他打长曲棍球，现在还像运动员那样神采奕奕。詹姆士是他身边的小弟。金黄色的头发，脏脏的，脸上棱角分明。这种人你绝对不想靠他太近，免得他把痰吐到你身上。兰迪是帮一家大公司做事的，我觉得他很懂行。他没有开门见山就谈生意，他想先摸摸我的底。我马上喜欢上了兰迪。詹姆士那小子只把酒和女人放在嘴边哇啦哇啦地讲着——这小子我还没摸透。跟他们在一起的在华尔街工作的其他几个人，在我身边形成一个小小的半圆。这堆人当中，我是唯一的买方人士。我的杯子从没有空过，而我自己没点什么酒。我注意到兰迪用拳头轻轻打我的胳膊。这时机对了。

兰迪的手握着拳对着我，好像要跟我玩一个猜拳的游戏。我伸出手，他手里的一包可卡因掉到了我的手里。一阵暖风吹过楼顶。我已经六杯鸡尾酒下肚了，眼前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我跟着他到了厕所，我们分别进了不同的隔间。我拿着那个装毒品的小袋子，迟疑了片刻；从我上次拿过可卡因之后，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主要是我的银行账号以及社会

地位的变化。这次，这些白白的东西看上去好像不那么危险。我也没有想起篮球名人兰·比阿斯吸毒的后果。现在好像说得过去了。这是这里文化的一部分。我不妨试试看，看大家那么上心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就试这么一次。我把小拇指伸进袋子里，挖了一大坨出来，就着鼻子，猛地一吸。

高潮立刻到来：一股无比的能量冲了过来，好像什么人按下了重启的按钮。酒精作用什么的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每个感官的高潮。我觉得我能战无不胜。回到楼顶，我脸上的笑意没有停过。我朝四周扫视了一圈。20英尺外吧台那里，有个男的正在努力追求一个女的，他绝对没戏。离我最远的地方，有三个女孩子在那儿坐着，她们看着我，在对我评头论足。她们喜欢我。女服务员又给我送上一杯龙舌兰，我看着她眼睛，她所有的故事都呈现在我眼前。她从中西部来，想当模特儿，但是她自信心不足。“你从哪儿来的啊？”我问她。“俄亥俄州。”她说，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难为情。此时我就是篮球赛第四个半场时的迈克尔·乔丹。我百发百中。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个人上床。我可以要任何一个女孩子，那是给她们的恩赐。这样的感觉，我不想让它消失。

“下礼拜你得来我们家玩玩。”兰迪说。

“对啊，兄弟，我们住的地方酷毙了！”詹姆士插嘴道。

“酷毙了？”我说着，哈哈大笑。那一定是很好的意思喽。

14

1 条腿骨折、2 份处方维柯丁、4 次飞机被劫持、7 次应召服务、市场跌了 10%、连续吸食可卡因 12 个晚上、16 周的单核白血球增多症（俗称接吻病毒）、19 个恐怖分子、24 次一夜情、30 条香烟、75 个新交易员、100 英里以外的夏日度假屋、150 次工作晚餐、250 个狂欢夜、3 亿美元的管理资金、365 天之后……

第二部分

巅峰·深渊

“白宫”

保健板块

翠贝卡的公寓

一根“棒子”的奖金

“拉链”评级

1 864 999 美元

简

2002 年，夏

昨晚龙舌兰酒的味道我还能闻得到。我的毛孔不断散发着那种味道。昨天穿的普拉达此时还在身上。衣服好像是我刚从运动包里揪出来一样。衣柜里还有十件一样的、干净的，不过我又睡过头了。巴尼斯的店员此刻如果看到我的穿着，不知会有何感想。我还一身的烟臭。我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牙齿都穿着毛衣。

交易桌四周都是玻璃。我好像在金鱼缸里工作。我在帕克大道上公司新装修的办公室里工作。什么都是新的。谢天谢地，克里森今天没来，其他人也都没来。我的肘部撑在桌面上。我慢慢抬起头，看了看钟。开盘的钟声响了，我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我坐直了身体，努力集中精力关注我眼前的八台电脑。我桌上有 25 张委托单，每张都是 500 万～1 000 万的金额，需要我来做某些投资的决定。我的头突突地跳，疼死我了。

我要坚持住，坚持到吃午饭之前就行，我给自己打气。现在如果能吃一个芝士汉堡加煎蛋那该有多好啊。我计算着我能忍住多久不看钟——当天的最佳纪录是 16 分钟。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要坚持到收盘钟声响起。

2：55……3：17……3：58……我做最后一分钟的倒数计时，就像时报广场上新年来临前加拿大人干的事情。

我自由了。

45 分钟之后：微波炉里堆着一盎司的可卡因。厨房里的一个盘子上面，还堆着价值几千美元的毒品。到处都是灰鹅酒瓶、冰块、杯子还有吸毒品的管子。我们把这个东区的公寓叫作“白宫”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比较像“华尔街毒殿”。兰迪和詹姆士就住这儿。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来这里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处理。一切都是免费的，敞开供应，全拜卖方所赐。我从没有告诉兰迪和詹姆士，我第一次吸可卡因是一年前我和他们在汤普森酒店的那次。我想我是怕他们瞧不起我吧。我每个月去那儿一次，不过他们当我是常客。他们这些人，总想让他们和客户开心。今天他们就很贴心，安排的是应召服务——中国和墨西哥女郎。

我看着两张黑色的信用卡在厨房的空中飞过，稳稳地落在那堆毒品上面。詹姆士用那些卡把可卡因分好，旁边 12 个人挽起袖子跃跃欲试。其中一个妓女阿德琳娜用手指在我的胸前划了一道。两个在康涅狄格州做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刚打车赶过来的——拉上一对亚洲双胞胎进卧室去了。鱼博士，就是那个佛罗里达群岛长大的、体重 300 多磅的交易员，早就定好了阿德琳娜，把她领进了另一间卧室。

我看着阿德琳娜被鱼博士带走，一个男人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卡斯。他近三十岁，黑黑的短发，身穿蓝色衬衫，脖子处领口开着，住新泽西。他递给我一根吸管。此时公寓里的其他面孔都是我熟悉的。这场景就像是一个黑帮在吸收一个新入行的小弟。不知道是谁请这小子来的。“哟，你就是那个特尼·达夫？”卡斯对我说。我笑了笑，把那个可卡因的盘子推开了。我脑子里的警报器开始狂闪不停。

“是叫卡斯，对吗？”我问道。

“没错，不过大家都叫我‘涡轮’。”他说，“我吸了可卡因，就变成

涡轮样儿啦。”

他笑的样子，像极了今晚还没有吸过的人。这个绰号已经很烂了，他怎么还想得出来要解释？这小子是不是逼得太急了点啊？第一回合，我心里道。“我很荣幸能认识‘保健黑手党’的人。”他说。

我翻了翻白眼。我真想转过头去。真想他快点滚蛋，但他手里还拿着那个盘子。

“这说法比较适合城市传奇人物。”我说。但那又不是一个传奇人物。波士顿富达公司一个叫汤姆·布鲁德曼的交易员是首先获得过这样的称号的人。布鲁德曼是华尔街的不朽传奇，他搞的婚前最后狂欢，其中有数次投掷侏儒的游戏。有一天，布鲁德曼在生化科技板块大赚特赚。应该是通过安进公司的股票，我想。“别告诉‘保健黑手党’的那帮人。”他告诉他的经纪人。他说的是对冲基金的人，其中包括在阿格斯的我们。我们对这样的称号引以为豪，但我们更像电影《瞒天过海》里面的人物。像富达这样的大公司，要做出投资决定的程序很烦琐，对冲基金就比较快捷。我是首席交易员，我一收到信息，立刻开动，进行交易。并且，我们是团体行动，信息分享。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布鲁德曼要买进的话，比方说，700万股安进的股票，我们就抢先行动，在富达之前买进安进。富达大量买进，会把股价推高，我们则坐享其成。这种超前买进是非法的，但是极难证明。不过，通过“黑手党”党员们的敏锐嗅觉和信息分享，我就获得了最佳的机会。

但这些事儿，我犯不着跟卡斯讲。不管我是什么“黑手党”还是《瞒天过海》里的丹尼，我们都遵守严格的沉默准则。我接过那个盛可卡因的盘子，吸了绳子那么粗的一排。我抬起头，抹了抹鼻子。卡斯还在讲个不停。

“我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他说。

“听说了些啥？”

“如果咱们碰上了，最终一定会死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店里。”他笑了。

我也笑了。我眼前浮现了一个画面：一个脏脏的酒店，地上躺两个人，手持黑莓手机和一卷钞票，身体周围用粉笔画了一圈。

我总以为不管你的母语是什么，呻吟声都是一样的，但是阿德琳娜的呻吟声是带西班牙语口音的。即使我在厨房里，我还是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后面的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15分钟之后，那两个从康涅狄格来的家伙出来了，接着是鱼博士。这三个人出来之后跟另外三个人碰了碰拳头，这三个人接着进去了，好像是两个摔跤队在换场。鱼博士和他的队员们饶有兴致地谈论他们“战斗”的细节。又过了一会儿，所有人都回到了厨房。

“你们女的可以在这儿待着，好好玩。”兰迪说。但她们婉言谢绝了。

不到晚上八点，最后几个男的也站起来穿上了外套。他们都有老婆，有女朋友，有孩子，需要回家。我并不想当什么道德裁判，但我告诉自己，如果我结婚了，有了孩子，我肯定不会再这么玩了。我站了起来，卡斯、兰迪还有詹姆士也都站着。我近来跟兰迪做了不少交易。我们每年付给他们公司的佣金可能会有100万。我跟詹姆士也有往来，但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对卡斯一点也不了解，但我知道他是哪种鸟。我们四个人走入夜色中。

W酒店的湿吧不错。詹姆士和兰迪是常客，于是我们也可以畅通无阻地享受服务。酒吧外临莱克星顿街，几个穿着紧绷黑衬衫、黑裙子的女吧员在长长的吧台后面忙活着。这地方灯光黑暗，烛光是主要光源。酒店的客人在后段睡觉，华尔街的人占据中段，这里也是主要的战斗场所——如果你想叫个应召女郎来段“夫妻生活”。我们四个人在角落里的一个包厢坐下。我们离开公寓之前，每个人都拿了一汤勺的白粉，装进我们的外卖袋里。女服务生迪瑟瑞过来问我们喝什么，卡斯抢着要付钱。他把信用卡按在桌子上。迪瑟瑞是个迷人的女孩子，黑头发黑眼睛。她

跟兰迪和詹姆士很熟，问他们是不是要老三样？我点了培恩牌龙舌兰加冰块，再加三片青柠檬。“好像蛮好喝的嘛。”卡斯说着，他也点了一份。

“不好喝。”我对自己说。我不喜欢龙舌兰的味道；我只喜欢龙舌兰给我带来的感觉。

我们呷着 50 美金一杯的酒；我们轮流往厕所跑，用钥匙舀着可卡因来吸。就这样玩了几个晚上，有时候，在家门口，我要把钥匙插进锁里都得花上几分钟时间，因为粉末在钥匙上结了块。厕所也不是从事非法勾当的最佳场所。但正是这种不方便，倒是让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我决定要好好地盘点出一个纽约的厕所攻略，我称之为“嗑药攻略拉链分级”。最好的厕所（五根拉链级别），只有一个锁，没有服务生。如果还有镜子和水池可以来清洗，那最理想。如果厕所是在走道的一端，远离人群，那也很好。湿吧的厕所只评上两条拉链。虽然那里没有服务生，却有四个隔间，从这些隔间走到洗手池和镜子前去检查自己的鼻子，要走得很辛苦。兰迪、詹姆士跟那里的总经理称兄道弟，总经理说厕所里有暗藏的摄像头。吸毒要到第四个隔间去，要侧身。一听说有这回事，我马上把那里的厕所降为一根拉链的级别。还暗藏摄像头？在厕所里？真离谱。不过，10 分钟之后我就来到了那第四个隔间，侧身，开始吸上了。

一位女调酒师跟我对上了眼。她是个小个子，但身材不错，正合我的口味，纯的、绝对的性感。棕色的头发，波浪状，跟詹妮弗·安妮斯顿一模一样。我尝试跟她保持眼神交流，但是我跟她距离 20 英尺，她正忙着往杯子里放冰块，倒波本酒。没等几分钟，我就让兰迪去帮我打探一下。这里的女服务生他大多都认得，他也很乐意帮我这个忙。兰迪用手梳了梳自己的大波浪头发，这里的女孩子爱死他了。一定是他以前打过长曲棍球的原因——即使他比以前胖了 20 多磅，还是魅力不减。他站起身来，要去打探那个女调酒师的情况，他也没忘了给自己忙活忙活，

他老跟迪瑟瑞说话：“单身吗？你的真名叫啥？”

这个时候，卡斯开始跟我大谈特谈他如何喜欢交易。“哟，今天的佛瑞思有买家也有卖家……”他说个不停。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就要被打上“华街强尼”的标签了。兰迪跟我用这样的绰号称呼这些人，简称“华街”。他这样的家伙，穿衬衣从上扣到下，还塞进裤子里。在办公室里，他会跟你说把他的名字写在午餐名单上，这是变着法儿地告诉你让他买午餐，真自以为是。“华街”说如果看到一只热股，他会大买特买。下午喝酒的时候，他会跟你吹，说他如何厉害，刚刚又卖出了25万股。吃晚餐的时候，他会谈佣金还有研究什么的。你刚把一块水牛乳做的乳酪塞进嘴里，他就问你最看好什么股票。他手头没有股票，他只是想炫耀一下自己。这种人在高中校友会肯定是最后一个到场的，开着崭新的名车，整天摸着他的劳力士。讨厌鬼。

“现在你知道我干啥的啦！”卡斯说。兰迪怎么没在这里，听卡斯这小子在这里废话。“我把买方给灭了。”我点着头，表示同意。“卖家是我的小弟，我罩着的。”他说。

——此时兰迪打探完消息回来了。那个女调酒师叫莉莉，长岛来的。有个儿子，不过她现在单身。兰迪没有说她是不是本周最惹火的女调酒师。兰迪拍了拍卡斯的肩膀，意思是让他把加长轿车给叫过来。“20分钟后到。”卡斯在嘈杂的酒吧那头喊着。我得加快脚步了，我已经整装待发，信心满满。我已经开始喝第三杯龙舌兰了，我的口袋里也满是可卡因。我站起来走出包厢座位，他们三人继续坐着。

莉莉朝我微笑，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我也对她微笑了一下，说要借支笔。我抓过一张纸巾。我写到：你真美，你笑得也很美。我还写下我的姓名、年龄和电话。我正想折起纸巾递给她，心里又一想，我可以整得更有意思一些。我的记者专业毕业证书可不是白拿的。我又打开纸巾，接着写道：最佳舞步——毛巾舞。她应该完全不明白毛巾舞是什么，

但这正是我的用意所在。我整整齐齐地折好纸巾，递给她。兰迪示意说加长轿车已经在等了。10：33。

车子是白色的，里面是红色的皮草。车内顶部正中是一个迪斯科舞厅的那种旋转闪光球，车体下面是紫色霓虹灯光。车内有豹纹地毯。巨大的音响播着修斯阔乐队的《猛摇小船》。这车太离谱了，不过也酷毙了。开车的叫“大艾尔”，跟那个老色情影星荣·杰罗米挺像的。兰迪和詹姆士坐在前面靠左边，我和卡斯坐在后排。我们经过一家店。“你们看到英特尔的盘后价位了吗？”卡斯说着。

我朝兰迪望了一眼。“第二次了。”我做了这样的嘴型，还伸出两个指头。我看着卡斯，心里想着我有几种回应他的方法：很有礼貌地请他不要谈工作；告诉他搭下一班帕斯火车回泽西；不理他……“初中科技作品展我拿第四名！”我说。我睁大了眼睛，还点着头，借此来说明我说的是真的。

卡斯听完的表情就像他刚被《美国偶像》淘汰出局。他意识到自己说错什么话了，但是又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他看上去人不错，而且，今晚到目前为止我还挺高兴的。不过，上夜店寻欢之时还跟我谈什么股票交易，这有点过了。卡斯还搞不清楚状况，但是我知道他想干啥，在“白宫”我就看出来。他想让我跟他开个户，跟他交易。不过，他的做法错了。我比较喜欢按牌理出牌的人：先跟我交朋友，然后再来谈生意。

在“包厢16号”门口，我们的车在路边停下。门口已经排了一大串人，在等门卫放行。毒品和酒精的作用已经让我们飘飘然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口那条围栏。兰迪给门卫塞了一张百元大钞，围栏被拉开了。一进去我就看到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总经理杰森，土生土长的纽约人，犹太裔，头发金黄，二十来岁。“我靠，我们刚刚塞钱打通门卫呐，不知道你平时也在。”我说。

“来了记得找我啊，特尼。”他说，“来了记得找我。夏天我们还要再

开一间，叫侯爵。开张仪式你可得到。”

“谢了，老兄。必须的。”我说。女服务员迎了过来。我们说要一张桌子，她把我们带到后面的弧形包厢座位。我们周围的人群跟着音乐的节奏在跳动着。一路走来，我瞧见性感美女无数——这是不是《单身王老五》电视节目的选角现场？这里的男的，是下城区的打扮：带链钱包、美洲豹运动吸汗护腕，还有褪色的牛仔裤。只有我们几个还是华尔街的行头。

女服务生把一瓶VC插入冰桶。那是小瓶的，所以，我们叫了好几瓶。埃米纳姆的歌声在耳边狂轰滥炸，不少女的在我们的桌边跳着。这里的厕所比湿吧还糟糕，只有一个小便器，还有一个没有门的隔间。只能给一条拉链的评分。卡斯掏出钱包，翻了翻，找出一张一百块的。他递给那个厕所服务生，好像是在交过路费。

在我们的座位那边，震耳欲聋的音乐之下，讲话都听不清。不过，每一个贝司的低音似乎都震撼着我身体里的那些可卡因。香槟酒锦上添花，让我觉得晕晕的、暖暖的。在座的几位应该都有同感，因为我们都微笑着，相互点着头。

我们座位左侧的两个女孩子探过身来，说她们是大学生。眼睛大大的，皮肤滑滑的，有点紧张——似乎真的是大学生。她们也好像感觉不太自在。我给她们各倒了一杯香槟。她们说非常感谢请她们喝酒，但她们一般不喝香槟。“我一般也不喝。”我说。我们举杯感谢能有如此缘分可以相遇。她们问我干啥的，我有点犹豫。

“在华尔街干事。”我说。

“然后呢？”其中一个女孩子接过话茬，“干啥呢？”

“在对冲基金干。我是交易员。”我说。

“很酷啊。不过具体干啥？”另一个女的问道。

这样的对话我经历过无数次的了。通常，即使我解释了她们也听不懂。

她们以为我每天就在交易场上，穿深蓝色西装，打各种不同的手势。我的家人和好友都不知道我具体做些啥。有时候有人竟然问我哪些是热股，那是研究股票的人、股票投资组合分析师什么的干的事情。我卖了个关子。有人告诉我买进 10 万股 JNJ，我自己得判断跟谁买，啥时候买，这是高难度的活儿。那两个女大学生不依不饶地问了许多问题。

这可是宇宙中的大谜题之一啊。每个人都想知道华尔街是怎么运作的。但其实大家都只是想知道我赚了多少钱，或者说，我可以帮他们赚多少钱。“这个嘛，”我说，音乐声也太大了。“基本上呢，靠直觉，还有那些把钱投给我的人，因为我们可以帮他赚到更多的钱，比他们自己去赚的多很多。我们从中赚个手续费，然后在利润里抽两成。”那两个女大学生听得很入迷，我身体里的可卡因也在给我助力。“是这样的，”我继续说：“比方说，你投了 100 块，然后你赚了 10 块。不错，对不对？”她们俩都点头。“但如果我告诉你，同样投 100 块，你可以赚 50，你怎么想？你会怎么做？”她们的头点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只从利润里拿 10 块钱，还有一丁点儿的手续费。”

“哇，”靠我近的那个女的说，“你真能做到？”

“给我 100 块，我做给你看。”我举起杯子。

一个女学生把香槟洒了一些出来，另一个忙着拿纸巾给她擦，俩人咯咯笑着。这画面让我想起大学时代的生活，还有我在纽约第一年的生活，那时候我只有一些亲近的好朋友。我当上买方之后，一切都变了。现在的情况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好像我谁都不能信了。他们究竟要什么？我得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俩女大学生的亲密无间让我心里泛起些许伤感。

时间飞快，这俩女学生要回家了——也许明早还有小测验吧。真不忍心看她们离开。如果我不是那么喜欢她们的话，我可能会略施手段，让她们跟我回去。我还是住在第 76 街和阿姆斯特丹大街交会的地方。我

曾经问过女孩子，要不要去一家叫“俱乐部 67”的地下室俱乐部。出租车开进我住的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女孩们都开始心里打鼓。不过，电梯员总给我打掩护。我问他：“俱乐部开着吗？”他总会说：“开着。楼上请。”我把很多女孩子带入我的公寓，只有一个人尖叫着跑回电梯里面。我跟那俩女大学生互留电话，看她们消失在舞动的人群中。

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已经不能说话了，毒品和酒精已经把我完全征服。之前让我能够畅所欲言、为所欲为的能力已经消失，现在剩下的只有恐慌、负罪感和耻辱。已经搞成这副烂模样，能让我解脱、感觉良好的方法只有一个：再吸更多。我跟卡斯、兰迪和詹姆士示意，我要再去厕所。

等我回到楼上时，兰迪和詹姆士已经不见了——人间蒸发，我之后跟“涡轮”一起待着。我转过身，往外边走。卡斯从后面抓住我的手臂。“要回去了？”我进退两难：一个我想冲进夜色，跑回家中；另一个我知道还没到结束的时候。我耸了耸肩。“回去干点好事就行。”我说。卡斯找到女服务员，结了账。

那天晚上卡斯在 W 酒店搞了间房。我们到了那个房间，继续嗑。他的塑料袋里还剩很多。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要回家了，睡几小时，”我说。我刚走到门口，他开口叫我。

“你觉得跟我开个户怎么样？”他问道。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可卡因的作用下，我都在发抖了。“给你提个建议可以吗？”我不客气了。

“这种问题问都别问。如果你非问不可，等上一礼拜，等上一两个月。慢慢来，懂吗？跟我装装朋友，懂吗？装作你不在乎什么交易，装酷，懂吗？”他坐在床上，仔细听着我的每一个字。“如果你第一晚就开口了，”我张开双臂，耸耸肩膀。“那么我就知道了，明白吗？”

“谢了，老兄，谢谢你的忠告。”他说，头低低的，看着地上。

“慢慢来，自然点儿。”我说。走出去时我站住了。“好的。”我说。

“好的？啥？”他问道。

“好的，我明天就跟你开户。”

凌晨四点。我在莱克星顿街某处。我在等出租车。我记得有谁住这附近。我划着手机，查看电话号码。我打过去，她接了。十分钟之后，她拉开门链，让我进去了。芭芭拉近五十了，做应召也快做到头了。她的公寓里，全年都亮着圣诞灯火，她卧室门口有块床垫，有一角已经没有弹簧了。沙发、电视、咖啡桌，这景象跟我大学时代跟七个人分租的时候很像。这公寓，和她一样，被过度使用，而没有被呵护。芭芭拉穿着一件黑色蕾丝睡袍。

“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她拉着我的手，陪我在沙发上坐下。“真搞不懂你。”

“我现在及时行乐。”我从上往下拍着自己的头发。

“我也是啊。”她说。六个月前我在网上搜寻的时候，她的介绍是“成熟女性”。她的照片还很性感：金黄色的头发，胸部超级大。但跟她面对面时，她的眼睛出卖了她的真实年龄。两边眼角的皱纹足够筑起鸟巢，眼睛里道尽了人生的苦难和失望。

“我今晚把我的电话号码给出去了，也换回一个号码，”我说。

“瞧瞧，”她笑了，“挺好的嘛。”我喜欢芭芭拉，我觉得她也喜欢我。但是，我怀疑她是否对我真诚相待，就像我怀疑我生命里的其他人一样。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她说看到我让她想起强尼·德普。我哈哈大笑，因为我一点儿都不像。她说曾经和大明星德普在一起数次共度良宵，他彬彬有礼。我听着这个故事，才不管它真实与否。我把剩下的所有可卡因都扔在咖啡桌上。她帮我倒了一杯伏特加加冰块。

她问我要不要把这个小小的派对移到床上来举行，但我觉得她这么说只是客气而已。她看得出来我已经玩得很过火了。“不用了，谢谢。”

我说。于是，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着。我问她生意如何，她耸耸肩，好像是在说时好时不好。“如果我之前把我的钱投资一部分的话，”她说，“那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她的这一番话让我开始琢磨起来。我想跟她说，现在是熊市，没人赚到钱。“我也就不用天天晚上干这个了。”她说，“我就可以选客户了，只跟你这样的在一起。”听了她的话，我微笑着。我也知道，我们是物以类聚。

我很疲惫，感觉很肮脏。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冲个澡。热水冲打着我的身体。我们轮流帮对方洗着，一边哈哈笑着。那是我当天最喜欢的20分钟。

我穿好衣服，头发还是湿湿的。在门口，我抱了抱她，我给她些钱，但她不要。“拜托了，收下吧。”我说。她把我轻轻推出门口，但我还是在门口的桌上留下几张一百块的票子。

一切结束后，走在街上，我看看手机，5：42。我得回家换件衣服。

一小时以后，我坐在办公桌前，李察和美琳达也在。他们跟我在同一张办公桌交易。我们公司成立后不久就招了李察。我在高利安公司的时候，他是花旗集团负责跟我交易的经纪人。我有一笔百万美元的大交易就是他操刀的。当时盖瑞打电话给他，说不许再罩着阿格斯了，他都快笑死了。当时他都已经跟我们进行第二轮面试了。我见过最瘦小的前曲棍球运动员就数李察了，乱糟糟的黑头发贴在头上，像抽象艺术画。他还有白如珍珠的牙齿，女孩子们都爱死他了。美琳达是克里森在高利安公司的助手，是个黑发美女，好像有夏威夷或者菲律宾血统。美琳达是货真价实的好员工。她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开，而且她完全了解自己并不是万事通，所以她才显得睿智无比。我很喜欢来上班。我们常常欢声笑语，工作也都很卖力，同事都聪明能干，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团队。

开盘后不久卡斯就打来电话。我知道他会打来的。我给他下单了：SPY 股票买进 15 000 股。我完全没有想买进这只股票的意思，但它买进卖出极容易，所以，我可以买进，等上个五分钟，能赚钱就再卖出去。美琳达和李察都以审视的眼光看着我这么做，好像他们知道我在搞什么鬼。“他行动力很强。”我说，耸了耸肩膀。我真想收回我说的那句话。“行动力强”其实是“他有一个巨额支出账号”的代名词，但也不是说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要跟谁开个户，需要克里森的批准。不过，如果

他问起这个账户，我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

卡斯打来电话，给我最新情况报告。这次，李察先接了电话。“卡斯这小子是谁啊？”他问我。他用的是开玩笑的口气。“说真的，谁会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卡斯啊？”我咬着嘴唇不说话。还好，他不知道那个绰号：“涡轮”。想起昨晚我就后怕。我得处处小心。李察和美琳达都不知道我吸毒。如果不是卡斯给我毒品，我怎么可能去认识他呢？在华尔街，一包可卡因就犹如一张下班后的名片，不过这个小包会让大家更容易记住你。

“他绝对不是小松鼠，我保证。”小松鼠指的是那种你给他一个小单子，然后他不停地回来找你要更多单子的人。中西部或什么老掉牙的地方的小银行可能有那样的人。你给他一个单子，然后他就每天给你打电话，而且是每天好几次。接下来，这只小松鼠就会把你烦得快要疯掉。每次交易，我们付5美分的交易费，所以，小松鼠嘴巴吃得鼓鼓的，都是小钢镚儿，但还是到你门口来讨吃的。但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卡斯比谁都像是一只小松鼠。

下午的时候，我觉得得找根牙签来把我的眼皮撑起来。唯一的好消息是：卡斯几个小时没有打来电话了。我决定了，昨晚那样的情况再也不可以发生了。一天当中，就现在这个时间最难熬了。收盘钟响起之前的两个小时，漫长得好像是永恒，而且没有其他什么东西来让你摆脱这种心情。现在，那种感觉愈发强烈了。我开始听到自己脑袋里有原始鼓声开始响起。“你这个骗子！”那声音说着。在这12个小时里，我从浑蛋变成了超级浑蛋。我没有给公司赚到钱。他们训练一只大猩猩都可以做得比我好。美琳达和李察都会看穿我是嗑毒的瘾君子。我每次鼻子抽一下，他们都转头看我。克里森肯定要炒我鱿鱼了。我是一只买方小松鼠，而且我三十二岁了。这样的丑陋黑暗的念头一个一个闪过我的大脑，就像子弹打过大脑后的血肉横飞。正当我要在这片消极负面的思想中溺

亡的时候，就在我最最脆弱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

“下班后来‘白宫’一下。”兰迪说。

“不行。”我说。我赶忙把电话给挂了。一整个月我都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了。

我喜欢星期天的夜晚。对交易员来说，星期天没什么事情可做。当然，我应该研究研究股票图表，看看巴伦的书，但谁想看啊？我更喜欢跟杰森和伊森坐在沙发上看《色欲都市》。手机响了。我把卡斯的手机号码存在手机里了，不过名字是“涡轮”。每次看到“涡轮”闪烁，我都会很得意地笑笑。我按下“拒接”键。可电话又响了。“这个死涡轮。”我说。不过我一看屏幕，是个未储存的号码。我按下“通话”键。

“你好……”我的声音跟歌手巴里·怀特不相上下。

“我是莉莉。”对方说道。

莉莉？我在大脑里反复想了几遍这个名字，但我想不起来谁是莉莉。我不认识的女的打电话给我，这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社交圈很广。我就开始应付了，问她咋回事。她说她在朋友家里看《色欲都市》，我赶紧抓起遥控器，把正在播放的片尾声音关小。很快我们就没有什么可聊的了，出现了一阵尴尬的沉默。“听说你很会毛巾舞？”她问道。她怎么知道的？“咱们见个面，我可以亲自给你演示。”我说。

“那好啊，”她声音里充满了甜蜜，“劳动节之前我都忙，节后怎么样？”

我记下了莉莉的号码，说会跟她联系的。我挂了电话，问杰森和伊森我是不是认识一个叫莉莉的女人。两人都摇头。那天晚上很晚了我才想起那是谁。莉莉！湿吧的女调酒师，头发像詹妮弗·安妮斯顿的那个。

2002年9月，两个室友和我都觉得应该搬家。曼哈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上西区的那些高楼——都跟前苏联的建筑物太像了。那里住的人都一样，起床时间一样，吃一样的格兰诺拉麦片，穿一样的公司

服装，一起排队等巴士或者一起走下楼梯搭地铁。这样的一成不变让我发疯。我们仨都同意：应该有所改变了。

目前只有我们仨住这里：伊森、杰森还有我。我们敲掉一堵墙，把客厅搞得更大了一些。伊森是我的堂弟。他大学毕业几年了，现在是演员。如果你需要有个朋友在课外时间来监督道德规范，那他是最佳人选。所以现在我得讨好讨好他才行。他看上去是有我家的血统，达夫家的鼻子什么的。另一个是杰森。他有点像演员本·阿弗莱克，稍胖一点。这胖小子，在葬礼上都能让你发笑。他是媒体买家，专门帮客户购买电视广告时间。其他室友之前都搬走了。

我自己一个人也租得起这个公寓。我在阿格斯的时候，年薪已经是20万美元了，还不算奖金。2001年，我的年收入是60万。公司没赚钱，但是克里森给了我奖励，说我离开高利安冒了一些风险。自己一个人住多无聊啊！想到没人陪伴、宿醉、单身公寓，即使装修豪华又如何，真让我感觉压抑。在我找到真爱，结婚生子之前，我想要跟小伙伴们一起住。小时候，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快快长大。如今我已经长大，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长大。不管咋样，我跟朋友们说了，如果我搬家，一定把他们捎上。现在我得履行承诺了。

目前只剩一个问题：住哪儿？有一回，我去下城区翠贝卡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个工厂楼房改建的建筑，有黑色铸铁的楼梯，前面有一个前廊。那个时候我就想：在那地方住挺不错的。但是，确定要去住，是一个约会之后的决定，那次约会，众所周知。

2001年9月11日，阿格斯伙伴公司已经成立几个月了，公司还在中城区第6大道的那个临时办公室里。我跟几位高层在开早会，突然有个行政助理走进来，说一架飞机撞进了世贸双塔之一。当第二架飞机撞入另一个塔楼，克里森让所有人立刻疏散。我们都到了大楼的侧边的小道上。我朝第6大道望去，看到北楼顶端冒出滚滚浓烟。那个时候，北楼

还是矗立着的。我记得我当时转过头去点燃一根烟，再回过头的时候，塔楼的顶端已经不见了。这个时候，塔楼已经垮了下来。那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我是和杰森、伊森还有其他一些朋友在中央公园的草地上度过的。我们抽着烟，看着一片蓝蓝的天，当天没有其他飞机飞过。那天晚上，我们到附近的一个酒吧去了。那是唯一一次我不想去酒吧。可是，我也不想一个人独处。

三周之后，我开了一个派对为 9·11 事件中遗留下来的孤儿进行慈善筹款。我几乎联系了所有我认识的华尔街人士。派对是在翠贝卡一个叫“闪亮”的俱乐部里召开的，我们筹到了 25 000 块钱。华尔街时不时还有人说起那个慈善捐款派对。就在距离世贸大厦遗址几个街区的地方，我们一千多人一直跳舞到凌晨 4 点。我一直认为翠贝卡是个奇妙的地方，有鹅卵石铺就的地面和旧工厂、旧仓库改建的大楼，但是 9·11 事件之后，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居住简直就是一种爱国行为。

是杰森和我一起去找房子的。我们最后看上几处房子，其中之一是幢糖仓库大楼，那是在莱特街上的一座十层的红砖楼，路面也是鹅卵石的。这仓库是内战前建的，当时是曼哈顿数一数二的高建筑，是曼哈顿城市天际线的一部分。如今，这个大楼被改成了许多二层或三层的公寓。门房说我们看的那套公寓是唯一出租的公寓，其他都是房东自住的。

我们来到 5A，大门一开，我们看到落地窗，窗外的哈德逊河映入眼帘。橙红色的落日在新泽西那边落下，落日在河上的光芒把河流一切为二，一艘游轮匆匆驶过，景色真美。起居部分是下陷式的，很宽敞；我们脚下的木地板闪闪发光。有正餐餐厅，厨房里有最新款的不锈钢厨具和设备。二楼有个超大的主卧室。主卧的窗子比起居室的更大，景色也更美。主卧浴室里南部风格的瓷砖美轮美奂，蒸汽浴室也大得离谱。离开主卧，走过大厅，那边是一个带浴室的小卧室。三楼是一个台球室（我们让伊森在角落里搭了张床），推拉玻璃门外是一个 1 500 平方英尺的

屋顶平台。杰森和我站在屋顶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哈德逊河的全景，从华盛顿桥到自由女神像。就像那张《纽约人》漫画一样，哈德逊河以外才是美国其他的地方。我点燃一根烟，微风吹过，烟旋转着、飞舞着。

“我要了。”我对中介说。

“但我还没跟你说租金呐。”他说。

我才不管呢。我必须住这儿。“多少？”我问道。

“9 300 一个月。”他看着手头的介绍材料说。

“可以，我要了。”

一周之后，我们搬进去了。这可不是我们搬床垫底座上楼那么简单，我从旧屋墙上摘一面廉价的镜子还把它搞破了。我们请专业人士来搬家。他们从第 67 街把那张九成新、20 英尺长、定制的天鹅绒沙发，还有 50 英寸组合大电视搬了过来。我买的东西是超级杯狂欢派对规格的。在新公寓里，我的卧室超大。查尔斯·罗杰斯大铁床摆在房中央。有人跟我说这是个叛逆的摆法，是对室内装潢赤裸裸的挑战。他说的可能有道理，但即使我这么摆两张床，那间卧室还是显得空荡荡的。我的落地式衣帽间比我来纽约时住的第一个公寓卧室还要大。三楼也还空着。屋顶平台也需要摆点什么家具。我决定要租下这个公寓的时候，我没有想家具该怎么处理，我只想到房租我可以多付一些。除了房租，要买些配套的家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不过，我们是个配合良好的团队，不过几天时间我们就整出一个方案。我们先买最必需的东西。杰森和他那个从俄亥俄州飞过来的朋友崔吉一起，拿了我的钱，去买台球桌了。

伊森则拿了我的信用卡到 J&R 音乐商品专卖店去了，他买回了音响、连接线，还有便携式电话。我的老室友强尼听说我要搬家，从科罗拉多飞来帮忙。他跟我在家待着，等安装有线电视的人上门。安装有线电视的人安装好三个大盒子走了，我检查着起居室里的电视有没有连接

问题。电视上正在播放本·史迪勒和欧文·威尔森演的《超级名模》。我超喜欢这部电影。我告诉强尼我把好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之后，我们就点上了大麻烦枪。电视上欧文·威尔森演的是超级名模本·史迪勒的对手，欧文有一个“泥土室”。其实就是一间堆满了泥土的房间。我觉得这设计太强了。当然，吸完强有力的“东西”之后，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也要一间‘泥土室’。”我对强尼说。

“对。”他说着，点着头。“需要。”所以，我们俩眼红红的，咯咯笑着出门去看哪里可以买“泥土室”。

可惜，ABC地毯公司不卖土，但其他东西他们几乎什么都卖。走进那家百老汇的分店，就像走进洛克菲勒二手杂货店，或者是载满财宝的海盗船。真不便宜。如果我不是当买方的话，不管我有没有抽太多大麻，我都不会走进这样一家店。不过，这地方确实有点意思。

那天，店里人山人海。我在顾客里撞来撞去，就像一只水里的塑料鸭子一样。突然间，我周围的喧闹不见了，我的注意力像镭射光一样聚焦了。我面前放着一个叫“印第安床”的东西。这是一个木制的大床，四根床柱有七英尺高，上面的篷子满是手工雕花的美丽图案。四周有白色埃及棉布制成的可透视帘子。中间有一个铁架古董水晶灯，上面垂下红色的小圆柱、珠宝等东西。我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张床，伸手拉了拉强尼的衬衫。我走近了一步。

“就是它了。”我说。

“泥土室不要了？”强尼问道。

“这个放在起居室里太完美了！”我说。

强尼看了看价钱，轻轻吹了声口哨。我招手叫了一位服务员。我当时穿着人字拖和T恤。我的头发乱糟糟，眼睛红红的。“我要买这个。”我跟他说。他看了我一眼，充满怀疑。

“你知道价格吗？”他问道。我根本没理会他说什么。我看着收银机

那头有一大堆人排着长队。可能是因为我抽了大麻的原因吧，那个长队看起来像银行里排的长队——他们的脸都是扭曲的，充满愤怒和挫败感。

“我说，”我把信用卡递给他，说，“我太想要这床了。”服务员看着我的信用卡，倒退一步。他的表情说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可不想排那么长的队。”他以飞快的速度搞定了付款手续。强尼和我差不多是跑出店门的。20分钟之后我们跑回公寓，继续抽着我们的大麻，抓起遥控器，找《超级名模》那一台。

“我们连土都没有碰上。”强尼说。

“我知道，老兄，我也特想要‘泥土室’。”我说。

接下来的几周，我花钱如流水，好像我快要离婚了，而前妻的律师还没有把财产冻结。我斥资2万买了些艺术品，还有一些从专门代理中生代艺术家作品的MG画廊买来的摄影作品等。我买了一副巨型摄影作品，叫“两极”，是詹姆士·迪恩拍的焦距模糊的一条鱼；我还买了落地灯，还有几个多颜色射灯，它们从地上将光射向天花板；1000块钱的地毯；3000块钱的磨砂玻璃酒吧，带四个椅子。我还给起居室添置了几台电视机、几张椅子、几盏灯和一台环绕音响。我还买了原版的“吃豆小姐”游戏机。每天都有新东西送到我们的这栋三层楼的公寓来，它最终变成一个“兽窝”和夜总会的综合体。买方的宠儿，有一天我躺在沙发上对自己这么说着。没错，一个三十二岁的单身年轻人能做到的穷奢极侈最多不过是这样罢了。不过，这是我的美梦成真，和肯尼邦克的生活有天壤之别。搬完家，消停之后，我决定给莉莉打电话。我穿着最喜欢、水磨得最美的牛仔裤，淡蓝色的短袖衬衫，胸口一边写着“德伦顿”，另一边写着“克莱斯勒、道奇、普利茅斯”。我在镜子前面快速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打扮。“不错。”我心想。如果整个华尔街都不行了，我可能应该还有点希望当个换油工。我和莉莉约在多斯·卡米诺斯，那是在一家墨西哥餐厅。从我的新住处出发，很快就到了。

她穿着一件米黄色细吊带束腰衣坐在吧台前。她站起来跟我拥抱，我才发现她是如此小巧，偏棕色的金发是如此的柔软。女服务生把我们引到外面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我跟在莉莉的身后，欣赏着她的衣服随着她的脚步轻轻地摇摆。我们嚼着蘸着洋葱辣酱的薯条，等着我们的玛格丽塔鸡尾酒。上次跟她讲电话，她提到她的儿子，所以我立刻就问她儿子的情况。他七岁了，喜欢运动，非常爱他的爸爸。她讲话有点迟疑，我觉得她跟前夫之间有些坎儿还没过去。莉莉住在长岛，每天晚上搭地铁去俱乐部上班。撇开住处和单亲母亲的身份不谈，我发现我被她吸引了。不只是她的美貌，她还有些别的东西让我心动。我们喝着鸡尾酒，她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突然这么一问，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肯定她知道我是在华尔街做事的。我这么一说，她挺诧异的。“你看上去不太像。”她说。我觉得她是在夸我。她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华尔街。她通常看到的都是打着领带、吸食可卡因的瘾君子。“我是说，你跟你朋友兰迪就很不一样。”

后来，我去买单。女服务员说已经有人买过了。我的大脑里飞快地排查，看可能是谁帮我买的单。肯定不是交易桌上的同伴美琳达和李察。虽然他们可能知道莉莉的存在，但他们不知道我今晚 would 带她来这里。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们的关系还属于同事，在更衣间打交道比较多。李察曾经几天没来上班，有电话找他，我都说他在家养病，他在家照顾着的其实是“买”先生和“卖”先生。如果我没来上班，美琳达帮我接电话，她常常（特别是对女性）说我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她那也是跟我学的。他俩比较可能安排个小丑拿些气球来活跃气氛，不太可能帮我买单。我觉得也不会是兰迪——他在“白宫”招待宾客呢，而且他刚给我发过短信，问莉莉“功夫”如何。唯一知道今晚我在哪里跟谁在一起的只有一个人。我还真小看“涡轮”那小子了。

我们走出餐厅，我抢着在靠街的那边走。我听说，男人跟女人在街

上走着，男人应该靠街，以防路上有车子突然失控撞上行人——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们朝西往百老汇走去，莉莉允许我“占领了”靠外的那个位置。街上商店都还开着。到运河街之前的那几个街区很美。我伸手去牵她的手，小小的，软软的。她抬起头看着我，微笑着，又飞快地转头朝前看去。我们走到了运河街，我问她要不要去看看我的新住处。她轻轻摇摇头，拒绝了。“我家里请了个临时看孩子的。”她微笑着说，这微笑后面还有什么含义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低下头，在她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可以再给你打电话吗？”我问。

“我等你电话。”她说。

到2002年的10月，股市已经从9·11事件中复苏，夏季的低谷也已经过去。虽说我们不太可能大赚特赚，但是总应该比去年强一点，阿格斯去年一整年都是勉强维持着保本。我们现在回头看，才知道2002年的华尔街是多么的惨淡。这一年，泰科的丹尼斯·科斯洛斯基、安然的安德鲁·法斯托、伊姆克罗恩的山姆·沃克萨共同堆砌了贪婪的欲望高山。也是在那个时候，纽约州的某位总检察长终于鼓起勇气相信，股票分析员的排名应该会反映出一些问题。当然，那是这位总检察长召妓丑闻事发之前的事情了。但就我而言，2002年似乎没有什么比较难的挑战。9·11之前的那种螺旋上升的市场态势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每天都得努力工作，似乎都是在与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对抗。

到现在，我已经在阿格斯伙伴公司当了一年半的首席交易员了。我之前在博蒂诺餐厅对高盛公司的MBA学员随口讲的那些话可能很不适合常春藤的风格，但我是话糙理不糙，跟他们著名的教授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从某个层面来讲，当上交易员之后，我更理解盖瑞·罗森巴赫了。也许是因为压力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经手的钱的数量原因，交易员做事都很疯狂，特别是对那些想要抢我们生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我给自己定下规矩，绝不可以向盖瑞那样滥用职权。但是，挺好笑的是，在阿格斯，我也很乐意让某某人在众人面前跳个舞。

有一次，在阿格斯的时候，雷曼公司负责我的交易的布莱德打来电

话。像布莱德这种为赚佣金不择手段的人多如牛毛。我之前跟布莱德出去过，吃个饭，上个俱乐部什么的。我挺喜欢他的。他比我小几岁，是雷曼公司交易部的初级员工。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我：他还找不着北，大家都捉弄他。布莱德是新泽西人，上的是希拉克斯大学。他打来电话，求我给他一些订单。不过，在谈生意之前，他说起他最近一次晚上去玩的情况。

“你就是华尔街的乔安·瑞福斯啊，”他说，“谁都认得你。”

我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大家都知道我，这使我很高兴。我挂了电话。铃声又响了，他又打过来了。“电话线路问题？”他问。非也。铃声响了，如此三次。到第四次的时候，我才让他说话。“就为那事儿，你对我就不爽了？”他说。

“嗯。”我说。

“哇，特尼，求你了。给我个订单吧。”

“也许吧，”我说，“不过，你得先让我舒坦才行。”

“叫我干啥我都愿意。”他说。

“那好，我要你爬上桌子，唱那首‘奶昔’。”

“拜托啊。”他求我了。

“你听明白了：上桌，电话别挂，我要听。”先是刷刷的纸张的声音，接着是他鞋跟的吱吱声，最后是他的嘻哈念唱的声音，走调了，而且没有热情。“所有男孩子都来到院子里，为的都是我的奶昔。”我几乎看到他站在雷曼公司交易桌上唱着，所有人都看着，都朝他扔着纸团。我叫美琳达也听雷曼公司的这条线。我们两人都哈哈大笑。当布莱德唱罢，拿起电话，我让他帮我买 69 000 份 BBH 的股票。

当然，我也不是一下子就变坏的，我是慢慢才变得会整人的。跟我在华尔街从事的其他工作一样，前一年半的时间也是在学习。起初，我以为当上阿格斯的首席交易员会是顺顺当当的事儿。我只想在原来高利

安已经不错的基础上再发展一下。灰色地带的浅谈，拉吉的大船上载着华尔街的英才：大卫和盖瑞。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想要成为成功的交易员的主要条件：每天上班，做好准备工作，尽量少犯错误，保持信息顺畅流通，进出均是如此。但在阿格斯，我意识到，还有新的错误可以犯。我也学习到，犯错误是最佳的学习方法。

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克里森跟一位潜在投资者在会议室交谈，他说我在交易的时候“跟猫一样”。我从没听过他公开表扬我的交易技巧，我也不认为我的技巧有他说的那种“动物性”。我甚至怀疑他提到的那种东西算不算技巧。很久以后我查出来有轻度的抑郁症，叫“心境恶劣症”，据说挺久了。但是在我交易的那些年头里，我以为我能够心平气和地交易。华尔街的老话不是说“不要太情绪化”吗，“不要跟某只股票纠缠上一辈子”吗，是这么说的。我从来没有过那样的问题。哪只股票不合我意，我从不生气；哪只股票飞涨，我也不会太兴奋。周围的人都说我头脑清醒，但这是我天生的。这是许多交易员所缺乏的清晰的头脑。

通常，如果某只股票价格不好，生化科技部的高级分析师安吉利就会冲出办公室，咆哮着要抛售。有一天，我在打着电话，她问我：“那只‘生化’股票怎么了？”我挂了电话，看看她是啥意思。这只股票没有不利消息，但这两天大家都在抛售。“是不是我们买的股票有些基本面的不利因素？”我问她。“没有啊，”她回答得很紧张，“但我们得清仓，因为价格一直在跌。”她一走开，我就买进更多“生化”股票。她的痛点正是我的买入信号。股票从这里才会飞涨。

也许克里森是对的。我出手之前，喜欢静观周围的一切情况。我的一些最佳交易是观察了周围的人之后才完成的，比如说奈特的事情吧。他是办公室里“最宝贝”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几乎永远做错事。不管他对我说什么，我只要朝反方向干就对了。还有维维克，我们从卖方聘请过来的人。他是个印度人，超级聪明。但我认为他胆小如鼠。他很

会分析，但他不清楚他要下多大的赌注。如果他说：“医疗电子股票买进两万五。”我一定买五万。我知道他的分析常常是对的，但是他不清楚股票上涨的时候，需要更大胆一些。

我对身边人物的肢体语言特别关注，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着投资组合经理、中级分析师卡琳，还有我的交易员伙伴赞迪，甚至那个只负责退休金投资的、帮我买熏肉煎蛋和芝士的人的一举一动，综合做出我的决策。

如果他们对投资不看好，我不会放过这个信息。我通常会采取反向动作。所以，我的工作完完全全是在处理信息。

我想，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离经叛道式的交易方法，是因为我没有其他什么交易理论做支撑，至少我没学过什么华尔街的传统交易理论。什么研究报告，我看了就想睡，股市新闻我听了也不会兴奋，我也不搞技术分析。我只相信我的直觉。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干得很好。

从高利安来到阿格斯的时候，我还把工作中的另一层面的经验也带过来了。10月份的时候，通常对冲基金都会设计一个预算，定好下一年度要给哪个经纪人哪个级别的佣金。虽说每笔佣金都是在交易后才支付的，但是，通过这个预算，我们可以大概知道有多大的量。至于每次交易要给多少交易费，通常是由首席交易员和研究小组来决定的，当然，投资组合经理可以最后拍板。在高利安，我不是那个拍板的人。但是，记录佣金的那个表格是我来填写的。我的工作就是向盖瑞和大卫汇报当前佣金的支付和我们的预算之间的差异情况。就是在那个阶段，我真正学到了公司里所说的“努力赚钱”这个信条后面的科学理论。我看到，对于那些大公司，如高盛公司，无论付他们100万还是50万的佣金，你获得的服务是一样的。如果你付200万，那你可以获得更高一级别的服务，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只付给高盛50万。付最低的钱获得你要的服务，这是一门艺术。

如今，我的职责就是评估我们的那些交易员了。这是我来到阿格斯之后第二次在10月份的时候干这件事儿。我把表格整理好，交给克里森和整个研究小组看。总的来说，我尽量做到忠于事实，保持客观，但是如果我说我没有保护自己的朋友，还有那些给我提供玩乐的人，那我肯定是在撒谎。我的表格上必须显示，兰迪和詹姆士有在帮公司赚钱，否则克里森就会追问我为什么要付他们那么高的佣金。

我跟克里森说，兰迪给了我很多小道消息。有时候，即使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了赚钱的消息，我也说那是兰迪给的。至于詹姆士呢，我跟克里森解释，说因为我向他们公司要求投入资本，他们损失了一大笔钱，而事实是他们公司没有一点儿损失。有时候，如果我想要有交易记录，我就找个经纪人，说“给我上点儿”，意思就是说，我要他们当另一方，让他们来承担风险。如果股票如我所料地涨了，那对方就会赔钱，他最好自己有补救的方法。如果股票没什么动静，或者是跌了，那他就可以卖出，能保本或者赚上一笔。但我通常都是赢的那一方。我方赌赢的概率非常高。说实话，经纪人没什么赢的机会。不过，经纪人才不管呢，因为他知道，那是他为了赚取我们佣金预算里的钱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一年当中，他们这样的损失达到20多万，而我一年当中给他们公司付100万的佣金，他还是赚80万。卡斯的佣金就远远低于这个数，他的佣金数克里森根本连看都不看一眼。要把他给藏好很容易。

这一年，我们给华尔街的股票公司付的佣金是3000万~3500万元。其中，我给兰迪公司付的是七位数字的金额。他只负责一个板块——保健，这么大的数字算是他们公司的一个里程碑了。这让他们公司的老板对他另眼相看。詹姆士的佣金会是30万。卡斯的是10万，不过他们公司给他40%的提成。所以，卡斯就净赚4万块。不需要做分析，不需要资本，能赚这么多，不错了。

这是最有意思的时期。我需要喂饱很多人，而我手头也有很大的库

存。佣金预算最大的好处可能是——受益人只有拿到钱之后才知道他们真正拿到了多少——预算数字我们是不告诉他们的，而我知道，这才是关键。我觉得自己牛气冲天，不可一世。华尔街这些人，就像是圣诞节那天盼望着可以打开礼物的小孩子。而我，是那个拿着礼物神秘秘的圣诞老人。还有更好的，最高的佣金也意味着可以有最大的消费账户。在阿格斯，如果经纪人想要招待我，没有极限。但现在，我要给自己定下别人招待我玩乐的极限。

18

2002年12月，我参加了华尔街的一个大型慈善活动。通常我都会在一个月之前拿到邀请，我也会接受，然后就置之脑后了。后来詹姆士打电话提醒我说慈善活动明天晚上举行。我想把这活动给推了，但是他开始劝我。“拜托了，老兄，这可是积德做好事啊。”他说。我知道他比较关心那场活动而不是公益善事，不过我让他说得我都开始考虑要穿什么衣服了。

我六个月没理发了，而且我每两周才刮一次胡子。我的形象跟巴菲特是不能比，我知道。我此时也还和我十九岁时一样瘦。我有请私人健身教练，定期在健身房里锻炼。我去“艾奎诺”公司找教练的时候，我说我是搞销售的，想要一个女教练，年龄相仿，性格开朗且好相处。那人问我是要找教练还是要找女朋友。教练找来了，叫梅维斯，她真能折腾我。

今天训练过后，我去了工会广场那里的一家叫廉价杰克的古典式服装店。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廉价商店买东西，甚至会去救世军的二手商店。上班时候我有正式服装，下班以后，我穿的都是一个风格的东西，就像我的蓝白印度式毛衣，前后绣着大水牛（真丑，不过丑得很美），还有我的牛仔衬衫，带蕾丝边的。不过，今天不同，我有任务在身。

廉价杰克的女售货员大概二十二岁，脸上打了好几个钉，两个手臂都绣满了刺青。她头发染黑了，黑得发紫。“需要帮忙吗？”她问我。找

古典式样的衣服就像是在寻找爱情。找到了才知道那是你要的，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让人介绍。

“不用，我自己看看。”我微笑着拒绝了她。我在一楼找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半圆状的衣橱都翻了个遍。我确实找到几件好衬衫，其中有一件粉蓝色配晚礼服的起皱衬衫，但我要找的是更大胆一点的。那女售货员看我挺失望的，就说：“楼下还有更多。”

我到地下室一看，这还差不多：整个地下室一排排的衣服，每排都有整个街区那么长。我站在最下面那个阶梯上，鼻子里充斥着浓烈的樟脑丸和干洗剂的味道。这些衣服有多少人穿过？这些缝衣的线，经历过多少纠缠？我正在做这样的思考，突然一个东西闯入我的眼帘。我径直朝它走过去，把它从衣架上抽下来，查看是什么尺寸。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必须拥有它。

第二天晚上，我前往第42街的琪普利安尼。请柬上写着八点，而我是在快九点的时候到的。我心想自己至少得认识四五十个人吧，应该再多一些。很多人看好阿格斯。虽然赚钱不容易，但是投资者还是源源不断把钱砸进来。我们负责管理的资金已经接近10亿，这让我们成为业内的高端公司。能有10亿元的对冲基金就已经够牛的了，而对冲基金其中的一个部门——保健板块——就有10亿，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我在华尔街上也开始小有名气了，下班后尤为如此。销售交易员都说，只要安排好跟我的饭局，他们就知道一定是能玩得开心得不得了。他们永远不知道我会说出什么话，干出什么事儿。我知道，大多数跟我合作的人今晚都会来，高利安的一些“隐身”人士也会出现，可能摩根士丹利也会来几个人。我跳下出租车，走向活动场地。“噢，我的天呐，瞧那个人！”我听到一个看门的在跟另一个说话。

这场地原来是个商业银行，我们不可能来这里招摇。大厅的天花板高高挑起，缤纷的水晶灯华丽垂下，四边是大理石柱子。地上反射光芒

的也是大理石，在 500 块一双的名贵皮鞋的踩踏下吱吱作响。整个场地华尔街精英云集。

我心想，穿亮橙色的囚服到任何场合都会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但是在这个场合，特别是有安然、泰科时代的场合，我的打扮有点让人害怕。毫无疑问，现场有几位人士认为我的装束是当晚的败笔。但是我并不是来做什么政治宣言的。如果你此时问我为什么这样穿，我会说这是一个商业的决定，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不过，可能有更简单的原因——我是买方，没人能拿我怎么样。对我来说，这象征着自由，不是监禁。

我朝吧台走去。大家自动让开一条道，为的是要看我。我昂首大步向前。我看到有人微笑，有人举起大拇指，有人要跟我击掌。女调酒师问我要喝什么？我呷着啤酒，卡斯见了，几乎就要上来抱住我了。兰迪和詹姆士也从后面过来了。“太炫了！”兰迪说。

“好酷啊！”詹姆士说。

“老兄，你得来见见我老板，”卡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他们肯定会爱死你的。”卡斯陪我走过舞池。他小声跟我说他有份礼物要给我。我说我待会儿跟莉莉有约。

“你就收下吧，”卡斯坚持要我拿，“我口袋里还有三包呐。”我伸出手放在他的手掌下，接过那个半英寸大的袋子。虽然我们的动作隐蔽，但我感觉整个会场都看到了我们的举动。我飞快地把可卡因收进裤子的口袋里。

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男的站在一个高高的圆桌旁边，桌上有两个鸡尾酒的杯垫，上面有湿湿的圆形水印。这两个人开始紧抓他们的酒杯。维尼和罗伯特是卡斯两个老板。维尼已经谢顶了，穿着一件双排扣的西装——好像是 80 年代他发福时候留下來的。不过他笑得让人很舒服。以前他一定是个美女杀手吧。罗伯特是维尼的缩小版。他一直微笑着，一直点着头。他有浓浓的棕色胡须，眼睛也是棕色的。我怀

疑有没有女孩子会喜欢他。“我听说了，橙色是如今的流行色，跟黑色一样。”维尼说着，猛握着我的手。“今天算是见着真人了。”

当天晚上，我跟整个华尔街的大公司都说上话了：高盛、摩根、花旗、瑞士瑞信银行、比尔·斯特恩斯、雷曼，等等。谈的内容都千篇一律，都跟维尼一样在自我推销：“我们的执行力很强……我们跟‘大医药’的专家们在同一层楼上班……这个我们行……那个我们也行……”到最后，所有交谈都浓缩成一些不和谐的噪音。就连我穿的奇装异服也没办法让他们的自我吹嘘减弱。这些大投资财团才不会管你穿什么呐，只要你能够让他们赚到钱就行。不知从何时起，眼前的景象突然变成了空中鸟瞰的画面。我是那只橙色的小鸟，周围是一群一群的乌鸦。我突然有了一种冲动，想要把那整包可卡因都解决掉，只要能让我从这里解脱，做什么都可以。“我得去方便一下。”我说。我四下看了看，看到周围都是断了翅膀的乌鸦。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企业化，那么没有个性。如果大家都任毛发生长，都按心情穿着，都畅所欲言，我会是第一个去理发店门口排队的人，会是在布鲁克斯兄弟商店买东西的人，会是买一本《巴伦》杂志准备在星期一可以大谈特谈的人。

当我走出厕所，我可以感觉得到我的心在可卡因的作用下跳动着。偌大个会场缩小了，每个人都在看着我。我心急火燎地找着兰迪和詹姆士。终于找到他们了，我求着他们跟我一起离开。我们走到大街上，我的感受正好符合我的穿着：一个逃犯。我们把卡斯给撇下了。刚才最后一次看到他，他正跟从康涅狄格来的在对冲基金工作的一群人聊得正欢。我们朝湿吧走去。

那里人山人海。莉莉看到我，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还给我来了个飞吻。她安排好客人之后，朝我走了过来。“嘿，”她说，眼睛闪闪发光。“穿这个橙色的囚服是咋回事？”

“自我感觉良好。”我说。

“看着真可爱。”她说。

接下来的整个晚上，莉莉几乎只为我一人服务。有几次我想起口袋里的可卡因，但是我不想让她看到我比现在还要兴奋的状态。我喝了几杯东西，然后抓起她的手，说我要离开了。“我需要回去睡觉。”我说。她的微笑中带着点忧伤，但她还是说了OK。她让我等一下。她跑到吧台的另一头，从收银机后面拿过来个什么东西。她又跑回来，塞给我一个皱皱的纸巾，叫我保证回到家才能打开看。“一定听话。”我随手把纸巾塞进裤子的口袋里。

我回到家，伸手到口袋里拿东西，却摸到卡斯的东西，里面还有挺多的。接着我打开莉莉给我的那个纸巾，那是个嘴唇型的荷西巧克力。我脱下外裤，剩下四角裤，接着把那包可卡因和巧克力放进抽屉。我把囚衣卷成一团，扔进洗衣篮，爬上了床。

在我睡过去之前，我想着我得跟莉莉说点什么。第二天晚上我去找她了。湿吧的看门人一眼就认出我来。我跟不少交易员来过这里喝酒，每周至少来一次。通常我闭口不提莉莉，直到莉莉走过来给我满满地亲上一口，我才看他们的反应。但今晚我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远远地看到她，我的呼吸似乎一直冲击着我的喉咙。虽然我是站在人群涌动的酒吧，但我的眼睛只能看到她。她还没看到我，正在忙着倒酒、接单、收钱。我转过身，朝门口走去。我是来跟她分手的。我和莉莉的关系从没有深入发展，仅仅停留在鸡尾酒、欢声笑语还有几次做爱上。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继续。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放慢脚步，或者她会不会加快脚步。她还有个儿子。其实，这些统统是借口。我只是还没有坠入情网。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我只想着，爱情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情况还不止这些。可能是我当交易员的本性，让我知道如何了断。老听着股市的这些名言：“别跟一只股票纠缠一辈子。”“不要感情冲动。”“如果交易失手，要马上割肉止损。”不过，我知道，人家正上班呢，我去跟人家说分手不合适。我明天再打电话给她，或者后天。

2003年2月底，我好像患上流感了：发着烧，昏昏欲睡，肠胃不舒服，咳嗽，喉咙疼。这能说明一到两个问题。要么我染上非典了，要么是宿醉。想起我去过黑色咖啡厅，还喝了很多龙舌兰，还在“白宫”逗留过，我想应该是宿醉。但谁知道啊，大家都对非典病毒惊恐万分。大家说病毒可能会全球泛滥，亚洲股市也已经一落千丈了。就在上星期，从中国回来的一个美国商人就开始出现一些症状了。他的飞机折回别处，他本人被送往医院。他跟他的主治医生最后都死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全球警告。问题很严重。香港交易所有的交易员戴着口罩在交易。

人们说，每个动作都会有反作用，但是就华尔街而言，应该说，每个灾难都会带来一个交易。眼下，非典病毒是保健投资界关注的焦点。几乎每天都有新闻，说有新的小型生化公司开始研发某种疫苗，或者发现了一种新的变异，这些都可能对保健股票有利，虽然变异对整个人类不利。这些天，我们晨会的内容几乎都围绕着非典，以及如何从中获利。而且，其商机不只是局限在制药和医疗设备公司。这个病毒可能严重影响航空公司、旅游业、餐馆、空气过滤器公司、检疫中心等。其影响范围要多大有多大。

在晨会上，我坐在桌边，用纸巾清理着我的鼻孔。我已经用掉三张纸了。我又抓起一张干净的纸巾，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我并不是资本主义投机分子。我得仔细看看，交易之神是不是即将用雷

电来劈我。没有？那就好。但是，我的人生在干什么呢？我的祖国和伊拉克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世贸双塔废墟处的硝烟似乎还在散发烧焦的气味，而我却坐在这里，算计着能不能利用非典来赚钱。

这不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职业进行质疑。我还在高利安公司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认为有一家公司治疗第三期癌症的药不太可能获得药监局的批准，所以我们就大量卖空了那家公司的股票。那种药可能会让肝癌病人活得更久，而我却在那里打赌这个药不被看好，我当时非常痛恨我自己。那天晚上我把自己灌得大醉。可能是在我喝了半瓶培恩的时候，我突然想通了。这跟肝癌患者没有任何关系。这完完全全是个投资决策。就像海曼·罗斯曾在一家古巴酒店的屋顶上说过的：“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生意。”我们不是不看好那个药，我们只是觉得那个药得不到批准。纯商业决定，绝对的。

想起海曼·罗斯，我的思路立刻回归正常，接着我建议大家一起拥抱一下，或者给那些分析师还有交易员搞个烛光仪式。我提醒自己2003年的计划：我要赚百万奖金。这就是我的目标，而且看上去股市也会跟我配合的。

在经历了2002年底的股市上涨之后，2003年的一、二月份股市开始下跌。虽然有非典在肆虐，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牛市就在不远的前方。过去的这两个月中，股市没有跌破2002年的最低谷，这就是一个牛市的征兆。还有就是伊拉克那边的事情。有老话是这么说的：“看见大炮就买进，听见号角就卖出。”要打仗是利好的消息。但是，为了好好利用不断好转的经济大环境，我得做一些调整。我得改变我交易的方式。

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大体可以分为两类。要么你是执行交易员，要么你是自营交易员。以前我也做过一些自营交易，最早在高利安，后来在阿格斯，交易的量都比较小，只有5 000~10 000股。大多数情况下，我做的是执行类的交易。做执行类的交易员，主要的工作就是一点都不能

搞砸。你得一字一句照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的指令去做。我还记得放在美琳达桌面上的她的最早几次交易之一。克里斯走过来，叫她买 1 万股 AMGN。于是，她遵照指令，抓起电话打给摩根士丹利说要买进 1 万股 AMGN。第二天，克里森问那些 AMGN 股在哪里，美琳达才意识到，是要“卖空”1 万股。10 亿资金的对冲公司从不会只买进 1 万股什么东西。当执行类的交易员没什么不好的，很安全。但是，我的交易工作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就像十八岁的时候给了我一辆卡玛洛跑车。我想自己搞些大交易，给阿格斯多赚点钱。因为，如果我是自营交易员的话，每天或每年结束的时候，我都可以跑到克里森那里去报告，说：“我赚了这么多。”当自营交易员能够最佳地体现自我的价值，也是最佳的赚钱方法。

当然，危险不是没有。每天，你的价值都用红色或黑色的墨水记录在文件上。不过，这工作带来的自由是无与伦比的。当个自营交易员，我可以拿阿格斯的钱来做我自己的交易；没有什么分析师或投资组合经理来对我指手画脚。我可以买，可以卖，可以买空，可以卖空，都由我说了算。

我刚开始的时候买 25 000 股，接着每次买 50 000 股。有一天我忽然突发奇想。每一笔交易都必须输入，得过一台机子给纸带打孔，这叫“过带”。我们现在在电脑上看“交易时间与金额”就可以获得以前纸带上的这些信息，而且更快。不管是纸带上的还是电脑上的，只要是“过带”了，整个华尔街都可以知道这笔交易。

于是，我按下 UBS 的电话键，告诉我的交易员说要卖 69 000 股 BBH，我交代给布莱德的也是一样的信息。BBH 是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由 18 个生化科技公司组成。这是一揽子的股票组合。我这是在赌一把。我觉得整个板块都在涨。我之所以想到 69 这两个数字，那是把我年少的心体现在这交易当中，同时让我那些年轻的交易伙伴们印象深刻。接着，我通过高盛卖出 69 000 股。第二次我再这样做的时候，我用了两

个不同的经纪人，但我交易量总是 69 000 股。不到一周的时间，我重复使用了我所有的经纪人，所以，他们一看到 69 000 股 BBH，那就是我的。

如果我不是在华尔街一家最大的保健基金做事，我到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无非是添点笑料而已（我有时候也自嘲几声）。我毕竟是在华尔街，还是在帮传奇式人物克里森这样的投资组合经理做事——他在高利安的时候业绩惊人。人们把我们的投资当作聪明钱。所以，当我的 69 000 股 BBH 股票在股市频频出现之后，不只是吸引了一些眼球，还让卖方的人开始嘀咕：是不是阿格斯有什么消息了？而卖方最不喜欢的就是被蒙在鼓里。紧接着，我开始接到卖方的电话，说上个交易，他们可以做得更好，还说他们的价格更有竞争力。每给出一个订单，我的定价就越紧。“给我一次机会吧。”他们会这么求我。他们都像狗一样向我讨生意。

虽说用 69 这样的数字是我的原创，但是业内老早就有人用某些方法来把他们和一般人区别开来。华尔街不像拉斯维加斯，不存在赌客跟庄家的关系。这是牌局，赢家和输家同桌博弈。我举个例子吧：有两个对冲基金交易员，A 和 B。两人教育背景相同，资源相同，对同样的信息处理的能力也相同。但是这并不说明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就能赚取同样数量的钱。这是赚钱的艺术，也是个技巧。

跟大多数交易伙伴相比，我的学历比他们低多了。我也不比许多交易员更有优势，也没有比他们获得更多照顾。所以，我得自己搞出点名堂来。于是，我运用了我阿格斯的前一年半时间里学到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加上我和“保健黑手党”成员的联盟，加上驾驶卡玛洛跑车的少年热血，最后再盖上那个 69 记号。结果你猜怎么了？我开始样样事情都得心应手。我很快就坐在牌桌上，数着从桌友那里赢来的钱。

后来有一天，我又去开晨会。虽然说我身体上是感觉好多了，不过连我自己都认为我在生化科技研究的优势已经快用光了，但是我却听维

维克说，现在医院开始通过中介公司聘请临时工而不是招全职护士了。他说他注意到另一个趋势。我马上坐直身体。有变动，有改变，可能是条大鱼。

克里森、维维克和我一起火速分析，看哪家公司会从这样的新趋势中获利。我们分析出三家主要的大公司，还有几家二级公司，都是拥有保健行业主要员工的提供公司。但这几家的股票都不怎么卖得动。华尔街有一个说法，说某些股票是“预约交易”，就是说，这些股票的每日平均交易量很低，通常在 10 万股以下。如果有谁下个大买单，那会把这样的股票价格推得老高，让竞争对手占尽了便宜。要买下这种公司的股票，或者至少要买入我们想要的份额，需要低调操作，慢慢来，但是我们的时间又不多。还有三星期这些公司就要出季度财务报表了。那样的财务报告的出台，会通过电话会议与潜在投资人商谈，其中会讨论到这个新的趋势。报表一出，将天下大乱。

于是，我每天都大量吃进。我不能把手里的那对 A 秀出来，所以，我打电话给几家大公司，询问这几只股票的情况如何。但我没告诉他们我是要买还是要卖。我只是想摸摸底。我先通过电脑程序 Instinet 小量买进，因为我不想把价格推得太高。我还想找一个自然卖家，这样我们一来一往也不会引人注意。但是我没那么好运。

我花了近两周时间填满了我们的仓位，每只股票买进了 30 万~40 万股。之后，我打电话给“保健黑手党”的两位成员，说下班后在“墨西哥电台”见面。他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有他们想听的消息。我可不是来搞慈善的。现在我帮他们，让他们在老板面前有光彩，他们就欠了我人情。我要他们在正确的时间鼓动大家买这几只股票的热情。

我走进“墨西哥电台”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在酒吧里了。罗杰在一家有 10 亿资金的宏观基金做事，做很多保健方面的交易，特瑞夫的公司有几十亿的资金，也是搞保健交易的。我们这些人从不开门见山地谈生

意。我们见面先喝几杯鸡尾酒，说些有的没的：有啥新闻？工作怎样？有没有什么新妞？尽聊这种东西。这样的热身谈话之后，我会说我们关注的那个员工中介的事情，有哪些公司，我们估计股价会涨到什么地步，等等。我们再来几轮“墨西哥电台”的招牌饮料“短波”，抽几根香烟，然后就各自回家。

之后的两天，股价不断上涨。很显然，盟军已经说服了投资组合经理，开始买进。我再把消息放出去给几个我认识的对冲基金交易员。现在股票的价格才真正开始涨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赚了很大一笔钱了。赚得太多了，现在几乎是要清仓的时候了。但是维维克说，此时股价看上去还很便宜，应该还会涨。我们等着。

等到那些中介公司放出消息说明他们的新趋势，股价当天就在盘前涨了10%。卖空期间的利息很高，因为在今早出消息之前，很多对冲基金都不看好这个板块。股票不断上涨，我悠悠地等着开盘，看着股票涨了15%。我得开始干点事情了。

我分别给五家华尔街的大公司打了电话：高盛、摩根、美林、花旗和瑞银波士顿。虽然我想卖出，但是我还不想让华尔街知道。所以我告诉这五家大公司说我有一个大单子要买进，需要在“人力资源板块”操作。我表现得好像在输钱，说得有点语无伦次。我可是演这套戏的高手。我可不是跟一群傻蛋在打交道（可能里面有一两个算是吧），但我亲眼见过业内不少交易员——我自己就当过交易员。我知道怎么说别人才会相信。他们听完都说会再打电话给我。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一放下，他们那头肯定得狂欢尖叫，因为有个大买主要买所有人力资源公司的股票。接着，他们所有的同事都会往外打电话，把这个消息放出去。与此同时，我坐在桌前，把要卖出的单子一一准备好。他们给我回电话，我回复的内容几乎都一样：“抱歉，不卖。”如今，买方的公司告诉他们的绝大多数客户，有大买主要买我手中的股票。整个气氛都变了。有投资者的聪

明钱要进场了，大家也都想进场。观点变成现实。我当然也得顶着一种风险：即有人确实想卖，那么就可能有人给我来电话，要把一大堆烂股票卖给我。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我还真得好好应对。幸好没有卖家出现。

当天收盘的时候，股票涨了 30%。我给卡斯打电话，卖出一部分。这只是给“涡轮”一点小小的甜头，我主要是想让不知情人士来参与而已。我这次在华尔街当“卖家”的身份保留得越久，这个股票的表现就会越好。但是，这个秘密我只能保守一段时间，今后一两天内，我必须完全清仓。全卖出之后，阿格斯就会进账 700 万元。三个星期能赚这么多，不错了。

在办公室里，我们把这次的功劳主要记在维维克头上，因为是他首先提出这个做法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我可不是那种等人来鼓掌的人。我在等着我的奖励——我的百万奖金。当天晚上，我跟罗杰和特瑞福去了“电台”餐厅。“交易都很成功啊，小子。”特瑞福说。我点了点头，叫了培恩牌龙舌兰加冰块，再加三片青柠檬。“有没有什么新妞？”我问道。关于人事公司股票的事情我们再也没提。我们都知道我们赚了多少钱，还欠谁人情。我们有说有笑，又喝了一轮酒，罗杰要结账了。我看他们走出门外，又叫了一杯培恩。我在吧台坐着，手机在嗡嗡震动着，是短信，兰迪发的，上面写着“过来”。

2003年春天的时候，阿格斯公司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10亿元，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我们好像是自己有印钞机在印钱。我们越赚越多，赌注也越下越大。高利安现在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华尔街谈起保健板块，首先会想到阿格斯。华尔街谈起保健交易，首先会想到我。

这种转变你根本没办法预见。没有内部通报表扬，也没有老板拍拍你的肩膀说你干得好，你已经入局了。某天你一觉醒来，世界全变了。每个人请客都想让你光临，你喝的酒有人抢着付钱，你“最好的”新朋友都邀请你去做客。我不是说这不让我激动——我都兴奋死了。我去年坐在超级杯棒球赛50码线上，那次超级杯是打得最棒的比赛之一。在亚当·维纳特里球场，落后两个触地达阵的爱国者队，在加时赛中打垮了公羊队。在坦佩打冠军赛的时候，迈阿密飓风队和俄亥俄州七叶树队打出了双加时赛，我坐的位置更好。我还去了日光舞蹈电影节。电影节的时候，我住的地方是滑雪圣地的一个七居室的屋子。我坐直升机飞到汉普顿斯，还坐私人喷气机到拉斯维加斯。

虽然一切都很风光，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知道莉莉在干吗。我从不跟女人交往太深是因为我不喜欢分手的滋味。跟她们约会几次就需要跟她们来个“谈话”，我最不喜欢的谈话。我当时打电话给她，我们也没有计划要再见面，只是互道晚安。我们互相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低，也没有安排见面。终于电话不再打来，莉莉也完全不再出现。不知道算

是我把她甩了还是她把我甩了。但那不重要。我想我开始怀念以前的日子了。我花太多时间吃工作晚餐，还在兰迪和詹姆士的“白宫”待了太多时间，我都没什么时间跟我的室友在一起了。在我当买方之前，杰森和我经常出去。我们有计划有安排：星期三去上西区的绅士杰克；星期四去上东区的达科塔；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们四处逛酒吧，最终都会逛到“西部红岩石”酒吧。在酒吧里我们也有自己的“老三样”。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交叉跳绳的动作，我们会叫两个人假装在我们跳的时候转动绳子。我们会玩安妮游戏，我们会跪趴在地上，假装在刷地板，还得唱着“生活真是很艰苦”。我们两人是死党，就像波特和厄尼，布奇和日光舞蹈或者拉夫尼和谢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太久了，都不用排练，配合得天衣无缝，非常自然。说不定我跟哪个女孩子正说着话，杰森可能会过来打断我们，说：“呃，特尼，忘了告诉你，你的中介下午打过电话。”接着他转头就走，我则可以接过茬儿，什么借口都可以编。我可以说我是演员、艺术家或者是作家。但我很少说自己是华尔街的交易员。

不过有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个叫德鲁的家伙打来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把杰森重新拉回我的社交网络。德鲁跟我聊着，好像跟我有多熟的样子，但我根本没见过他。他说他是费城瑟斯奎哈那交易公司的交易员，最近他开展了销售、交易、客户联络方面的业务。他邀请我周末到南沙滩去，跟费城的几个人以及他在纽约的一些客户一起去玩玩。他还说他们租了一架 BBJ737 飞机（BBJ 我倒觉得不怎么样，因为听起来像分类广告里的个人广告），但是 737 听起来就知道它很大，超大。我说我会去，挂电话之前，我想起点事情来。“我带上个新手一起来怎么样？”我问他。当我告诉室友杰森我们要一起搭私人飞机去南沙滩，一起住高级酒店，而且一切都有人买单时，他尖叫起来，像个女学生。不过，有个条件，我说：“你得假装是我的交易助手。”

那个周五，杰森回公寓的时候，背了个超级夸张的背包。他每走一

步，他的臀部就往外翘一下，嘴唇也会撅一下。“喂，老弟！”我叫道。

“这是我交易员的走路范儿。”他解释说。他问我需要穿什么，我说，一扣到底的衬衣和卡其裤。15分钟之后，他下楼来，还是迈着那种超级夸张的步伐，不过这次他把包放在后面的行李箱上。他看上去像是要走T台的空乘人员。不过他确实穿了件一扣到底的衬衣和卡其裤。他看着我，发现我只穿着旧的短裤、拖鞋还有白色T恤。“为什么你穿那样，我穿这样？”他问我。“因为你是华尔街的装扮，”我说，“而我不是。”

我们坐车去威斯切斯特机场的路上，我让他熟悉一些背景情况，告诉他该说什么，更重要的是：不该说什么！“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苏斯夸西？”他问我。我双手抱头做痛苦状。

“瑟斯奎哈那，”我说，“你要不要写在手上啊？”

接送的汽车直接把车开到了停机坪上，就差红地毯了。这么大一架波音飞机，商用规格，至少可以坐150人，但机舱里就坐了20个人左右——每个都穿得跟杰森一样，蓝色的衬衣，褐色裤子。我听到有香槟酒开瓶的声音，接着又一瓶。机舱后部宽敞舒服的位子都被占了，所以我们在前面找位子坐下了。皮椅子可以调节高低。有沙发和咖啡桌。地上是一张东方式的地毯，投射灯给舱内提供了一种微弱的灯光。机上的厨房比大多数纽约公寓里的都大。天花板上垂下一个平板电视。我们还没坐下，服务员就问我们要不要来杯鸡尾酒。我甚至都忘了我们是在飞机上。这简直就像在男士俱乐部，多配了两个翅膀而已。杰森和我舒舒服服地坐下，呷着啤酒。金发美女服务员对我们微笑着，然后说飞机即将起飞。

“我太爱股票交易了！”杰森叫道。

当飞机升到巡航高度之后，我跟德鲁见了面。他的样子跟我想的一样，跟任何一个华尔街的经纪人一样：棕色头发，四十开外，退役运动员。可能他在高尔夫主场可以让七个球，但在客场可能尽量要让14个

球。他的笑容一半像销售员一半像同性恋。他已经有点醉了。但他还是保持那种每个销售经理都有的高昂气质，在我进入华尔街第一次面试时候就领教过的那种。“你好吗？”说着，他伸过手。“是不是很兴奋？这样来过周末？”接下来他吹捧了我一番，说我多厉害多厉害。“你对市场的感觉极佳。”他说道。

“感觉极佳。”杰森也插话。

在迈阿密，我们住的是德兰诺酒店，那是南沙滩最早创建的艺术标志之一，已经修旧如旧，恢复了往日的风采。在这里住，让你觉得你是40年代的影星。太完美了！晚餐则订在一家热门的新餐厅。

到餐厅的时候，我把杰森安排到最边上的位子。我想着，这样我们就可以尽量少谈生意方面的事情。但是，要让杰森嘴巴不停可难了，几杯鸡尾酒下肚，他开始哇啦哇啦地讲故事，而且都是关于我的故事。杰森很滑稽的，也很会讲故事，那些经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他开始不像我的助手，而更像是我的朋友了。我有点紧张。接着，他开始讲他最爱的故事，说某一晚我狂欢之后睡去，醒来一看，我躺在一堆稻草里。“我看他是跟中央公园的一匹马同床共枕了！”杰森大声呼叫着，大家都笑了起来。我也笑了，接着说声不好意思，要出去抽根烟。现在得让杰森住嘴了，不能再讲我的故事了，要不然他就得露馅了。

在餐厅外面，我看到瑟斯奎哈那的一个客户山姆在打电话。他朝我笑了笑，接着转身继续压低了声音讲电话。我看到他在饭桌上也一直在发短信。我点上一根烟。山姆此时打完电话了。他的肢体语言，他的表情，让我有所提防。“今晚不错。”他说着。我点点头。我们站了一会儿，沉默着，看着那些装饰用的棕榈树和开过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名贵汽车，分享着陌生人之间无言的氛围。我把烟头弹了出去。“这次来的人当中，有人喜欢派对吗？”我问道。他看着我，微笑着，像个老朋友一样。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他说。

我们回到饭桌前，我们这边的人已经挪到吧台去了。杰森坐在吧椅上，还在唾沫横飞。瑟斯奎哈那的四个交易员围着他，好像要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千万别啊！”我心想，问题可能要来了。“我交易那个很多Q的股票，”他说，“就是QQQ。”四个人都点着头，好像杰森是太阳神。简直是太过分了。交易员上班的第一天可能就听过关于QQQ的事情了。这不过是一种基金，跟BBH一样，只不过它代表的是纳斯达克100，而且主要是由技术板块的股票组成的。你说你交易QQQ，就像是宣布你在呼吸。

杰森看到瑟斯奎哈那的人开始慢慢失去兴趣了。他看着酒吧里的一个女孩儿，他把手轻轻地放在一个交易员的肩上，仿佛是在说：“注意了。”那人给他来个满怀歉意的笑容，于是杰森继续讲下去。“我交易得很密集。”他说。现在，连调酒师也在听杰森讲了。“我喜欢交叉套，”他说，“交叉着干，让他们猜去。这就是我的风格。”瑟斯奎哈那的人频频点头。杰森讲话好像他是从玻利维亚来的交换留学生，看MTV电视台学的英文，但又像一个特能吹牛的演员，还很会用戏剧化的停顿来挑逗观众。“我还交易‘梯尼’。”他又接着说了，他现在双手交叉着，等那些人消化消化他的话。所谓的“梯尼”指的是价格——十六分之一点，这个价格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量，但那些人听着，没吱声。他们微笑着，互相看了看，一脸的茫然。

“真厉害！”终于有人打破僵局。“其实，”另一个人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希望哪天也能当上买方。”杰森琢磨了一下这句话，接着，用大拇指和小指头比成电话机状，靠近耳旁，还摇了摇。

“给我打电话啊。”他说道。

我连忙把杰森给拉走。我跟大家说我们要出去抽根烟。我们还没走出大门，就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交易什么QQQ？他交易很密集？他还交易“梯尼”？我想着这位室友可真能胡说八道，这个周末我们在一起肯定

会快活极了。此时，一辆白色的凌志车停在我们面前。山姆从车上下来，一脸灿烂的笑容，好像他中了六合彩的头奖。他朝我们走过来，我看到他的手伸向口袋。我不想让杰森看到我们的“接手仪式”。杰森对我在华尔街干的勾当大半都不知道。山姆和我对视了一下。我的眼神告诉他“悠着点儿”。他立刻领会，只伸出手跟我握了握。他的手掌跟我的手掌相碰，一个不小的封口袋子贴在我手掌上，我感觉里面是些药丸。我握住袋子，把它塞进裤子的口袋。我看没人在看我，就往嘴里扔了两粒。我之前喝下的龙舌兰酒让我毫不惧怕陌生人给我的毒品。我们要往好处想嘛。

杰森和我又进去到了吧台前，那里有三个女孩儿，皮肤晒得黝黑，穿着短裙，戴着大大的耳环。看上去她们是迈阿密当地人。她们相当惹火。不过她们完全没注意到我们，所以杰森向她们介绍说我们俩叫作“特别美味”和“让我煽情”。那几个女孩儿大笑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状况了。首先，我觉得体内有跳动的感觉，然后转到体外，好像是潮水一般。此时，我满脸微笑。一切都变成了慢动作。一切都很好，而且不只是很好，应该是完美，感觉太舒服了。灯光打在吧台后面的酒瓶上闪闪发亮，太炫了。体内的那阵跳动现在变成了颤抖，扩散到我的全身。全世界似乎都没有问题了，即使有，我也能解决。我的话犹如海明威的话划过整个餐厅；我风采犹如詹姆士·迪恩；我的动作潇洒犹如迈克尔·杰克逊。

我的身体随着音乐不停地扭动。闻着这些女孩儿身上的香水，犹如被芳香的牛奶裹住。我所触碰到的东西，都散发着爱的能量。我追随着节拍，奇准无比。那几个女孩儿又大笑起来。我们一帮人都站了起来。那些女孩儿开始拿她们的东西。她们朝外面走去。我需要抽根烟。我走到外面，点燃一根烟。负责停车的人早已把她们的敞篷布朗克吉普车开过来了。我转过头，杰森还在里面跟一堆人聊着。我回过头看那些女孩儿，她们朝我招

手呢。我又转过头，杰森、山姆还有几个人也开始朝我走来。那几个女孩儿现在已经坐在吉普里面，朝我招手，让我过去。我朝她们的吉普跑了过去，跳上后座。车子往前走了。但是前路不通，于是开车的女孩儿猛地掉了个头，车轮发出吱吱的响声，接着，我们的车飞驰着掠过餐厅。杰森、山姆还有一堆瑟斯奎哈那的人都朝我们喊叫着。他们追着我们，追了半个街区。我伸手从口袋里拿出摇头丸，我数了一下，还剩七粒，我又吃了两粒，给那些女孩儿一人一粒。狂欢之夜正式开始……

凌晨6点。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站在一间叫“空间”的俱乐部的中央。音乐声超级大，同样的节奏不断重复。我觉得地上可能有释放烟雾的机器。每个人走路都好像是僵尸一样。接着，好像有人突然按下了一个开关。我的大脑突然剧痛，大脑里面的声音让我无法忍受。我要回家。我撞上几个一起来的人，他们问摇头丸在哪里，我怎么到这里来的。接下来他们问的问题很古怪。“老兄，你穿的那是啥？”我一看，我穿的是粉红色的艾佐德牌的女式衬衣。衬衣横挂在我腰间，好像那些女孩儿穿的短裙。

我知道自己算不上道德模范，但我还是快速想着解决眼下问题的方法。真不该把杰森丢下跟瑟斯奎哈那的人在一起，真不该把所有毒品都留给自己。我真的不想这样。这不是我第一次违背心愿做出不高明的事情。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吧。我想要改变。

第二天中午过后，我在游泳池边上，躺在休闲沙发里。虽然我带着墨镜，周围的亮光还是可以直接照进我的眼睛，照进我的头。我感觉含着满嘴的沙。此时，瑟斯奎哈那的人三三两两地走过来，都跟我说昨晚有我在，他们过得很开心。当然，他们没有说我拿走了所有的摇头丸，他们也没有说我临阵脱逃的事情，他们跟刚下飞机的时候一样，跟昨晚吃饭的时候也一样。我是他们的客户，行为再差也没有关系。杰森躺在我身边的沙发上，静得不像是他的风格。最后，只剩下我俩了。“你昨晚怎么回事？”他问道。我闭上眼，挡住那道直射我大脑的阳光。

22

2003年初夏的时候，我爸妈来纽约看我，要来我翠贝卡的公寓瞧瞧。他们还没来过。那天星期五，一下班我就回到家，开始整理。我和室友把公寓整理得比较像样了，但总有些地方漏网，一两个空啤酒罐，或者什么地方有一卷纸什么的。杰森还特意在咖啡桌上放了几张色情DVD片子、玻璃烟枪和一包大麻。他这是在整我。我们还住在上西区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办派对。他先去洗澡了。趁此机会，我把几本色情杂志塞到他卧室里椅垫的下面。当夜已深，派对正欢，我把几个女孩儿带进他的卧室。我一屁股坐上去，然后装模作样说椅垫有问题。我掀开椅垫，六七本色情杂志掉了下来，落在那些女孩儿的脚下。

我爸妈是要去巴黎，从肯尼迪机场走，顺道过来看看我。我姐姐克里斯丁和她老公以及三个孩子现在住在巴黎，圣诞节前，我帮爸妈买了来回机票让他们坐协和飞机去巴黎，所以现在他们才来的。圣诞节那天的早上，在缅因州老家的厨房里，我把装着机票的信封拿给妈妈，她欢喜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老爸就会说风凉话：“你这是干啥？”

我把烟枪和DVD藏到酒吧后面，最后检查了一次，看杰森还有什么把戏没有被我看破。起居室里的一切，要么是新的，要么贵得要命。墙上挂着照片名画，地上放着印度大床，还有其他的摩登家居——我住的地方好像是买方奢靡生活的陈列室。我觉得把电视转到CNBC台，不过我把声音关掉了。大功告成。

此时，门铃响了。门房通过对讲机跟我说我父母到前台了。我坐电梯下去接他们。在大堂里，老爸跟门房闲聊着。老妈跟塔克舅舅说着话，舅舅今晚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塔克舅舅从旧金山搬回纽约了，他在一家新公司上班，老婆也已经是第三任了。我搬进那个上西区的小小公寓都是九年前的事了，我那时候还打电话给舅舅，说要找跟我写作文凭对口的工作。人世间的事情真是难以预料。我走过长长的过道，走向前台。老妈紧紧地抱住我，老爸和舅舅跟我握了握手。我带他们坐上电梯。进去之后，我告诉老爸按5楼。我开始跟老妈讲话，但是我发现电梯没动。“爸，按5楼，拜托。”我说。

“我按了。”他说。

我看着他又按了一遍。他使了最大的劲，用大拇指按着“5”键，但他按的是那个指示灯，不是右边的那个按钮。我伸手按下了那个按钮。我心想，如果当年我没有离开肯尼邦克，现在的我会成什么样子？我会按电梯钮吗？

我爸爸是在匹兹堡长大的。对于他的青年时代，我所知不多，只在达夫家庭聚会时，听他们在喝酒的时候讲过一些。我所记得的只是他跟别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干那些捣蛋的事情——在邮箱里放爆竹、夜闯坟地等。关于他跟他老爸的事情，我所知更少，但我猜得出来，关系肯定不佳。我听大家小声说起过爷爷酗酒还有他生意最后搞砸的事情，所以我猜他们之间关系不佳。现在想来，整个达夫家的亲戚都加在一起得有25个人，他们每年夏天都来威斯康星州蓝多湖的房子度假。我们至少每年聚一次或两次，有时候感恩节或复活节会去我奶奶的娘家——就在匹兹堡城外的圣克莱尔。但是，我想不起他们说过什么家族的趣闻轶事。可能是我当时太小，不太喜欢听这些东西吧。但我觉得比较可能的是，我们家族的人比较能保守秘密，很多秘密都被封存在特尼家的阁楼上了。

我妈妈这边也有秘密。我知道我外婆用奶昔的杯子装马提尼酒来喝，她老在床上待着，还在床上抽烟。不过，这是我最近才从塔克舅舅那里听来的。我在想，我爸妈带着各自家族的秘密相遇、结合，也因此他们不愿意多谈他们小时候的事情。

他们中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后来又一起就读于巴克奈大学。大学还没毕业，他们就经历了求婚、怀孕。我老爸不得不在学校多待一年，取得化学工程的学位。那个时候，我妈在学校里跟他住，肚子里怀着大姐德碧。毕业后，他们生下了二姐克里斯丁和三姐凯莉。最后，在我爷爷的威逼利诱之下，我也呱呱落地了——我是独子，家里的老幺。

别人的爸爸跟儿子一起练习棒球、钓鱼，我完全没有那样的记忆。

我们一起“工作”，至少我们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只要天亮着，我爸就在家干这干那，那是常有的事儿。要跟上他的步调，要达到他的要求，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我不能把烧火的木柴整整齐齐地堆放好，或者如果我油漆车库留下刷痕，那么，以后这些事情就没有我的份儿。记得有一次，我主动把草坪的草给剪了。他瞧见我推剪草机留下的线不平，就叫我今后再也不许剪草了。没多久我就摸清了门道，如果我不想干什么家务活儿，只要故意做差一点儿就可以了。不做家务，正合我意。我想跟朋友们到处玩，做游戏，或者随便瞎混。

我的学习成绩平平，老爸也不在意，不过他对我体育成绩倍感自豪。每次我有运动会或比赛，他和老妈都会来看。他们也没有做出让我感到不好意思的行为，他们坐在边上，一言不发。

虽然我们都喜欢运动，但我们还是有太多的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对摔跤的态度。我上高中的时候，被选为橄榄球联盟全能明星。我爸妈都想来看颁奖仪式，但我骗他们说只有运动员和教练能来。为什么我不想让他们去呢，唯一的借口就是，我都十八了，还跟家长一起出去会让我很不好意思。但是，后来我心里感觉非常不好，终于在一次吃

晚饭的时候跟他们说了，问他们要不要来。老爸坚决不去。不知这是不是他对我撒谎的惩罚，还是他就是这么犟。我妈对他很恼火，后来她一个人出席了颁奖仪式。

我跟老爸分歧巨大，这一点在餐桌上表现得最明显。每天晚上我们全家都一起吃饭。我们都有固定的位子，还有不成文的固定职责。老爸坐在主位，老妈坐在他左边，我坐在老妈左边，三个姐姐坐在我对面。偶尔我们也讲讲笑话，但说真的，吃饭的时候最好别离我老爸太近。如果你的肘部放上了桌面，如果你做了哪些不可饶恕的动作，比如说，嚼东西的时候没闭上嘴巴，或者你还戴着帽子，或者你没穿鞋，老爸反手一巴掌就打过来了。通常肘部会被拨下桌面，但我们还是小孩子，惊吓才是真正的伤害。直到如今，我在餐桌上还是很不自在，我得把账全算在老爸身上。

我是老幺，又是独子，几个姐姐常常要过问我交朋友的事情。如果老姐们听肯尼邦克的小道消息说我交上了一个女朋友或者我在学校干了些什么事情，那么她们都想从我这里打探个究竟。她们简直就是对我口诛笔伐，我也每每奋起反击。不过，我在餐桌上极少讲话。上高中的时候，我被评为班上的饶舌大王。老姐们听我朋友这么说，都大跌眼镜。她们觉得那绝不可能——她们觉得我根本都不会讲话。我总觉得，我告诉她们越少，她们能拿来攻击我的“武器”就越少。我每次都飞速“扫荡”完盘里的东西，然后找个借口走开。我只想离开饭桌，回我屋里待着。即使是现在，如果我吃完了饭，我都觉得很不自在，必须得站起来，到外面抽个烟，或者到酒吧喝点东西。因为我是客户，所以这样做没关系。

在外人看来，肯尼邦克的达夫一家，那几乎就是完美家庭的代言人——看上去真的如此。我们还帮扬基兰露营地拍过全家福广告。我妈至今还保留着那张广告小册子，封面是我们一家六口：英俊美丽的父

母，四个头发黄黄、鼻子完美无瑕的孩子。我都不记得小时候在家里听到过“我爱你”这样的话。爸妈从没对三个姐姐说过，三个姐姐之间也没说过，我也没听过爸妈之间这样说过，爸妈也从没对我这么说过。不过，除了偶尔在餐桌上被老爸打一个巴掌，我们没有其他的争执和恶劣行为。一家有三个女儿，个个班上学习第一，有礼貌，体育又好；还有一个儿子，有创造力，体育也好，虽然偶尔耍耍小孩脾气，但会尊敬家长，这样的家庭还会出什么问题？婚姻维持了40多年，还会出什么问题？生活在一个干净整洁的屋子里，院子也维护得整整齐齐，还会出什么问题？会有什么问题？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曾有一度，我觉得我和老爸之间的关系极差，那几乎是我们双方都永远无法胜利的战斗。我们好像是互相往对方阵地发射导弹，喜欢造成直接的致命打击。如果老爸要惩罚我，我就躲在老妈身后，给他来个微笑的鬼脸。他也给我来个鬼脸。他的鬼脸给我透露的信息是，他有的是时间，总有一天，老妈不会站在我们之间的。我慢慢长大，我们之间的战斗变得比较文明——有礼貌的争斗，绅士般的决斗，因各种原因而起的争斗。这样的争斗没什么危险，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我们的关系也就保持着这样的状况。

在电梯里，我看着他，我想要把他的一切都抛在脑后：他的小城意识和价值观、简单枯燥的生活、堆砌整齐的木柴。我从没见过做事像他这样认真的人。我要上预科、上大学，他也不把房子重新抵押帮我贷款。三个姐姐都要接受教育，他也只顾养家而不顾教育费用，教育的事他都没做。我家的房子是他扩建的——从打地基到安装好最后一片门板，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他还教我如何使用工具，但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会用杠杆又如何，我完全看不出那有什么出息。但可能是由于潜移默化的原因吧，他教的一些东西我竟然记住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克里斯·阿瑞纳、杰米还有杰森一起出去，车胎爆了，只有我一个人懂得如何换

车胎。老爸非让我先学换车胎，然后再学开车。他想让我对人生有充分的准备。他教我要有礼貌、要忠心耿耿、要做好事。但是，今晚，眼下，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只看到在翠贝卡这个住宅区，在这月租 9 300 块钱的公寓里，有一个人不懂得如何按电梯按钮。

2003 年 10 月

三十四岁生日派对之后的那天早上，我独自一人上了屋顶。我不知道当时是几点，如果让我猜的话，可能是 5 点。太阳正准备升起，云彩的边缘变得紫红。我还穿着我的无袖 FLANNEL，但我的墨镜已经找不着了。我还穿着卡其短裤，颤抖的手上还留着运河酒吧的红色入场印。眼下，我的血液里有那么多的可卡因，要睡觉是不可能的了。在酒吧狂欢之后，大概有 50 个人来到我家，继续放纵。我拿了个工业用垃圾袋，开始把被子、瓶子、烟蒂还有其他什么鸟东西一一扔进去。

才干了几分钟，我就把垃圾袋给撂下了，我得让这股劲儿缓一缓。我装上一筒大麻，在屋顶阳台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看着这一片狼藉，这地方看上去像莫特里克旭酒店的房间。我想，我根本不用担心我会变成像我老爸那样的人。我老爸三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是美国氰胺公司化工工程师。他已经有四个孩子，在俄亥俄州佩斯维尔的一个小房子里住着，艰难地付着房贷。我努力把爸爸那种勤劳工作的形象给推开，取而代之的是我的生日派对，脑中浮现的画面不按先后顺序：崔奇唱着他的那首《OPP》；龙舌兰鸡尾酒；像发薄荷糖一样发摇头丸；无数次到厕所去吸可卡因。大麻渐渐开始生效，缓解了可卡因对我的冲击。在我耳朵

的深处，平克·弗洛伊德的歌声开始响起。我用食指把几乎齐肩的头发往后梳理，把它们按在脖子上。我闭上眼睛，往后仰着。初升的旭日温暖着我的脸庞。我真想就这么待着，直到永远。我麻木了，麻木得舒服极了。突然有个问题跑进我的脑海：为什么我感觉如此空虚？此时此刻我不应该感觉如此悲伤才对啊！我刚搞了个生日派对，大家都玩得很尽兴，我该高兴才对啊。但是，我感觉形骸放浪，好像我在看电影中的自己。影片中的那个演员好像很高兴。但，我是谁？

24

几个月了，股市一直长驱直上，就像我在高利安的那段日子又卷土重来了。我也迫不及待地等着发奖金的日子到来——我的百万奖金——因为我需要钱。20万年薪，几乎都不够花。我租着这三层楼的公寓；在巴尼斯有个人导售员；每年度假几次——最近的一次是跟兰迪和他们“白宫”的几个朋友去了墨西哥的坎昆；还有，夏天的时候，我花了15 000块——那是分摊汉普顿斯度假屋的费用。

我并不担心我会把钱用光。我知道，如果我的奖金没有一根“棒子”——华尔街说的一百万——也至少该有七八十万。我想着，今后20年我也可以赚这个数，也许更多。我牢记那个好像叫拉里的人的建议，“收入第一”。这种赚钱方法最棒的部分就是它能带给我的自由。我买东西根本不看价钱。我想要什么，我就拿下；我想去哪里，我就出发。我不欠任何人钱。

从大的方面说，我之所以获得了这样的自由，是因为我走了与华尔街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逆向的道路。华尔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想赚大钱，那么你就得准备好跟别人结下梁子。如果盖瑞·罗森巴赫有家族徽章的话，这句话肯定刻在上面。他也真正赚到了大钱。2003年，全世界交易员的前100名，他们的年收入总和是60亿，平均每人赚2 500万。盖瑞是其中之一。但是，华尔街恨他的人，也可以轻易地装满整个湾流G6型私人飞机。我搞不懂他怎么活得下去。如果有人恨我，我都不

知道要如何是好。我的为人处世之道是让人喜欢我，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信条。

在华尔街的大多数职业里，有很多规矩，也有很多人不守规矩。贪婪和权力也许是让人不守规矩的最大动力。但是，让人放低标准的原因是各不相同、微妙无比的：老婆想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孩子要上大学；跟实习的女孩儿搞上了——这都是需要赚更多钱的原因，这都使你之前所认定的不可破坏的规矩变得脆弱无比。这我都了解，但我也很明白，不管我的事业会如何，我绝不会让大家都恨我——在那之前我就会辞职的。

但是，有一天早上，摩根公司的电话指示灯亮了。我的销售交易员告诉我，有一家搞保健信息服务的技术公司要搞一个“股票重发”，这就像是已经上市的公司再来一个首发股。公司叫“全码保健解决方案”，股票代码是MDRX。在阿格斯，我们要买什么股票，已经有了一张关注清单，我们等这只股票出现好价格已经好久了。摩根公司的人告诉我，他们要按昨晚收盘价提供优惠价格，卖出200万股。“完美！”我立刻告诉克里森。“全部吃进。”他说。

但我们不可能全部吃进那200万股，摩根公司有好多客户需要照顾。可是我们已经开口说要通吃，他们也就知道了我们有多么迫切想要买到这只股票。因为我们跟他们的交易量非常大，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拿个好价钱。我又给摩根那个人打过去。

要获得这些配股是得花一些时间，但一定会在开盘前就敲定。我信心满满，觉得已经能买到我们要的，至少是10万股，交易价格是17块。一开盘，MDRX的股价立刻涨到19块。我开始数钱了。只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摩根的人还是没给我打电话。于是我给他又打过去，但他没接电话。我又打，一个不认识的人接了电话，让我等着。我猛地挂了电话。克里森走过来看看出了什么事。我说我们还没拿到我们要的配额。

我不是那种轻易生气的人，我也很少大声嚷嚷。我刚进摩根士丹利没几个月，塔克舅舅曾经带我出去吃过一次饭。他问我干得怎样，我说起有两个交易员整天叫骂不停。“特尼，在这一行，很多人整天叫骂不停。”他说，“虽然他们整天叫骂，但没人听他们的。”但是，塔克舅舅说：“如果你是那种不叫骂的，你一旦叫骂起来，别人都会听。”当摩根的那个人来接电话的时候，我说要我那个份额。我没有叫喊，但我的声音很严厉。

“现在就要。”我说。他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搞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理由，说什么要的人太多，好像他是照着《如何让客户发怒手册》在念东西。这个时候我发飙了。“你他妈给我那些份额！”我嚷了起来。我又猛地挂了电话。十分钟之后，那人打了过来，说了实话。

“不好意思，特尼，”他说，“你们被搞了。”

我一听，不知如何反应。我从没有被搞过，在高利安没有，在阿格斯也没有。即使买那些非保健类股票时也没有过，而MDRX还是个保健股票。这完全是不按牌理出牌。我的不解很快就被疑问所代替。“这是谁的决定？”我问摩根的那小子。他说他发誓真的不知道。

“我会去了解一下。”他说，他的声音很尖。

“给我搞清楚。”我说，又挂上了电话。

我怒火攻心。我给可能知道内情的人一一打了电话，但是他们的回答都一样。接着我打给“保健黑手党”的那些人。他们都拿到了配额。但他们不说拿到了多少，所以我就没问。如果我真要问，他们会说的。但是，有不成文的规定，这个东西不可说。如果卖方知道我们四下通气各自拿到多少配额，他们一定得发飙。不过，在这个时候，我才不管卖方发不发飙。不过，我询问的保健对冲基金都比我在的阿格斯公司小。通常，他们的配额能够反映一个东西——我们应该比他们拿到的配额更多。我又打到摩根去找我的交易员。这次，他又多了解了一些情况。

他说，不知什么原因，这次的配股是银行的交易部直接操控的——这种情况以前几乎没有出现过。我问谁负责银行交易部。听他一说，我觉得我脖子上的青筋在渐渐暴起。这人我认得。他去高利安面试的时候，我在那儿。他非常想要那份工作，但他没拿到。但我知道他也一直没有放弃。我也了解到他一直在给我的老对手献媚。

自从盖瑞想拦住我，不让我来阿格斯，我就和他没联系了。不过，我并没有把他完全给忘了。他就在电话线的那头，像个秃鹫在远远地盘旋。我知道，他还惦记着我。我听说了，他一直在散布对我有利的消息，说我是“美国的过客”，是“华尔街的臭屁名流”。我还相信，应该说坚信，如果他有机会把我给灭了，他一定会这么干。

我打电话到摩根的交易桌，找到了罗森巴赫的朋友。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生气。他说那是他公司的决定，股票卖给谁不是卖啊。“放松，特尼，”他说，“来个深呼吸。”

我照原话跟他重复着：“放松？来个深呼吸？”我觉得我的脸都烧了起来。我的手紧紧抓着听筒，指关节都变得惨白。“叫你老板来听电话。”我说，我使出我吃奶的劲，一字一字地说。想到他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我就无法忍受。“大家都不在。”他说。

“那咱们走着瞧。”我说。

我打给研究销售员，找到摩根分管证券处的头头。我对他的姓氏有那么一丁点儿印象。此人曾是厉害的赚钱机器，但现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当主管经理，华尔街众多误用人才的案例之一。他们尽干这样的事情，把最厉害的赚钱机器转去当经理。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跟他解释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但没有提高我的嗓门。我说完之后，接着以非常平静收敛的方式告诉他，如果他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可要把“线”给扯了。

知道吗，如果你对你的交易员说你要把“线”扯了，问题就很严重

了。那条“线”指的就是跟他们进行交易的电话线。这样的威胁，大家都得谨慎对待。你把某人的“线”扯了，就是把他给毙了。摩根的那个经理立刻表示万分的歉意，但对这个 MDRX 的配额交易，他无能为力。他们要卖的那两百万份股票已经到他们客户手里了。从早上到现在，股价已经涨了 3 块钱了。“我今后会给你补偿的，特尼，”他说，“我保证。”

“这可不行。”我说。在我挂电话之前，我补充说道：“我可不接受这样的结果。顺便告诉你一下，其他的对冲基金经理都告诉我你给他们配了多少了。”

公司之间配额的数据不公开，是有原因的。就像发奖金一样，你可能会激怒其他的交易员。如果我拿了 10 万股，而你只拿到 2 万股，你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了。你可能会去找交易员，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能会影响今后的交易。这同时也是我们交易员赖以生存的规定。在华尔街这个冷血、割喉的世界，竟然还有这样的君子协议存在，似乎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它却又真实存在。这样的规矩必须存在，这样才能让这里的生意不沦为寡头经济。破坏这样的规矩的人被叫作“破坏分子”。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有如此众多的投资由我管理，没有什么比背负这样的恶名更糟糕的事情了。

但是，每当你降低你的行为准则，你都会找出理由。我对自己说，我这么做，单纯是商业决定。摩根的那个经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去调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他看到那些配额的安排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会知道阿格斯给人搞了一把，他也很快就会知道其原因。现在，对我来说，这件事已经不是什么商业决定了。这是我要报复那个搞我的人，我认为是罗森巴赫和他的朋友搞的鬼。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交易桌前，突然收到即时短信，是一个还在高利安的朋友发来的。他问我是不是可以打他的手机。“兄弟，你怎么这样对我们啊？”他说。接着他告诉我，盖瑞把高利安的每个交易员都单独叫

到会议室，一一质问他们是不是把 MDRX 配额的事情告诉特尼·达夫了。“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恨你入骨，”他说，“他们说你一定说些什么了。”我倒是没有想过我的行为会对这些同行们有什么影响。我真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你说了？”我朋友问我。

那天晚上我上床要睡觉的时候，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我的那些老同事们如今怎么看我。我辗转难眠。我走到屋顶阳台，要去抽烟。已经过了午夜。我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根烟。我能理解为什么高利安的那些人会那么生气，他们担心自己在华尔街的声誉，但他们愤怒的主要理由是盖瑞让他们生不如死。也许我当时不该吓唬摩根的那个经理，那是下下策，我是一时生气才说出来的。那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有人开始恨我。我完全了解高利安的那些人的感受。我看着手里的烟产生的烟雾在黑暗的夜色中飞舞，消失。我曾心怀感激，因为我之前在高利安学到不少东西，获得不少机会。如今，这种心情荡然无存。我很庆幸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盖瑞现在还认为他可以对我指手画脚。说来也是，盖瑞还真的没有什么理由不这么认为。他就是在那种环境里泡着的，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就在那里如鱼得水。

在高利安的时候，我都变得麻木了。他们可以对我喊叫，多大声都可以，而我丝毫不受影响。我对他们的音量无动于衷，反倒使他们变本加厉。而且不只是我这样。打压所有人是高利安的企业文化。拉吉和盖瑞，这两个人丝毫不注意影响，他们有一天带着一个侏儒来办公室，跟大家介绍说公司聘请他来负责研究“小成交量”股票。

其他人的行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我离开高利安之后，有一回，塔瑟国际公司的人来我们公司，要做投资推介。拉吉说要出 5 000 块钱，问办公室里最吸引人的那个女的愿不愿意做靶子。一位员工指着塔瑟的标志时，那个女的双手紧抱着自己的双臂。飞镖射中她的时候，她的腿一摊，倒在地上。有传言那支飞镖射到她裤子上了。大家狂笑的声音已

经消失很久了，但那种伤害却久久无法消去。那群该死的浑蛋。

我还不清楚阿格斯因为 MDRX 的事情损失了多少，或者盖瑞·罗森巴赫和高利安公司赚了多少钱，可能几十万吧。没错，挺多钱的。不过，对于有数十亿元资金的对冲基金来说，这是毛毛雨。不过，问题不在这儿。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必须改变。我目前已经如日中天，正大步向前，怎么碰上这么件倒霉事。钱，我真不在乎。真的。我担心的只是那些还在高利安工作的朋友们认为我利用了他们，还有就是我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威胁。不过，我可不会让盖瑞这样的人给我穿小鞋。我要还击，对此，我心安理得。如果这次有什么人躺着中了枪，那就是战争的代价了。举棋不定比做错决定造成的伤害更多。从今往后，我将全力以赴。如果我想要当个成功的交易员，不能只靠交易股票。我必须下得了手，敢于用大棒子打死小海狮，占残疾人土的停车位，拆毁孤儿院来盖间脱衣舞俱乐部，等等。在华尔街，胆小的人只会被人踩在脚下。我已经厌倦了，再也不想看到“蹄子”了。

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走出住所，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在等着我。司机卡洛斯已经把车后座那里的冰箱塞满了科罗娜啤酒。车子沿着运河街直上，朝东区驶去。在第43街和第3大道的交界处，一身休闲打扮的兰迪在等着我。他跳上车，塞给我一包可卡因，我递了一瓶冰镇啤酒给他。我撕开口袋，把弄湿了的小手指戳入那些可卡因。我的小手指出来的时候看上去像个沾满白糖的意大利杏仁脆饼。我把小指头塞进鼻孔，开始猛吸起来。车驶入河东大道。路上车很多，都在动着。我继续往鼻子里塞白粉，用喝过的啤酒数来计算着路程。两瓶科罗娜啤酒下肚，我们可以看到扬基球场了。

领位员把我们带到球员休息棚上面的第一排。球场人山人海，几乎座无虚席，但我们坐的第一排没有人。我们刚坐下，就看到大卫·威尔斯第一次投球。我们叫了两杯扎啤，两个热狗，不过这两个热狗不是传统的那种。我们吸了那么多白粉，根本不可能再吃了。我把我的热狗塞在座位下面，看着球场的人群。千百个笑脸充满了球场，从球场上方垂下比赛的锦旗。

我们坐得离场地非常近，甚至可以听到球打在接球手套上的声音，可以看到威尔斯额头汗水闪烁的亮光。比分是1：0，扬基队的球迷开始坐不住了。他们总想赢得比赛。我从小支持的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但是我打心眼儿喜欢的是搬家到缅因州之后喜欢上的红狐狸队。我记得

有一次跟爸妈在7月份的时候去看了一场球赛，那时候我七八岁。去波士顿开车只要两小时，我们开着“绿色机器”（一辆房车）就去了。那次体验太棒了。看到那么多车，我兴奋不已；看到芬维球场，我整个人都惊呆了。绿色的球场看上去像是用霓虹灯装扮过的。我记得好像是路易斯·田德在投球。我们坐在跟球场一样的高度，在第三垒的后面，很后面。好像每张票花了老爸6块钱。今天，兰迪肯定花了好几千——他买下8个座位，只有我们两个人来看球。

“你今年肯定会拿到奖金的，对吧？”兰迪把嘴巴上的啤酒沫抹掉。我给他一个“那你以为呢”那样的眼神，跟电影里的东尼·苏普拉诺一样。“如果我不赚个75万，就要走人了。”他说。股市上扬，交易量也水涨船高。如果交易量大，卖方是真正赚到钱的人。“12月份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他说。兰迪向那个卖啤酒的招了招手，又叫了两瓶。“支票清了之后我就会做个决定。”在支票过账之前，没必要到处宣传说你要找新工作。1月份的时候，大家都是自由人。

威尔斯打得很吃力。不少队友都上垒了。投手好像是你可以在“西部红岩石”酒吧看到的那种人。我可能真的见过他。

“老兄，这太有意思了，”兰迪说，“上星期，我们开了个销售会。”他接过两瓶啤酒。“他们用你的账户做例子，在幻灯片上做讲解。”他说着，哈哈大笑。

“瞎说。”我说，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真的。他们说，你这样拓展账户的方法是对的，他们有你2001年、2002年和今年前三个季度的佣金增长数字。”他说。

“他们的幻灯片里有没有可卡因和酒瓶？”马林队打了一个双杀。投球结束。

“咱们去消耗两张票吧。”兰迪说。我们站了起来，走到厕所，进了后面的两个隔间。我把公寓钥匙插进那个袋子，快速挖出三坨白粉。扬

棒球场的厕所，我只给一个拉链的评级。我真讨厌在这里吸。进进出出人太多，没有隐私。我们在隔间里洗完了，朝出口走去。把门的人说出场之后不可以再进去。

“知道，知道。”我说。我们还有六张票，可以出去抽三次烟。我们出去之后，各自点上一根烟。抽完了，我们又续上一根。我们抽完烟，递给那个把门的两张新票。他应该去当送葬的，因为他的微笑里面没有任何感情。

刚走到我们的座位，我几乎就想要再抽一根烟。我抬头看着计分板。应该是第二场了，不，是第三场了。比分还是1：0，佛罗里达队有几名队员已经上垒了。“我说，你觉得可以帮我找份新工作吗？”兰迪说。

“老兄，15分钟就可以搞定。”我说。我拿出电话，做打电话状。他问我该去哪里，我说应该去雷曼或美林。“这些都是大公司，办公室政治不太厉害。”我说。

“你确定能把我搞进去？”他问。

“确定，”我说，“如果我把你跟皮特配上对，你们就是最佳组合了。”

今年夏天我刚认识皮特。我跟华尔街几位哥儿们在夏日度假屋度假。一天早上，我宿醉醒来，昨晚穿的短裤的口袋里有一张酒吧的纸巾，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还有一个名字“皮特——白色巨浪”。

我坐在前廊吃贝果面包，喝着佳得乐运动饮料，那些哥们儿告诉我皮特是这里“约翰·斯哥特沙滩”酒吧里的调酒师。渐渐地，昨晚狂欢的印象开始浮现、开始聚焦。电视剧《五人党》里面有个叫皮特·百利的人，所以我这么叫他。皮特已经玩疯了，他把20根香烟塞到嘴里，还点上火。他给我们完全买单。我太爱他了。

“但我怎么会有他的电话号码呢？”我问。

“你答应要帮他找份工作。”有人这么回答我。

皮特说他在一家叫骑士证券的公司里工作，搞行政的。那周的星期

一，我打电话去骑士证券的交易桌。“我是阿格斯公司的特尼·达夫，”我说，“我有十几个亿的管理资金，想跟你们开个案。”电话那边是我预期的沉默。如果有个乐透公司打电话到你家说你中了大奖，你什么反应？我刚才那么轻描淡写地这么一说，对他们公司来说意味着数十万的佣金。

“只有一个条件，”我对那个沉默的交易员说，“我要搞行政的皮特当我的专属交易员。没他就没戏。”皮特从此就从相对阴暗模糊的办公室走到前面的交易桌，进入华尔街明晃晃的金钱世界了。

“听着，”我对兰迪说，“我不想表现得不可一世，但你得知道：我可以把你推到任何地位。”可卡因渐渐把我吞噬。我开始想着兰迪和他的问题。我都不怎么了解他，说实话。在派对以外的场面我就没见过他。他除了来派对玩，交易些股票，还做些啥？兰迪察觉我看着他那种奇怪的眼神。

“咋了？”他说。

“你最喜欢什么颜色？”我问。

“蓝色。”他说。

“你什么时候失贞的？”

“十三岁。”他说。

“高中毕业舞会，你带谁去的？”

“特洛彭姐妹中的蒂娜·特洛彭。”他说。

“如果你此生只能再看一部电影，你会看哪部？”

“*Boogie Nights*。”他说道。我每天都跟兰迪讲话，但我真不了解他。关于喝酒、吸毒、女人，我们讲了无数的精彩故事，但我不了解他。他也没有真正地了解我。杰德开车载了个人进来，人群一阵欢呼。

“我想当记者。”我跟他说。兰迪看着我，好像我的眼睛流血了。

“真的假的？”他说。

“真的，”我说，“我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我还在哥腾作家培训班上

过剧本创作课呢。”

“那个有黄色架子的地方？”他说，“我就老想那地方是干啥的。”

“我有个大学朋友，在洛杉矶商业电视台搞广告。我们一起写了一个恐怖剧本，就叫‘恐怖星象图’。我们把剧本改来改去，用电子邮件传来传去。甚至连 MIRAMAX 电影公司的人都看到了，但也没有下文了。”

“厉害啊！”兰迪说。

我还说我在高利安的时候拍过一个短片。我把片名定为《我杀了艾米尼姆》，我朋友杰西·依兹勒还给片子写了首歌并亲自演唱了它。“真的？”他说。那个片子曾在加州独立电影节上播出，还曾在布朗克斯嘻哈音乐节上播出。还真算是部好片子。“怎么说呢，好厉害啊！”他说着，眼睛茫然无光，只有可卡因的痕迹。我开始后悔跟他讲我的写作、我的短片。我决定不要把我的梦想也告诉他。我的梦想，我跟谁也没有提过：我梦想着要上 GQ 或《名利场》杂志的封面。我拿着两个吊着木偶的绳子：一根上面系着华尔街，另一个上面系着好莱坞。我抬头看计分板，3：1，佛罗里达队领先。怎么会这样？

“觉得执行模式咋样？我知道如果不研究一下会挺难的，但是卡斯拿了 40% 的佣金。”他问我，好像我们一直谈的就是生意。

“大家都说这不行了，大家都需要拿出研究产品来证明他们应该拿的佣金，”我说，“说了好多年了，但都没有实施。如果你给我 300 万，让我带上几个人，你可以赚上一根棒子。”华尔街就喜欢玩弄文字。比方说，如果股票上涨一块，你可以说“涨了一个塔克”，塔克·贝尔有 9 毛 9 的东西可以吃。如果你今天交易损失了 12.5 万，你可以说，“该死，今天我毁了一辆法拉利。”

“我们再到隔间去吧。”兰迪说。我们往厕所走去。我们走出球场的时候，同一个看门的看着我们。这次他没说什么出去之后就不能进来之类的话。他只给我们投来葬礼服务人员的那种微笑。

我们回到座位上的时候，比分是3：2。我们出去的时候，有人打出了一个全垒打。可能是博尼·威廉斯吧，我想。我们听到了欢呼声。我们开始讨论我的奖金的事情。我跟兰迪说我搞明白了克里森奖励员工的方法。如果公司效益不佳，他多发奖金。如果效益好，他照正常份额奖励员工该得的奖金。什么叫“该得”，你懂的。这样他就能让员工死心塌地帮他干活。如果哪年效益不好，有人罩着你，你肯定会记得他；效益好，有钱赚，你也不会埋怨什么。马林队派出唐特雷尔·威利斯上场投球。我挺喜欢他的。他不胡来。

“你觉着你能拿多少？”他问，“你别介意我问这些啊。”

我亮出七根手指头。

已经是第八局的尾声了。扬基队2：3落后，但是他们还有很强的最后主力部队：威廉斯和松井两人连续出战。观众都站起来了。兰迪还有两张门票没用上呢。现在天已经黑了，又很冷，但是大家热情十足。

“咱们回‘白宫’吧，我有个惊喜要给你。”兰迪说。这不是肉包子打狗嘛。

“那咱走？”我说。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可能是再下一个，不，可能是再下一个星期四——我不记得了。星期四是华尔街的星期五。我准备要出去了。我要去跟花旗银行的人吃工作晚餐。我穿上我的牛仔衬衣，前面有个带蕾丝的领带。衬衣是海军蓝的，肩膀部分是白色，连接到V型花边领口。

我到巴斯蒂的时候，第9大道路口那里有很多人站着，抽着烟，聊着天。不知道的人 would 以为旧的“肉类包装区”不过是些“路桥和隧道”，但他们不知道，那里每周都有新俱乐部或餐馆开业。这里会不断给你提供能量。甚至这里的地心引力好像都比较强，你只想喝上两杯，却被一个快乐黑洞牢牢吸住，让你两天之后才能回到家。

我进去了。里面人山人海，我好不容易才挤到服务处。穿着白衬衣、白围裙、黑裤子的服务生在人群中穿梭滑行。几分钟之后，我看到罗波，花旗银行医药板块的交易员。他满脸笑容地朝我走来，张开双臂，给我一个华尔街式的拥抱：他一个肩膀向前倾，跟我身体接触，另一个手臂伸到我背部，用拳头敲打着我的背。我也做同样的动作。“这衬衫酷毙了！”他说。他说在等另外两个人，问我要不要先去坐下。这里的女服务生简直美若天仙。金黄色的短发，但有一缕黑发拉到一旁。她的皮肤完美无瑕，犹如一块埃及棉布。罗波说我们定了位子，想先坐下。她问是否只有两人。“还有人，”他回答，“我们还有两人。”她说人没到齐的话，她不能领我们先去坐下，她说着，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罗波说声谢谢，

把身子朝酒吧外转开。但我没动。

“你可能没搞清楚状况。”我说着，轻轻地碰了碰她的肘部。“我是买方的。”她看着我，等着我再解释一番。但我就那么站着，看着她。

“对不起，先生，”她说，“人没到齐，我不能领你们去坐下。”

“但我是买方的。”我说，口气非常清楚准确。

“对不起，先生。”她说着，还是尽量保持礼貌。她可能觉得我很狂妄，但我只是想跟她小闹一下。

另两个人来了，我们就立刻被领到桌前坐下了。晚饭嘛，规矩他们都懂的。如果我不提生意，他们谁都不会先说的。我尽量不想提，但是有时候水到渠成就控制不住了。我们点了餐，又叫了一轮鸡尾酒。酒才上来，我们又叫了一轮。我体内的化学物质开始蠢蠢欲动。我很想到厕所去吸上一条可卡因，但是我手头没有。服务生收盘子的时候，我站起来，说失陪，我要去抽根烟。

接下来我上了出租车，就这么走了。我也没说再见或谢谢。花旗银行的人就在桌子那里坐着，等我回来。我很讨厌这种感觉。我明天不得不跟他们交易至少几百万股的股票。

我走进“白宫”的大楼，门房跟我点头示意。我飞速掠过他身边，按下电梯的按钮。进到公寓，我看到兰迪的房门虚掩着，电视屏幕上正放着色情片，但屋里没人。我往右想进厕所，但是门锁着。我抓着把手转了一下，门突然开了，是维克多，也是买方的。他的眼睛睁得老大，嘴唇犹如橡胶，下巴看上去很僵。他跟我说“嗨”，但是他的牙齿磨得太厉害，发出的声音好像是在呻吟。他的鼻孔里满是可卡因结成的块。他箭一般飞奔冲进兰迪的房间，就是放色情片的房间，然后关上门。谢天谢地，我不住这儿。我还没走进厕所，就听到维克多锁门的声音。真为他老婆孩子伤心。

我回到客厅，看到几位我认识的人。鱼博士和他的两个同事坐一边，

数落着卖毒品的人。他们根本就没理睬我的到来。我又看到角落里有另外一个人，前后摇晃着，不停地跟自己讲话，好像这里有实况版的《行尸走肉》。我走到厨房，卡斯在那儿，但他吸了太多可卡因，那样子我看了都怕。他跟我说三个钟头之前他怎么跟一个妓女搞。他非常兴奋，很难听清他说些什么，因为他断断续续地讲着，嘴里不断喷出小泡泡。我可不想被他的唾沫给喷到。兰迪和詹姆士也在厨房。兰迪对我一笑，点点头，而詹姆士直直地盯着我。兰迪在一个盘子上倒了点可卡因，朝我推过来。

后来我又跳上出租车，朝上东区吉米兄弟那里冲过去。“白宫”里的那些可卡因抵消了龙舌兰的酒劲。我口袋里还有一张 20 块的纸币，里面是兰迪给我的白粉，很多。

皮特在吧台的一角，和几个纽约花园城市来的高中同学在喝百柏医生焰火饮料。我跟他们是在沙滩度假时认识的。这是他的告别派对，他星期一就要回芝加哥了。我喜欢叫他“白色巨浪”。自从我帮他在骑士证券搞了好职位，他一直干得不错。看到我，他咯咯地笑。他给我点了一杯“火焰”。我说了一声谢谢，转身进了厕所，来个快的，这里是两条拉链的评级。我回到酒吧，一口灌下那杯“火焰”，然后对皮特说我得打个电话。我回到街上，点燃一根香烟，在手机上拼命滑着通讯录。我点了拨号，等待着芭芭拉接电话。等了好久，她沙哑的声音传来。

“嘿，我是特尼。”我说。

“谁？”

“特尼！”我大声地说。

“厄尼？”

“不是，是特尼。”我说，“我能过来吗？”

“呃，可以啊。”她说，“知道我地址吗，厄尼？”

“知道。”

她开门的时候显得微微惊喜——好像她根本没有想到会是我。她眼睛下方是黑黑的眼圈。今天她的头发是一半金黄一半黑色。她看上去老了十岁。她的公寓比我记得的更加冷清。床垫还是扔在床上，圣诞灯饰依然挂在墙上。电视上有一道划痕，咖啡桌上放着无数芝士薯条的包装袋和啤酒罐。她从沙发上拉出一大堆杂志报纸，扔在一旁，让我坐下。我看到她手臂上有淤青，腿上有烧伤的疤，还有青筋。

她也坐在沙发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她探过来，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怎么了，”她说，“你要跟我干？”

我都不忍心看她。她的眼睛干枯无神。我问她要不要吸点可卡因，因为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说不用，谢了，她问我要不要喝啤酒，接着她说她要出去。“我去趟小卖店。”她说。“别了，我去。”我说，“我马上回来。”我说着，出了门，把门带上。

我飞快地跑到小卖店。我买了六瓶百威啤酒，跟她咖啡桌上的空罐子一样的那种。我回到她家门口，放下六瓶啤酒，还把两张百元钞票夹在两瓶酒之间，让她看得到。我敲了敲门，接着跑去按电梯的按钮。

已经过了午夜。走在大街上，我收到瑞士瑞信银行的一个叫约翰的人发来的短信。他跟一群人在“肉类包装区”那边一个叫“莲花”的地方。我跳上一辆出租车。到了那里，门口有二十几个人排着队想进去。我直接朝门口走去，体重超过300磅的看门人用他树干那么粗的手臂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不排队，”我说，“我鄙视排队。”那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接着拉开了那条隔离绳索。我看到约翰和几个人在吧台中央站着，于是我朝他们走去。约翰把头转向调酒师，给我点了一杯培恩牌龙舌兰加冰块，再加三片青柠檬。我注意到旁边还有一个女孩子，跟她的几个朋友在聊着。她看上去可爱极了。她身穿一件无袖黑色丝质衬衫，白色裤子。这是劳动节的打扮——我喜欢。约翰把酒递给我的时候，我捕捉到了那女孩的眼神。她娇小可爱，除了一缕搭在一边的头发，其他

都绑了起来。我很喜欢她微笑的样子。我径直朝她走去。

“你觉得我可爱吗？”我问。

“有点吧。”她咯咯一笑。

“我今年三十四，单身，住翠贝卡的独栋三层楼，年薪七位数，”我一口气说完，稍作等候。“现在可爱程度多少？”

“你很有意思。”她说。我都没有跟瑞士瑞信银行的人道别，抓起这个新朋友的手转身就走。

凌晨四点十五分。我在浴室，赤身裸体。我把用过的安全套扔进厕所，转头看着镜子。我的头发全部竖立，我的脸一片通红。我脑海里有两个念头：我如何把这个女孩子哄下床？我今天要怎么请假？

卧室里，她醒了，光着身子坐在床的边沿，抽着一根烟，看上去好像她是在摆一个姿势。她那件黑色无袖丝质衬衫和白裤子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边的红绒沙发上。我挤出一个微笑，从地上抓起我的裤子，跑回浴室。她一言未发。

我在放牙刷和牙膏的地方，倒出毒品，归整成一条粗粗的线条。我从牛仔裤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钱，卷了起来，开始吸。我又看到镜子里的自己，但我立刻转过头去。我在牙刷上倒了一点儿可卡因，然后在牙龈上猛刷。我强迫自己看着镜子里面的我，做了几个深呼吸。

我回到床边，钻进被窝。“几点了？”我问。我们两人都看着同一个钟。“快四点半了。”她说。我惊惶地从床上跳起来。“该死，今天我得做欧洲交易！”我说。偶尔我会做些欧洲交易，但不是今天。我从地上抓起我的衣服和东西，我告诉她我得去洗个澡，然后准备上班，我会帮她叫一辆出租车。我再次逃进浴室。

我洗完澡，腰间也没有围着浴巾，我看得到她还在床上，裸着。她不想走。我冲进落地衣橱，心里继续打算着。我穿上一件蓝色的衬衫，黑色的普拉达西装。我怎么可能去上班，但是这样的装模作样是我唯一

可以想到的可能让她走人的方法。我穿上袜子和鞋子，又走进浴室。她还是一动不动。“我五分钟之后就得走。”我说得很坚定。终于，她下了床，开始穿衣服。我把我湿漉漉的头发往后梳理着。

我们走在莱特街上，她握着我的手。我打算给她叫辆出租车，然后就回公寓，但她问我：“那，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我反问她。但她等我先回答。我们只好一起上了出租车。该死！

她继续握着我的手，我们保持沉默。到了她家的那栋大楼，她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说昨晚谢谢了。“我再给你打电话。”我说，但是我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她有告诉我吗？她给我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在手机里打着“莲花酒吧小姐”。“莲花酒吧小姐，对吧，我是特尼啊。”

我让出租车往回走，回到我们上车的地方。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爱看就看吧。我看着窗外。在我的公寓里，伊森和杰森都还在睡觉，所以我蹑手蹑脚地走回我的房间，锁上门。门锁好了，安全了，我又掏出可卡因，在电脑鼠标旁边又来了一条。我动了动鼠标，电脑屏幕亮了，上面显示着将近6点。我脱得只剩四角短裤，点上一根烟，把窗子推开一条缝。

我全身颤抖起来。我还需要多喝点酒。我溜进厨房，看冰箱里有啥可以喝的。我找出一瓶红酒、三瓶啤酒，夹在左胳膊下面，往楼上走。我得让毒品的药效缓下来。我又看了看钟，已经过了6点。这是我的唯一机会。美琳达可能已经上班了，但是办公室里应该只有她一人。如果我现在打电话请病假，只需要跟她一个人解释，她也不会问东问西的。我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练习着要怎么跟她讲。终于，我按下呼叫的键。美琳达听说我病了，深表同情，那口气跟我妈妈不相信我的时候一样。我挂上电话，我又在桌上嗑了一条可卡因，接着打开房间里的电视。我租了一个黄片，坐在书桌的椅子上，把声音调低。我不想让伊森和杰森知道我在家。我又吸了一点，喝了一点，然后睡觉了。今年我不再搞派对了。

那年余下的时间里，我还真的没有搞派对了。我在翠贝卡的独栋三层楼房里，独自一人度过了圣诞节。三个姐姐都约我跟她们一起过圣诞节假期，她们各自有老公和孩子，我总共有八个外甥和外甥女，但我根本不想出门（肯定不会去巴黎）。我父母去克利夫兰了，跟凯莉姐姐一起，所以，我是不能回缅因州了。我不反对过圣诞节，我也不反对任何事情。我可喜欢圣诞节了，但我也不在意自己一个人独处。不管如何，美琳达和李察这半年来一直罩着我，我跟他们说圣诞节你们就放假吧。

下午四点。我坐在沙发上，满身是汗。我把圣诞树插上电，往火炉里扔了一块木柴，打开电视机。圣诞树下，有八份包好的礼物是要给我的——大多数是卖方送的。我点燃一根烟，开始拆礼物。有几瓶酒，有名贵的法国酒，也有加州解百纳。还有一个 Tivo 工具箱——很酷。有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汤普森酒店一晚的住宿券。一箱唐佩里农和一箱培恩。最后拆的那个礼物是我妈送的。她每年都送我同样的东西：自制日历——有各家的照片，家族所有人的生日和纪念日都标好了，怕我忘记。

我决定要开一瓶酒。我从厨房找来一个开瓶器，在沙发上坐下，卷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壁炉里，木柴噼里啪啦地烧着；圣诞树在一闪一闪地亮着。透过客厅的玻璃，我看到窗外圣诞夜的夜色开始降临。下点雪多好啊。

第二天是星期五，股市还开。我六点半就到办公室了，独自一人。

真好，真安静——这是全年最安逸最缓慢的一天。我想起刚去高利安时候的情景：我每天最怕的就是这个时间。但现在我的感觉是多么的不同，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又抓又挠的感觉，好像我即将被发现的感觉。念头一转，我开始想我的奖金。对，我的奖金，没错，奖金会给我充实的感觉。

奖金算法很简单：全年的利润扣除开支，纯利的 20% 拿来分。我还可以多拿一份管理费——这是我跟克里森讲好的。我从 10 月份就开始计算奖金了，我心里明白我即将达到我的目标。11 月过了，12 月也要过了。当然，我心里也清楚，随时可能出个状况，把情况搞砸。2002 年的时候，阿格斯对特网连锁医院投资甚多。那年 11 月，联邦调查局突然检查了一个医院，说有医疗保险骗保，还有不必要的手术等。两天我们就损失了三四千万元。整年的业绩功亏一篑。但那是去年，今年不同了。我也不同了。

接下来的周一和周二也没什么大动静。周三虽然也开市，但是那是新年前一天，所以也没什么大动静。对我来说，这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这是一年中唯一一天没有盈利和损失会跟你的表现挂钩。一年当中其他日子，每天都需要有卖出来体现盈利和损失。今天所做的事情，会直接影响我的奖金。

有一个东西叫“剥削股票”，它是一种操纵股票价格的方法。我今天就想干这个。今天我能“剥削”的股票越多，今年我的业绩就越高。

我先找出流通量不大的 10 只满仓的股票。流通量不大是说这家公司的股票交易量每天不会超过几十万股。要操纵这种股票的价格比操纵那些每天交易几百万股的股票容易多了。我找出的股票名字，如 CYBX，这家神经肌肉产品公司设计、开发植入式医疗器材并进行商品化；他们的产品能提供迷走神经刺激，用于治疗癫痫病人以及治疗忧郁症等。这是啥意思？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只股票符合我的要求。找好所有的股票之后，我等待今年的股市快要收盘了才出手。

下午3点，我接到经纪人翠西的电话，她的那家公司不怎么做研究，但总是雷声搞得很大，而且出手很重——她招待过我几次。我跟这些经纪人每天都交流，跟翠西也是如此。她在这个时间点打来电话，是因为去年的今天我在这个时候通过她玩过这一套，所以她一上来就问我，今年还用她不。对她来讲，这也是一个创收的好机会，数百万股票的交易，而且没有风险。她解释说她为什么这么早就需要这样的订单，她说她要做好准备。所谓的操纵股票，真正的原因是大银行，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得有翠西工作的这类公司来快速又不留痕迹地去做。“我再打过去给你。”我说。我挂了电话。

我确实得让翠西来做。她很有胆量。去年我用她来做的时候，我知道她把我的单子派给另一个客户去做了，这样他们才能预先帮我交易。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还没给她下单之前，就看到股价开始上涨了。后来当我要操纵价格的时候，她的客户再把那些股票卖给我。今年此时她打来电话，想要再干一回。但我今非昔比了。

我还希望人人都能喜欢我。但如果你要跟我要花样，我会把你整得很惨。或许是因为上次罗森巴赫在MDRX股票上让我吃了亏，又或许只是因为我在对冲基金太久了，这是自然的过程。不管怎样，翠西刚才是犯了一个大错。

3点半。我打过去给她，跟她解释今年对我很重要，我真的需要她表现出色。接着我给她下单，并且明白无误地告诉她，3:55之前不要交易。“一秒也不能提前。”我说。

“我懂。”她说。

我选了10家公司，每家公司的股票我卖空100万股。我又跟她过了一遍那10只股票的代码。如果在5分钟内卖空100万股CYBX的股票，通常能把股价拉低5块，可能更低。

我把10只股票都调出来，显示在电脑屏幕上，方便我观察。大约在

3:40 的时候，这些股票都降了，降到红色，跌破当天的开盘价。我可以肯定翠西又把我的单子派出去了。我打过去给她。“记住，”我说，“3:55之前不可以卖空我的单子。”“那当然。”她说，似乎我打电话提醒她是侮辱了她。3:51，股票还在继续跌。3:52，又跌了30美分。3:53，开始不再跌了；3:54，我要施展身手了。所有那些在我前面买进的人都停手了，他们都等着我进场来买进。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轻松赚点钱。这个时候，我抓起电话。“知道，知道，”翠西说，“我现在已做好准备，要把所有股票卖空。”

“呃，”我说，“取消我所有单子。”对方的沉默，那是真金啊。

“啥？”她最后能说话了。

“取消我所有单子。”我说。我两次告诉她不要在3:55之前交易，而现在只是3:55，所以她不应该已经交易了。

我挂了电话，立刻给卡斯打电话，下了我真正的单子：我要买空，不是卖空。到3:56，股票开始涨了。3:57，股票几乎涨回开盘价。3:58，股价反超了，卡斯和翠西的客户买都买不过来，在收盘的时候，我比他们高了几块钱。卡斯打电话过来报告成绩，他说每只股票他只能买到几十万股，他说他很不爽。我说他干得好极了。阿格斯就这么赚了几百万。

过了几分钟，我打电话给翠西，跟她说不好意思，这么迟才取消那个单子。我说，我们也是最后一分钟才决定不要卖空那些股票的。“没关系的。”她挤出这句话，但是她听上去已经气得不行了。她把我的订单泄露给的那些人，肯定要对她咬牙切齿了。他们一定被整垮了。他们肯定是根据我放出的烟雾弹订单而付高价卖空了。股票交易第一原则：买低卖高。傻了吧。一年的最后几分钟损失掉几百万美元，这样的状况再惨不过了。我对翠西说新年快乐，但是她已经把电话挂了。我知道，新年里，我肯定会快乐的。

28

华尔街	支票号码：055728 12/31/2003 TOTAL COMP	32-61 1110
支票受益人： 特尼·达夫		金额 1 864 999美元
壹佰捌拾陆万肆仟玖佰玖拾玖圆		
055728	111000614	925978728

29

八个月之后，纽约城奇热无比，砖墙、水泥地，到处散发着热气。拉开出租车的门就像拉开一个烤箱的门。我对面停着一辆微软公司的卡车。那辆车是卖冰激凌的，不是买软件或是 Xbox 游戏机的。街上路面的热气就在车前面蒸腾，看上去像海市蜃楼。纽约的 8 月，可能会热死人的。

我正好有约，约会地点附近的拐角处有一家咖啡店，落地玻璃巨大无比。我在玻璃前看着我的穿着是不是得体。我穿着黑色阿玛尼运动外套和裤子。参加住房管理委员会的董事会会议还需要有领带，但我没有戴。我就要刺激。我钻进那家咖啡店，打发一点时间。时间还挺早的，所以我点了一杯冰咖啡，坐在吧台上喝着。这家店不大。我想象着我周六或周日上午来这里喝咖啡，进来的时候店员都跟我说：“你好，特尼。”我喝了半杯咖啡，然后掏出手机看时间。离会议开始还有五分钟。我在吧台上放了五块钱，开始往外走。

走到外面，冒着酷热，我按下快拨键打电话给我的新女朋友简，等着她接电话。“嗨，我这就进去。”我说。

“你没问题的。”她的口气充满正能量，那是她在充满打击的职业中磨炼出来的生存本能。“他们都会爱死你的。”这么说之前的那个停顿真让我感觉不舒服。简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已经在一起七个多月了，我们近两个月开始用“爱”这个字眼打情骂俏。我跟她开玩笑，说我第

一次用这个字会是通过短信。她觉得这话不好笑。我也不让她的态度左右我的行为。我跟她道再见，然后再挂上电话。我走到约见的那栋大楼，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三下。我听到里面有一阵小小的骚动，但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听到我的敲门声，于是我等着。

我跟简是相亲认识的。我表弟伊森跟她的朋友的朋友——简的同事——认识。简是歌手，安瑞克·依格西亚斯巡回演出时，她跟着当后补替身。因为她太受人嫉妒，巡演时被炒了鱿鱼。依格西亚斯当时还在跟网球女星安娜·柯妮科娃交往，现在也许还在交往吧。根据简的说法，柯妮科娃觉得依格西亚斯的女替身抢了她的风头。简还说柯妮科娃甚至在台下朝她扔水果糖。简太美了，据我所知，她至少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起因，可能还有更多。你看她一眼就会忘记自己还在开车了。

在那个办公室门外，我敲门的声音加重了一些。这次他们肯定听到了。几秒钟之后，门开了，一位头发花白但梳得整整齐齐、有绅士风度的老年人打开了门。他淡淡地笑着说欢迎。那办公室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是个疏于整理的办公室和维修室的合并版。桌上一堆堆的纸张，好几个档案柜，还有一些工具，一些坏的家具。这栋大楼，布里克 27 号，是 1910 年建的，当时是一个织布厂。80 年代的时候，几个租户合资把它给买了下来。七层楼的房子，带这间办公室，街面这一层是艺术画廊。你看了都想笑。这是栋所谓的“艺术建筑”，但是公寓每套好几百万。不难猜测，住这里的人很少是靠在华盛顿公园画肖像为生的。每层楼都有两套公寓，A 户型有 1 100 平方英尺，B 户型靠北，大约是 2 200 平方英尺。我要 5B 户型。卖家要价是 180 万，我们以 175 万成交。

我跟简相亲的那个晚上，我安排在布莱德餐厅见面，那地方小巧可爱，在斯布林街上。我穿着一件一扣到底的衬衫，没有塞进牛仔裤里，还穿着人字拖，长长的头发乱糟糟的。她飘然走进：长长的头发，浅黄而茂密，发光的眼睛，厚厚的嘴唇。她穿的裙子，几乎就是一件晚礼服。

我的心在怦怦跳，就像初次跟女孩讲话的懵懂少年。餐馆人太多，太热。我问她愿不愿意换个地方，到附近一家餐厅去。她立刻答应，于是我们挤出门外。拿不定主意去哪里吃饭，那就去“墨西哥电台”。那里东西好吃，玛格丽塔鸡尾酒更棒。我们各自喝了五六杯，但第一杯没喝完，我就对她完全倾心。关于那晚的事情，我们有不同版本的记忆。她说是我把她推进出租车，然后自己跑回酒吧去喝酒。但我记得的版本是，我告诉我自己，如果我此时要跟她缠绵，我可能会把最好的机会给毁了。我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让她上了出租车，然后说我明天给她打电话。标准好男人。接下来，我走向酒吧，然后再彻彻底底地醉了一把。第二天上午，我的确给她打了电话——之后每天都打。

那个董事会有六个中年男女，坐在桌子两侧，我面对他们坐着。我脱下运动外衣，披在椅背上。我把衬衫袖口的扣子解开，把袖子给挽了起来。我想坐得舒服点儿，既不太正式也不太随便。我想展示我的职业操守，表现得成熟而又放松、平易近人。我想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想借一点油盐酱醋什么的，可以来找我。想到这里我都想笑了。在莱特街，要借一包毒品可能更容易借到。

我想我是在跟简第三次约会的时候向她告白的。她有点担心了，因为我对她还没有什么行动。我感觉自己做得挺酷的。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只是想攻陷她的内裤而已，因为她不只是另一个短裙小妞而已。她也一直蒙在鼓里，不知道我的下一步会是什么。她甚至打电话给她的前男友之一（现在已经成了同性恋），问他要怎么办。“我们之间很合得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的同性恋前男友的建议是直接来问我——她还真的问了。我特意把简从餐馆里拉出来，上了出租车，去了她的公寓。

我的申请书放在每位董事会董事的面前。有几个人戴上眼镜。那个把白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人身边坐着最胖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穿的那件黑色重金属T恤衫在肚皮那里已经绷到了极限。“那么，”这个最胖的人

开口了，“多汁烤肉汉堡是什么？”在我的申请书上，“其他投资”项目下，我写下的是最近我砸了几百万元买进的快餐连锁店。那是西海岸的一个快餐连锁品牌，我们要在东海岸推广。

“简餐。”我说着，轻描淡写。上星期在泽西城的开张仪式风光极了。“今后还会开很多家分店。”我说着，尽量装生意人的口吻。我注意到，每个字他都听得很认真。

“这么说，如果我批准你入住，我们就有汉堡包吃喽？”

“那当然。”我的微笑是那么的轻松。但他没有笑，看上去他像是要把我的申请书给吃下去。

那位老先生想跟我谈谈薪水的事情：“你在阿格斯公司？”他说，口气里一半是怀疑，一半是装腔作势。我说底薪是20万，但是我还按比例拿公司的管理费。我把跷着的腿放下，又跷了回去。数字我就不用了，申请书上写着呐。我知道他看到了。虽然他尽量想掩饰，但我看得出来，钱数不是问题。

我第一次跟简做爱之后，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和我与前任女友的不同。我以前从未对别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上班的时候都会想着她，下班也想。如果我去“白宫”，我会想她在干什么。朋友们也都察觉了。兰迪和卡斯问我怎么了，他们都开始担心了，因为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太多。有固定的女朋友倒也还好，但如果我结婚了，搬到维斯切斯特怎么办？那他们会怎么办？他们要取悦谁呢？

董事会最年轻的一个人是个女的，看上去她还期待今年依旧是1976年。她不是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女人，但她绝对拥有自由的灵魂。此时她在对我微笑。我注意到他们是轮流在问问题。“跟我说说，特尼，”她说，好像现在是电视上的择友节目。“业余时间你喜欢干些什么？”我现在该夸夸其谈我的酗酒、吸毒、性事还有色情录像？那可是过去的我了，现在的新我可是有固定女朋友的。

“我跟女朋友出去吃饭，我看书、运动。”我说。

“哦，我也很喜欢看电影。我特喜欢看电影。”她看着我，好像在期待我约她一起去看一场。

简担心她的出现会让我和朋友之间的交情受到影响。“他们没事的。”我跟她保证。我跟杰森一起住了快十年了——几乎从我在华尔街工作开始就住一起了。伊森更不用说，自家人。再者说了，我又没有要把他们踢出去。他们也都有女朋友，也各自有安排。“我就是不想他们嫌我。”简说。其实，有点不高兴的人是我。虽然他们没有要求，但我在他们身上和这个公寓上花了好多钱，而他们也从没表示过感激。这是我自找的，是我跟他们说不要担心钱的事情。“一切没问题。”我告诉简。我和她在一起之后，一切也真的没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批准你的申请呢？”董事会主席问话了。这问题问得好。我稍微顿了一下，我在思考着我的答案。十年前，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我是第三个来住的。而现在，我要买下这个 175 万元的公寓。照这个发展速度，五年之后，我可以买下整栋大楼。我朝这些董事会成员——看过去。也许我应该表现得有点紧张，但是我没有。每天的工作晨会比这难熬多了。但在这里，我最不能表现出来的就是我的傲慢。因为，我非常想要这套公寓，为了简，我想要这套公寓。

“购买的程序我了解，我也知道你们这么小心是非常重要的。这不只是钱的事情——钱当然至关重要，我知道……但是，毫无疑问，你们每个人都努力工作，为了这栋大楼，你们都付出了许多，你们想保护你们的巨大投资。而我是谁呢？陌生人。你们要做出决定并不容易。我尊敬你们的决定。那么就让我把我的条件开诚布公地说说吧。我很喜欢这套公寓，在这里住，我一定会很幸福。而且，不只是这公寓很棒，每次走过这栋大楼的大门时，我能感觉到吸引人的气场；还有这里的人的友好，就像各位，虽然我们未曾谋面；还有这里的邻里环境，我感觉这里像家

一样。我不会跟你们撒谎。我单身多年了，在华尔街工作，而且我赚了很多钱。单身男人有了钱能干出哪些‘好’事，我想你们都应该猜得出来，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三十五岁了，遇上一位女孩，我们相爱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翻开人生的下一个篇章。而且，我也找不出哪个地方能够比这里更能让我更好地开始新的生活。”

我再次环视整个房间，每一双眼睛都看着我。那个 70 年代的姐姐看上去都要哭了。“我就不再继续让你们为难了，”我说，“感谢大家抽时间，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跟你们见面。如果大家认为我不适合，那就不要批准我的申请。”我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了一点儿。“如果我在这里住，我也希望你们能这么秉公办理，”我说，“你们一定得考虑清楚。”都说到这份儿上了，他们怎么还不给我钥匙？

找到布里克街这栋公寓是简的功劳。莱特街的公寓两年的租期 10 月份就到期了，我得开始找个地儿自己住了。关于我要搬家，简从没有发表过看法。我是说，她看到我在看翠贝卡月租 1 500 块钱的公寓之前没吭声，之后她就插手了。“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在租金上面？”她问我。我耸耸肩，我从没考虑过这问题。

那个老绅士站了起来，示意约谈已经结束。我对每个人表示感谢，说的时候，我都看着他们的眼睛。门外，热度丝毫没有减退。我走到布里克街和拉法叶街街口，点燃一根烟。我会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太有真实感了。这里一点儿都没有“肉类包装区”的那种不愉快的感觉。街对面就有“家庭计划中心”，隔壁是个无家可归者中心，那个对面有七家高档餐馆。完美极了。

回家的路上，我接到公寓管委会的电话。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简在公寓门口带着我八周大的爱犬——胡迪尼。它是只日本狒犬，很像电影《小精灵》里的那只吉斯莫，太可爱了。我以前跟简提过我想要一只狗，两天之后她给我一张单子，上面写满了能适合我的生活风格的狗和育种

人。一周之后，我们就开着车到马里兰州去接胡迪尼了。我还没走到公寓，她就上来深深吻了我一下。这是一个长长的、湿湿的、很感性的吻，我好久没有这样吻过了。她的微笑让我感觉太棒了。我立刻脱下运动衣，扔在沙发上，我们又吻了起来。

“怎样？”她问我，还装着想把我推开。“说说吧，进行得怎样。”我回想着刚刚接到的那个电话，看着她的脚下。“哦，宝贝儿。”她搂着我温柔地说。

“我最不在行的就是面试了。”我轻声地说。当我抬起头，我就演不下去了。她的眼睛里有些东西，让我不忍骗她——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行。她看出来我装不下去了。

“通过了，对不对？”

“到家之前他们刚打电话给我的。”

“我就知道！”她说，还拧了我一把。“我就知道！”我们又吻了起来，接着我走向卧室。我换上短裤和T恤。“跟我来。”她说，拉着我的手。简带我来到屋顶天台，上面摆着一张桌子，白色的桌布，点着的蜡烛，还有两个酒杯，一瓶酒插在冰桶里。铺天盖地的是粉红色的彩霞。此时正值日落，渐渐昏暗的哈德逊河上，泽西城的夜色中的灯光开始闪烁，河水很平静，几艘豪华游艇缓缓驶过。我们在桌前坐下，打开瓶塞。我先给她倒上一杯，然后给自己倒上一杯。我们举杯，庆祝我们新的开始。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把剩下的酒都倒进我们的杯子里。日落之后，气温稍微降了几度。我一手拿着杯子，一手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到卧室。

我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背脊。我感觉自己的手指和她皮肤之间充满了电的感觉。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她的一部分。我闭着眼，细细地体会着她背部麻麻跳动的感觉。我躺下了，她也躺下了。她的手指插进我的头发里。以前，我总是停不下来，总是得赶着去俱乐部，去下一个派对。我一直对自己说，可别错过了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真正地满足

过，不管我在何处，跟谁在一起。自从跟简在一起，我们就坐着，聊着，在餐桌上我把手伸过去，握着她的手。我喜欢这样跟她平躺着，我不想让她离开我，我也不想走。我以前好像从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不再瞎跑个不停，不再害怕，这样就好。……我并不是说自己放弃了一切。我还是会偶尔跟我的那些朋友们聚聚，每周的工作晚餐还是照常出席，偶尔，我也会到“白宫”转转。但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了。我会让自己释放一下，冷静一番，然后再回去找我亲爱的女朋友。我闭上眼，慢慢睡过去，进入我最舒服的梦乡。简靠着我的背，柔软又温暖。此时，我听到她在我耳边轻声细语：“我爱你。”泪水开始盈满我的眼眶，接着滑下我的脸颊。对她的话做出答复，一点儿都不困难。很自然地，我就说了出来，发自内心的。说完之后，我被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和的感觉完全笼罩着。我站在高山之巅，清楚地看到我的未来。我从没有这么幸福过。

“我爱你。”

第三部分

迷失·重生

多汁烤肉汉堡

罗拉

“打劫”自己

戒毒中心

插、挖、吸

再次戒毒

写作

30

四个月过去了。一天，简告诉我她怀孕了。她是从洛杉矶给我打来电话的，她在那里跟经纪人见面。她声音很轻，几乎像个受惊吓的小孩。虽然我从没有表示过，但我其实挺希望她能怀上的。这能让我定下心来，在最高点挺住，不要摔下来。反正，她怀孕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意外的事情。有一天，在办公室里，我们聊着关于节育的事情。我说我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美琳达就说了：“啊，顺其自然希望没事，老招数了，对吧。”“没错，”我说，“不过我们只是希望没事而已。”此时的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电话里，我对她说我爱她，我兴奋无比。

几周之后，简搬到布里克街的公寓和我住了。我们是不是要一起住，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但我们说好不需要急着结婚。我们先把孩子的事情办好。今后的几个月里，我的单身汉的特性一点一点地在消失。白天，我上班，简把我们的屋子变成一个家。她的品位特好，综合了波西米亚和折中派的风格。这非常适合这栋大楼的简约风格。我们俩也都喜欢摩洛哥风格的装饰，她在长岛的住处有很多这类装饰，她那里没有的，我们就出去买。只有一个房间还没有装饰，那就是第二个卧室，我们想把它当成育婴室。那间卧室的家居、色调、玩具的设计全部押后，直到我们知道孩子的性别为止。我们也都同意，要尽快知道孩子的性别。

从春天开始到夏天，我们在家里待的时间很多。有一个周末，我们带着我们的两条狗——胡迪尼和 MC——到华盛顿广场公园散步，我们在

遛狗道附近的长椅上坐下。第二条狗是简搬进来之前我买的，因为我觉得让一条狗独自在家挺过意不去的。我们还看很多电视节目。简喜欢看HGTV，我则买了《24小时》前几季的DVD，我们追着看，停不下来。浪漫喜剧影视让我痛苦不堪。我们的饮食安排也让我心满意足。我们每餐都吃外卖：我主要点墨西哥和美国式的，简点的大多是意大利和中国餐。周末的时候，我们几乎不起床，因为简还会有妊娠反应。我们每餐都吃。在我单身生涯最后的记忆中只有查尔斯·罗杰斯牌的雪橇床（简很快就在西普汉波家具店里买了另一张床给换了）和看不完的电视剧和电影。

虽然生活是如此美好，但当简进入孕期第二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得溜出去一下，跟杰森、伊森或者华尔街的朋友们一起喝喝啤酒。我总会在半夜之前回来，只有一两次（简知道的）我稍微喝多了一些鸡尾酒。不过，有一天晚上，我过了一点才回来。我没喝太多，可卡因用多了，因为我顺道去“白宫”逛了一下。这下我可睡不着了。我爬上床，上面睡着的是我怀着孩子的女朋友，我不敢跟她对着脸，怕她看出我没睡。我辗转反侧。我需要睡眠，但是我蹑手蹑脚地溜进浴室，要给自己来个最后的可卡因高潮。结果太糟糕了，在那种强迫的清醒意识当中，我忽然有一种冲动要跟简坦白。这种冲动越来越强烈，似乎某种忏悔能够减轻我的痛苦。但我对自己说，不能跟她说可卡因的事情，这样做太傻了。我看看时间，4：30。今天我可能上不了班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可以感觉到简在慢慢醒来。虽然她还睡意朦胧，但她看着我的眼睛。看着她的表情，我知道她感觉到哪里出了问题。她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我昨晚干了点蠢事。”我嘟囔着。她坐直了身体，抬起头。我猜她是以为我会说我跟哪个女的搞上了。“我喝了几瓶啤酒，”我说，“然后，他们给我几粒药丸吃。”她指责的表情开始变成悲伤。我说那些是止疼片——我想用小小的谎言来掩盖大大的事实。我总得跟她坦白些什么。一滴眼泪滑下她的脸庞。她紧抓自己的枕头，翻身远离我的身体。在哭泣和呻

吟声中，她的背上下起伏。

我以为她会生气，没料到她会感到悲伤。我揉她的被子，但她扭动着把我的手摆脱开。我坐着，全身僵硬，充满恐惧，我怕现在再说什么，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最后，她终于转过身，看着我，眼睛红红的。“你知道这像什么吗？”她的声音在颤抖。现在我最好是什么都别说。“一辈子无法摆脱的影子。”她说道。她的眼泪又流下来了。“我十三岁的时候，”她说，“我问我妈妈，爸爸埋在哪里。当我知道就离我们的住处不到五百米，我的心往下一沉。这么多年我们住的地方离他的墓地那么近，而我却一直不知道。”直到现在，简都很少跟我说起她爸爸。我知道在简四岁的时候，她父亲因为吸毒过量死了，也可能是故意自杀，但我不知道细节。“我妈妈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继父在地下室里，我冲到车库去拿我的自行车。”我从没去过那房子，但似乎历历在目。那个小车库里到处是工具和垃圾什么的，还有她那辆久经磨炼的粉红色十档自行车。“我骑到那个墓地，找到了入口处。”她说，“我不知道我爸爸埋在哪儿，所以我到管理处去问，他们跟我说了。我骑上车，穿过许多墓碑，找到他的墓。我很害怕，但我又毫不在乎。我得跟他谈谈，我得知道他埋在哪儿。我找到他的墓，当我看到他的姓名，再也抓不住自行车，它倒了。我忘了他的中间名是艾拉——我呛了一下。”简深呼吸了一下，对那段记忆报以微微一笑。“他真是意大利佬，”她说，边哭着边笑着。“不管了，我趴在草地上，双手展开，似乎在拥抱他。我哭个不停。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干？他为什么离开我？我觉得好孤独、好寂寞。我喘不上气来了。我的肚子开始疼得厉害。我四下看了看，看是不是有人看到我或者听到我的动静，但没人。我觉得更加孤独寂寞了。”她哭得更大声了。“我只想他能在我身边。大家都说他是个大好人，但是他就是戒不了毒。他离我而去。我有太多的悲伤和痛苦无人倾诉。”我拉起简的手，轻轻捏着。“那年夏天，我每天都偷偷骑车到他的坟墓去，”她

说，“我会待上好几个小时。”我想象着十三岁的简坐在墓前，哭着，背景是美丽的夏天。我开始挺不住了，但此时简的表情变得愤怒。“我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她说，“不允许。”

2005 年 10 月

“多汁烤肉汉堡是什么？”我的会计师杰瑞问我。我正朝中央车站走去，通过手机跟他讲话。我早就应该让他来处理这些事儿了。他的声音有点担忧，但我能理解。对华尔街来说，餐馆是无底洞。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为了错误的目的而投资了餐馆。他们都想以拥有一个出名的餐厅、咖啡厅或者夜总会的股份来炫耀自己，当大佬，或者带女朋友来吃饭，就像是花 20 万块钱来让人罩着你。这，我就免了。对我来说，多汁烤肉汉堡可不是这回事。我超级喜欢多汁烤肉汉堡。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洛杉矶的时候吃过一次，以后每次我到西海岸，总会安排去吃一次。我看着中央车站中央的大钟，几乎要六点了，人潮如地毯一样涌向火车，都要去维斯切斯特。

多汁烤肉汉堡的口号是“你见过的最大、最有肉汁的汉堡”。此言不虚。餐馆是根据早年间路边汉堡档设计的，有个柜台，有椅子可以让你坐着，还能转来转去，还有一台播放摇滚歌曲的点歌机。大约两年前，旧金山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链接，说多汁烤肉汉堡要搞连锁。我打了两个电话——就两个——就召集了钱和专家，整出一套方案要把多汁烤肉汉堡搞到东海岸来。好了，我们是有钱了，但是如果我说我们有专家了，那可能是打肿脸充胖子。我一个合作伙伴的朋友，叫约翰，由他

来负责这个项目。他是律师，还做日线交易，但他现在这两样都不搞了。他只需要一点点做汉堡包店的经验，而这在多汁烤肉汉堡就学到了。他们送他去专门的汉堡包学校上课。

我们要在纽约附近占地盘：曼哈顿、波罗区、维斯切斯特。但是多汁烤肉汉堡想要在那片黄金地带占更大的份额，所以我们把新泽西也划了进来，约翰家就在那里。最后我们只需要搞定嘻哈歌后拉蒂法女王就行了。我们接到电话，就去干了。2004年的夏季，我们的第一家连锁店在新泽西隆重开张了，我们的计划是再开19家。“那些文书我都得看看，”杰瑞说，“有谁投一百万，却连会计师都不通知的？”

我挂了电话，朝中央车站外面走去。第42街是黄色出租车的海洋，车上的指示灯亮着“下班”。我永远搞不懂，为什么这么多出租车司机在高峰时间“下班”。我打电话给杰西·依兹勒让他把K1文书直接发给杰瑞。几个月前，杰西跟我搞了个有限责任合营公司并将之称为“粉红与绿色”。我们已经投资了一匹赛马，在布朗克斯区搞了一个嘻哈乐队。这些东西听起来风险很大，其实不然。我们每个人只投了2万。我挂上杰西的电话，又给表弟伊森打过去。我们一年前拍的一个叫《比你更神圣》的片子，现在急需一个剪辑的。剧本主要是我写的，故事来自童话故事——《翰姆林魔笛手》，不过场景是在纽约的俱乐部。一些古惑仔很讨厌“桥民”和“洞民”们来占他们的地盘，因此，他们找了一个魔幻人士要把那些桥民和洞民引到城外去。我请了一星期的假，搞完这个项目；我们每天的拍摄时间是12小时。我已经投了5万。我真的没时间跟伊森一起找个搞剪辑的。他一直给我打电话，给我留言。“你就把它控制在2万以下。”我告诉他。终于到了42街，我给简打了个电话。我先往东走，然后往南拐进第3大道，我们聊着，她的声音能让我平静下来。“听说吃墨西哥食品，再加上做爱，可以催产。”我说。我们随时等待着新生命的来临。是女儿！

这辈子我从没有这么紧张过。我需要在车里安一个婴儿座椅，这是从医院回家这段里程碑式的行程中要用的。我怎么老安不好？我工作中上百万的投资必须在电光火石的瞬间做出决定，但安一个座椅却让我束手无策。座椅后面有一个像是安全带那样的黑色带子，但好像没地方放这条带子，旁边的扣子也没地方扣。我用力摇晃着那个婴儿座椅，希望它能够自动安好。伊丽莎白街停车场的停车管理员看到我的窘状，但没有说要来帮帮我。这个时候怎能让个街上的陌生人跟我说：“哦，应该这样安。”那怎么可以！最后，我放弃了。我开到琼斯街一家修理店，出40块钱，让那个人帮我安。他笑了，接过钱。虽然他在微笑着，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这家伙开宝马540i，却不知道安几个按钮，拉紧几条扣带。三两下工夫，他就把婴儿座椅给安好了。我终于开上去医院的路。我要去接我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女人。

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重播着那奇迹的画面。我看到她在医生的手里，头小小的，眼睛紧闭着，先是出来了一半，接着，全身都出来了。我是深爱着她的男人。护士在用毯子给她裹上，我喊她，她的头朝我转了过来。“我爱你，罗拉。”我轻声地说着。她知道那是她的名字，也认得出我的声音。几个月来，我一直隔着简的肚皮跟她讲话。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简，发现她也是两眼含泪。我们想说着什么，但是说出口的都是含糊不清的言语。护士轻轻地把罗拉放在简的胸脯上。我用食指轻轻碰

着罗拉·吉娜·达夫的小手，第一次感触着她的皮肤。

女儿出生后的那个星期二，我又回去上班了。下班后我去中央车站附近的安妮摩尔酒吧，跟一家叫米勒·塔巴克的小公司的人喝上两杯，那公司有年头了。酒吧的前面是红色的，透露着纯正爱尔兰都柏林酒吧的特色。但是，安妮摩尔酒吧的爱尔兰血统跟中城区的很多酒吧一样，不过它们的境界只停留在使用这些绿色的塑料礼帽。克里斯和帕特已经到了，他们是我的人，坐在吧台边等着我。这不是华尔街人常来的地方。这里让人感觉是美梦破灭的中途岛。这里顾客的梦想虽然还没有完全破灭，但也差不多了。年长的男人和女人们，只顾着喝他们杯中的酒。调酒师看上去是那种临时替班的，你点杯酒，他很不耐烦。“克里森、帕特，佣金排行榜第三十二名，但在我心里是第一名。”我说道。

“啊，真的？三十二名？”克里森问道。他有点儿不高兴。

“开玩笑呐。”我跟他们分别握手。克里森还是不高兴。“你呢，应该是排名第七。”这不是实话，但我给他和他公司付的钱已经够多的了。去年我给了接近一百万。这让我成为他们公司的十大客户之一。克里森点了一瓶啤酒，还让出他的位子给我坐，我没坐。“我整天都坐着。”我说。我们没什么正事可谈，他们只是想让我出来，跟我碰个面。他们问起罗拉。我记得女儿刚出生之后，我走到医院外面去抽烟。打开手机一看，里面有无数的短信。我给每条都回了一个笑脸。都是朋友，华尔街的朋友，华尔街的合作伙伴，华尔街的马屁精。他们跟我交朋友，大多是要有回报的。只有几个人是不求回报的。我跟这两个人仔细描述了一下女儿出生那天的情况。他们感不感兴趣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是兴致盎然。我说，罗拉让我心里感到软软的、暖暖的，就像喝下一杯威士忌的感觉，但是不会有其他副作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她圆圆脸，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皮肤柔柔润润。我发觉自己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了，所以我提议我们干一杯。喝了几瓶啤酒，他们问我是不是要找个桌子坐下，吃点

什么东西。我说不了，我得回家。简一整天都在家里带着罗拉，她一定需要我来换班，我也等不及要见到罗拉。我抓起外衣，谢谢他们请我喝酒。我走到街的对面，要走过中央车站。每走一步，我就离我所爱——女儿、女朋友还有两条狗——更近一步。我的生活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真是神奇。之前我还穿着牛仔衬衫，在外面瞎搞胡闹；一转眼，我已经有了家，成了好男人。我顺着公园大道走过几个街区，我感到有些微醺。感觉真好。此时正是金秋时节的黄昏，秋天的光影让城市变得柔和。我要走路回家。

但我却走到了“白宫”。我给简打了个电话，说我们的会面需要久一点。过几小时就回去，我跟她保证。

公寓一片黑暗，很脏。兰迪和詹姆士在门口等着我。“瞧瞧，谁来了！”“他来了！”他们猛拍着我的后背。接着我们就到了厨房。洗碗池里堆着一星期没洗的碗盘。地板黏黏的。有人在网上找应召女郎。“当上老爸了，感觉如何？”兰迪问我，詹姆士在盘子上倒了一条粗粗的白线，然后把盘子朝我推了过来。我拿起卷好的纸币，低头看着那条白线。“你们懂的。”我一边说一边低下头，把那条线全部吸进我的鼻孔，接着我一仰头，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大口喘着气。可卡因灼伤了我的鼻子，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我觉得身体里有一股力量在翻滚。这是刺激和麻木的完美组合。我跟他们说，罗拉是我这辈子拥有过的最好的东西。

两小时之后，我走出了“白宫”。我注意到街对面有辆黑色的车子，里面有两个人。他们穿黑西装，还戴着墨镜。天色已经很黑了。我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看着我。我开始走，他们就启动了汽车。我摸摸裤子的口袋，看有没有可卡因。我没有在上面公寓里拿毒品，我知道，但我还是检查了一下。我觉得头脑一阵发热，好像有聚光灯在照射着我。我朝莱克星顿街走去，那辆车子慢慢在街区尽头停了下来。我看到一辆黄色出租车在他们后面停了下来。我冲到街上，猛拍车身。司机按开了门，

我跳进车内。我看着前面那辆车左转，上了下一条大街。我们也左转。他们慢了下来，在莱克星顿街边停下，但是我们一超过他们，他们就跟上了我们的车。我不想往后看，但我不由自主。我们都快到工会广场了，他们还在后面跟着。“不能再往后看了。”我对自己说。出租车在布里克街我的公寓大楼前停下。我从人行道那侧下了车，想象着有人过来揍我一顿、给我戴上手铐，或者至少有人要过来拦我。但我一回头，他们不在了。

我跑进大楼，冲向电梯。我跑进公寓，紧紧抱着我的女儿。我头脑里只想着一件事：她出生的时候我许下的不再吸毒的诺言。我不知道那辆车里面是什么人，但不是个好兆头。看着女儿甜美的脸庞，我意识到，吸食可卡因太危险了。

2005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0 月

昨晚整晚没睡，都在陪罗拉。“今天我上不了班了。”我给克里森打电话。

似乎一切都在变，而且是突然在变。生意完全不同了。报纸头条触目惊心。我想，美国大集团的那些 CEO 们——雷曼兄弟公司的、史杰灵的、科斯罗斯基斯的——把一切都毁了，他们多年来不断造假，然后疯狂掩盖，接着是调查，接着是定罪：世通、泰科、德尔福、安然，不胜枚举，甚至富达公司也出现重大丑闻。似乎华尔街草木皆兵。他们要让所有对冲基金都在证监会注册，这真要命。如今，经纪人的费用账户也有人监督着，他们要招待我们，得很小心。不过，我们现在能干的还是挺奢华的——拉斯维加斯的赌场、贵宾套间还有加长汽车——我们只要多用点心思就可以了。但是，我的进账和奖金都低了，因为我们的业绩不佳。阿格斯今年资产减少了，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办。

10 月底的时候，克里森叫我到财务长那里去一趟。“这个你签一下。”他说。阿格斯收到证监会的函，说要调查我经手的一只股票的交易。在我买进之后几个小时，那只股票的评级提高了。签完那个文件，我感觉心里怪怪的，就像你知道有人在跟踪你的那种感觉。

我开始魂不守舍了。我刚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电话响了，是“保健黑手党”的人打来的。他透露说，通用型药品板块出现一种趋势，他几乎是哀求着要我买一系列的股票。我买了一些，想看看情况，但是股市一直抛售。我又每只买进 25 000 股，还是一直往下跌。我决定打个电话给摩根士丹利问问为什么股票一直跌。当对方告诉我卖家是谁，我握着听筒的手抓得更紧了。原来是那个哀求着我买进的那个“保健黑手党”的人：这伎俩太低级、太有针对性，通常只有陌生人才做得出来。他真的觉得对我搞这一把戏，我会饶过他吗？他这次是搬起大石头砸自己的臭脚了，他这次死定了。他的名字从我的清单上被划掉了。“保健黑手党”的那些证券——土崩瓦解。证监会就在屁股后面跟着，搞得大家开始互相猜忌，互相敌视。我谁也不能相信，但我什么事情也干不了。

几周之后，我走进办公室，我已经迟到一小时了，昨晚整宿没睡。李察和美琳达看着我，好像我是鬼。“我以为你父母来了，你今天请了假的。”李察说。我不记得我说过要请假，我父母明天才会到啊。他们不常来纽约，因为他们挺害怕纽约的。他们不敢出门，因为怕走丢了或者被抢劫。上次他们来纽约的时候，去过唐人街，回来的时候脸色惨白。我对李察和美琳达点了点头，转身回家去了。

12月的时候，我在克里森的办公室跟他谈了谈今年年底评估的事情。我进去的时候，他的脸上勉强挤出一点微笑。我的奖金是 50 万，他就这么单刀直入地对我说，原因是业绩不好，资产降低。我已经连续两年奖金下降了。另外，克里森告诉我，今后的奖金制度要改变了。公司今后不再有固定百分比的奖金了，取而代之的方法是，我们五个人——我、李察还有三位高级分析师，我们靠业绩领取奖金总数的 25%。他认为竞争能够让我们表现得更好，我看是让我们互相动刀子才是真的，我们得在背后互相捅刀子才能够多赚几十万。真恶心。我站了起来，摇了摇头。“谢了。”我说。

2月份的第一个天气暖和的夜晚，简和我推着罗拉一起去外面吃晚饭。我们静静地走着，有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我们最近挺不好过的。走过几个街区，简开始哭了起来。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很难适应全职在家带孩子这样的改变，每天都让她觉得很难熬。“你的生活一如既往。”她说。“才不是这么回事呢。”我心里大声说着，但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抱了抱她，但她全身紧绷。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双眼睛严肃地看着我。是个男的，高高的，下巴方方的，很健硕，很精神。他的头发是白的，戴着个巴尔的摩欧里奥队的帽子，那帽子跟他不搭。他看上去像个戴着棒球帽的政客，那种穿着只是想让大家相信他是个普通人。几个街区之前我就注意到他了。他不会是在跟踪我们吧？他的眼神一扫而过，但却直射入我的眼睛，然后他转过头。我把推车推得更快了，简在后面跟得挺吃力的。

几天之后，我又打电话说我生病了不能上班。“食物中毒很痛苦的。”美琳达第二天跟我说。我的肤色依然惨白。我放下手机和钥匙，手还在发抖，我打开电脑。克里森来上班了，他问我感觉怎样，但口气里一点儿诚意都没有。上班的时间我度日如年。我下班的时候，又看见了那个白头发的人，这次他没有戴帽子。我直视他的眼睛。刹那间，我觉得他似曾相识。我很肯定，他是在监视我。他慢慢转身走开了。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忘掉他。虽然我很留意，但我没再看到他。可能我把他吓跑了，或者，也许他知道我对他有防备了。

4月底的一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李察和克里森已经在会议室了。克里森让我去看医生，他觉得我有问题。“你今年病假请得太多了。”他说。我一开始还解释，说我昨天告诉美琳达了，我是要带罗拉去见医生。“我知道，”他说，“但你问题不断，所以我觉得你最好去检查一下。”

我是几天没来上班，但他哪里知道我家里的日子也不容易。我得先把克里森打发了，所以我跟他说，我下星期还得去见医生。但我的健康

问题不是我们开会的唯一原因，他要跟我谈自营交易的事情。“我要你只交易我们没有参与过的保健股票，”他说：“有分析师说你只挑他们的最佳股票来交易。”

这是说什么呢？我就是这么干的。因为分析师不懂得要如何交易，所以我才来交易帮公司挣更多的钱啊。交易我们没有参与过的股票，这是什么逻辑？

“他们说自去年交易账户业绩很好，是因为你只挑他们的最佳股票。”

我选中它们的时候，他们还没分析出来那是好股票呢——那可是技术。我想要喊了。克里森站了起来，我想那就是谈话结束的意思。他往会议室外走着，我叫住他。

“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要不，让分析师自己挑自己认为最好的股票来交易——也许他们可以自己来操作？”克里森的脸涨得通红。他回到会议室，开始用拳头敲着桌面。

“你做你该做的，我做我该做的，怎么样！”他咆哮了。我在阿格斯快五年了，这些年当中，我一直是公司的宠儿。我不可能做什么错事的。克里森走出会议室，我知道了，我的地位不再牢固。

屋漏偏逢连夜雨。6月份的时候，在清理过期期权的时候，我忘了每天收盘前检查我们所有的仓位，这是我每月第三个星期五需要做的事情。每个月，这些期权都需要转变成证券，要不然就等于废纸一张。星期六我发现情况的时候，我知道那是小事一桩，星期一再解决都可以。但在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我接到“聪明的卡尔”的短信，说有一家公司要收购另一家公司，而且价值非常高。这叫“稀释”，也叫“摊薄”。华尔街的分析师认为那家公司的出价高了。这对股票价格不利。因为我星期五没有做好工作，所以我们公司还拥有10万份那家公司的股票。星期一一开盘，股价已经跌了10块钱了。我的过失让公司损失了100万。

这个大过失过后的第三天，我又没法工作了。我看上去像是整夜都

在哭个不停，在交易桌前我好像也哭个不停。我径直走进克里森的办公室。我知道我眼睛肿肿的，脸塌塌的，手抖抖的，他应该能理解。“简昨晚小产了。”我说。克里森什么都没说，除了一声“OK”。他知道我今天是没法工作了。我转身就走。出去的时候，我也一句话没说。

之后，我就开始在自己管理的账户上不断损失。又过了一周，我们公寓的一个水管破了，我只好又请了一天假。再下一周，我眼睛发红，于是又打电话请病假。我的运气怎么这么背，无法做自营交易了，我这个样子赚不了钱的。克里森要让我垮台，要不然他为什么只让我交易那些我们没有参与过的股票呢？我接到杰西的电话，说我们赞助的嘻哈歌手犯上枪支方面的重罪，得坐牢五年；我们投资的赛马也不能跑了，它总是最后一名。我们在新泽西的那家多汁烤肉汉堡店勉强达到收支持平，但要在大西洋城的博格达开第二家，还需要很多钱，而我缺的就是钱。还有比这更糟的状况吗？在家里，简对我不理不睬的。即使她对我说话，那也都是指责。“每天都是去吃工作晚餐喝得醉醺醺地回来。”她说。如果说我的生命中还有点希望，那就是我女儿。她开始讲话了，还从摇篮里向我伸手：“起来。”她在公寓里到处爬。当我看着她，我感觉很平静。她的头发长长了，眼睛是碧蓝色的，胖嘟嘟的脸颊红红的。一天晚上，简和我决定要租《与歌同行》来看，是关于乡村歌手约翰·凯西的故事。罗拉还没睡，所以我们把她放在沙发上，跟我们一起。我们看着看着都累了，想明天再继续看，影片里乔奎·菲尼斯开始唱那首主题歌。罗拉听了，坐起身来，开始晃动她的肩膀。她竟然做起西米肚皮舞的动作。想起这件事我就笑，至今仍然如此。

7月的时候，我决定要带简去希腊。过去几个月我们太过疏远，希望此行能够改善我们的关系。简的妈妈愿意帮我们照顾罗拉。但当我跟克里森说我要休假的时候，他说不行。他说交易员不能在每个季度各公司汇报业绩的时候离开，这是华尔街最忙的时候。我说要取消旅行已经太

晚了，我已经买好票了。我必须得去，为了简，也为了我。

我们住在圣托尼里岛上最漂亮的酒店——卡迪基斯酒店。我们住的房间是在靠山的那一面，感觉好像是个洞穴。碧蓝的大海环绕着已经陷入海中的火山，景色壮丽无比。夜里，我们在寂静的小镇上散步，看到一位做首饰的匠人。简看到一枚精美的戒指，上面有一颗蓝色的宝石，闪闪发光。第二天晚上，在她洗澡的时候，我冲到小镇上买下那枚戒指。在酒店里，我们订好了晚餐。我们去用餐之前，在阳台上一边喝着酒，一边欣赏着美丽的大海。我单膝跪下，向她求婚。她答应了，我们俩喜极而泣。

夏天过去了，我们帮罗拉报名上了她的第一个学习班——双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学前班，另外，还有母女同上的音乐课。我则开始计划给她庆祝第一个生日。我决定要租一艘游艇，邀请 150 名宾客，绕曼哈顿航行几圈。我们要安排一个周日早午餐合并的餐会，再叫个乐队。我前前后后忙了几天，打了好多电话，交了一些定金，整个生日庆祝安排得差不多了。我跟简说我晚上要出去见几个朋友，会迟点回来。但我凌晨 6 点才回家。我只有洗个澡，再准备好去上班的时间。

情况开始变得很糟糕。一个小时之后，我站在布里克和拉法叶大街的交界处。李察在办公桌前接了我的电话。“我大学同学昨晚闹自杀。”我说，鼻子不断抽着。

“嗯，”李察说，“嗯，真糟糕。你怎么样？”

“我得飞到俄亥俄州去，”我说，“你能跟克里森说一下我星期一回来上班吗？”我挂上电话，又看到了那个白头发老头。至少我觉得那是他，不过我不确定。我就一瞬间看到他，接着他就消失在街角。我没有朝家走，而是朝南走去。简和罗拉还在睡觉。我就想一个人静静。我下午回家的时候，跟简说起俄亥俄州那位朋友的事情。简问我怎么样。她很担心我的状况。她说我该去看看，但我说我已经跟他谈过，他没事了。我

只想休息休息。

罗拉周岁生日之后的第五天，我瘸着腿走进公司，全身湿透了。我流着血，我的西裤上还有几个窟窿。那是早上快7点的时候。保安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正眼看他，向他挥了挥身份卡。我拖着右腿，走进电梯。我一只手扶着电梯壁支撑起我的身体。我的呼吸急促，站立得很艰难。我进了电梯，幸好没有别人。

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远。每跨一步，我的右腿就突突作痛。每走过一张桌子，我就得停下来喘口气，休息一下。然后我探头看玻璃墙那边美琳达和李察在办公桌前干什么。他们都抬头看到我，然后两人面面相觑。那是他们的标准表情：特尼这星期五又倒霉了。他们很害怕。我努力想说点什么，但我开不了口。最终我说了：“我被抢了。”李察和美琳达又看了我一下，接着继续面面相觑。“我得去医院，我的腿受伤了。”我开始一瘸一拐地走出办公室。

李察站起来跟着我走出去。“有什么需要就吱声啊，”他说，“你真的没事吗？”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莱维顿街107号。”我对司机说。我发了个短信，跟简说我上班路上掉坑里了。接着，我又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得去让医生瞧瞧我的膝盖，稍后再打电话给她。我知道她此时还没生气。我坐在出租车后座，全身发抖。我摇下车窗，又摇回去。我长长地吐了几口气。我回头看着是不是有人跟着我的出租车。我低头看看我的膝盖——血还在流。我的手掌红红的，皮肤下面有一些细细的沙砾。我把湿湿的衬衫脱下来。

莱维顿酒店的大堂光线挺暗的。我递过我的驾照和信用卡，说要开一个房间。他们看着我，一脸的疑惑，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说。那个大堂礼宾员为什么走到后面去了？我是不是该转身离开，但他们已经拿了我的驾照和信用卡。于是我等着，情况不妙，怎么这么久？“好了。”前台把

我的东西还给我，还给了我一把钥匙。“上电梯，14楼，出电梯往右。”我一把抓过钥匙，匆匆奔向电梯。

到了房间里，我迅速脱下衬衫和裤子，扔到椅子上。我抓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转到色情频道。床上一片雪白，我很怕会把血染上去。我把所有的口袋都清空了，把东西都放在床头柜上：钥匙、钱、信用卡、手机还有两袋可卡因。我把其中一个袋子放在床头柜上。我想哭，但我哭不出来。

昨天晚上，一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那么顺利。下了班，我就去喝了几杯鸡尾酒。大约10点的时候，我打电话叫一个交易员出来。我半夜的时候回到家，简和罗拉都已经睡了。上床前，我想再抽几口，但我停不下来了，一发不可收拾，没有什么可以控制得住我。我就在沙发和浴室之间来来回回无数次。我知道我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这是星期三开始的。该死。简见到我的样子不知会怎么说我？我看着还在冒血的膝盖。简直不敢想象，我竟然说我被打劫了。我已经编不出理由了。

我整个人废了。我没有被打劫。

两小时之前

出租车把我放在第54街和中央公园交界的地方。天还没亮。漆黑的天空继续飘洒着昨晚开始下的雨。整个城市处于混沌之后、拂晓之前的那种临界状态。“而我是唯一的生还者——勉强生还。”我一边练习着台词，可卡因一边从我喉咙后面流淌下去。我得去上班了，要不然他们要炒我鱿鱼了。连续两个晚上吸毒喝酒，此时的我站在街角，几乎要休

克了。

我用颤抖的手点燃一根烟，开始绕着街区行走。我吸进绝望，吐出焦虑。我这副模样，怎么能走进公司呢？我走到小巷子里，半根还没有抽完，我就弹掉香烟，烟接触到湿湿的水泥地，滋滋作响，却让可卡因作用下的大脑迸发出一个火花。如果我被打劫了怎么办？我觉得浑身一阵爽快。突然，我眼角的余光看到有一个黑影正在越过街道，朝我走来。那影子来得快，去得也快。我又点燃了一根烟，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绕我家的这个街区走了一圈了，我已经回到刚开始的地方——街上出现了一个水坑。我深呼吸了一口，闭上眼睛，站在水坑前面。我得开始被抢劫了。

第一次尝试……

我的身体不配合。我怕疼。

我站了起来。

第二次尝试……

这个跳水动作很不情愿，但我的两个膝盖都撞上了水泥地。

我的手掌也一片火热……

我感觉我的脸上一片湿湿黏黏的感觉。

我用嘴尝了尝味道。

我的裤子全湿了，皱了起来。

我的衬衫还是干的。

再一次！

再一次！

再一次！

感觉上我好像是被推倒的。我跌下那个坑，跌得好重，我的脸碰到水面，接着碰到下面的水泥地，一阵刺痛。我抬起头，又看到了那个影子，它飘到小路上我之前站的地方。现在我又站了起来，怎么起来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能感觉到血从膝盖流向小腿肚；我的手也划破了，流着血。那个影子慢慢增大，变化成某种东西。接着我又倒在街上那摊水里。我停不下来。

我摔坏了，流血了，上气不接下气，我抬起头，疯狂地找寻着对我施暴的人，但我什么也看不到，我只看到马路牙子，还有停在街边的汽车的轮胎。不知怎地，我努力地站了起来。那个影子不见了，我心里的恐惧消除了，我放松了。我的目的已经达成。我走进公司大楼的时候，我的喉咙背后还是有可卡因在往下流动着，不过现在还伴随着一些血的味道。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我没有什么朋友闹自杀，我家的水管也没有爆过，只不过漏了几滴水而已。简有过一回小产，但那是我打电话请病假之前两星期的事情。我差不多每周都得病一回，但我真正的病因并不是我说的那些借口。我每星期有四个晚上吸可卡因。我会跟简说我有工作晚餐，但我却到酒店开个房间，开始吸食可卡因。我跟朋友们说我晚上都忙着工作晚餐的事情，但我跟华尔街的朋友都说我得回家当好爸爸。我以为当简说她怀孕了，我就会收手。接着我就期待着，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吸毒了。但是，当简和罗拉睡着了，我就会蹑手蹑脚地溜进电脑室，整晚看黄片、吸毒。我停不下来。

我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我知道，两年前不应该记下那个毒贩的电话。我一塌糊涂，再看一个片子，再吸一条，然后我就把所有毒品都冲到厕所里去。我会打电话到公司，告诉他们我还在医院。我还会打电话告诉简，让她知道我没事。再吸一条，就一条。看看猫眼后面是不是有人，再吸一条……检查猫眼，再吸一条……

我抓起手机。简发过三条短信，克里森发过两封电邮。简开始担心了：“你在哪儿？发生什么事了？你没问题吧？大家都打电话到家里来找

你。”克里森的电邮显得不太关心：“你今年太多杂事了。我们得聊聊，给我回电话。”另一个电邮：“你星期一得来公司，我们得聊聊。”

我看了一眼时间：下午 2：30。色情片还在放着。我租了 20 多部片子。可卡因还剩下一条。我听到一个声音。我知道那是我脑子里发出来的，但我听得到。“这是你的最后一条可卡因。”那声音说道。我全身发抖，就这么定了，这是我最后一条。

我一塌糊涂。

离开莱维顿酒店后三小时，我回到自己公寓大楼的外面。我身上还有手机、信用卡和驾照，身上还有衣服，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我在咖啡店的玻璃上看自己。我确实确实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没过多久，伊森和杰森也都坐出租车来了。他们一脸迷惑，迟疑地向我走过来。“老兄，你没事吧？”伊森说。我爬进出租车的后座。我们朝杰森的家出发，因为伊森和女朋友住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单间公寓套房里，杰森住的是一居室的公寓。我整晚在杰森家的沙发上，第二天上午才给简打电话。我不确定她会不会接我的电话。

我假装被打劫，又去酒店住过之后，我带着一种既焦虑又充满希望的心情走回家。不知你信不信天命，我觉得我是被某种类似上天的启示这样的东西给打中了——我觉得我好像是走在从罪恶到解脱的康庄大道上。但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忏悔我所做的事情。我知道这么做会伤人心，但是我对自已解释，说那就像撕掉一块创可贴。“果断点儿，撕了。”我心里说。我把一切都跟简说了，至少把有关可卡因的事说了，然后我说我一定会痛改前非，我请求她支持我。

我看得出她的大脑正在把以前的迷惑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她渐渐明白过来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家里无端的疯狂行为，工作晚餐应酬不断，还经常请病假，这些事情现在她都搞明白了。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一直这么做，我也希望自己知道原因。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每

天早上我醒来，我都会决定今后再也不这么做了。接着，白天的时候，我会信心十足，说我这次已经能够控制好自己。但是到了晚上，我的渴望就像七岁小孩期待圣诞节的到来。我必须来点儿。

她表现出来的不是很震惊，而是生气，泪水滑下她的脸颊。我以为我掩饰得不错——瘾君子都这么认为，但她却因我而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她抹去脸上的泪水，露出鄙夷的神情。“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她说，“上个月，我跟妈妈去过一次大西洋城。”求求你，不要问这个问题，我心里祈祷着，求求你。“星期五晚上你自己一个人带罗拉，而星期六上午你连话都说不清楚。”她的眼睛充满了指责。“你有吸吗？”

我想找个理由，但我找不出来。我盯着地上看着，我的头低低的。她抓起烟和手机，走了。“你给我滚蛋”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星期六，我从杰森家里给简打电话，她接了。我说我要去戒毒中心，在亚利桑那州的塔克森，那中心叫“棉花树”。从她的口气我听出她昨晚的怒火已经消失，现在她表现得很冷漠。她说，我从戒毒中心回来的时候，她和罗拉不一定还会在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电话中继续向家人和朋友忏悔。我妈听到“可卡因”，开始哽咽无语。我担心她又要睡不着了。老爸来听电话的时候，他祝我好运，似乎我是要去上大学。“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就开口。”他说。我的非华尔街的朋友们听到消息都很震惊。他们一个个的反应都是：“你用可卡因？”他们都不知道我吸可卡因，但他们见过我的某些怪异行为和我不可靠的行径，他们都猜到了我有些不对劲。

至于华尔街的人，我第一个通知的是塔克舅舅。这类故事他听过太多，但他没想过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说他想帮帮我，对我表示同情。接着我打给卡斯和兰迪，他们两人都很不高兴。不知道他们俩是不是觉得他们得负点责任，或者他们只是因为要损失最佳的客户而不高兴。我又打给几个华尔街的朋友，他们都说不要再告诉其他人了。他们说别声张，

但我做不到。有个地方我必须通知。

那个星期一，是个特别暖和的秋日。我站在第 57 街和公园大道的交会处。纽约的车潮人潮涌过，我抬起头看着天空，让太阳的光芒照着我的脸，好像在游戏场接受太阳洗礼的孩子。毒品和酒精已经把我吞噬，但是，太阳的温暖让我再次感觉到完完全全的我。我想要把这个感觉永远留住。我向自己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此时此刻我感受到的希望与光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拿着手机的家伙撞上我的肩膀，我手里抱着的一大堆文件掉落在人行道上，如雪花纷飞。“这里不是沙滩，浑蛋。”他转过头骂我，脚步没有丝毫放慢。我捡起我的文件，朝公司大楼走去。

办公室里一片严肃。我不知道这些同事们是感觉尴尬，还是悲伤。即便是跟我有眼神交流的，也都只是蜻蜓点水般掠过。有几个人扫过眼神竟然让我觉得有几丝寒意，可能是我想太多了。此时我并不是自信满满。不管情绪如何，那感觉是实实在在的。我走进会议室，公司的 CEO 唐、李察还有克里森都在座。在门口的时候，大家的小声嘀咕已经听不到，只剩下一片不安的寂静。我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我低着头看着我的鞋，发现它们都这么脏了。这里的眼神没有比外面的好多少。我把眼神停留在克里森头上方墙上的一个点，似乎我在寻找着地平线。“感谢各位对我所做的一切。”我说，不理睬他们的反应。这可能不是我最光荣的时刻，但我的话真是肺腑之言。我说，我知道给公司惹了很多麻烦，让公司一片混乱。我说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以为我能控制好。“我出大事了，”我说，“我需要帮助。”我说我要去亚利桑那州的一个戒毒中心去戒毒。“明天就去。”

在座的几位都直勾勾地盯着我。“所以，对每个人来说，我能做的最理想的事情，”我慢慢地说着，“就是马上辞职。”

此话一出，双方的紧张都烟消云散。我是公司的累赘，我也不想继续待下去了。都结束了。他们也不需要炒我鱿鱼。每个人都发了言。我

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着，但是他们的话像是激流冲过岩石。我的脸热得不行，耳朵嗡鸣不停。我知道他们是真心地担心我的状况。我也知道他们希望我能够早日恢复。但我也知道，我一走出公司的大门，他们会大大地松一口气。

星期二早上，我跟罗拉待在主卧室的床上。我问她知不知道我有多爱她，她点了点头。我说我得出一趟远门，让自己好起来。我说这样可以吗？她又点了点头。虽然说她还小，不可能知道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她眼睛最深处的那一点光芒让我知道，她明白我的意思。“我爱你和妈妈，超过世上一切。”我说。我拉着她的手，让她在床上蹦着。“我要去让别人帮我整理整理，让我回来做个好爸爸。”罗拉咯咯地笑了，伸手来摸我的鼻子。我全身涌起一阵幸福的暖意，这感觉几乎让我不能自己，但我没有哭。多年吸毒使我已经麻木。我突然觉得我的生活是如此的脆弱，毒品把我对女儿的爱这么轻易地就抹除了。“深呼吸，”我对自己说，“深呼吸。”我抱住罗拉，好像我永不会放手。我就这么抱着她，直到她在我怀里睡去。

飞机在塔克森降落时已经是下午了。很热，很干燥。我很想抽根烟，但我更想上厕所小便。我冲进机场的厕所，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看上去我还是一塌糊涂。我给简打电话，直接听到留言信息。我过去等行李。输送带终于把我的包送过来了，我抓起行李，拖到一边，接着我立刻点上烟，吸了一根又一根。第三根烟抽了一半的时候，有个久经风霜的老人朝我走过来，那脸的颜色和质地就跟马鞍一样。“太阳晒过头了，”我想，“至少多晒了十年。”他举着一个牌，上面写着：“特尼先生”。

“特尼是我的名字。”我这就算是自我介绍。

“我是比尔。”他伸手要来帮我拿行李。

“我自己来。”我说。可能我看上去比较虚弱吧。比尔和我穿过机场的停车场，来到一辆枣红色的房车面前。到中心需要半小时。刚开始我

东张西望看窗外的风景——机场附近的风景都一样，高速公路、立交桥、连锁大超市。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来戒毒中心了。

“你用的是哪种毒品？”比尔打破了沉默。

“可卡因和酒，我想。你在中心工作吗？”

“我退休了，但我每周在中心干几天，他们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喜欢在那里工作，它能时时提醒我为什么今天不能喝酒。”

“多久了？”我问他。

“没酒精？”他微笑了，“22 个年头了。”

我真想相信他，但我相信不了。

“日子就这么过着，孩子。”他哈哈一笑。比尔挺讨人喜欢的，我立马喜欢上他了。“一天一天地过着。”

我还是喜欢他，虽然他有点啰唆。车子在红灯前停下。

“虽说我不该这么做，”他说，“不过，你进去之前要不要先买足香烟？”

我的每个口袋都鼓鼓的，里面装着烟，我感觉自己好像穿了防弹衣。车子来到一个大铁门前，那里有个保安亭。比尔跟保安挥挥手，亮了他的身份卡。过了第一道大门，第二道门那里保安更多了。

“好了，我只能到这里了。”比尔说，“你可以再打最后一个电话，但我得看你进去之后才能离开。”

我又给简打电话，听到的又是留言。这周围的景色真美：灌木蒿是黄绿色的，仙人掌是锈色，有些高达 10~12 英尺；远处是黛青色的圣卡塔琳娜山脉。我走进中心，比尔把车开走。我感觉完全被寂寞笼罩了。

入住手续办完之后，我被带到自己的房间。房间很小，有四张小床，三张床上都放了东西。有一个小浴缸。这里跟四季酒店里的套房不能相提并论，但也不像是纽约宝瑞慈善中心的房间。我想象着这样的中心都应该是挺高端的，有个厨师，有游泳池，还有瑜伽课程。这地方让我联

想起大学的一个小校区。弯曲的小道连接着数个建筑。我放下行李，立刻去找指派给我的治疗师。我想立刻开始康复的过程。

来这地方两个星期了，我终于和简通上电话了。由于时差和中心对电话联系的管制，之前我只能给简留言。我在外面的露台给她打电话。黄昏时候的沙漠真美。“嘿。”她淡淡地说。

“你怎样啊？”我已经 14 天没吸毒或喝酒了，我感觉清醒无比。“世界真美妙。”我的态度足以让真实世界的人感觉厌烦。我哇啦哇啦地讲我感觉多么好，我上的那些课多么有用处，这里的导师多么厉害，等等。我说我剃了个光头。“简，我觉得我已经找回原来的我了，”我说，“我在学习如何再次生活。”她回答之前，有一两秒的停顿。

“是啊，你能好好度个假，享受享受，挺好的。”她说，“我越想越觉得你这次太自私了。你一点儿都没有考虑到女儿，没有考虑到我。你考虑的都是你自己。”

我头顶的彩虹开始渐渐消退。

“你的信用卡账单我拆开看了，我帮你还了。里面有十几笔住酒店的钱。”

我想要解释，但她一个字都不想听。我能说些什么呢？我在那些酒店里待上六个小时，看着黄片，打着飞机，吸着可卡因。而她，在家里为我担着心，还得做事情，照顾罗拉。

“简，我没有背叛过你，”我说，“我保证。”

电话那边传来忙音，我拿电话的手垂到腿边，我望着远山。粉红的晚霞中带着紫色。沙漠那边吹来的是温暖的微风。

34

28 天之后，我已经洗心革面了。我的身体里再也没有那些残害我的毒素了。太阳晒过的肤色，头剃得光光的，胡子也剃得干干净净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三十七岁还要年轻。我走出大门的时候，闭上眼睛，抬起头，让脸对着阳光——就像上次在第 57 街时那样，不过这次没有人来撞我的肩膀。我唯一感受到的是新生活带来的暖意。我睁开双眼，看见老朋友比尔站在那里等着我，好像他是从天而降的。“我来帮你拿行李吧。”他说着，笑了，脸上的皱纹好像皮夹克上面的褶子。我跳上他的那辆车，扣上安全带。“哪家航空公司？”他一边把车开出去，一边问我。

“带我到最近的酒吧。”我说。他一脚猛踩刹车，车子吱吱叫着停住了。他看着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眼里的笑意出卖了我一脸的严肃。我们都一起大笑起来。

“拿瓦侯族印第安人的话说，笑是纯净的象征，”他拍拍我的膝盖对我说，“你会没事的。”

电梯门开了，简拉着罗拉的手在等着我。罗拉有点不知所措。我的心都快碎了。只有胡迪尼和 MC 很高兴看到我回来。我蹲下来，张开双臂。接着，罗拉笑了起来，蹒跚地走了过来。我一把抱起她，紧紧地抱住了她。我的宝贝儿感觉到了我的脆弱，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窝。简此时比较难沟通。她站在那里，紧紧抱住双臂。她想挤出点笑容，但是她笑不出来。

我们那天就在一起，在家里待着。我们之间的那种尴尬，比第一次约会还糟糕。不知道简的感觉是不是和我一样糟糕。这种感觉只是我觉得不舒服的一部分原因。我以为把过去扔在脑后很简单，但有很多东西都提醒着我用毒品的事情：看着电脑，我想到黄色片子；厨房里的盘子让我想到可卡因；狗让我想到过去的那些不眠之夜。我把手放在客厅的砖墙上，希望能找到可靠的感觉。但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那段日子很难熬。我和简的爱，有时候和以前一样牢不可破，但有时候，我们就像是陌路人。她老打电话，有时候是跟朋友，大多数时候是跟她妈妈聊。好像她们是合伙来要跟我过不去，而我也没有理由可以向她们反击。我是那个瘾君子，是我自己去戒毒，一走了之一个月。我想，简的妈妈就像任何妈妈一样。我想，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情。简没有离开我，但是我们都同意，我们该搬出闹市区，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开始生活。我们决定先过完这个假期，然后开始着手行动。我必须向简还有所有人证明，我康复了。在戒毒中心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戒毒后的12个月内，不要有什么重大的改变。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不太容易。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要由简来决定。我要做的就是多赚点钱。

1月份的时候，我在家里搞了个办公室开始找工作。每天，我花几个小时阅读电子邮件，在网上看股市行情，还打好多电话。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了我的情况——华尔街是堵透风的墙。不知道我情况的，也一点都不惊讶。“特尼，你觉得华尔街95%的人拿长假是干啥用的？”我朋友罗伯特问我。所有人都想来帮我。起初，我以为大家都那么爱我，但后来我发觉，如果他们帮我找到了工作，就等于给自己找了个欠他们人情的买方人士。

罗拉很喜欢我待在家里。如果不太冷的话，我们会一起去公园玩，荡秋千。我们一起吃午餐，一起看电视《朵拉探险记》，一起睡午觉。晚上呢，我尽量安排去参加戒毒后支持会，戒毒中心的人一直告诉我要去。

每次我出去，简都很紧张，怕我又会一去不归。在会上，我碰到一个叫凯文的，他也在华尔街工作。他高高瘦瘦的，头发已开始泛白。虽然看上去不太像，但他在大学时还入选过篮球队。他问我女儿情况怎么样，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情况如何。他像是真的关心我所做的事情。他有个朋友叫克里斯。我猜凯文是克里斯的担保人。克里斯脸圆圆的，戴着眼镜。他是搞媒体的，互联网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戒毒多久了，但他穿的希姆斯衣服很不搭，一个口袋破了，眼镜腿上还粘着一个白白的标贴。他看上去就是觉得活着很没意思的人。他人挺逗的，像小狗一样跟着凯文。每周一和周四晚上他们都帮我占个座位。我挺喜欢他们的。

有一天，开过会之后，他们约我一起喝杯咖啡。刚开始我还有些拘束。但后来我放开了，我讲的都是简的事情。凯文说她生气是应该的，我只需要专心做好自己眼前的事情就好了。“继续来开这个会，每天给我打个电话，好好照顾自己。”他说，“你已经干得很不错了。”虽然我不这么想，不过他的鼓励还是让我充满希望。我心想，华尔街居然也有这么善良、这么平静的人。

克里斯此时用嘴在眼镜上哈气，接着开始擦眼镜。“在去戒毒的飞机上，你喝酒了吗？”他突然间冒出这么个问题。我摇摇头。“聪明。”他说道，“我喝了，凯文在去明尼苏达州的飞机上一口气灌了三瓶啤酒。”那景象很滑稽，特别是此时的凯文正用咖啡杯来表演当时的情况。这可能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开怀大笑吧。这其实一点儿都不好笑，但凯文继续用咖啡杯表演着，每次我都越笑越厉害。

虽说一切都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但是我的工作开始渐渐步入正轨。1月份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在家里的办公室里坐下，打开电脑，看到三封电邮，都是卖方发的。第一封是卡斯发来的，第二封是另一个朋友奥利弗发来的，第三封是另一个朋友帕特发来的。他们都给我些买方的信息。这个时候，我听到简和罗拉要出去散散步。就在这个时候，我突

然间萌发了一个念头，想要给交易员打电话。我竟然会这样想，这想法本身就很疯狂。“人生要往前看。”戒毒中心的人对我说。我看了。结果是，我穿着内裤，在酒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每隔五分钟就看看猫眼。真糟糕。我抓起电话，跟进了他们给我的几条信息。

那一周就这么慢慢地过去了，有新消息过来，有人要约我面试。我去下城区一家老牌公司面试，面试官非常喜欢我，但他认为我资历过高。他说要给他的一个好朋友打个电话，那家公司可能更适合我。那是一家叫波亚司尼的对冲基金，在中城区，做法跟高利安一样。他们想让我继续做保健板块的交易员。他们说得仔细计算一下，然后会跟我讨论薪水。还有一家叫 SAC 资本顾问的公司，康涅狄格州的，说可能有个空缺适合我，但是他们需要一两周的时间来安排。

跟这些用人单位的会谈，让我感觉我无须存在，都是他们在说。我上次经历这样的谈话，是在摩根士丹利面试，因为我知道《梅洛斯小宅》的剧情而获得了那份工作。我现在知识渊博，很稳重，很自信，我自己都感觉很惊讶。在面试的时候，我都会说，我保证，在这个会议室里，我的 SAT 高考成绩肯定是最底的。但是，如果要打牌赌钱，我肯定总赢钱。这方法每次都奏效。我跟他们解释经营、管理佣金的艺术，我说我可以把佣金减半，但依然提供跟别的经纪人一样的服务。我说，我也会犯些错误，但是我绝不会去掩饰错误，我会很诚实地去纠正错误。“我只想找一个位置，让我把需要在华尔街完成的事情做完。”我最后都会这么说。每次，他们都对我报以微笑，跟我亲切握手并保证会给我打电话。

但是，当我独处的时候，我倍感寂寞，丝毫没有信心，更不相信还会有人要给我工作。我想象着，自己的背上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标记，整个华尔街的人都看得到。我曾经是个坏小孩，现在理应受到惩罚。我迫不及待地想让简还有全世界都再次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我的状况其实还不太坏。简没有离开我，罗拉很爱我，我在银行里还有些钱。只是

我还没有重拾那种感觉。我急着想找到一份工作，只要有人给，我立刻会接受。

而一切也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朋友奥利弗给的线索开始有了眉目。2月份的时候，J. L. 波克维兹公司打来电话。这公司以前叫克雷默·波克维兹公司，以前的老板是有“疯狂金钱”这个绰号的吉米·克雷默。那天晚上，我跟罗拉在她房间里玩耍。我跟她玩过家家，模拟晚餐上的谈话。“罗拉，我明天要去面试。”我说。她笑了，朝我扔过一个塑料做的肉丸子。“我其实不想去那里工作，但是，有时候我们总得做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就像你得刷牙。”我说。听着自己嘴巴里冒出的这些话，我觉得里面充满了矛盾。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想要找一份工作。罗拉咯咯地笑着，假装在吃东西。“还有，我得给你买很多肉丸子呀。”我说，我给她挠痒痒，罗拉笑得更大声了。我亲了亲她的额头。“祝我好运吧。”我说。

第二天我面试完走上大街，手机里就有两个语音留言，是保荐人打来的，他们说波克维兹公司非常喜欢我。我吓了一跳——这公司什么都做，就是不做保健板块，而我这六年来只做保健板块的股票。不管那么多了，股票不过就是一个代码而已。第二天上午，一个叫杰夫·波克维兹的人打来电话，让我星期四到公司去签合同。那天早上，我穿上蓝色衬衫和卡其裤。我的头发还是很短，基本是士兵头。我的眼睛清澈如缅甸河的河水。我即将重返买方的战场。

如果在去波克维兹面试之前我对“让纽约更精彩”这句话还有什么怀疑的话，那么这个怀疑在我某天下班回来之后就荡然无存了。简在家中的门廊等着我，她的双手紧抱在胸前，脸色通红，怒火冲天。她跟隔壁邻居又发生矛盾了。那家伙仇视女人，还是种族主义分子，非常令人讨厌。简住进来之后，这邻居就是她的死对头。他把垃圾放在走廊上靠我们的这一边，还经常胡作非为。“这里我是住不下去了，”她说，“如果你想住，没问题，但我得走。”我知道她说得出做得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终于出现了。“好吧，”我说，“咱们开始找房子。”

——我们必须同进同退。简开始登广告卖房子，开始找新房子——这比一份全职工作还忙。她一上网就是数个小时，不停地找。

她备好了地图、看房时间表、中介的电话，把我们的行程严格地规划到以分钟来计算。我们看房的范围从布鲁克威尔到长岛北部的冷泉港。自从罗拉出生以来，我就没见过简如此兴高采烈。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自私。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是歌手，刚做完一个世界巡演。我们谈恋爱 11 个月之后，她怀孕了，妊娠反应很厉害，而且持续了几个月之久。孩子出生后，我还尽情享乐、工作，就让她一人在那巨大的公寓里照料我们的孩子，应付讨厌的疯子邻居。此时，她一心一意地要找到最理想的房子，如果我偶尔变得不耐烦，只要一想到我过去的自私，我就什么都不会说了。

一天晚上，都半夜了，简在网上找到一个房子。“这房子，不知该不该给你看，”她说，“价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考虑范围，而且比冷泉港还远十英里。”（当时我在看重拍的《A 恐怖》，但事后很久我才知道什么叫恐怖。）我还能说啥呢——在电脑上一看，是个安妮女王维多利亚风格的六居室，再加一个客房，再加一个游泳池。

简和我初次约会的时候就提起过，她想住在一间像样的大房子里。简也一直坚持着这个想法，比我要执着多了。她本来就是长岛来的女孩，土生土长。对她来说，在那样的生活区拥有一座房子是一种标志，她认为那是幸福的来源。虽然我也是在大房子里长大的，但我却爱上了都市生活。别的地儿，我哪都不想住。

但自从从我戒毒回来，我的想法都变了。保持体内无毒是我的第一任务，不过，更高的任务是要让简和罗拉幸福，还要赚很多钱。我还是喜欢都市生活，但搬进生活区的大房子里住可能是和女朋友还有女儿保持联系的唯一方式。为了说服我自己，我常常想象着罗拉在家里车道上骑着带辅助轮的自行车，还有她在后院玩耍的景象。

我拿到了波克维兹的那份工作之后，其他的一切也都很快地就绪了。我们知道，要卖那个公寓肯定没有问题。2006 年的年终奖金我错过了，如果我能拿，那一定是个大奖。我的身后肯定也不乏我这样的人，前仆后继地要争取百万奖金。

前往汉丁顿湾的路似乎非常遥远。整个长岛高速都停滞不前，像个大停车场。如果我们买下了那个房子，我得每天这样上班下班，一星期五天。终于我们到了，在一个弧形车道上停了车。我不得不承认，这地方真是美极了，即使那么堵车也值。这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上，新刷过的白漆，前门处还有百尺高的欧洲山毛榉树。我们开过来的时候，似乎一切都活了起来。山毛榉树在阳光中闪耀着。绿草地和树丛真是杰出的手笔。山毛榉树之外还有日本红枫，像个巨大的盆栽；

还有一株 70 英尺高的七叶树。地界边缘是 20 英尺高的冬青树。但最让人心动的是房子本身，特别是那个前廊，像一条大围巾把这个安妮女王风格的大房子团团围住。这房子的价格是 240 万。

简和我站在前廊，把这个两英亩大的地产好好消化了一番。一句话都不用说，我们彼此之间有默契。我抱起罗拉，问她喜不喜欢我们的新房子。她挣脱我的手臂，在前廊跑来跑去，在这个新的环境里愉快地奔跑着。

我到波克维兹上班的第一天，吉米·克里默的名字至少出现过 20 次。他从 2001 年开始就不再跟公司有联系了，但他仍然阴魂不散。这家公司对这个前老板的这种盲目热情的态度让我搞不懂。我看过他上电视，总觉得他是个小丑。我还在高利安的时候，见过他一次，但是大失所望。克里默聘请了高利安搞期权的托德来负责交易。他离开的时候开了个告别会来安抚某些受伤的心灵。不过克里默没有意识到，高利安认为它是在照顾克里默，因为托德和盖瑞关系不好。那个告别会安排在华尔街中城区，高利安公司的人包括拉吉、盖瑞、司莱恩、可琳和我，波克维兹公司的有克里默、杰夫·波克维兹，还有他们新聘请的人——托德。我记得，克里默整晚上都在吹自己如何聪明、如何厉害，似乎他非常迫切想要得到拉吉的认同，但那只是我的观察。直到波克维兹公司的那帮人离开之后，告别会才开始精彩起来。拉吉和盖瑞模仿着克里默，学他尖尖的嗓子，嘲笑他做的那些份额很小的交易。他们把他叫作怪人。

虽然华尔街还是把那公司叫作克里默·波克维兹，但吉米·克里默的名字早已荡然无存了。虽然他阴魂不散，但他不是我的老板，杰夫·波克维兹才是我老板。我挺喜欢杰夫的，我以为他也喜欢我，虽然我们的出身没有任何交集。他是那种正统沃顿商学院毕业、高盛公司实习的科班出身。而我呢，从俄亥俄大学来到高利安，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在学校里他是校辩论队的，那我就是搞笑演员约翰·贝鲁西。也许正是因

为这点，他才聘用我的吧。在华尔街，越是你没有的，你越想要。波克维兹是20世纪90年代对冲基金蓬勃发展期间出名的。克里默频频上电视，杰夫则买下他的公司，一直经营着。但是J.L. 波克维兹也经历过惨痛的岁月，这也是杰夫要聘用我的主要原因：要改变公司的现状。跟阿格斯相比，我进的这家新公司只有1.5亿的资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算是家规模较小的公司。在这儿工作比在阿格斯的初期逊色多了。

私家飞机没了，交易场的座位没了，加长汽车没了，买方的派对也没了，剩下的只有工作：买进卖出的单子、销售员、记录交易的打孔机。如今我不酗酒了，不吸毒了，我的生活只剩下工作。我想，我正在经历一个身份危机。我不再是那个在“天然顽皮”派对上坐吧台边上的那个家伙；我也不再是手持酒杯谈笑风生的说笑大师。虽然我知道我过去的举止对我的关系和事业造成了不良影响，不过没有那样的风采，一切都太没有激情了，太没有意思了。但我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来的：工资。拿了工资，我可以付房贷；付了房贷，我才能保住那个房子；保住房子，我才能让简和罗拉高兴。

我们是200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搬入新居的。那个时候，春意盎然，院子美极了。那房子是1906年建的，原主人是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来的时候运来这些树，所以这里才会这么美。我们最终以210万成交。老公寓我卖了，扣去中介费、出租房屋让渡税、豪宅税，还剩50万，都当作大房子的首期了。我还又从支票账户里提了10万元，付了些房款，这么一来，我的支票账户也透支得较严重了。之后，我还从威尔斯·法戈公司借了150万。没错，是借了一大笔钱，但房地产是硬资产。

每天早上四点，我的闹钟就响了，我五点就开车出门了。进城的路得开一个小时。还差几公里要到公司的时候，大约5:45，天际线开始出现。我想：此时，是不是有个男孩正走出芭芭拉的公寓？芭芭拉还在做应召吗？她还活着吗？正在离开她公寓的那个男孩，是不是已经吓得不

行了？不知道他今天要怎么上班？我心存感激，我不再是那个男孩。我的工作时间是早六点到晚六点。回家路上，交通拥堵，得开上两个小时。杀了我吧。第一天上班简直是个噩梦。我猛按喇叭，变换车道，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几乎要哭了。她要我回家路上带晚饭回家。“没问题。”我说。我都想要喊了。

我买了辆本田混合动力车之后，就可以使用快车道了，上下班交通就方便多了。但不管是快车道还是我整天听的体育电台，都不能把我的顾虑从大房子上拨开。但问题是，房子太老了，已经 200 多岁了，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老。我们不断发现需要修理的东西：内部需要油漆，有些地板翘起来了，有些电线好像是在煤气时代转成电气时代的时候布的。修理工人每来一次，我的钱就花掉一笔。接着，我们又突发奇想，要装一个影院系统。我想象着在那里播放我自己拍的电影。我们刚搬进去的时候，三楼是铺着复合材料的阁楼，低低的，布满了蜘蛛网，到处是尘土。墙还是棕色的。简神奇地为阁楼换上了长毛地毯、竹子的顶罩、影院座椅、106 寸下拉式荧幕。但代价是 15 万，是我借来的。我计划着靠我的奖金来支付。我在投资硬资产，我不断提醒自己。但支出却是巨大的。

夏天结束之前我开始觉得工作上手了。起初几个月，我找到一些降低成本的方法。我把没用过的彭博终端给撤掉了，把没有用的研究服务给停了，还有，我保证过的，我把佣金和对冲费用都降低了，此举会让公司少花 1 500 万。但是，我花了挺长一段时间才把交易搞得有声有色。我经历了四个月赋闲才找到这份工作，之前的两年我用了不少毒品。每天下午，我都觉得比较累。我得学新的交易系统、新的电脑知识。最重要的是，我得适应自己的新身份。最终，我完全恢复了。之后，我对交易感到信心十足了。接着，我就开始赚钱了。

有一天，杰夫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叫我把所有的苹果股票都平仓。

“雷曼公司就要给它降级了，”他说，“我们得清仓。”他几乎疯了，要我立刻操作。就在上星期，他还跟我说苹果股票是我们公司买得最好的股票。但现在，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知道，此时卖出是个错误之举——我全身每一根交易员神经都这么告诉我。但我现在初来乍到，希望尊敬大家，特别是对我的新老板。

“这个降级有什么说法吗？”我问，“有没有实质问题？”

“没有，”他说，“一派胡言，这不过是在评估——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我走进他的办公室。

“杰夫，”我说，“如果这是我们买得最好的股票，现在就不应该卖。我们应该很高兴啊，现在可以买进更多。”他已经命令初级交易员希瑟卖出5万股了。

“雷曼公司说会降三四块钱。”他说。

“那又怎样？”我说。但我看得出杰夫已经铁了心。他朝希瑟嚷着，再卖出25 000股。

股票应声跌落。我坐在桌前，看着股价直落4块，正如杰夫所说。但我知道自己没错。又过了一两个小时，股票开始涨了。我们没有补仓。当天下午，股票的价格已经高出雷曼公司评级下降时的价格，但是我们手头已经少了75 000股。杰夫没跟我说话，但我清楚，他知道我是对的。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是对的。

不过，挺有意思的是，几乎是在我摆脱过去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诉说。而且，几乎是同时，我立刻想到一件事——我怀念起“保健黑手党”的那帮人，我应该可以跟他们说说我这次准确的判断，而他们也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处在同样的处境，我们都了解所有的玩家、背景故事还有其他的荒诞故事。当然，我跟简谈了。但是有关华尔街故事，她听了总是不以为然地转着眼珠子。跟新办公室里的人没什么好谈的。有些时候，那个过去的我会跳出来——我会唱首歌，

会说个有趣的笑话，同事们都会哈哈大笑。不过，他们一般都认为我是突然接错了线。现在不同了，这不是我钟爱的华尔街了。

有一天下午，卡斯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要跟我聚聚，吃个晚饭。我重回华尔街之后还没吃过工作晚餐呢，当然了，跟卡斯吃饭不算是那种工作晚餐。再说了，他知道我已经不喝酒不吸毒了。我说聚聚很好。我需要在上班、工作、下班、睡觉之间做点别的事情。这一切慢慢要让我吃不消了。卡斯还要带我去第75街他的新公寓瞧瞧。他现在跟女朋友同居了。我说可能下次去吧，咱们就吃个晚饭，我最好在罗拉睡觉之前赶回家。

我们在我的办公室对面的休斯顿餐馆碰头。其实，那个地方在花旗银行大楼里，现在叫希尔斯通，但大家还是叫它休斯顿。我们吃了些鸡柳蘸菠菜酱汁，我原本要离开了，但卡斯问我最近有没有见过兰迪和詹姆士。回来之后我没见过他们。我每天都会和兰迪打电话，因为他现在罩着我做事，不过我没有见过他。但我戒毒后没跟詹姆士说过话——我们的关系是纯粹的派对/生意关系，而我现在也没跟他做生意了。不过，我还是怀念那些旧时光。在我戒毒回来之后，参加过几个支持会，他们告诉我要远离那些能够激起我毒瘾的人、地和事。但是眼下情况越来越离谱。现在我不能喝酒，但我不能连朋友也不要了。另外，如果我还想在华尔街混，我总得有些表示吧。我不会碰可卡因，我也不会碰酒。所以，会有什么害处呢？“我们去见见他们。”我说。但是卡斯不想这样，他想让我跟他回去看看他的新公寓，见见他的女朋友。“下次吧。”我说。

“白宫”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只是更脏了。厨房里有四个人，兰迪和詹姆士跟另外两个人围着一个可卡因的盘子。他们看到我来了，先是震惊，接着是愧疚，最后是高兴。我跟大家都招呼了一下，接下来就是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我们都看着台面上的那个盘子，上面盛着一堆可卡因。大家当着我的面，都不敢动。可能大家都在等我先动手吧。“别管我

了。”我说着，朝那个盘子挥了挥。但我感觉很不舒服。

我走开了，不在那个台面前待着。我点燃了一根烟。兰迪吸了一大条可卡因，然后走过来跟我说话。“我们要搬了。”他说。我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詹姆士开始侃侃而谈。

“你听说了吗？”他说。此时他已经吸了不少，开始有点颠了。我当然没听说。“还记得肯尼吗？”他说。“记得。”我说。他不是混华尔街的，但他是“白宫”的常客，也是给“白宫”提供白粉的人。他天天都在这里混。他怎么了？“他被逮住了。”詹姆士说。

“据说，是他告密的，”兰迪说，“不能允许他再来这里。”

我感觉整个屋子都在旋转。我想到那个戴着巴尔的摩欧里奥队球帽的人，在我家公寓前停着的那辆黑色轿车。我还一直以为会因为在高利安的内幕交易被抓。但也可能是警察想抓华尔街的一些小混混而已。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要回家——回汉丁顿海湾。我想紧紧抱着我的孩子。

几天之后，我在办公室里跟兰迪讲着电话。他邀请我来“白宫”，他要搞个告别会。那是最后一次的狂欢。他告诉我，他们要穿一件 T 恤，前面画一个充满血丝的眼睛，后面印着我的名言：“我们不排队，我们鄙视排队。”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那样说，但我还是要了一件 T 恤。我挂了电话，我不会再靠近“白宫”，特别是有人可能已经被抓了，还可能是个毒贩。

但是那天晚上的情景，还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下班之后，我到了公司附近的停车场。管理员看见我，对我笑了一下，接过我的停车票，跑着去取我的车。差不多每天都是同一个管理员；我都会给他三五块钱的小费，所以他认得我。只有一两次例外。我总是从第 56 街出口开出去，这样我就可以立刻右拐，上第 5 大道，接着上昆斯博罗桥的上段。载车电梯的门开了，管理员开着车，他却对我示意走第 55 街的出口。他为什么这么干？如果我从第 55 街出口出去，我可以右拐，朝第 2 大道开，进入下城区，到达“白宫”。

如果我去了“白宫”，几乎就可以肯定我会用可卡因，即使如此，即使我知道用了可卡因，我和简还有女儿的关系就会土崩瓦解，我开始考虑要不要去。一旦考虑的门打开了，想去的念头就更强烈了。我闭上眼睛，想要把这个念头挤出我的头脑。“不要做傻事，”一个声音在我头脑里出现，“直接回家。”我睁开双眼，管理员正看着我，一脸的疑惑。我

把头慢慢地往第 56 街出口方向移，接着开出去，回家了。

虽然我的大脑做出了这样的明智决定，但我的身体却还没有消停下来。我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好像我的车是刚冲出悬崖。我可以感觉到腋下在流汗，往我身体两侧流下去。我点上一根烟。上了桥就好了，只要我上了桥，就不会再回去了。路上非常堵。开到第 57 街之前就遇到了好几个红灯。我又点上一根烟。现在能来一口可卡因该有多好啊。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了，我提醒自己。接着，我的小小幻想把我带到常去的地方：在酒店的房间里，有足够的可卡因和黄片可以让我玩好一会儿，再来一瓶酒让我平衡我体内的物质。我低头看着控制台上摆着的我家的钥匙。我抓起那把钥匙，幻想着把它插进一包可卡因里面。我拿起那把钥匙，靠近鼻子，狠狠地吸了一鼻子。我的头往后仰，双眼紧闭。接着我身后响起了喇叭。我睁开眼睛，前面的车已经开始动了。我把钥匙扔回控制台上。回家就好了。在我开过关键的那一点之前，在我上引桥之前，我还感觉到最后一次冲动，想调头回去，开回下城区。但我又意识到，我周围的车已经封锁住了我的命运。我慢慢地开上了引桥，开上大桥。

那一星期的后几天，我住在城里，住在莱克星顿街的一家酒店里。这么开车上下班整死我了。简安排她妈妈来带罗拉一晚，因为简要跟一个朋友聚一个晚上，我也顺便逃避一下那个全世界最长的停车长龙。我住进酒店之后，打了个电话给凯文。我们去了上西区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吃法式薯条配可乐。“你家附近有支持会吗？”他问我。

“还没找到，”我说，“这星期，我回家太晚了，周末我都跟简、罗拉在一起，还有家里一堆事情要做。周末我们才有时间真正能够做些事情。”凯文点点头，但他的表情介于无助与同情之间。

跟凯文话别之后，我穿过中央公园来到东区。我走过莱克星顿街，走过第 2 大道，经过一个又一个酒吧。以前没注意到竟然有这么多酒吧。我想，是因为如今我不喝酒了，才会注意到有这么多酒吧。我发现自己

的眼神起初会在每个酒吧门口停留。我会朝玻璃里面望，看着那诱人的黑暗。我又经过一个酒吧，典型的纽约路边小酒吧，特别诱人——我常混的那种地方。它对我不断发出牵引的力量，我轻易地就投降了。我找了个空位在吧台边坐下。隔着两个座位的那个男的瞄了我一眼，他让我想起几年前的拉瑞。调酒师问我要喝什么，我直勾勾地看着调酒师的眼睛，但我的嘴动不了。“我先去加点冰块，”他说，“你想想看要喝什么？”他低头去拿一个冰桶，而我则朝门口夺路而逃。

6月的一天，杰夫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要跟我聊聊信用市场。信用市场？我才适应次贷的事情，现在他又要跟我谈信用？自从2月份之后，华尔街的人都在谈论次贷。汇丰银行曾把105亿美元的次贷抵押证券列入坏账，那是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次贷。接下来的几个月，次贷成了华尔街人人谈论话题。刚开始，大家主要担心的是房屋建造板块和财经板块受到影响。但到了6月的时候，华尔街——至少我负责的这部分——不那么担心了。大家都说，那是住房方面的问题，是某些贷款群体的问题。“都是小部分人，”我听大家这么说，“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但它的确给市场带来动荡不安的局面。市场越动荡，越大钱可赚。我开始进进出出交易财经股和房屋股，低买高卖，跟着市场的节奏行事。我能感觉到那个节奏，我也适应得很好。与此同时，不管什么次贷不次贷，股市的其他板块也因为合并和收购不断上涨。这股市涨疯了。道琼斯指数有三位数的升降。自从我开始交易以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从前，M&A交易一个月来那么一次吧，现在，每天一次。谷歌买下了双击；雅虎买下了正确媒体。因为有传言说微软要买下雅虎，我们就获益100万。收购计划多如吃豆游戏里的豆子。我要做的就是好好引导一下吃豆子的方向。接下来，出现了广告网络的大整合。我们的一位分析师说，有个叫aQuantive的数码广告公司是主导的收购力量。我们认为他说得对，所以就买进了。一周之后，有新闻爆料说微软要出60亿美元买下

aQuantive 公司。这消息公布的前一天，aQuantive 的资本只有 28 亿美元。我们从交易中获益几百万。小菜一碟。

但是，当杰夫叫到我到他办公室去，可不是要拍拍我的后背，说我干得好。我的所有成就都是因为他领导有方、计划周详。我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他说他看到次贷和信用之间有联系。他开始谈高风险贷款如何作为以资产为抵押的债券被捆绑销售，全世界都如此，特别是在欧洲。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认为他想说贷款的衍生作用吧，但我也搞不懂。但他说起抵押债务义务的时候，我不想再分析了。“你要我怎么做？”我问他。

“开始关注信用市场。”他对我说。我有点担心。我现在唯一关注的是怎样不被堵在长岛高速公路上。

我到家的時候，簡和羅拉在門廊那里等着我。我開上車道的时候按了几下喇叭。簡跟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别扭。问题在于，她不信任我，即使我几乎九个月滴酒未沾、毒品不碰。“我打电话找了家公司要给游泳池加个盖。”我走上门廊，朝她走去，她对我这么说。羅拉飞快地朝我跑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太好了。”我说，语气也尽量表现得很兴奋。但她的每个字都标上了金钱号。我们都担心游泳池没有盖，家里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到处乱跑。虽然我的工作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的房子是个无底洞。

这之后的几周，我尽量多学习了解关于信用市场的情况。我的电脑屏幕上开始不断出现“技术娱乐设计”利差、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隔夜指数掉期利差、主权债务还有主权信用违约掉期等。关于这些，我知道的不比羅拉多。但我知道一点：信用在吃紧，如果银行不像以前那样放款，经济就要开始出问题了。

杰夫比其他人早一两个星期开始关注信用危机，但现在他就像《万圣节》里的杰米·柯蒂斯。他知道迈克尔·玛雅在家里，但他仍然耐心

地躲在衣橱里等待着，要从衣架后面吓迈克尔。他就喜欢这样做。虽然我们账上还持有不少股票，但我们随时可以卖出。他宁可在股市跌了1%或2%之后抛售，也不愿意成为能够触顶的英雄。

7月份的时候，我们平仓了，全国财经——美国最大的单一家庭房屋抵押贷款商——公布了他们的违约率几乎翻了一倍，达到25%。随着房价的猛跌，越来越多的贷款无法被偿还。接着，7月底的时候，贝尔斯登公司宣布，它们两个次贷对冲基金的所有价值全部报销。这个消息让人震惊。外国银行——如汇丰银行——出了问题，是一回事，如果是华尔街自己的银行出了问题，那就是出大事了。情况就像非典出现在了中国香港，你为那些中国人感到不幸，但如果你周边的邻居也戴上口罩，你心中的恐惧是完全不同的。三天之后，道琼斯指数首次攀升到14 000点。不过，好景不长。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将停止向三个基金放款，希望先理顺全法国范围内的次贷混乱情况。两周之内，道琼斯指数狂跌10%，新房屋价格降了20%。整个股市跌疯了。

由于有欧洲银行和美联储注入资金，信用挺了一段时间，股市也正好做了些修整；10月份的时候，股市又高升创下纪录。这次的高涨是因为微软、谷歌、苹果和英特尔这些技术公司的利好消息而导致的。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解读这样的表象。我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压力过大，但是股市竟然依然上涨。我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但我不想去相信这个事实。问题在于次贷不像几个月前那样能够得到控制了。真正被控制住的，是真相，是美国最大、最有声誉的几家大银行——花旗、美林和UBS等——内部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真相丑陋无比。

万圣节前一个晚上，罗拉吃晚餐的时候打扮得像白雪公主。我们要在烤盘上烤点肉，做汉堡包。天气很温和，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次在户外吃饭的机会了。简把门廊布置了一下，放了几个友善的小鬼，有鬼脸的南瓜灯、真人大小的女巫，为了不吓着罗拉，女巫的脸是微笑着的。

女巫从前廊的天花板吊下来，随风摇曳着。我们坐下，吃着晚餐，我的眼睛无法从我的公主身上移开：乌黑的头发上，戴着一个塑料的“钻石”后冠，她的皮肤洁白如珍珠。她把肉拨到一旁，她更喜欢吃薯条和橙汁苏打水。她吃了几口，就跑到院子里追着我们的两条狗去玩了。在我们的白色围栏内，绿色的草地上盖着一层日本红枫的落叶。罗拉和两条狗奔过来跑过去的。简坐在我对面，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牛仔衣。

“我有点担心。”我说。她把头一歪，露出疑问的表情，同时往自己的盘里夹了一些沙拉。“不算吃的，我们每个月的开销得有一万二。”

“那咱就节流咯，”她说，“清洁女工可以不要了，电影频道也可以全部取消，我们不去外面吃饭，度假也不用提了。”

我有经验，到时候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总是这样的，但我在头脑里飞快地计算着华尔街会如何。我总感觉焦虑不安。“这么多账单，地产税，6.5%的利息，我们的日子会比较紧的。”我说。简点上一根烟，但是她不让烟影响到罗拉，她把烟朝房子的方向吹。院子里，罗拉的脚步把地上的落叶踏得支离破碎。

“呃，如果我们住不起这里，我们就把这地儿给卖了，搬到小一点儿的地方去。”她说。

“对，咱就这么干。”我微笑着说。但我都不确定能卖得出去。

2007年的11月1日，我到公司的时候，杰夫已经到了。很不寻常。我还没走到办公桌前他就跟我嚷着说什么梅瑞迪斯·惠特尼的报告。我不知道梅瑞迪斯·惠特尼是谁，更不知道她报告了些什么东西。我打开电脑，给卡斯发了一封电邮，问他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还没上班。这个点儿，谁都还没来上班，除了在华尔街搞外国股票交易的。我查询了一下，初步了解了梅瑞迪斯·惠特尼。她看上去很惹火，像是喜欢搞姐弟恋的那种，如果能跟她一起玩，一定很有意思。接着，我查到梅瑞迪斯是欧本海默公司的分析员，她写的那份报告好像让整个华尔街都吓到了。

杰夫嚷着让我卖掉 SPY 和 QQQ 的股票。他让我把所有股票都给卖空。那份报告我还没看，不过我老板的声音是明确无误且十万火急的。股市还有几小时才开盘，所以我开始在 Instinet 程序上输入卖出 SPY 和 QQQ 的命令。价格不理想，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杰夫才不管这么多呢，他只想能卖多少卖多少。大约一小时的功夫，我卖空了 5 000 万元的股票，又过了几小时，公司的股票完全卖空，而且，似乎今后一段时间内都会保持这样的状态。

惠特尼的报告其实是对美国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集团——偿还能力的一个苛刻评估，它给华尔街造成了地震式的影响。大家都认为花旗这样的银行是坚不可摧的，那是宇宙的主宰居住的城堡。但几周之后，它们的大金库一打开，里面全都是废纸。惠特尼发表报告的时机，选在了美联储开会的时候，她在会上发出了警告：经济在开始萧条，繁荣都要过去了。

那个周末，我把罗拉抱进车里，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到汉丁顿村的中心。去纽约大道的路上，我看到有大房子前面贴着出售的牌子，一个又一个。我沿着纽约大道开到了主街。汉丁顿村是个小地方，很宁静，这也是我们选择在这里买下那个维多利亚式房子的原因之一。小路上铺的是红砖，铁制的街道煤气照明管道还在。这样的主街最适合搞欢迎仪式大游行了。但今天，我看到的是数家店面关门大吉或者即将歇业，我不禁思考：以前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这些？

2008 年 3 月

晚上 6 点。下雪了。动人的竖笛声隐隐传来。起初只是几片弱弱的雪花在飘舞着，伴随着竖笛优美的旋律。雪花飘舞着落下，景色动人，像梦一样。这片雪幕越来越厚，笛声也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兴奋，似乎我回到了七岁的时候，我刚刚意识到下雪了。

光滑的红木咖啡桌上堆放着可卡因，旁边是信用卡、一杯威士忌酒、两包新港牌的烟、打火机，还有一个遥控器。我抓起手机，拨了号。我站了起来，在费茨帕特里克酒店的豪华套房里慢慢地踱着步子。这是最艰难的部分。我现在需要打这个电话，然后才能够开始行动。但现在就跟简和罗拉道晚安，是不是早了点儿？简从来就没有要监督我的意思，她只希望我一切都好。她知道，上下班这么奔波着，我肯定累死了，所以我们说好了，每一两星期一次，我在城里待一个晚上。不过，她以为我是在卡斯家里，而不是在一个每晚 400 元的酒店套房里。她接了电话，我装得很随意，但露出倦意，她会觉得我累了。“今天你怎样？”她上来就问。这个问题最近她经常问。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华尔街怎么了。

“还不算太差，”我跟她说，“今年还是正数。”

“那我就高兴，”她说，“我们需要你保持正数。”我说要跟罗拉讲几

句。简叫着罗拉，但是罗拉现在不要跟我讲话。接着简开始讲罗拉上学前班的事情，但我没有在听。我盯着那堆可卡因，我得挂电话了。

“我要钻到被窝里，看个电影，”我说，“我可能会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那我就先跟你说晚安了。替我亲亲罗拉。”

“好的。”她说，不过听起来有点不爽。是不是我打断她的话题了？她还想说点什么罗拉上学前班的事情吗？还是她起什么疑心了？

但我的问题很快就被再度响起的竖笛声给掩盖了。我把一张20块钱的钞票卷成管状，用信用卡把可卡因砌成大大的一条。我用遥控器点了今晚的第一个黄片，点上一根烟。我吸下整条的可卡因，那冲劲直接灌到我的大脑，然后遍布全身。

可能是几天之后吧，但我不记得了。那时我在工作，收到卡斯的一封邮件。那是一张照片，一张两块钱的纸币贴在比尔·斯特斯总部标志的上面。JP摩根公司现在只要付这么个价钱来买比尔·斯特斯的股票，而一年前这股票值171块钱。我看了看办公室，分析师静静地坐着，眼睛盯着屏幕看着。另一个交易员希瑟忧心忡忡，缩在她的椅子上。杰夫则看上去好像几个月都没有睡觉了。我想整个华尔街都是这副模样。无所谓了，买方、卖方、混合收入、资产或者私人资产，我们都玩完了。

我给詹姆士发了个短信，这几个月我开始跟他交易了。“4：15 见个面。”这是我们的暗号。4：20 是抽大麻的暗号，那么我们都认为4：15 就是吸可卡因的意思。一整天，我拼命跟詹姆士交易，交易量巨大。股市收盘之后，我走在小路上，抽着烟。中城区总是有那么多人，大家都往中央火车站赶，几乎所有人都拿着个手机贴在耳朵上。我都能听到他们在讲什么：有个女的，长岛口音很重；一个男的，拿着耳机轻声细语；一个老板对他的秘书发火。街的对面，有个骑单车送信的人。他的大腿上都是文身，胸前戴着一个大链子，像个奴隶。我看着他，他避开我的眼神，开始摸他的鼻子。我知道这是暗号。我坚信，他是在监视我。此

时，詹姆士摇摇摆摆地从第3大道走过来。我把我的那包新港烟给了他，他接过塞进大衣的口袋。“真是一团糟，老兄，”他说，“我所有的账户都很惨。”

“了解了解，”我说，“真惨。”但我关心的只是他偷偷塞进烟里面的那个小袋子。詹姆士问我今晚怎么安排，我说要跟个搞分析的一起吃晚餐。“这个我需要，”我接过他递还给我的新港牌的烟，“足以度过今晚。”他想象着我跟华尔街一帮人正襟危坐着，笑了。我正要转身走开，突然感觉一阵恐慌。“这事就你知我知。”我说。其他人都不能知道，连兰迪和卡斯也不能知道。

“没问题，”他说，“我能保密。”我看着他的脸，看是否有丝毫骗我的迹象。他经不起我这么看他，眼睛转开了。我用拳头轻轻在他肩膀上捶了一下，然后走开了。

我回到费茨帕特里克酒店的房间。汉克·宝森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把可卡因倒在面前的咖啡桌上。我吸了一条，接着把电视声音关掉，看着宝森的嘴唇在说着什么。我又点了一个黄片。

在一周或两周之后，下班后，我到中城区一家酒吧去出席一个非正式的慈善会，那是给受伤战士筹款的慈善会。我走进的时候，听到几个人叫我的名字——他们很惊讶我会来。我走到吧台，叫了一杯可乐。“我戒酒了。”我对调酒师说。他没多问，只对我说，戒了很好。我背靠着吧台，看着这里的人群。突然间，我开始疑惑：这里的人都比我年轻。十年来当买方的日子在我头脑中滑过，我觉得好像还在高利安，跟盖瑞和拉吉在一起。不久之前我还在类似的慈善会上碰到过拉吉。他表现得好像完全不认识我。看他这么势利，我哈哈大笑。我想在他眼里我已经死了。上次见到盖瑞是在我们一个朋友四十岁的生日会上。他们请了“阿夏”乐队来助兴。仗着我体内的可卡因，我拐弯抹角地说起MDRX的事情。我说，不知道别人说过啥，但我对我这边的事情深表遗憾。他

看着我的眼睛，跟我握了握手。我想，他以为我在道歉，但我不在乎。我觉得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在这个给受伤战士筹款的慈善会上，我看到一个瑞士瑞信银行的朋友走了进来。看史蒂夫的样子，好像他刚从海滩度假回来。他肤色晒得很健康，长长的头发，似乎被阳光挑染成了金黄色。他在华尔街家庭长大，但他更喜欢冲浪。他给我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问我情况如何。看到我手里的软饮料，他脸上露出微笑。“真为你感到高兴，兄弟。”他说。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我却是个伪君子。接着四五个认识史蒂夫的人走了过来。“我哥们特尼可是传奇式的人物，”他说，“他办的派对，绝了。”他跟他们说着南沙滩还有瑟斯奎哈那的事情。“他回来的时候，皮肤都是绿的。”他说完大笑着，但是尾声可以听出微微的伤感。我也回想起9·11事件之后的慈善晚会，还有我的生日大狂欢。我想着当时的我（或者说我以为的那个我）挥霍过的钱，还有赚过的钱。我是谁，到底是谁啊？我父亲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在车道上铲着雪，鹅毛大雪铺天盖地飘下来。但他不理睬，继续铲着，直到天色全黑。我看看四周，我想着这么多人，不知有谁来自我的家乡，有谁即将重蹈我的覆辙。就在那个时刻，我感觉对自己很失望。随着这些记忆慢慢消退，眼前的事情慢慢更清楚了，大家的笑也停了。华尔街面临的这个巨大灾难让大家都觉得很不自在，大家头上似乎都悬着一把剑。这就像在葬礼后开一个派对，大家都笑不出来。

但史蒂夫还是不停地说我事情。他说那时候，他的同事布莱恩在交易桌上翻了一个筋斗，我就给了他10万份股票。“布莱恩脚踝扭伤了，整个星期都瘸着来上班。”他说。这些年轻的交易员看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兴奋极了。但史蒂夫的话好像是我的悼词。我借故走开一下，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此时我看到詹姆士站在酒吧入口的地方。

已经是凌晨6点了。我低头看着办公室厕所的马桶，里面是我吐的

东西。我嘴巴里还有昨晚喝的威士忌的滋味。我又狂吐起来，这次只有胆汁。我抓了些厕纸，抹着嘴角。冲了厕所，我在马桶上坐下，大口喘气。我站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当我看到镜子里的我，我真痛恨我自己。我的脸是猪肝色的，毛细血管肿胀。看上去我就像一个刚从火宅里逃出来的人。我把凉水浇在脸上，又看了看镜子里面的我，希望我的脸色能够奇迹般地恢复，但是一点没变。我挣扎着回到办公桌前。希瑟问我是不是还好。我说我病了，可能是流感。她说我应该回家。“回家去，”她说，“好好照顾自己。”但我摇摇头，继续逞强。等待股市开盘似乎等了无数年。等开盘了，我的屏幕好像也充血了，全盘跌，一片红。我感到鼻子里往下流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洗脸的水，或是我流鼻涕了。接着我看到一滴红红的液体滴在键盘上，又一滴，滴在同样的地方，我的血滴在了键盘上。

星期四，卡斯正在看体育节目的时候我到了他家，在第75街。他女朋友罗莉在厨房里。她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跟“涡轮”完全不同。卡斯家让我想起我在第67街上的公寓，简单的两居室。我没钱可以继续住费茨帕特里克酒店了——另外，我一直担心简会查看信用卡对账单，看到我住酒店，而不是住卡斯家里。罗莉朝我挥挥手，她觉得我很惨，认为我肯定疯了才会买离市中心那么远的房子，还贷了巨款，本金加利息远远超过房子的价值。我把行李包扔到客房的床上，然后过去跟卡斯一起在沙发上坐下。他想聊聊股市的情况。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可把我折磨坏了。我的口袋里有一包可卡因。我给简和罗拉打电话道了晚安。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视，我开始打哈欠了。“我想先去睡了。”我说。卡斯和罗莉互相看了一眼。“我明天再跟你聊，”我对卡斯说，“谢谢你们收留我。”

凌晨两点过后。我需要酒精来平衡我的身体。之前我看到冰箱里有一瓶酒，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厨房。啥都看不到，一片漆黑。我用手摸着，

想要摸到厨房的饭桌。我知道饭桌就在我的卧室门口。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光着的脚丫子，可以感觉到木地板被瓷砖所取代。我伸手摸冰箱在哪里。我拉开冰箱门的把手，轻轻地，尽量不出声。但打开酒瓶的声音就像是拉开了维克牢粘扣带。冰箱的门开着，露出一片三角形的光亮。我从冰箱架子底部拿出酒瓶，拔起瓶塞，对上嘴。我使劲一口气猛喝着，歇了一下，又来了一次。我把酒瓶放回冰箱后，感觉后面有人。我转过身，看见罗莉在我身后看着我，她一言不发，跑回了她的房间。天啊，她的出现把我吓呆了。

五分钟之后，我回到卧室，接着听到敲门声。“你得离开了。”卡斯说。真是开玩笑，我心想，现在可是凌晨两点半。“你再也不可以在我家里干这个了。”

“干啥？”我说。

“特尼，我们知道你在吸可卡因——你来我这儿的时候就开始吸了。”

“那又怎样？”我说，“咱俩一起吸过好多好多。”

“现在不同了。你去戒过毒，你也承认过你有问题。我希望你平安无事，我不要你在这里吸。”

“浑蛋，”我骂他，“没有我，你连这套公寓也买不起。”

“你最多待到天亮，”他说，“然后你就走人。”

卡斯爬上我的加长汽车，自我介绍说他叫“涡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我向李察和美琳达保证他不是小松鼠，给他第一个订单是什么时候？该死。

一周之后，我下班开车回家。那段时间我没怎么用毒品，我知道我必须戒掉。我最大的恐惧是让简发现，而我心里总想着要吸最后一口。我跟会计师谈过了，我说我的合作伙伴不再付泽西城多汁烤肉汉堡的店租了。“那房东就得留意了。”杰瑞说。我从后视镜里看到我的数百万的投资散落在长岛高速公路上，似乎有谁打开了装钱的箱子，把钱扔了出

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事必须告诉简，我得让人同情我。

我开进我家的车道时，简正在花园里，不是泳池边上那个蔬菜园——那里面的土壤很肥沃，有时候收割一次过后，还会长出第二茬的蔬菜；她也不在旁边的花园——里面有粉红色的花，也有莓子，有嫁接的苹果树；她也不在玫瑰花园里——里面有七八种颜色的玫瑰，花开得和垒球一样大。她是在房子边上的花园里，那个花园有自己的个性，能长出美丽的花，而我们都不记得什么时候栽过那些花。她跪在土里，身穿一件连体牛仔工服，还穿着我的一件衬衫。她手里拿着一个铲子，额头的汗水在阳光下闪烁着。我下了车，朝她走去。“我的多汁烤肉汉堡的投资打水漂了。”我说。她没有理我。“我想那得损失一百万。”

“损失惨重啊。”她说，从土里拔出一大把杂草。

“罗拉在哪儿？”我问。

“在外婆家。”她说，用手臂抹了一下额头的汗，她手里还握着铲子，但她没看我。

“那好。”我说，脸上带着期待的微笑。“你想干点啥呢？”

“我有安排。”她一边说，一边在绣球花的四周挖着。“冰箱里有点剩的东西。”

我此时演的是电影《猎鹿人》的最后一幕，我演克里斯多夫·沃肯。简的身后，夕阳正在落下。柔软的阳光亲吻着花园和草地。

我想她已经知道我又在吸毒了。

2008年9月29日，星期一，我在办公室看着CSPAN，国会正在投票看要不要拯救华尔街。一票赞成，一票反对，再一票赞成，反对、反对，再反对。就这么过了十分钟，我看到杰夫砸桌子了。我们觉得这是走过场而已，国会肯定不会通过解救方案的。我们都认为救市计划会失败的。我们目前仓位低——少量卖空，还混杂着持有一些股票。随着每一个反对票的出现，我们越来越后悔没有多卖掉一些。跟多汁烤肉汉堡的合作伙伴打过一轮电话之后，我一直坚持，我们必须把商业地产股票卖空，这样就可以在这次的大灾难中稳坐钓鱼台，稳稳地收钱。但杰夫一点儿都不高兴。

华尔街有说法，说那些做空的人会像孩子一样被人欺负。反华尔街主流而行之，是最彻底的孤立做法。我在当买方的时候，不跟人结梁子，赚到了钱而且没有伤到别人。而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我自己曾经万分鄙视的。雷曼兄弟公司——美国第四大银行，最终也申请破产。我认识的人，曾一起参加派对的人，有的现在开始搭地铁，有的抱着纸盒子，里面装的是他们工作生涯的残余记忆。几个月前，美林公司以50%的价格把自己卖掉了。我在那里看着这个市场，不再为了交易而交易，而是为了钱而交易。我觉得空虚无比。很久之前我就觉得我不再有良知了，但此时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我仅剩的一点儿良知似乎在这个股市里也烟消云散了。

国会投票结束了，杰夫静静地坐着，不敢相信电视上显示的结果。他比我早意识到了：卖空还是买空，都无关紧要了。华尔街的钱现在一文不值。投票之后，股市跌穿谷底。这是道琼斯的最差纪录。第二天，《纽约日报》的封面是一个大红箭头往下指向一个数字：777。

星期二下班后，我到中央车站坐了一趟快车。地铁咣当咣当地开着。有个无家可归的人坐在我的正对面。他穿了好多层破破烂烂的衣服，脚上套着黑色的塑料袋。他看到我的时候，正在裤裆那里挠着。他的眼睛像是棕色的花岗岩：又亮又硬。我想不去看他的眼睛，但我又忍不住。每隔几秒钟，我就被他灼热的眼光吸引过去。他能看穿我的灵魂，这样的感觉让我窒息。终于，地铁到了时报广场。我走到门口，等着开门。我转头又看了他一眼。“并非只有你如此。”他的声音很低沉。

我朝“地狱厨房”走去，詹姆士现在住那儿。他的公寓脏得很有“风格”。咖啡桌、小桌上有很多空啤酒瓶，烟灰缸已经堆满烟蒂，色情杂志扔得到处都是。不过，虽然景象如此，我并不感觉很突兀。这很像电影的场景。还配上詹姆士特有的华尔街“玩具”：超大的屏幕、Xbox游戏机、高尔夫球杆、名贵手表、汉普顿度假时的照片，厨房柜子上吊着他保时捷汽车的钥匙。

紧紧贴着他的是他的女朋友，他们坐在沙发里，詹姆士正在吸一条可卡因。他跟我介绍说那是杰西卡，她看上去像个脱衣舞娘：金发是假的，那对大奶子也是假的，妆化得像个小丑。我就想拿点可卡因然后走人。但我坐下，表现得有礼貌。他们把满是可卡因的盘子朝我一推，我刷刷刷吸了三条。詹姆士说杰西卡有些朋友可以一起约过来。“不用了，”我说，“我还得去见几个朋友。”我知道，他们都清楚我是骗人的。老子不管那么多了。把可卡因给我吧，我这就走人。

半小时之后，我走人了。我在“地狱食堂”附近逛着，想找个没人认识我的酒吧。在第9大道上，我看到一个地儿。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

之后，发现我是里面最年轻的，我比其他人都小大约二十岁，除了那个女调酒师。在那么昏暗的灯光下，她显得很寂寞。她朝我笑的时候，我看到她一嘴黄牙，而且凹凸不平。酒吧里只有五六个老男人。我坐在一个人边上，他粗糙的双手抱着那瓶长颈的酒瓶。他用脏脏的指甲抠着酒瓶上的标签，对着酒瓶喃喃自语。我点了一杯龙舌兰加冰块——哪个牌子的我不在乎。酒吧里没有音乐。这还不错。

2009 年 7 月

下班了。我在第 5 大道上走着，有人抓着我的手臂，把我从拥挤的人行道上拉开，是司莱恩。好多年没见到他了。他的衬衫松松垮垮的，从没见过他穿不紧身的衬衫。据华尔街的留言——卡斯跟我说，证监局在调查拉吉，他们派人打进高利安，身上还带着窃听器。司莱恩现在有没有带窃听器？他问我波克维兹公司对我怎样？他很早就认识杰夫了，他说。接着他问我在交易什么类型的股票，需不需要点消息？如果在其他场合，这样的谈话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我又看了一眼他的衬衫，现在这种情形下，我躲都来不及。“我说啊，老兄，见到你，我很高兴，但我现在得去开个会。”

“那就这样对待带你入行的人？”他说。

“不好意思。”我说。我真怕说漏些什么东西，并且，詹姆士正拿着可卡因等着我呐。

当天晚上，我回到公司。会议室一片漆黑，对面街上公司微弱的灯光照到我们这里的地上。我知道我无法入睡，但我总得在什么地方待着。现在大概是凌晨 3 点。我爬到大桌子底下，把手机闹钟调到 6 点：以防万一。我闭上了眼睛，把双手放在我的光头上，我的手指可以感觉到发茬。

这都怎么啦？

3月份的时候，简告诉我她受够了。我们准备要卖房子了。她说她忍无可忍了，她要我搬出去。但我租不起公寓，更别说是酒店里住一晚。所以我只能睡沙发，周末回汉丁顿湾的家里拿些干净的衣服，过个周末。

切斯公司把我们的房屋贷款给停了。我身无分文。虽然我们公司2008年业绩超好，上升了10%，但是我的奖金跟公司业绩不成比例。我们管理的资金不够多。我的工资不够付房贷，我还得养家糊口。

我睡不着。我每十五分钟就醒来一次。我在办公室四周走来走去。我走进洗手间要看看我自己。大家来上班的时候我得看得过去。我的脸干巴巴的，我的眼睛充满血丝，但是我的头剃得光光的，过夜包里还有干净衣服，所以没有人会看得出来我没有洗澡。

没有一个人给我们的房子报价，我们总不能把房子送人吧。我要回家，我明天下午下班后要回家，我要看罗拉，我要的不只是干净的衣服。如果卡斯没有把我赶出来，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上星期，我没得到他的允许，就想去他家过夜。门房不知道卡斯不让我来。但我是凌晨三点才到他家的，公寓大门已经关了。我只好在大楼自行车间的冰冷瓷砖上睡觉。这个停车间是大家往下面扔垃圾的通道。

大家都躲着我。我在两个不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家里借宿过，他们两个的名字都是凯里。过了一周，他们俩分别告诉我不能让我住下去了。他们都说他们不能再纵容我了。他们说我需要告诉老板，我需要回去戒毒。他们搞错了。我一定要戒毒，现在就开始。

我回到公司的会议室，在桌子下面躺下。我需要抽根烟。我从桌上抓起门卡，因为我等下还得进来。到了楼下，我走向第3大道去吸烟。我需要把体内的毒给降下来。我需要酒精。我需要点什么东西。既然下楼来了，我得抽两根。我点燃第一根烟。我看到几个街区外的地方，有

人在骑车。他太高大了，骑那辆车不协调——他有七英尺高，是个黑人，留个大爆炸头。他没穿衬衫，在第3大道上骑着。他越骑越近，开始盯着我。他离我1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他在短裤的口袋里掏什么东西。他几乎到我面前了，接着我看到他拿出的是手机。他用手机对着我。我们相距只有一英尺的时候，他拍了我。

我回到办公桌下躺着，心有余悸。我全身颤抖。我的双手在颤抖。他为什么只给我拍了张照片？

2009年10月16日

此时的我，穿着内裤、白T恤，浑身发抖，光着脚站在我家的前廊上。温度只有摄氏5度左右，湿气让我感觉更加寒冷。外面仍是一片漆黑，但我很快就得上班去了。户外的桌子上已经有两个空的可卡因袋子，我打开了第三袋。我把钥匙深深插进袋子里，尽量挖出较多的可卡因，然后一吸到底。插、挖、吸，插、挖、吸。

烟灰缸上放着的烟还剩一半，我已经又点了一根。我的心脏飞速跳动。它即将爆炸，我知道的。我对着酒瓶灌了些威士忌。瓶子里剩下三分之一，我一口全部灌下。

太阳渐渐升起。我无法直视阳光。屋里面，家具寥寥无几。沙发、电视（还开着），客厅里还有一张椅子。我得再抽几根烟。我爬上楼，走过罗拉以前睡的房间，里面空空荡荡。我不敢往里看。我走到主卧的衣帽间。简的那一半完全空了——我不往那边看。我翻了几件大衣的口袋，想看看有没有新港牌的烟。我冲下楼。罗拉、简还有狗都不在了，这屋子一片死气沉沉。我还需要多吸点可卡因。

我看了手机，5：30。我必须躺会儿。我从沙发上抓过一个枕头，压住胸前，希望我的心脏别跳出来。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再看手机的时

候，已经是 5：59 了。我得出发去上班了。我冲进浴室，钻进淋浴间。我整个身体剧烈晃动，双手抖得像是发癫痫。洗发水的瓶子从手中掉落，我捡了起来。我想挤出洗发水，但是，瓶子不断滑落。我放弃了。我站在冰冷的瓷砖上，赤裸着身体，全身滴着水。我双臂抱在胸前。

四十英里外，在萨顿生活区，我的前老板——高利安的拉吉，穿着运动服，骑着运动自行车，欣赏着窗外东河的美景。运动装闪闪发亮，一条毛巾围在脖子上，就像一个套环。他额头上不断冒出汗水。我没去过他的公寓，但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人去过。他们说他家美极了，肯定值几百万，但对亿万富翁来说，这房子还算比较保守的。电视名人朱迪是他的邻居。当然，他在格林尼治区还有房产。拉吉今天安排好了行程要去英国，给一个 2 亿美元的基金做开幕式。他一直骑个不停。

而我，全身还湿答答的，在几乎空荡荡的客厅里踱来踱去，盯着我手中的手机。我练习着说你好，但每次我的声音都像是很兴奋的样子。我真的很兴奋。我没办法打这个电话。最后，不知怎的，我鼓起勇气，滑到杰夫的电话，拨了号。电话每响一次，我都控制住自己不要挂断电话。最后我听到他的声音，“喂。”他说。

“我今天没法来上班了。”我说。

“你还好吧？”杰夫问我。

6：30，拉吉公寓的门铃响了。毫无疑问，他觉得很奇怪。如果你住在萨顿区，门铃不会这么无缘无故地响起来的。打开门的时候，他的惊讶变成了惶恐。门厅里站着六七位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有几位穿着带有 FBI 标志的风衣。

“不好，”我对杰夫说，“我不行了。”我不知道杰夫知道多少我吸毒的事情，但是我想他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他听上去很担心我，但他并没有觉得吃惊。他说他会再给我打电话。“杰夫，我今天上不了班了，”我又说了一遍，“可能今后都来不了了。”我嘟囔着。我挂了电话，又吸

了一些可卡因。我知道这只会让我的情况更糟，但是我别无选择。我抓起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把最后几滴酒也喝光。我走到门廊，又点上一根烟。前花园此时完全沐浴在晨曦中。从夏天开始，草地就没有整理过，花园长满了野草。我看到车道远处停着一辆车子，之前我看到那辆车开过我家门口。我回到客厅，关上电视，把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

在所有联邦警员的注视下，拉吉穿上白色的衬衫，领口敞开着，穿上一件绿色毛衣，再穿上一件蓝色的外套。他穿好之后，一位警员让他把手背到身后。他的手腕感觉到了冰冷的金属，接着听到手铐扣上的声音。警员问他有没有枪支，家里有没有毒品。他觉得他们可能会再栽赃些什么。他老婆孩子还在家，这情景他们绝对不会忘记。警员对他宣布，他因内幕交易被捕。他们把他带出公寓，带出大楼。

我的可卡因都快用完了。我的手机响了一下，有短信，我差一点从沙发上跳起来。我不敢看。我抓起枕头，用它紧紧压着我的心脏，防止心脏跳出来。我摸到客厅的窗户那里，站着，躲在窗帘后面，偷看车道和街上的动静。有一辆暗黑色的小轿车——我想跟之前在门口的是同一辆——在开过我家的時候，放慢了速度，司机转头看我。我僵住了，我怕他知道我在看他，我也怕转头看别的地方。

拉吉坐在联邦调查局的审问室里，他的律师还没到，他不需要律师。按人种说，拉吉是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斗士身上都带着氰化物胶囊，绕在脖子上。被抓之前，他们都会自杀的。拉吉什么都不会承认的，他不会配合的。审问持续了好多个钟头。警员播放了拉吉电话的录音，那些可以定他有罪的证据。但拉吉什么都没说。

我的手机又响了，一直响个不停，是短信。几秒钟之后，手机又响了几下。这是怎么回事？我抓起手机看了第一条短信——拉吉被抓了。下一条说的是联邦调查局突袭检查了高利安公司。短信不断进来，我的手机响个不停。

我麻木了。上帝啊。现在好像都说得通了，联邦调查局也要来抓我了。我冲到厨房里，把满是证据的可卡因盘子抹干净，接着冲到厕所里，把剩下的所有可卡因冲进马桶。应该不是关于高利安的事情。我没有干什么错事。我的头脑里闪过一系列的交易。是诺顿，我想。不，不可能是那个交易，我啥都不知道，都那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算是进行内幕交易吗？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他们知道我付佣金是去买毒品的。“白宫”！就是它。兰迪那兔崽子说过的。他们有照片，是詹姆士在街角把毒品交到我手里的照片。我完全毁了。他们要来抓我了。

我又去查看窗外的情况。有两辆深色的轿车慢慢在街上开着。车里有好几个人。我看到他们打了转弯灯。他们要转进我家的这个车道了。跑吧！我想着。往哪儿跑？

我无处可逃。要不我装作不在家吧。那两辆车已经开过车道的一半了，肯定是联邦调查局。我要被抓进监狱了，死定了。什么都不能招。你什么也没做错。但我什么都做错了。我看着入口处大门那里的一面镜子。我很消瘦。我还穿着内裤和T恤。我黑眼圈上面的眼珠子暴起，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结局。我听到拍门的声音。

我看到有三个穿西服套装的人从车里下来。我必须面对他们。我打开门，走了出去。朝阳照入我的眼睛，几乎让我失明。我几乎都看不清朝我走来的三个人的样子。我吸毒太多，太兴奋，哭都哭不出来。我不反抗了，就这么投降，甚至还感觉到一丝丝的宽慰，犹如即将溺死之人坦然接受水中死亡。老早之前我就对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控制。在当买方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一切：我的亲人、钱，还有最重要的——我的自尊，现在失去的是我的自由。我以为我很在行，但是我错了。衡量在华尔街成功与否的，不是工资和奖金，而是交易桌上照片里儿女穿戴的球队制服、帽子还有毕业服。衡量在华尔街成功与否的标准，跟衡量其他职业的工作者的标准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是工人、数学老师或者是编

因州的一位有着四个孩子的工程师。

当那三个人走到房子的阴影下，我才看清那些熟悉的身影。我的紧张迅速得到释放。凯文昨晚给我发的部分短信，我突然想了起来。他看着我，我还光着脚，只穿着内裤，他脸上浮出一丝担心又同情的表情。和他一起的是克里斯以及另外一个叫吉姆的朋友，我以前见过他。“你得离开一阵子。”凯文说，他清澈的蓝眼睛似乎看穿了我的一切。我无法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真诚，但我又无法转头装作视而不见。

我的大脑开始飞速旋转找寻借口：一走就是一个月，我办不到，我想。工作怎么办？房贷怎么办？我怎么跟罗拉解释？但是我的嘴里只说出“好的”这样的话，而且一说完，我全身洋溢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解脱。

“戒过一次毒的人，大家都会帮他。戒过两次毒的人，大家都会离你而去。”他说。他的话非常真诚。他的话，我信。“我们会一直帮你的，兄弟。但我保证，如果你继续这么搞下去，大家肯定会离你而去，而且是很快地远去。”我觉得很多人已经离我远去。

在我心深处，我知道，都过去了，全都过去了：吸毒、酗酒，还有我帮买方塑造的那个特尼。我想我的女儿，想起我应该在ta身边而又不在的那些时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凯文把他的手搭在我松垮垮的肩膀上。我需要相信他，超过一切。

出租车从拉瓜迪亚机场开近家门的时候，我很兴奋地看到简的车停在车道上。我的肌肉绷紧了。昨天我从劳德代尔堡戒毒中心给她打过电话，我问回家后是不是可以见见罗拉。她们一直住外婆家。当我付了出租车钱，从后面拿出大行李袋，走上门廊，我的胃却开始打结。不知道女儿见到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30天没见到她了，这简直像是永恒那么久。

通过玻璃窗，我看到罗拉和简在厨房里玩。我推开门，罗拉抬起头。她认出我，脸上泛起喜悦。她向我跑来。“爸爸！”她叫着，那声音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我紧紧抱着她。她散发出的温暖如此纯洁，顷刻打散我的所有焦虑。我怎么会那么傻，竟然几乎失去这么珍贵的东西？简曾问过我，是不是爱可卡因胜过爱罗拉。我理直气壮地反问她的：“你怎么可以这样问？”我从没想过我更爱谁。我只觉得我没法控制，我就吸一点点，下一次就不会了，但每次我都会再吸。每次的吸毒高潮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和女儿分开。我想戒毒中心和支持小组会上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在毒品和酒精面前我力量微弱，只要我一碰它们，我就开始对生活失去控制。但没有对，也没有错。我抱着罗拉，心想我再也不能做错误的决定了。我从眼角看到简在流泪。

第二天是感恩节的前一天。我打电话给杰夫说我可以回来上班了。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时候跟他联系过几次，他很支持我——我不在，他还

照常支付工资。我说我星期五会上班。我记得 1994 年刚到纽约在拉昆酒吧碰到拉瑞的情景，他说：“感恩节之后的那一天一定要上班，这会让你看上去像个英雄。”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当英雄。但杰夫说这周让我在家休息，星期一再来。从他的口气里我听出有点问题。

星期一早上，我早早来到办公室，打扮得清清爽爽。办公室里一片整洁，有点儿亮，让我有点受不了，好像整个大楼都换上了较高瓦数的灯。我很紧张。过去十年左右，我的生活好像是处于双重的状态，有时我气焰嚣张，有时又很自卑。戒毒和康复就像是给我的嚣张气焰泼了冷水，让我脆弱不堪，自我怀疑。我很担心大家会怎么对待我，特别是杰夫。

我到办公室还不到 15 分钟，老板就叫我到他办公室去。杰夫开始问我情况怎么样。他人很好，说要克服我这样的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他为我感到自豪，等等。但他话锋一转，开始讲生意，讲公司状况，说公司状况不是很好。我们公司所经营的资产数量又下降到了我刚入公司时候的水平。投资者们把我们当成资金来源，尽管 2008 年我们表现不错，但资金还是被撤走了。我此时才意识到我们今天见面的目的。

但即使我被炒鱿鱼，我也不会再用毒品的。负面的情况通常不会直接就把我推向酒精或毒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放手也是一种解脱。我也还没有准备好继续来当买方。我最后一次走出波克维茨的办公室，心想着，我今后还会回来吗？

我们的房子已经无法获得新贷款了，简和我也已无法复合，也没有公司要再让我当他们的交易员，这几个月的日子我过得简单而满足。我报名参加了戒毒中心一个社区活动，每个星期参加几次支持小组的会议。华尔街的一位同事介绍我帮他推介他的地缘政治研究——我在波克维茨用过他的服务。我需要做的就是按通讯录逐个打电话，然后数数看还有几个人没有打。不过这个工作最有利的一点是，我可以在家里工作。我

可以有时间每周三次带罗拉去上学前班。我还可以有时间来写作。

我在戒毒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了。我写作时犹如凯鲁亚克一般思如泉涌，当然了，只是量多，质则未然。说实话，写下来的东西也许不够精雕细琢，但从某方面来说，确实也很不错。似乎在我离开大学之后封闭了的门，通过写作又给打开了。在华尔街做事的时候我也几次想推开那扇门——写电影剧本、嘻哈歌词，等等。然而，尽管我的梦想是追逐利润和灵感，我的工作却总是把我的创作力推向一个黑暗的角落。并非我一人如此。在华尔街我一起工作过的人当中，有最风趣、最具创造力的人。但是，他们的奖金、他们的才华都被尘封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戒毒的初期，开始清醒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的时候，我开始让我的梦想驰骋。但这在现实的世界中却没有那么容易做到，而且买方也暂时不会离我而去。

我开始向一个新的大型对冲基金推介我的地缘政治研究，这家公司叫先锋路径，他们让我过去跟他们谈谈。他们的办公室巨大无比，什么都是新的。前台接待员向我问好，带我到会议室，路上还问我要不要喝咖啡或水。当我开始把研究的资料放在桌上时，有个叫德里克的瘦瘦的黑人走进来，笑得很灿烂。德里克还在帮雷曼公司当交易员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虽然我们不是非常熟，但是我记得我们一起出席过一些有意思的晚餐会。我还记得他非常喜欢玩扑克牌，我挺喜欢他的。他走过来，给我来了个华尔街式的拥抱。这是我的第三场推介会，所以，即使我面对的是朋友的笑脸，我还是有点紧张，于是介绍得不是很好。但我跟他解释，非常诚恳地解释，我以前用过这产品，我觉得它有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对买方有哪些帮助。虽然他很关注地看着我，但他像是在假装对我的东西感兴趣。他的脸上一直堆着笑容。我介绍完之后，他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微微地点了点头。“你干这个每年挣多少钱？”他问我。我往旁边看了看，心里琢磨着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想不出来。我知

道今年的收入肯定低得可怜，可能就3万吧。

“大概30万吧。”我说。我就这么撒谎了。“也可能，少点儿。”

“如果我给你一倍的钱如何？”他说。他笑得更灿烂了。好多钱在我眼前舞动，闪烁着。“下星期再来一次，咱们好好谈谈。”他站起来，伸出手，我们握着手。“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保健板块交易员。”

10分钟之后，我走在外面的大街上，手机里来了一条短信，提醒我下星期见先锋路径的人事部经理。我的大脑开始想象着各种场景。有他那种保证，我闭着眼都可以赚上一百万。我甚至还可以把那房子保住，也许可以搬回市里，在翠贝卡买套公寓。如果继续不吸毒、不酗酒，我会有很多钱可以花。

跟人事部的面试无可挑剔。我很清醒，这让我颇为自信。对她的提问，我应答如流，我想让她知道我有童子军般的工作态度。面试结束了，她让我明天再来，见见其他交易员。“非常乐意。”我说。

第二天，那些交易员还给我小测了一下，问我关于奥巴马和医疗改革的事情。来见他们之前，我问过保健黑手党的朋友克里森，他现在还在搞保健股交易。克里森跟我讲了些我不知道的事情，立刻把我以前知道的事都给联系上了。面试时，他们的每一个问题，我的回答都正中要害。这感觉超好，我的思路这么清晰，我感觉那么自信。我心里知道，能被他们聘请是件好事——如果我能不吸毒、不酗酒。但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吗？他们让我再来做最后一轮的面试。

在回来的路上，我打电话给简、凯文、塔克舅舅还有我父母，问他们意见如何。他们的意见各不相同——简说“你自己决定”，塔克舅舅满是热情——但最终都归于一点：我必须做我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你想太多了，”凯文说，“工作还没拿到手呢。”他只提醒我，我必须做的就是不要再酗酒和吸毒。“如果你做到了，一切都会顺利的。”他说。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我知道他们会给我这份工作的，如果他们给了我，我不知道要如何拒绝。我需要钱，但我觉得好像是在签自己的死亡证书。我不知该何去何从。我从没扮演过他们说的上帝的角色。我记得小时候上过几天主日学校，那是我们一家人还住在俄亥俄州的时候，我们会上教堂去。但后来我们搬到缅因州，我就不记得再去过主日学校。有一次——可能是感恩节或圣诞节，全家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她们不相信上帝，她们要投票给民主党。“养不教，父母过。”妈妈哭了。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认为宇宙有一个主宰——同时是善恶的化身。我这辈子一直都能感觉到那两种力量。在毒瘾发作的时候，我看到至恶，在罗拉的眼里，我看到至善。女儿的眼睛是我每晚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影像。

第二天，我又坐在了那个会议室，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坐在这里了。一个男的走进来，他的穿着气势压人，非常“华尔街”。他手里拿着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带的简历，上面写了不少东西。我跟他紧紧握手，我看着他眼睛。我们聊着股市、我的房子、他的房子、我女儿、运动，还随便聊着纽约。他坐在我的对面，微笑着。“这么说，你觉得你是很棒的保健板块交易员喽。”他说。这句话让我愣住了。难道我的简历上没有写清楚吗？

“其实呢，”我说，“自从2006年我离开阿格斯公司之后就没有做保健股交易了。”他听我这么说，眉毛开始往上挑。“没错，”我说，“在波克维茨我们什么都做，就是不做保健股。”

“哦。”他的反应就剩这一个字了。

“对，”我说，“我四年来没有做过一单保健股的交易。”

他把头暂时歪过一边，也许他觉得我紧张了，我一点儿都不紧张，这辈子我从没这么镇定过。他开始进行工作描述。接着他说，先锋路径是国际性大公司，假日也得轮班，晚上也得轮班云云。我打断了他。

“呃，我想这不适合我。”我说，“我女儿才四岁。如果我假日上班，每周几个晚上得上班，我想这不行。”他的脸上出现一丝微笑的痕迹，似乎他在跟我分享着一个特殊的时刻。我想，他在面试中一定没有见过我这样的人。“我觉得我无法这么做。”我说，尽量脸上带着微笑。其实，我的微笑没有停过。这是我进行过的最好的面试。他把笔套上，继续对着我微笑。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或其他什么想说的吗？”他问我，用这么老套的结束语来结束最不老套的面试。

“没有。”我说，“没有了。谢谢你的时间和你的考虑。”

我走出那家公司的大楼时大约是9点半，中城区最后一波上班人潮在我身边涌过。天气很冷，天色阴沉。我抬头看着玻璃大楼之间留下的那片灰色的天空。我站的地方是第54街和莱克星顿街，在波克维茨公司和我自导自演自摔的地方的正中间。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我知道，我的买方生涯终止了。我不知道人生下一章会是什么——但不管往哪里冲，我都准备好了。

尾 声



2012年4月28日晚上，8:06，我坐在厨房里，穿着睡裤，穿着一件旧的白色T恤，上面写着“我知道：有型”。不幸的是，我把这件T恤和红色衣服一起洗了，所以这件T恤现在带点粉色。这一年来我在公寓里几乎就是这身打扮，当然了，我会定期换洗衣服的。看着窗外，景色让人遐想万分。从某种角度来说，特别是在晚上，华灯初上，景色有点像我书里写的景象。我每天数次会看着东河，特别是在我写作间隙休息的时候。我会想，那里又有多少故事正在发生。

此时我住在长岛的一间一居室的公寓里，比1994年我刚到纽约时住的那间小卧室还小。但这很适合我，需要的东西都有。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喝酒或吸毒了。确实不容易，有些时候特别不容易。我现在的目标不是快乐，而是内心的平和。女儿的抚养权我有一半，我每天跟她讲话，每天写作。虽然我的钱都已挥霍一空，但我从未如此快乐过。

六个月之前，一个朋友说我应该写一本书，把我的华尔街棺木钉上最后一个钉子。我立刻说：“锤子拿来。”对我来说，这本书意味着一个高潮和一个新的开始。我是为我自己而写的。写作是我必须做的事情。

我经历过那些挣扎，我不怪华尔街、买方、毒品和酒精，也不怪任何人。写下我的经历，能够更加清楚地照亮这个行业的黑暗处。当我看着镜子里的我，我没有看到华尔街。

写书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愤怒。在金融界工作的时候，我遇到了最让我着迷、最聪明、最诚实、最友好的人，我不想给他们抹黑。每个行业都有好人和坏人，华尔街也不例外。

但如果你在华尔街经营一家公司，几年之后，如果你看到我来敲门要找工作，要让你帮帮忙，你就笑笑，对我说：“我们不招人。”

谢幕之后



每次我坐下来写作，我都会闭上眼睛，双手按着我的心，说：“感恩、意图、鸣谢、谦卑。”

感 恩

关于宇宙是怎么形成的，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谈谈。

我的宇宙里明星有许多，如 Julie Flanders、Nathaniel Tilton 和 Brian McDonald。Julie，是你的直觉、你对我的指导还有你的爱心，帮我找回了深藏在我心中的那个作家。我无意中到了你的办公室，又在无意中开始了写作。Nathaniel，咱们 80 年代就开始一起写歌了，这么多年以后，咱们又同时写着自己的书，我觉得你——我儿时的同伴——一直在支持鼓励着我。Brian，是你教我如何写自己的书的介绍，是你从我书稿的字里行间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内容和信息，你是我的朋友，我的导师，我的兄弟。

我的天空中另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是 Leshne，我的经纪人。Lisa，是因为你的执着、你的洞察力还有你的辛勤工作，才使得本书得以完成。大家都说要找经纪人很难，找到好的经纪人更难，但我是幸运儿。你的热情、你诚恳的反馈还有你的专业知识，带领我一步一步走完这个写作的旅程。你让本书增色不少。

另一颗明亮的星星是 Rick Horgan。Rick，著名编辑，名声在外，让

我受宠若惊，但是你又是如此友好亲切，对我谆谆教导，把本书的层次梳理得更好了。我非常感激你看好我的故事，并督促我发挥自己的极限。

意 图

救命、疗伤、娱乐……最近几年我一直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如何不断写作？我的意图就在于此。

鸣 谢

给我帮助与鼓励的亲朋好友非常多，在此一一感谢：Lola Duff，我的母亲和父亲，Debbie，Kristin，Kelly，Tucker Sine，Ethan 和 Lenore Duff 夫妇，Rob 和 Eliza Sine 夫妇，Gretchen Berg，Suzanne Turner，Jennifer 和 Claire Scully 夫妇，Gutkowskis 一家，Jason 和 Lauren Kondi 夫妇，Keith 和 Brooke Savitz 夫妇，Dave 和 Sara Roter 夫妇，Steffen 和 Meg Kondi 夫妇，Scott 和 Michelle Levy 夫妇，Pete 和 Ruth Coccozza 夫妇，Scott Friske，Sam Sebastian，Dave DeWalt，Brad Cochran，Monday Men，Don Bosco Hewlett，Kevin Breznahan，Todd 和 McWilliams 一家，Writing Sober，Perry Hodge，Kevin Weir，Mike Breheny，Jayme 和 Caseys 一家，Chris Lottridge，Peter Young，Kevin O’Keeffe，Chris Langel，Kelly Dillon，Kelly Schwartz，Mike Elovitz，Patrick Grady，Sean Farley，Francesca Kimpton，Joe Foster，Dave Fromm，Sara Blakely 和 Jesse Itzler，Steve Ehrenkranz，Kelli Deveaux，Marisa Polvino，Dan Purnick，Rob Lubin，Jennifer Kalish，Ric 和 Lauren Weisgerber 夫妇，Ross Peete，Dan Simon，Dave Morris，Liz Wintrich，Patty Donaldson，Katie DiMento，Johnny Hong Kong，Bob Cook，Buckles，Caroline Cofer-Golin，Charlie Della Penna，Jon Fox，Chris O’Connor，Heather O’Hara，John Latino，JT，Kia，Lauren Tant，Lillyan Manus，John Lewin，Lisa Bloomquist，Michelle Debusschere，Joe Assad，Joel Morgan，Lori Carson，Pete Murphy，Matt Candel，James Karabelas，

Megan Basten, Kathleen Reardon, Kim Duda, Jim Heins, Amber Senn, Billy Gaus, Chris Arena, Dan Fox, Jaime Meagher, Jeff Bennett, Jen Bingler, Jeremy Bronfman, Joey Raia, KerynLimmer, David Slaine, Todd Harrison, KrishenSud, Jeff Berkowitz, Pat Shevlin, Chris Birch, Roger Meilleur, Austin Graham, Errol Gluck, Carly Novich, Mike Masiuk, Dave Osh, Oliver Wiener, Steve 和 Judy Taylor 夫妇, Brian Volpe, Steve Starker, Andrew Walker, Matt Walton, Fred Berman, Zandy Reich, Mary Vogt, Joe D., Danny Breen, Rich Giroux, Melinda Loiacono-Zech, Kevin Debbs, Collin Henne, Bruce Cachoch, Dan Hess, Ted Pratt, Christina Carathanassis, Wenja 一家, Nicole, Eric, Dr.Kondi, Recovery Place 康复中心, Cotton Wood de Tucson 中心。

另外,我还要感谢皇冠图书和蓝盾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的热情推动着这本书的出版进程,特别要感谢 Tina Constable, Tara Gilbride, Paul Lamb 和 Mark Birkey。

谦 卑

有进展,但不完美,我仍需努力。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5242

THE BUY SIDE
A Wall Street Trader's
Tale of Spectacular Excess

揭开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都未曾触及的角落

弗兰克·帕诺伊 / 《贪婪会传染》作者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是“绝命毒师”在华尔街的闯荡，只不过《痛与爱的交易生涯》不是小说。特尼·达夫在每个重要的人生拐点都被欲望左右，他所目睹的犯罪行为，金额之大，令人瞠目，他也涉足其中……如果你想对华尔街的丑陋有第一手的了解，那就看看这本书。

科林·布罗德瑞克 / 《黑猩猩》作者

把电影《华尔街》里的哥顿·盖柯和巴德·福克斯，还有《亮光》、《大城市》杂志扔进果汁机，加一盎司的可卡因，再倒入一瓶培恩牌龙舌兰酒，最后，把心爱的玩具小熊扔进去，你就调配出了自己的《痛与爱的交易生涯》奶昔。我喜欢特尼的风格，他是有良心的疯子。他的书，我爱不释手。

劳伦斯·麦克唐纳 / 《常识之败：雷曼背后的金权角逐》作者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揭开了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监守自盗》都未能触及的角落。特尼·达夫带我们坐在前排座椅上看到了华尔街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特尼的传奇经历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他如何在欲望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并最终领悟了真正的人生价值。

布莱恩·欧迪 / 《高潮——国际毒贩的自白》作者

《痛与爱的交易生涯》的叙述真实详尽，带读者一起领略极端疯狂之旅，谁都不想错过分毫。特尼·达夫在刀锋行走，一无所有，但其交易量却富可敌国。坐稳了！《痛与爱的交易生涯》要带你横冲直撞，但车上没有安全带可以缓冲严重的撞击。

做大家好书 传至简之道

http://www.crup.com.cn/djbooks
购书热线：010-62517677, 62510642
电子邮箱：djbooks@crup.com.cn



关注人大社大家好书

上架指导 金融/纪实文学

ISBN 978-7-300-21930-1



9 787300 219301 >

定价：42.00元